

AGNES SMEDLEY

史沫特莱文集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ZHU DE



3

715/1=2

62014

史沫特莱文集

伟大的道路

——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梅念译 胡其安 李新校注



200082294



3

新华出版社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56
根据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

史沫特莱文集（三）

伟大的道路

——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梅 念 译

胡其安 李 新 校注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4页 18.5印张 368,000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73 定价：3.70元

出版前言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一九二九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她缠绵在伦敦病榻的时候，还在深情脉脉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终因忿忿成疾，贫病交加，溘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她在给友人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

pk 28 / 25

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史沫特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支持被压迫的人民求解放的一生。艾格尼丝于一八九〇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这贫困潦倒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史沫特莱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她十六岁的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使艾格尼丝十分伤心。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史沫特莱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后来经常为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由于她积极参加这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一九一八年三月，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直到一九二三年，联邦法庭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才正式撤销。出狱后，根据她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她的第一部文艺作品《铁窗难友》。这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行前，他曾要求见一见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能如愿；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史沫特莱义愤填膺，严酷的现实使她的思想更加激进了。因此她出狱不久，就积极投身于支持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她编辑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才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

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积极参加了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她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山额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于一九二七年请山额夫人来德国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一九二八年，她在柏林开设了一个节育诊所。此外，史沫特莱还在柏林大学教授有关英美的课程；同时，她又劝说校方同意，作为一名学生攻读印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学术性刊物，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还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她同德国著名的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成为好朋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一九二九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她一到上海，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的著作中，对史沫特莱作过一段逼真的描述：

“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一辆里面坐着一位傲慢的外国官员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开路，他竟然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那时，她感到警棍好象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看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不禁感到耻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她当时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

当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它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文章，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首次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去，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

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了支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的斗争，她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信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一九三一年二月，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终于把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四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去中国西北采访。一九三六年，她在西安期间，亲眼目睹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她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真实情况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一九三七年初，她到了延安，访问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干部，并同朱德总司令作了频繁接触，要求为他写传，介绍他的生平。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同志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为此，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在战斗中实地观察达一年之久，为日后写朱德传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的安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她以遒劲感人的通讯促使中外记者和进步人士去延安亲眼见识那里的火热革命斗争。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她不仅用她那锋利的笔锋抒发着她对

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深厚同情，而且还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国外募捐，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医药界朋友的巨大援助，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还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当敌寇对新四军驻地狂轰滥炸时，叶挺军长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军医院，她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当斗争形势日益残酷时，朱德总司令也劝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的地方，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象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究竟什么力量使史沫特莱嫉恶如仇、追求光明和奋不顾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呢？她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为什么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她从不忘记她辛酸的童年

以及她难以忍受的逆境。这也是她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真正原因。当她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时，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来。

史沫特莱认为，她在旧中国的一切行动中心，“在于要预告中国革命的发生”，她认为她自己全部历史的任务，在于挖掘和发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潜流”，并且观察这一潜流究竟要流向何处？经过十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多数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十分振奋地写道：“在他们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而且她还坚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二百万字。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史沫特莱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感到莫大的骄傲与欣慰，虽然她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就是晚

年在贫病交加、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在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一罪名使她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她几乎没有栖身之地。到处都是关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或是“卖国贼”的传闻。所有这一切，使她不可能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的美国一家出版社，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表现了宁死也不弯腰的革命精神。

但是，就在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她曾经致力于奋斗的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多么遗憾啊，就在她在伦敦停留期间，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对于史沫特莱的逝世，中国人民是十分悲痛的，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史沫特莱文集》。这套文集含有四卷，主要搜集了史沫特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她在中國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第二卷收有《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和《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两部著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五年建军史诗。这部书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最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工人运动，变成了勇敢的革命者。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这部书是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写成的，一九二九年初版，以后连续再版。

第三卷《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

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传记著作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这本书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著。

第四卷收有《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和《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中国在反击》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记下了史沫特莱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初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书中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该书在一九三三年先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史沫特莱文集》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两书在国内出版过外，其他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次出版

时，对《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某些译文又作了润色和校订。

《史沫特莱文集》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这些记述了中国人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历尽艰辛和英勇斗争的书，既是极好的纪念品，又是激励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决战斗的重大动力。重温她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切有志之士可以更好地学习她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学习她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她毕生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的高尚理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斯诺一样，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黑暗的中国点燃起信息的火炬，而这火炬又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真正是国际新闻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正如邓颖超同志一九八四年九月致三S研究会的信中所说的：“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三十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劳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

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向我们三S的老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他们学习！”

我们愿三S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愿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演奏出更加雄伟更加庄丽的《中国的战歌》！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中译本校者序言

《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终于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一个胜利成果。

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①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禁锢主义，这样一本以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朱德同志为题材的书，却始终不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这本再现了中国革命和朱总司令高大而又十分可亲的形象的作品的时候，我的记忆无法不回到将近三十年以前——一九四九年的深秋，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英中友协成立大会的情景。在会议大厅里，一位头发斑白的美国老太太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

^① 由于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本书的日译本先于英文原著在日本出版。

造新中国过程中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听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提议为在解放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肃立致哀。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莱。

象白求恩、斯诺、斯特朗一样，史沫特莱的名字在中国是大家所熟悉的。从一九二九年初，这个美国劳动人民的女儿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里这样写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见《中国的战歌》，英文版，第五〇六页）

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所著《有办法》一书中，对史沫特莱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她和我谈到对上海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她看到肩上背着绳索的码头工人，在烈日炎炎下吃力地拉着满载货物的木板车。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名满脸胡子的高个子印度巡捕，他为了给洋人的高级轿车开路，竟然用木棍向着工人赤裸的、汗水淋漓的背上猛击。此刻，她感到那棍棒仿佛是打在自己的身上。她目睹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这样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不禁感到羞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肝胆的人，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见《有办法》，英文版，第十五——十六页）

的确，史沫特莱到达中国后不久，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

社会政治运动。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监视和跟踪下，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保卫人权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她在现场报道著名的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动员和组织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解放区。一九三七年初，她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尽管她早就听说过朱总司令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但在亲身见到朱总司令之后，他的非常感人的个性仍然深深地吸引住她。当她决心为他写传，并要求他介绍他的生平的时候，朱总司令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呢？”史沫特莱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见本书《序曲》）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写过许多著名的通讯，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战地报道。一九四〇年九月，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她离开中国去香港休养。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返回美国，先是住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关于中国的写作、讲演和辩论，为中国募集救济战灾的捐款。四十年代中期，她移居纽约附近的耶德庄，着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样，史沫特莱在耶德庄的相对安定的生活中断了。她不得不和猖獗

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陆军当局撤销了对她的诬陷。就在这一年的八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它和史沫特莱曾经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

一九四九年十月，她从广播里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不可能给她到中国来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

一九四九年深秋，在反共的狂热席卷美国的时候，她悄然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多雾的伦敦，寄居在她的老友希尔达·赛尔汶—克拉克家中。这时，她患着严重的胃病，身体很弱，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已经给予新中国以外交上的承认，但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她经常出席伦敦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在这短短半年时间（不幸这也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接触过程中，她的坚韧、诚挚和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约我去吃她亲手做的中国菜。当我去到希尔达家的时候，几位英国和澳大利亚朋友已经在座。史沫特莱兴高采烈地教大家跳美国西部的土风舞。晚饭后，史沫特莱的情绪似乎特别好。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希尔达客厅的壁炉里火光熊熊，更添加了友谊的温暖。她滔滔不绝地谈着关于中国的事，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坐在我身边的一位英国朋友说，“她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史沫特莱无疑是很欣赏这个风趣的评论的。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这样向往着中国呢？那天晚上，史沫特莱的一段讲话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她的声音有些激动，“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原因，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史沫特莱的燃烧着希望的眼睛瞩目的我，“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大使到伦敦来——什么时候呢？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史沫特莱就是这样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新中国。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她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靠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不肯中断《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四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她的信，让我尽早到她住处去。没想到只是半个月不见，她突然消瘦下来，脸色灰白，声音略带嘶哑。她告诉我说，她即将去牛津医院动胃切除的手术；虽然医生早就让她住院，但由于朱德传记尚未修订完毕，她不能去接受手术，因为也有可能手术后就“没有机会再写下去了”。她满怀希

望地说，“如果手术成功，我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不过，这时她好象已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她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手术失败，这就是永别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位始终象一团火似的史沫特莱，脸上出现了伤感的表情。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话不幸成为事实，这一次的会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希尔达的电报给我带来噩耗，史沫特莱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逝世，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总司令处理。

距离史沫特莱逝世半年多以前，她在美国曾经给朱德同志写信，表示了她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见本书附录）

史沫特莱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遵照她的遗嘱，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在北京安葬。走进八宝山烈士公墓，人们可以在陵园西侧看到史沫特莱墓前竖立着的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金色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九六〇年在北京接见阔别二十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史沫特莱和罗斯福表示深切悼念。（见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

英文版，第七十七页)

时光流逝，这两位老人今天都已长眠地下。一个是正当花甲之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年代里，在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迫害下积愤成疾，不治而终；一个是在九十岁的高龄，当“四害”的淫威涂炭中国大地的时候含恨离去。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终究不能长久，历史总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如今，麦卡锡主义早已被美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四人帮”也被中国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本书出版的时候，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隔着太平洋相望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被人为地分隔开来的历史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朱德和史沫特莱黄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史沫特莱的这本传记著作，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为了在涉及历史年月、事件和人物诸方面求得尽可能准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同志做了必要的注释；此外，北京图书馆李希泌同志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当然，这本书是在三十年前由一位外国朋友写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要求它在史料的取舍、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上，都能恰如其分。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史沫特莱写作本书的过程，以及她对我国的深厚感情，中译本把朱德同志和史沫特莱之间在四十年代末期的来往信函三件，及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一文作为附录，选入本书。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

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和他的传记作者史沫特莱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胡 其 安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中美建交之日

原出版者序言

当代的历史学家特别容易犯错误。他们不但苦于得不到同问题有关的各种实际情况，而且在事件的变化多端的过程中，也很难了解事实的真相。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它即或不是决定性地，也是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均势。它对于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或许连同在非洲的帝国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确切显示，在一个经济落后，只有规模很小的现代工业基地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国家里，也可以成功地进行社会革命。

生活本身，总要比任何理论（不论它是如何微妙与复杂）更为丰富多彩。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学派的人。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局限在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之内，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说，“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容易对口。”不过，他们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到一个更有伸缩性和更高的水平，它联系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严峻的现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无须等待未来历史学家的判断，就可以断言，就中国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起他们的外国良师益友，不论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都是更为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一种荒谬的遗产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人们相信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免因相信外国共产党人的建议而犯错误，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外国共产党人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和汉口发生反革命事件前夕的错误，以及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的错误，招致了严重的损失和伤亡，其后果几乎等于自杀。但车轮还是要向前转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外国建议和援助的依赖，要比国民党在丢失政权过程中对于外国建议和援助的依赖少得多。这里也就无须把这一点教训再向各地的进步人士，不论是工业先进但经常是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里的进步人士，或是仍在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进步人士，特别指出了。

当代历史学家容易犯错误这一事实，并不能减轻他们对当前一代或对后世所应负的责任。正如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美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起伏。直到今天，关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背景和进程，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和可靠的英文书籍出现，这很可悲，但它是事实。然而，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千百万中国人民第一次为了铸造自己的生命而开展的积极行动，其吸引人的程度，所充满的戏剧情节，以及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一七八九——

一七九三年的法国革命相比，也毫无逊色。西方许多论证中国革命史的著述，往往掺杂了很多关于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事实，甚至这两方面的材料，几乎占了同等的篇幅。它们对于这些材料的观察，和老中国通看中国一样，也受到欧洲中心论同样性质的局限，尽管程度有所不同。除此之外，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士还仰仗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一书，来探索他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不论这本书有怎样的文学价值（毫无疑问，价值很大），《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港口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到了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的现代历史作品开始比较可信了。一批美国人写出了或是直接报道中国，或是以中国为主要背景的优秀作品，虽然我们 must 承认，除了一两个人属于例外，作者里面并没有职业历史学家，而且这股潮流最近也逐渐衰竭了。这些杰出的作品，首先令人想到的，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了世界》，《史迪威日记》和卡尔逊的《中国军队》——这里不想把书单全部列举出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著作在这一类的书单上应当名列前茅。总的来说，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可宝贵的贡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既无魄力，又不渊博，只有历史好奇心”。正是由于她的纯朴的历史好奇心，足以使她自己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并且一同成长起来。

她在《大地的女儿》和《中国的战歌》两书中，曾经向我

们介绍了她本人的一些背景。她于一八九三年^①生于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里。当她年龄还很小时，全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随着在那里的生活体验，她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她这一生一直是积极的女权运动者。在她的著作中，最感人的章节，莫过于《中国在反击》一书中所描述的她对于一九三七年冬天朱德拒绝让她前往八路军五台山抗日前线的反应。伊万斯·卡尔逊的日记写下了现场目击的客观记录，值得在这里全文引用：

我把我上前线的事告诉了艾格尼丝，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吃晚饭时，艾格尼丝向朱德要求，准许她同我一起去五台山。朱德和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各种原因，说凡是上前线去的人都要准备放枪。

“我也放枪！”艾格尼丝说。“我是在西部长大的。”

“可你是一个妇女，”他们反对。

好家伙，这句话引起了艾格尼丝的愤怒。她把一肚子火都冲他们发出来了。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说。接着脑筋一转，又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好，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当然都是无神论

^① 据美国史学家麦金农考证，史沫特莱的出生年代应为一八九〇年。——校注

者。①

不过，她与那些没有社会意识的女权运动者不同，她并不屑于从女权主义开辟事业。这一名“大地的女儿”，是工人阶级的哈里特·史托②、佛罗伦斯·南丁格尔③连同苏珊·安东尼④的混合体。就在她全力弥补儿时所缺陷的教育时（她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就与纽约市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有了接触，投入印度独立运动。由于这事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且她全心全意地进行工作，因而被关进监狱的单人牢房中。英国人指控她是德国间谍，其荒谬之处，一如日本警察在三十年后指控她是中国共产党间谍一样。事实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来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多年来以同情的心情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后来在中国的岁月里，我给了他们以积极的支持，但是我绝不能把我的思想和生命毫无疑问地交给他们的领导人支配。我从不认为我有过人的聪明，但是我绝不能只成为一个工具，交到那些相信只有他们才

① 见迈克·布兰克福特：《大老美》，波士顿一九四七年版，第二〇九页。

② 哈里特·史托（一八一——一八九六），美国小说家，人道主义者。她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激起美国人民对黑奴制的憎恨，对美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校注

③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一八二〇——一九一〇），英国女护士，现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终身从事伤病员的护理工作。一八五四年，克里木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四十八名女护士到战场去救死扶伤，一时成为战场上传奇式的人物。——校注

④ 苏珊·安东尼（一八二〇——一九〇六）。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从十七岁起，从事妇女参政运动。——校注

拥有一把、而且是唯一的一把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的人的手中。”

人们从她的著作中很容易发现，她的信念和行动并不是复杂的推理过程的产物。她愿意从心所愿，她个人的政治分析和判断有时固然也是天真质朴的，但她的阶级本能（据列宁说，阶级本能是政治智慧的开始而非结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使她站到正确的立场上。

她在德国的八年，都用于学习德文、研究印度历史和中国民族主义，并且教授英文以维持生活。虽然大部分精力都已经为个人事务而消耗殆尽，她还是找出时间来协助组织德国第一个国家经办的节育诊疗所，并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居民的政治生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在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一次前往中国。（人们不要因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这两名报道中国的杰出美国新闻记者，曾多年为德国和英国报纸所雇用而产生偏见。）中国人民从没有比她更好的美国朋友。“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并不单纯是文学抒情，而是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

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有独特之处。她在哈尔滨街头看见一名警察脚踢苦力，便对她的翻译说，“这是中世纪”，这句话与端尼的更加审慎的判断，在实质上并没有很大不同。她旅行南下，把上海作为活动基地，成为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和现任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亲密朋友。她面对着人身攻击的威胁以及无数次的恫吓而不为所动，毫无畏惧地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

党的恐怖行动。她的最出名的成就之一，是她设法使中国女作家丁玲在被蓝衣社特务绑架之后获释出狱。她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早期书籍，对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大量书籍所提供的陈词滥调作出了急需的纠正，这些陈词滥调总是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一九二七年至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国民党中国一直在取得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是介绍红军和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长的最早的英文书籍之一，它至今依然是一部生动的和富有人情味的文献。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体质一向不好，而且动辄过分消耗精力。她的健康在一九三三年垮了，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在苏联疗养。但是她不能远离中国。她在一九三四年，经过十五年的阔别之后，重访美国，发现它“象是一座奇特的星球”。她也无法耐下心来去长住苏联，本来，她在那里可以使用她的作品的翻译版税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而且那里的“生活……比起中国来实在自由和舒服得多”。她的身体还远远没有复原，就回到中国，但不久就接受了劝告，在西安休养。那里的气候，就身体健康来说，而且，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时就政治来说，要比上海更为宜人。因此，她在西安事变时等于坐在现场的观众席上，那次事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奇异复杂和曲折多变的事件之一。不过事件的本身也很简单，不会使人茫无头绪。蒋介石要消灭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只好牺牲一些事情作为代价。

这就牵连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在西安成为轻微的受害者之一。她被一名蓝衣社官员跟踪，被动辄开枪的士兵们拦

截。但是她象在她以前的拉纳·普洛美一样，不为这种个人灾难所动。不用说，她在国民党政府眼中，是一名“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一九三七年年初，由于政府军开向西安，她便设法找到一个机会去延安住了一些时候，在那里，她会见了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她发现朱德的性格特别可爱，决定写他的传记。一九三七年三月，她开始与他进行经常性的谈话，以便为《伟大的道路》准备素材。

这些谈话一直没有结束。中日战争于七月爆发，朱德必须离开延安上前线去。史沫特莱女士虽然患有慢性胃溃疡，而且后背曾有重伤，还是遍访了各处后方医院，并且在临近一九三七年年底时，亲眼看到朱德在山西战场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大部分时间，她是在汉口度过的，她在那里参加了争取协助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医疗援助运动。美国给日本提供的军备规模之大使她感到吃惊，她是企图唤起世界舆论反对这种令人厌恶的死亡资助的少数人之一。她还协助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物色外国医生，包括诺尔曼·白求恩和一批印度医生以及流亡在外的欧洲医生。

她在一九三八年汉口陷落前不久离开那里，一直不辞劳累地与军队在前线一同进退，不懈地视察它们的医院。她以新四军为题材所写的报告文学是卓越的。她所写的小鬼沈国华的故事（沈国华是暴风游击队派给她的勤务兵，这支游击队的司令员就是北京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李先念），被海明威收录在他的以《最终的胜利之后》为题的战争文学选集中。她最钟爱的颂词，大概是国华在一个居民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上关于她的介绍：

“她是个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名伤兵；她亲自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她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绑着绷带的手！”他拉着我的手让大家看。“她给一名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她等于是我的生身父母。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只是到了身体必须住院疗养时，她才同意前往香港，在那里，她不久就恢复了宣传活动，而不理当地的繁文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火热的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她与宋庆龄、伊万斯·卡尔逊和史迪威将军的友情是很容易为人理解的，但是她的圈子还包括了塞恩·鲍威尔少校（现为将军），一批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英国情报部代表麦道轲，和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爵士。寇尔是苏格兰小地主，知识分子，卓越外交官，极通人情。他在重庆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工作做得很好。很难判断他为什么从重庆调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的特殊才能毫无用武之地。外交部门总是使用神秘方法去创造奇迹。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的新四军事件，使得中国国内情势突趋恶化，内战危机高涨。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戴笠特务手下被监视得不能动弹，是史沫特莱女士那种性格的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她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决定回到美国，她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如实地把广西将领锺毅的证言介绍出来：“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

的同胞。”一九四五年以后，她渴望重回中国，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她的行期只得展延。她希望恢复自一九三七年中断的与朱德的谈话。可是事与愿违。一场无法医治的疾病延长了她在英国的停留，一九五〇年年初在那里逝世，那地方既非她的故乡，也非她过去二十年中忠心耿耿为其事业尽力的那个国度。

很不幸，她的日趋孱弱的健康使得她无法对她的《伟大的道路》原稿进行大量工作。她所遗留下来的都是初稿，而她本来是打算重写并加以补充的。读者会发现，自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在本书是一个空白，而且，一九三七年年底（那时她已经不再见到朱德，虽然继续接到他的信件）以后的故事，显得很单薄，实在只是一段初步的描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她的重回中国计划终于未能实现。此外，如果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事详加叙述，则必须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概述，中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起伏，人民解放军获得胜利之前美国在中国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因为，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朱德的生平，与这出逐渐展开的民族戏剧是分不开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远远的超过了她的原来打算，而且只能够在更适当的条件之下才能实现。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空白比较难以理解。史沫特莱女士在《中国的战歌》里写明，自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七月初，她曾经记录下一九三四年以前朱德的生平，而且在临上前线之时，收藏好了这些记录。照此推断，如果不是记录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笔记本后来失掉了，就是她甚至一直没有机会根据这些记录写出初稿。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大一些，因为在此书中，她对于长征曾有很动人的详细描绘。也许她的作品管理人

有朝一日能解开有关这批笔记本的谜，一旦找到它们，应该好好保存。这里应该将长征前夕所发生的事件，作一个最扼要的背景介绍。^①

红军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已经坚决打退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在两场战斗中，国民党军队有三个师被歼，一万多支步枪被缴。因此，蒋介石又发动了部署最周密的第五次围剿，这次行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离开江西，走上史诗般的八千英里长征而结束。蒋介石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大约一百万陆军，将近四百架飞机的空军，和大量补给。在蒋介石看来，国际形势对他很是有利。他刚从美国建设资金公司获得五千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而且他获得所有大国（除了苏联）的精神支持。这次围剿的战略是由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策划的，军事顾问的头目是前德国总参谋长冯·塞克特。其战略是要尽量发挥国民党人力和物力的压倒优势，通过紧缩的经济封锁和逐步缩小的堡垒圈来扼杀红军。（后来，日本军队也使用了这一办法，成效更差，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更大地区作战，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汲取了江西的教训，而且用朱德毛泽东的基本军事策略给予还击。）

共产党阵营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情况如何呢？这正是与王明和博古有关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最大影响的时候。由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刚刚把总部从上海迁到江西

^① 细节可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五四——二二五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关于我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一七九——一八八、三八九——三九二页。

根据地，对军事行动进行了灾难性的干预。由于对全面情况估计错误（“中国目前存在着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围剿将决定“在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对抗中，谁将胜利，谁将失败”，等等），它拒绝与爱国者蔡廷锴领导的福建起义人士实行联合——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与日军作战时名闻全国。更加糟糕的是，中央委员会落入了德国将军们所设的圈套，坚持进行被动的阵地战，而根据地的资源根本不能支持这种战术。

毛泽东把这次作战经过描述如下：

……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①

共产党人在遭受失败之后，完全无法在根据地生存下去了。他们在一次围困中损失了六万人，国民党自己承认，“在收复苏维埃江西的过程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被打死或饿死”②。不论是谁应该对这些错误

①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二〇四、二〇五页。

② 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一八六页。

负责^①，当时已经别无选择，为了挽救红军，只能放弃江西。接着便是著名的长征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多次企图完成她所写的朱德传记而均未成功，这事实足以说明，《伟大的道路》在质量上和取材上为什么有欠均匀。这一有欠均匀的情况，多少与撰写传记的人的性格相合。因此在艺术上来说，它是颇为适当的。

当代历史研究家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情况并不严重影响本书作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社会和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此书可与特立齐科夫的《中国证言》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的“自述”并列，充分享有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地位。这些作品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这些学者总是使用麦克斯一威伯派的抽象观念作为他们对中国的无知的遁辞。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们深入了解错综复杂和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同时向读者们介绍了有血有肉的个人，这些人正是由于具有本身的特点，代表着广大的社会阶层。把朱德只说成是“典型”的中国农民，那将是荒谬的事。但是，人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

^① 斯诺认为，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顾问委员会应该与李德共同负责，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一九三三年到达江西（见《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三八九——三九二页）。但是斯诺对于他们的任务介绍得并不清楚，而且前后不一致，因此他承认这一看法只是猜测性质。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了李德对德国总参谋部战略和战术的专业知识。他的军事建议是否曾被接受，以及如果被接受，那是由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性，还是由于博古集团一时得势而加以支持，就无法判断了。姑且可以猜测为博古集团利用李德作为外国军事顾问的权威性，而使得他们自己的军事政策获得采纳。无论如何，《关于我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进行了谴责，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暗示支持斯诺的假设，即把外国人李德当作方便的替罪羊。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作为外国进步人士的一个教训。

实例来表现典型的农民风格——他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考中了秀才之后，竟然想下田帮助耕种，他的全家大吃一惊，因为一个读书人竟然干起体力劳动，不仅是贬低了自己，也因而贬低了他对全家的经济价值，这种做法，简直是亵渎神灵。

把《伟大的道路》和《中国证言》两书作一个略微详尽的比较是有益的。后者是一名学生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前后的动荡岁月中的传记。与谭家一样，朱家也是四川人。与谭世华的父亲一样，朱德也是哥老会和同盟会的会员，国民党党员，辛亥革命和挫败袁世凯复辟帝制事件的参加者。两个人在未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曾经多次有生命危险。与谭世华本人一样，朱德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民族觉醒期间受到很大影响。谭世华，一名在北京的左翼国民党学生，决定在莫斯科完成其学业。朱德，一名刚戒掉鸦片瘾的低级军官，为共产党所拒绝的入党申请者，而且几乎比谭世华大二十岁，却前往柏林去寻找“伟大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证言》不只是谭世华一个人的，而是整个这一世代的中国学生的传记，那么，《伟大的道路》的开头部分，也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无数中国农民家庭的传记。谭世华在一个低级文官家庭的幼年时期和朱德在一个农民家庭的幼年时期，有着动人的对比。谭世华的家财由于他父亲参加秘密革命活动造成生活上的漂泊不定而散尽，朱德所受的宠爱则超过家中任何一个人。这一事实加强而不是减弱了两者的对比。

“阎王”的强索勒索使得朱德对地主怀有无法平息的仇恨，这在谭世华幼年时期所受到的训练和教养中，是不可能产生出同样的感情的。

朱德的母亲既无姓名，又不“体面”，她是卖艺人的女儿。整个家庭由他祖母管理，这个女家长一心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土地，朱德所受的教育，就是恢复耕地的长期战略中的一步。朱德因此得以做官——说实话，只是一个军官，这使得他的家庭颇为失望。但是他从未忘记他的农民本色。

现在已经普遍承认，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他们具有反映和预期农民的根本愿望的能力。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把朱德选为典型，如果单纯是因为他足以表达农民的观点，那实在是聪明之举。由于他具有这一长处，再加上他对于政治有高度的见解，他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革命的人。”由于他具有这一长处，他因而能够与他的部队完全打成一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根据伊万斯·卡尔逊所称的基督教原则，或“道德标准”，把军队组织起来。的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总司令，在现役期间从事纺织、排字、种菜、做饭、写诗和讲学，不仅为自己的部队讲解军事战略和战术，而且向妇女班讲授如何储存蔬菜。

如果《伟大的道路》可以与《中国证言》同列为社会文献，则它作为历史文献可与《西行漫记》并列而毫无逊色。这两本书在某些事项有所重复，然而，就是重复，两者也是相辅相成，而并没有冲突。^①斯诺的书毫无问题是一本经典著作，

^① 斯诺书中《关于朱德》的一节例外（见《西行漫记》，英文版，第三五四——三六三页）。这一节，由于作者相信了第二手和未经核实的材料而使他处于不利的境地，他把朱德写成“地主家庭的后裔”，此外还有一些不尽翔实之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书也值得列为经典。这里的篇幅仅能把《伟大的道路》所记述的历史高潮简单介绍一二。

凡是曾经访问过延安，或现在从人民中国访问归来的人，都惊异地发现，共产党人的诚恳待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强烈拘谨作风大不相同，这种作风一直未曾消逝。在中国政治生活还没有结晶为两大政党之前，青年读书人组成了许多小团体，例如朱德在仪陇县与其他教师所组成的团体，庄严地将生命献给国家；这种团体（差不多都是秘密结社）乃是一种共同的现象。这在朱德的良师益友蔡锷身上表现得很多，读者禁不住希望书中有关介绍还要再多一些。而且，书中有关辛亥革命和四川、云南两省讨袁运动的详细介绍，有助于充实近代中国历史上相当模糊的一章。

朱德关于西南军阀割据情况的叙述是极其有用的，很遗憾的是史沫特莱女士没有把他的叙述全部重现出来。因为里面不仅有全国的和四川省的人物如刘湘、张群、邓锡侯和杨森等人，而且，如果不对军阀的性质和根源有所了解，那么对于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政权完全倚仗于军事力量），就难获得清楚的认识。团结和分裂的问题，就象一条红线一样，贯串着全部中国历史。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在外国侵略和内部纷争的双重压力下，分裂是主要方面，军阀割据是分裂局面的一个毒性变种，“受外国金钱的雇佣和豢养是袁世凯留给中国的遗产”。军阀是军人政客，半封建式雇佣兵队长，他们利用自己的军队或几支军队的联合，玩弄强权政治，正象帝国主义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玩弄强权政治一样。不管这两种把戏交织进行有多么复杂，它们总是只造成

一种结果——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

蒋介石象在他以前的袁世凯一样，希望成为最大的军阀，把全中国都划归他的辖区——他一再把中国和自己视为一体。袁世凯过去在腐败的清朝军队任职，和蒋介石原先曾在上海交易所和黑社会厮混，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蒋介石的许多行动不能作其他的解释，只能解释为军阀的诡计和野心的疯狂表现，甚至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处理都带着军阀色彩。

朱德一九二六年自苏联回国后，国民党^①给予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争取他的老同僚、四川军阀杨森，要杨森支持北伐，或者起码使杨森中立。这个任务，由于英国炮轰了川东万县而得到有力的推动。不过，国民党与军阀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当张国焘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他的私人军队而失败时，这种共生关系渗入了共产党队伍中。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关南昌起义到第二次围剿，以及有关长征的记述，给政治史学者以及军事史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朱德为发展经典的共产党作战方法所作的贡献，其重要性已经无须再作申述。不过，这里面也很有一些细节引人入胜。这里只提一两件：有一个故事说，东固共产党领袖们是地主出身，为革命一切在所不惜，但就是不同意分他们自己的地！今天，农业合作社在是否允许过去的地主参加的问题上，就处理得很谨慎。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和反革命作斗争的委员会的，它一开始就扎根于群众。这就很能解释清楚，中国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重蹈俄国公安机关的覆辙，没有出现官僚主义和为非

^① 原文意思不确切，应为“共产党”或“共产党通过国民党”。
——校注

作歹。

长征是《西行漫记》一书的高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我们相信，许多读者对于《伟大的道路》将有同样的反响。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从纯戏剧来说，红军越过曾经吞没了多少生命的大草地，第一次与甘肃边境的中国农民发生接触时——“我们抚摸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拥抱他们，我们又跳又唱又流泪”，这只有色诺芬的“海！海！”堪与比美。

从政治角度来看，《伟大的道路》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据我们所知，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单就这一点来说，此书已是值得一读了。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却拒绝与红一方面军合作，希望留在川西和西康，共产党人如果留在那里，就无法进行抗日斗争，也与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隔绝。为了推行他的计划，他劫持和扣留了朱德以及他的部属达一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是千钧一发。第一，如果张国焘不是因为执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而遭青海回教军阀击败；第二，如果共产党人不是使用“耐心说服”政策，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基层人员，那么，一九三七年以后局势的发展，很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

《伟大的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本正式传记。朱德自己提供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大部分材料，但是文章的叙述、评论和解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而且只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一个人的。如果她明显地表现出对她书中的主人公怀有极大的崇敬，那是一切与朱德接触过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崇敬。埃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写道：“朱德有罗伯特·E·李的和蔼，格兰特的坚韧和林肯的谦虚。”史迪威将军一九四四年十月在中国的最后的个人行动之一，是将他的有衬里的夹克衫送给朱德。十八个月之后，当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时，史迪威写道：“马歇尔将军也创造不出奇迹。我多么渴望扔掉我的铁锹，到那边去，扛起一支步枪，与朱德站在一起。”

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逝世之后，出版英文本《伟大的道路》的工作曾经推动过好几次，但始终未获成功。本书的日译本首先问世，开始是用连载的形式，然后出书。我们很高兴，现在得以使《伟大的道路》与说英语的公众首次见面。

在史沫特莱女士遗嘱执行人的同意下，曾对原稿进行编辑加工。除了把中国人名的格式和拼音加以统一之外，我们还做了少量的更正，我们确信，即使作者自己将原稿送给出版公司，她也会这样做的。但是在基本内容方面，我们未对史沫特莱女士遗留下来的原文有任何增添和改动。

里奥·胡柏曼

保罗·史威齐

一九五六年六月于纽约

目 录

中译本校者序言.....	1
原出版者序言.....	1
序 曲.....	1

第 一 篇 道路的起点

第一章.....	8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1

第 二 篇 走向革命之路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2
第七章.....	96
第八章.....	112

第 三 篇 灾难深重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9

第十一章.....	147
第十二章.....	156
第四篇 探索	
第十三章.....	167
第十四章.....	177
第五篇 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十五章.....	196
第十六章.....	213
第六篇 土地革命开始	
第十七章.....	228
第十八章.....	235
第十九章.....	244
第二十章.....	251
第二十一章.....	263
第二十二章.....	275
第七篇 《上杭之歌》	
第二十三章.....	285
第二十四章.....	305
第二十五章.....	319

第八篇 反围剿

第二十六章	329
第二十七章	337
第二十八章	343

第九篇 长征

第二十九章	353
第三十章	365
第三十一章	372
第三十二章	389

第十篇 历史重演

第三十三章	404
第三十四章	413
第三十五章	427

第十一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三十六章	442
第三十七章	457
第三十八章	463
第三十九章	468

第十二篇 “伟大的道路”

第四十章	472
第四十一章	479

第四十二章·····	489
第四十三章·····	498
第四十四章·····	505

附 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 的信·····	516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519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523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 时候·····〔日〕石垣绫子	534

序 曲

这本书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六十岁以前的生平。我写这本书虽然得到朱将军的同意，却不能认为它是正式的传记。时间、地理的距离和他作为震撼着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事业主要领导人之一所负担的工作，使得他无法对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事实与说明作一次最后的核实。

我最初打算写这本书，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刚到中国西北古城延安的时候。那时，百炼成钢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支配这支军队命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刚刚以延安为根据地。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朱将军，国内和国外的外文报纸也吠影吠声。可是它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抱着这种好奇心，我和两位朋友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前往他的司令部，踏进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人们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这些人的介绍都是正确的，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他那双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我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的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从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

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

我在这时候想起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便笑着向他提起关于称他为“土匪”的说法，以为他会象我一样，一笑置之。然而，他不但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直视地面。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但是，这一瞬间转眼就过去了，他扬起头来，直视着我说：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我想起了美国西部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有人持枪行劫，也有人持笔抢人。”但是，我并没有把它说出来，而是立刻把话题转到他的一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他作了订正：他的出身并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户贫农家庭^①。后来我才知道，很少人或者根本没有人了解他的一生，更没有人有时间坐下来把他或其他人的生平写成书籍。

就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写一本他的传记的主意，因此，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

^① 应为佃农家庭。——校注

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然会到了许多比朱将军还有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足可作为大型文学作品的素材。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戏剧性的，我还是坚持原方案，一九三七年三月，我们开始了工作。

每星期两晚或三晚会在一起，由我记录朱将军的谈话。几个星期、几个月转眼过去，有时我自己对工作也失掉了信心。他当年出身于卑微的文盲家庭，没有信件、书籍、文件或日记可供参考。他不能把时间日子记得准确，在他四十岁以前，社会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是个百事交加的忙人，而且似乎一直认为幼年时期的事无关紧要。中国的家庭生活、他的戎马生涯以及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纪律和生活，将他融化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因此很难判断，作为个人，他曾经是怎样思想和行动的，而从何处开始，他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走向革命。

我们这份有关他的生平的记录正写到一半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动身到前线去。我因此将这份材料放到一边，不久也上了前线，这不只是为了另写一本书，也是要尽可能在行动中对他进行观察。因此，我得以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

我们且不说他所负担的各种各样军事的、政治的工作，单是象他那样执著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人，我过去就从未见到过。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是他不愿探索和了解的。在延安的时候，他除了在一定的工作时间里同我在一

起之外，有时，我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他也经常出现，一起吃花生、讲故事、唱歌，以及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吹一吹”。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象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很喜欢跳，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象他的下属贺龙将军那样，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名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不放过从各方面认识朱将军，我有时发现他到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去讲演，有时在那所大学看到他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后来在前线，我也经常坐在白线外边，好象体育评论员一样，看他和参谋人员组成一队，与司令部的卫兵们赛球。朱将军还时常感叹似地摇摇头，说年轻的士兵们嫌他球技差，不愿他参加他们那一边。

他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前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曾公开放映电影，他几乎每场都到，不时为阿波德和考斯提洛^①的表演纵声大笑，据说，他们两个的表演很象中国传统的相声和滑稽戏。

① 即高脚七和矮冬瓜。——译注

第一天他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我们一边等人，一边俯瞰着眼前山谷中的小城延安，延水在古老的城墙那边缓缓流过，对岸，在黄土的断崖上，耸立着一座高塔，再望过去就是一片平川坝子，延水经此东流，注入号称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一块平川坝子，曾经是练兵场，将来要变成机场，最近还作过一次赛马场。那是因为有一队骑术高超、身体强壮的蒙族人策马南来与红军开会，朱将军为此向妇女和姑娘提出警告式建议，不要过于露面，还要保持端庄，免得让客人误解了欢迎之意。

但是妇女和姑娘们，连我也在内，都涌到坝子上去看蒙族人和红军骑兵赛马，看到蒙族骑手们催马疾驰，在马鞍上把上身向后直伸，直到整个身体完全躺在马背上，真是令人敬佩。一位红军骑手向我借去朱将军赠给我的飞快的矮种小马，出场竞赛。我和莉莉一边看着这头很象阿拉伯军马的小马落在那头鬃毛飞扬、马尾长长、坦克一样的蒙古马后面，一边喊得声音都嘶哑了。这些蒙族人现在已经回到内蒙，还有红军的军事和政治顾问随行。抗日战争正在准备着，革命的波涛也在拍击内蒙古了。

朱将军是个绝对守时的人，到了约定时间，就看到他从下面山谷的小城中走来。在他质朴身影的后面，有卫兵随行，他不时回过头去，大概是在讲话。他的腰板稍稍前倾，脚步象打

气筒一样向前移动，他就是用这样的步伐踏破了中国几千几万英里的大道和小路。登上黄土断崖时，他咳嗽了两声，那是在通过西康的终年积雪的大山时患上了支气管炎，当时还未痊愈。他停住一次脚步，一边指着延水流过的山谷，一边与腰佩手枪的卫兵谈论。山谷间要建立起一座水坝，拦阻洪水，进行灌溉，还可以在光秃的小丘及山谷间植树。他们的谈话声传到我的耳际了。他的稍见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里，混杂着身旁那名高大英俊的卫兵的高亢谈笑声。在我看来，这次中国大革命，使中国的三代人都卷入了漩涡——朱将军是一代，卫兵是一代，还有更年轻的十几岁的青年们又是一代。

朱将军和年轻的卫兵上了小山来到我们的平台了。与我们同住在这块平台上的农民一家，听到他的声音，立刻飞跑出来，亲亲热热地给他以农民对农民的欢迎。他也走到全家中间，拍拍孩子的脑袋，又从母亲的手里接过婴儿高高举起，和婴儿一齐笑起来。

就在这种气氛中，这样的环境里，这本书开始了。

第一篇 道路的起点

第一章

我们隔着一张小桌相对而坐，烛光照着朱将军多皱的面庞，他的两眼闪烁着光辉；他似乎在好奇地思忖，我会对他的一生提出些什么问题呢？

“就从头开始吧，”我说。

他开始了。在相当于新历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农历那一天，他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附近，比被清朝和其外国同盟者镇压下去的太平起义迟了二十二年。他说出的生日原是农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说那是十一月三十日；还有一位开始给他写传的中国作家——后来半途而废了——推算为十二月十八日。也许朱德将军自己也不能肯定出生的正确日期；但无论如何，他是出生了，这一点用不着怀疑。^①

他说，虽然儿时有正式的名字，生下来的小名却

^① 朱德的出生日期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十一月初六)，
——校注

是“小狗”，因为男孩子都要以动物为名，来欺骗那些埋伏下来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女孩子则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连鬼怪都懒得骚扰她们。

“在你最初记事的时候，记得些什么呢？”我问道。“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朱将军答道。

“就请你说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我催促着。

他垂下头，沉默了一阵，凝视着合拢来的双手，然后才若断若续地讲起来——他讲到光、色、声音、高山和森林、“象我巴掌大小”的芬芳的野花、“香飘千里”的鲜花，讲到阳光、一条湍急的小河、一首摇篮曲。

他的母亲唱着这首摇篮曲，而且为了哄他高兴，一边唱一边用眉毛作表情：

月如眉，
月如弓。
月如眉，
月如镰。
不似眉头常皱。

这首摇篮曲，对于他来说，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母亲对他唱时，带来了快乐，后来，在对弟弟唱时，便又给他带来了痛苦。这原是自己的歌曲啊，他这样想。

在他的记忆里，襁褓及孩提时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几乎是“野着”长大的，除了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要靠自己。他知道母亲很爱他，在记忆中，她从未责骂过他一句。可

是，她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顶多能抽空照顾照顾正在吃奶的婴儿。而且，吃奶的孩子始终没有断过。

“我爱母亲，但我怕父亲，”朱德从容而自然地讲着。
“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凶。”

刚刚能够手持汤匙的时候，便自己吃饭了，慢慢又用起粗糙的筷箸。受了伤只有自啜自泣，或是根本不哭，因为谁也没有功夫来哄慰。天气暖的时候，他光着身子四处乱跑。到了冬天，便穿上薄薄一层棉袄和棉裤。裤子是开裆裤，以便他在必要时自己方便。病过没有呢？没有，他这一生从没有病过。

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他回忆起当时玩耍的情景。“我玩得太累时，就随便拣个地方倒下睡了。起身又玩，玩累了倒下又睡。”

回想起太阳光穿过树荫，一点一点凌乱地照在地上，引得他用污脏的小手去捕捉光点时，他笑了一笑。离家不远处有几棵果树，到了果花盛开的时候，他便抱着树枝猛摇，花瓣象阵雨般洒满一身。到处都是野花，房后面则是一片沙沙作响的竹林，一棵高大遮荫树的树枝上悬着长长的秋千，一截木头上架着跷跷板。附近有一条窄而急的小河流经对面小山的山脚，岸边有红色的卵石，河上有小桥，有小舟，有竹筏，还有鱼儿在水中扑腾。

家的西面有一座名叫“卧狗山”的小山冈，山冈的那一边，就是大路，宽得可以通行板车——那是一条伸到遥远地方的充满险阻的道路，从南延伸而来，消失在北面的群山中。

听着朱将军的话，眼前不觉浮起了一个头发剃得光光，夏天只带着兜肚或涎嘴，胖胖的小娃儿的身影——一个爽朗而结

实的小家伙，活象一只在波涛大海中顶着风浪前进的小舟。

幼年时期的记忆之一，是感觉世上有欠公平；他和他的弟兄们最喜欢在小河或池塘里钓鱼，可是只能偷偷去钓，以免被地主的账房发现，因为河里所有的鱼，甚至他们家地里池塘中的鱼都是丁家地主的，丁家要派人来打捞，并把捞得的鱼运回家去。朱德和他的弟兄们免不了高声抗议，大人们却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父亲在对方走得不见踪影之后，才痛骂几句。这些人在秋天果树结实时也来摘果，而且有时还责骂朱家人作贼，说他们偷了果子。池塘和小河里所有的鱼，佃农地里所有的果子，山上所有的树林，丁家地主都说是他家的东西。尽管有着关于民主权利的谈论，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

朱德还记得他常玩弹球游戏，就是美国孩子们常玩的那种游戏，不过他和他的弟兄们所用的弹子乃是小石子或是团得紧紧的纸球。到了秋天，他和他的哥哥自作风筝，一边在山坡上放，一边唱起古老的避邪的菊花歌：

菊花黄，黄种强，
菊花香，黄种康。
九月九日饮菊酒，
人共菊花醉重阳。

这首歌象交响曲的主调一样，在他一生中贯串不断。传说古时曾有一个卜算者警告弟子们说，洪水当前，如果他们能够带领家眷上山，就能躲过这次灾难，弟子们照办后果然灵验。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在重九那天放起风筝，唱起菊花歌。

朱德的大哥代历比他大四岁，有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朱德不时坐在他身边，笑口常开地倾听他吹奏。自己的手长得够大以后，他也吹奏起来，等到成年，还买了许多种乐器，学会弹奏。

二哥代凤大两岁，常让朱德苦恼，因为他喜欢捉鸟，长大以后，甚至用家里的鸟枪来打。朱德总是奔向濒死的鸟儿，拣在手里，伤心得为它们落泪。母亲一再禁止代凤打鸟，可是他照样打杀。

提起了母亲，朱德将军满脸温情和悲痛。生他的时候，母亲不过二十刚过的年龄。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

“我的相貌很象母亲，”他说。“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我家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

最大的是女孩子，叫秋香，缠足后走得东倒西歪，那年一连哭了好几个月，十五岁就嫁出去了。秋香后面是长子代历，小名“小马”，下一个是代凤，叫做“小牛”。朱德叫代珍，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和父亲、叔伯辈用世字排名同一道理。

朱德说，由于自己排行第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我不只是被压迫人民的孩子，就是在家也是受到压抑的，既打杂帮助哥哥，又要象个保姆照顾底下的弟弟们。听说，我临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在烧

饭。还没等饭烧好，我就呱呱落地了。母亲生了我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我从来不记得有过什么过生日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过这种日子。我们穷得不能再穷，我也不知道我们穷，因为除了地主以外，人人都是一样的穷。”

他说，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的时候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的娘”。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甚至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挑选农民姑娘做媳妇，为的就是要劳动力。爱情问题是不存在的。姑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和公婆，夫死后也要遵从长子。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孔子传下来的古老封建观念。

妇女的职责是劳动，生儿子，以便传宗接代，给全家增添劳动力。她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如果完成不了这些自古相传的使命，丈夫就可以把她休弃。妇女方面无论有什么理由也不能离婚，丈夫却有许多理由可以休妻——例如不听他或公婆的话，不孝敬公婆，说话过多等等。喜欢怎样说，便怎样说，那是男人的特权。

官宦富豪人家总是要娶姨太太，农民就供不起这些享受。妾侍是提高男性权威的表现——她们是古来封建制度的一部分。朱家的妇女和姑娘同其他的农家女一样，缠足，被压制，谁要提起让女孩子去念书，准被人讥笑为蠢得给别人的花园浇水。

朱德的伯父世连是个不同寻常的男人，从不虐待妻子，没有子嗣也并不借口休妻。夫妇两个老来无子，朱德小时候，便经过磕头，过继给他们收养。至于为什么选上了他，他并不了

解。不过，大家原本住在同一屋檐之下，这种新的关系出现之后，变化也不太大。但过了几年，才显出正是由于承继的关系，他才从朱家所有孩子里被选拔出来，开始受教育，以便让他为全家应付税吏和其他的官吏。

朱将军的母亲出身于钟家，这一家原是流动艺人，遇到结婚、丧葬、生日等等场面，他家就由主人雇去，有的吹打，有的演戏；遇到农村过节赶集，也搭上一座简单的舞台，拼凑一台滑稽戏或是一台老戏。这类艺人在社会上是无家可归的，穷得毫不起眼，还经常成为政治上的嫌疑分子。

“可是，那是一帮爽朗而愉快的人，一般老百姓对他们喜爱得不得了。”朱德一边回忆，一边深情地微笑着。

朱家的孩子们，不但善唱民歌，而且无论遇到什么乐器都能够一上手就会，钟家大概是主要原因。这些民歌里面，有的很悲壮，有的愉快、俚俗而滑稽，也有一些抒情的恋歌，更不乏暗中讽刺政治的歌曲。

当地有许多“客家”，朱家也是其中之一。所谓“客家”，乃指从其他地方移居于此，没有超过八代，因此还未取得象土生土长、在此创建家园已久的人的同样权利。朱家一族最初在白莲教起义后不久，亦即在十八世纪末期或十九世纪初期，从远在南方的广东省迁徙至此。白莲教的兴起和清朝的镇压使得四川人烟稀薄，广东和广西的贫农便陆续来此，成了“客家”。^①朱家虽然已经在四川住了八十年上下，却还讲广东

^① 客家是古代从北方迁居广东梅县等地汉人的自称。朱家的祖先是广东的客家人，后迁居四川。——校注

话，保持着广东风俗习惯。直到朱德这一代时，家里才习用广东和四川两种方言。

朱家初到四川的人积蓄了些钱，就买了一块不大的地，在离着仪陇县马鞍场不远的商镇大湾盖起房子。可是不久，因为地主、官家、高利贷者等等都来下手，不但压得他们把土地押了出去，而且全家搬离原居，不得不给这一处那一处的地主做佃农。朱德出生的时候，他家正给一家拥有六十户佃农的姓丁的地主打短工。人们提到这个地主，就叫他“阎王”。

朱家从“阎王”手里佃来三英亩地，不是在山坡上就是在山谷里，几乎每一寸地都经过双手仔细耕耘。他家搬到一座树木茂密的小山山脚下，这座山就耸立在那条急湍的小河的东岸。附近还住着三四户佃农，加上朱家，凑成了一个叫做琳琅寨的村子。商镇马鞍场在北面二英里地。再过去些，便是大湾，近旁就是常令朱家人感慨系之的祖先创建的老家。再往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就到了城墙围绕的仪陇县城，在农民眼里，那是个大都会，只有少数人曾经去过。从朱家往西几英里地，嘉陵江穿流而过，它是四川省从而得名的四条大江之一。

朱家三代同堂。祖父、祖母的下面是以世字作谱名的弟兄四人和他们的妻儿，第三代朱德这一辈是以代字作谱名。

在第二代中，长子而且作为全家家长的是朱世连，朱老大——朱德的养父。朱德出生的那一年，他大约三十七岁。老二就是朱德的生父朱世林，是个脾气火爆、容易冲动的汉子。对于另外两个叔叔，朱德将军很少提及。还有，提到自己的弟弟，他也只是略微一提。朱德的养父朱老大是个治家谨严、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怪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

省，为全家打主意。

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个组织起来进行艰苦而有纪律的劳动以防饥馑的经济单位。

“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朱将军解释道。“祖母把男男女女的事都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需要气力，那是男人的事；地里和家里的小事情，那是妇女和孩子的事。祖母有四个儿媳，顺着次序一年一个给全家烧饭，小孩子当帮手。其他妇女，有的纺线，有的缝缝洗洗，有的扫房子，还要下地。天刚蒙蒙亮，负责那年烧饭的儿媳就要起床生火，准备早饭了。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床，各作各事——打水、挑水、砍柴、喂鸭、喂猪、喂鸡，或是打扫。

“伙食一年到头都是一样。按照多年的习惯，男人一起先吃，然后才轮到妇女和孩子。家境太穷，除了特别日子，哪里吃得上大米。早饭就是高粱稀饭，有时加上些米或者什么豆子。此外，就是一碗大家吃的青菜了。我们也喝茶，当然并不加糖，午饭或者晚饭吃的都相同。不是吃稀饭了，而是用高粱加上米，蒸干饭，再就是一两碗煮青菜。弟兄们和我要是钓来了鱼而没有被人发觉——我们都喜欢钓鱼——我们也许加一碗白饭。象猪肉或者其他特别好吃的也不过在过阴历年时才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

“四川虽然出盐，价钱却很贵，穷人只不过能偶尔买一些。盐也分作三种。有钱人买白色精盐，中等家境的买菜色的，象我们这样的穷人，只能买又脏又黑的盐巴。这盐巴宝贵无比，哪里敢放在菜里。或是在饭桌上放着一个汤碗，溶些盐巴在里面，大家吃青菜时，把菜夹在盐汤里过过水；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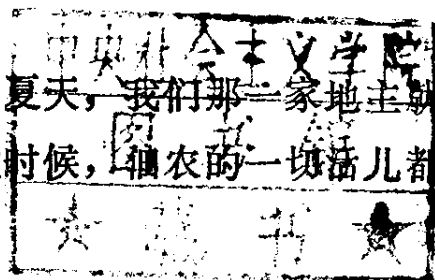
摆一块盐巴在碗里放在桌子中央，大家吃煮熟的青菜时，放在盐巴上擦一擦。

“祖母不但指挥大家干活，而且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情况分配粮食。就是在吃饭这件事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自由，每每觉得肚子还饿，就奉命离开饭桌了。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要开发国家，人民将有足够的食品和衣着，他们将坐火车、汽车，有时间也有精力在文化方面得到发展——然而就是在目前最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提高文化。

“祖母是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很会指挥，而且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她要负责给地主缴满年租，缴租不但要把收成的谷子缴出去多一大半，而且还要有鸡蛋、鸡，甚至于整头猪——这些是不得不奉上的封建性额外礼物。我们人人憎恨这种封建性的贡奉——尽管封建这两个字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我还是说这是封建，因为地主绅粮把各式各样奴役性的摊派和负担强加在我们和其他佃户的头上。

“举例来说吧，每到夏天，我们那一家地主就要全家大小上山，到别墅去避暑，这时候，佃农的一切活儿都得放下，去



送他们上山，毫无报酬。到了秋凉，又要接他们回来。还有，社会动乱的时候，或者闹土匪，或是农民起义，佃农奉令要到地主家集合，拿着发下来的武器为地主保家。农民们就在宿命的绝望中接受了这种封建传统。他们看不到出路。”

与附近的佃农一模一样，朱家在大年初一天亮以前，就得把一切年礼缴上去。除夕那天，一家人聚集在全家共用的堂屋里，祖母在大儿子——朱德的养父——的帮助下，分配全年的收入，并且决定该给谁添置衣服。妇女们对于一布一丝都了如指掌，知道谁的裤子还能补一补，谁应该做一条新裤。每一件衣服都要穿到烂得不可再补。每一套裤褂都要小心谨慎穿着；脚下的布鞋——妇女们手做的——只有重要场合才穿，所以能穿着很久。家庭会议把事情都商量妥当以后，廉俭的祖母便把全家剩余下来的现款，往坛子里一装，埋在她住屋的地里。

吃过了早饭，立刻开始干活，只在午饭和晚饭时稍停一下，一直干到夜色苍茫爬上床去。夜晚时分，如果点上一盏灯，就会被认为过分的奢侈。地里种的烟叶，准备晒干运到场子上去卖，家里哪个男人要是抽上一口，也同样被指为浪费。不过全家有时也点燃一管旱烟，一人抽一口，传来传去。朱德的父亲常常公开要求，每个男人应该有权抽一管旱烟。但他是个暴躁鲁莽的汉子，总得有人加以管束。

在朱家或其他农家，没有懒惰，没有拖沓，也没有什么每周应有的休假。家境好的人，到了阴历年可以享乐一两个星期；对于佃农和贫农来说，就是这一时期也没有休息。农民在冬季几个月里，可以松闲一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也必须准备春耕，或是安排小春。夏天养大的猪和鸡，在这时要运到场

上去换盐巴。地里的棉花摘下并打整干净之后，妇女们把它纺成棉纱，但她们并不织布。织布是那些串村庄的织匠的活儿，都是男人。另外，还要在冬天捡出地里的油菜籽榨油，把预计炒菜的油留下来，有多的就卖掉。只有很少的机会，才加上棉花灯芯放在碗里，在晚上照明。朱德直到二十岁才用上灯亮，那是上学以后回乡的时候，自己占用一张床，一间屋，这也只不过几天的工夫而已。

还有一条自古相传的不成文法，佃户的男男女女每逢过年或其他节日，或者地主的老婆甚至小老婆之一添丁，或是为下乡的官儿办宴席，都要到地主家里去帮工。在这些场合，佃农还要专门准备食品给地主送礼。

“对于地主来说，农民是不是够吃，地里是不是忙得不能分身，那不是他的事，”朱将军气愤地说道。“不但家里的男人要去，就是我的母亲和养母也要到‘阎王’的厨房里帮工。回家时，有时候用衣服遮掩着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孩子们尝一口，还给我们讲一些听来象神话一般的事。”

朱将军用这种语调叙述当年情形的时候，我的笔时时不由得无法写下去。他使用惊疑的眼光望着我。

“有些时候，”我解释说，“我觉得似乎你讲的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并不曾给封建的地主打工，可是我母亲也是专替有钱人洗衣服，或是在假日中到他们的厨房干活。母亲也时常给孩子们偷带出点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每人尝一口。母亲的双手操作得多了，也几乎是黑的，头发也是在后颈挽个发髻，又黑，又蓬蓬松松的。”

“你的父亲呢？”他惊愕地追问。

“我小时候，他是个穷苦农民，光着脚板耕种，不过，大部分时候还穿得上皮鞋。他恨透了这种生活，三番两次地撇下了母亲，离家出走。他不象你们家里男人那样有规有矩。后来，他变成一个干粗活的散工，我们的肚子也就永远没有吃饱过。然而，盐是尽够吃的啊！”

“世界上的穷人原是一家人！”他用粗哑的声音说完后，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久。

第二章

朱将军每逢提到四川，没有一次不赞叹它的壮丽。耸立在他家周围的群山，乃是迤邐川西、巍峨峭拔的大雪山向东延伸的一条余脉。大雪山和它的北支遮掩着全省和以“红色盆地”为名的广阔平原，使得全省气候温暖爽快，温带和亚热带的多种多样植物在这里生长得极为茂盛。以省城成都为中心的“红色盆地”，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终年有收成。四川省的盐产和各种矿产也很丰富，朱将军提醒我说，“法国和英国这两家帝国主义就不断对四川垂涎，打算并入它们帝国的版图。”

“看见过四川的花吗？”他突然问道。“又大又好看，香极了，花香一飘就是几里路。”

他的家，一座经过风吹雨打雪盖而将近坍塌的房子，就建造在这大自然的美景中。从东到西的长间上房面南而立，上覆灰瓦，破旧的原色木门，装在木门

轴上，这和中国内地大多数的木门一样，可以拆下，当作卧床。两边厢房较短，稻草铺顶，和上房刚好对成直角。没有窗子，全靠房门进光，土地用泥巴整过，又平又硬。房子外部涂的是泥巴，没有粉饰过。热天，全家在院子里吃饭，到了收获时，这儿又变成打谷场。

除去厨房（进门的左手）和上房的堂屋，其他都是卧室。还有披屋，养猪养鸡。上房的堂屋是全家聚会之处，有客人来也在此地款待，有什么大礼也在此地举行。正中央是一张粗糙的八仙桌，四周摆着长凳，桌后靠墙处是一座龕橱，供着祖先的牌位，那是些经过打磨的小木板，上面分别写明先人的名号。一尊泥塑的观音像摆在龕橱前面的条案上。

全家在一年之中，要简单地在祖先牌位前上几次供，包括过阴历新年、七月十五的盂兰节在内。快到过年了，就要从厨房炉灶后面的墙上，把满是尘土的灶神纸像取下来，在他嘴上抹些祭灶的糖，以便他上天为全家讲好话，并在院子里点燃了送灶。春节过后，再接来一幅新的灶神像，用浆糊贴在墙上。

朱家的人一向遵守这些旧礼，确信有照应收成的土地爷，有一大批善神和恶鬼。到处出没的狐狸精，是个特别讨厌的东西，它不但可以为非作歹，而且摇身善变，可以变成白胡子老头，遇到隐士或寂寞的读书人，还可以变成千娇百媚的女人。

“这当然完全是迷信，”朱将军微笑着说，但是，“对于寂寞的读书人也不无方便。”

他的家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除了拚命干活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朱德

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连有鬼有神在内，全部深信无疑。有一次在大路上听见过往行人谈起曾在美国念过书的某某人说，那里的人都不信鬼，因此那里也没有鬼。这番话给他的印象很深，朱将军在五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大路”——在他心目中就是那条在他家附近通过的单程路——为他的儿童时期带来了重大影响。它是古时驿道的一条支路，驿道在帝国的版图上组成了一条稀疏的路网。这条路从南而来，北到仪陇县城，越过山岭，与驿道会合，直通西安，转向东北方，到达国都北京。

儿童时期的许多时间是在眺望“大路”的过往行人中消磨掉的。这儿有远远来自南面重庆的运货商人，有走江湖的艺人，有时来一位身穿长衫的读书人，有时“阎王”也从这里经过，他坐着舒适的肩舆，手中折扇轻摇，跟班在旁奔跑。快到过年的时候，坐着绿呢轿的官老爷们有时也路过，衙役在旁跟着跑，或是在前面驱赶闲人开道。出殡的由此路过了，棺材后面尾随着麻衣麻冠、嚎啕大哭的家人，里面显然也有些人还觉得很高兴。娶亲的行列也来了，一身大红的新娘羞羞答答地坐在大红花轿的轿帘后面，前呼后拥，有人打旗，有人敲钹，另有人一台一台地抬着她的家具和衣物，那是她到婆家去的嫁妆。这些婚礼常常是又欢乐又猥亵的事，因为天下农民的风俗都是一样，有经验、结过婚的妇女会把新娘开导得面红耳赤，男孩子和男人们还会在新娘卧床代替弹簧的棕绷上系起铃铛。

朱德时常蹲在“卧狗山”上，看世界的流转。绅粮家里不大出门的女眷们坐着肩舆过去了，农家妇女骑在驴背上，东摆西摇的，不知是上庙求子，还是求签问卦，要不然就是一年一

趟走娘家。遇到赶场的日子，戏班子，例如朱德母亲的娘家人，也要过来了，农民们担着赶场的农产品也过去了。后面背着盐巴背筐的苦力，列成一队一队，也在此走过。这些背盐的苦力，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腿上有时布满了流脓的伤口，还有许多人有肺结核性的咳嗽。

朱家的男人们有时撂下农活，与在门前树荫下歇脚喝水的过往行人闲谈。从这些人的嘴中，朱德才知中国比可以自成一国的四川还要大过许多。他听到他们信口提及重庆、西安以及“老佛爷”（西太后的通称）驾座金銮的北京城。有些时候，还提到了他们先祖居住的广东省。四川省城成都，据说从远古以来就有又高又大的城墙，一共有五座城门：清远门面对大雪山和西藏而开，迎晖门向东而立；不过，靠近朱家的那座城门只有个“北门”的俗称，似乎有欠公允。

从全国各地来的商人跋涉到成都，购买皮革、麝香、翡翠、茶叶和草药、绢丝等等四川特产。还可以买到虎骨、鹿角来医治某些疾病，还有贵重无比的人参，按重量论银子计价。

光阴荏苒，朱德又了解到还有更远的城市。远在南方的昆明，乃是云南省的省城，再过去就是缅甸，在他出生的前一年，缅甸已被英国鬼子占领。还有广东南边的安南，也被法国人在同一年占领。北京为了偿付战费，抬高盐价，人民因此时起暴动。

从“大路”上过往行人的嘴里，他还知道了洋鬼子时常打败中国军队，清朝腐败、无能，而且暴虐，军队全无用处，人民的愤怒一年比一年高涨。日子也更艰难了，城里的物价几年之内就涨了一倍。

“我时常在‘大路’上跟着人走，直到人家赶我回去，”朱将军说。“我希望到外面走走。”

每年四季，都有季节性的流动手艺人离开大城大镇，在“大路”上出现，从一个村庄转到另外一个村庄，为需要专门手艺人的人家帮工。木匠、铁匠、织席匠、织布匠都是技术很好的手艺人，自己带着干本行的用具。每到秋天，织席匠就来到朱家，或是修整旧席，或是由主人家订编新席。这些席子很重要，当床垫使用，冬天防寒。大约有双人床那样大小，编得结实，花样很好看。刚织出来的席子还带有清香，色泽金黄。

有一位老年织匠——朱将军就直截了当地称他“老织匠”——每年冬天到朱家，把朱家妇女纺出来的棉线织成布匹。织出来的粗布再用靛蓝染过，搭在长竹竿上风干，然后由妇女们剪裁，有的缝成衣褂，有的缝成被套或其他东西。

“这些漂泊的手艺人是农民经济的一部分，”朱将军解释道。“他们来自大城大镇，比农民进步、独立得多，能给农民带来新思想。他们可以称做民间历史家，还有些人能读书识字。他们就在做工的主人家借住，每天晚上，全家就都涌来听他们摆龙门阵。他们对我们说，清朝把我们卖给洋鬼子了，洋鬼子要把我们当成奴隶；还有，我们和其他农民成年不知缴了多少税，清朝转手就交给洋人，不是清偿债务，就是支付赔款。他们说，我们穷并不是因为注定穷命，而是因为绅粮和做官的太享福了，用各式各样的税收勒索人民。我当时也闹不清什么叫做太享福了，不过猜想大概就是吃什么有什么，穿得好，住得好，什么事都让底下人去做——象我们的地主一样。”

流动手艺人对于中国历史知道得很多，时时提到本世纪早

期的英国鸦片战争和其他对外战争，这些战争摧毁了中国主权，而且招来了多年偿还不清的战争赔款，清朝“害了怕，洋鬼子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外国的机器制品几乎不缴关税就运进来，正在摧毁中国产品和手艺人的生计。他们还说，四川的外国传教士傲慢无礼，这些传教士和皈依洋教的教徒们轻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信洋教，便用“邪教徒”这种字眼来称呼中国人。

朱德一家都知道，就在“小狗”出生那年，由于法国传教士横行不法，造成了四川中部一次暴动。法国神父声称新皈依的中国教徒也象法国人一样享有治外法权。每当中国教徒和非教徒打官司时，法国神父总是威胁县官偏袒中国教徒一方。四川有个地主被这种凌辱激怒了。他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火烧天主教堂，袭击天主教徒。中国政府逮捕、监禁并用严刑把他折磨死了。这个地主的儿子又接着干，最后遭到和他父亲一样的命运。暴动被镇压在骇人听闻的血泊中。

对于这些每年到他家的流动手艺人，朱将军有这样的评语：“他们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驱者，所以要比农民开朗、独立而且敏锐。”

手艺人里，也有人提到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那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中国最大的农民革命，甚至在带有基督教色彩这一点上，都极象三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农民战争。事实上，每年冬天到朱家的那位“老织匠”，过去就是石达开麾下的士兵。石达开是太平军中最有声望的领导人之一，客家人，学者。他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包括土地，把所得全部交到太平军。太平军里客家人相当多，这是因为革命起自南方，而客家

人就住在华南南部和沿海一带。客家人原籍在哪里，没有人可以确定，不过据说是几千年前从北方移民而来。他们到现在还保有独特的言语和风俗，妇女从不缠足。朱德将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就是客家人，部队里的士兵也有很多客家人，其中军官也不少。

每年冬天到朱家来织布的“老织匠”似乎也是客家人。他是个说话有棱有角的严肃老人，把细长的织布机在当院一摆（数九寒天时摆在厨房里）就织起布来。朱德神往地在旁欣赏，因为老人那双褐色长手把梭子投得飞快。他一天能织二十尺，一尺布的工钱要两三个制钱，按照习惯，还要管吃管住。这笔钱算是够多的了，干一天就能维持一星期的生活。

老织匠的嘴虽然厉害，朱家的人却从未听够过，朱德便时常蹲在织布机旁要求：

“织布爷爷，给我摆段龙门阵吧。”

双手深褐、满面皱纹的严肃的老人于是开口了：

满鞑子知道怎么压榨老百姓，可是我们要教训他们，不要把老百姓当做大豆，觉得每逢要盖座新皇宫，就可以把他们拿来榨油。比起我们打起红旗打仗的时候，大家现在更加穷了。现在，只要谁能拿出两万两银子就可以当县官，自称为民之父母。仪陇县每年要往成都送五万两银子，可是知县收刮的还要多十倍。我年青的时候，数不尽的男人，还有妇女，都跟着忠王李秀成。他率领所有的太平军，决不向清朝和无耻的绅粮和洋鬼子投降。我的王爷是石达开，他虽然是学者，是王爷，可决不准谁向他磕头。现在的人不但磕了头，还觉得辫子越长越

好，真是混帐！

石达开带着我们队伍穿过南方往西进的时候，我们把鞑子当做包谷皮子一样，一吹就散。到了贵州桐梓，我们刚进南门，鞑子兵就从北门跑了。老百姓欢迎我们，尊称石达开为翼王，石王爷把老百姓集合到鼓楼，说明谁耕哪块地，就分哪块地，那就不算老虎地主的地了。

老百姓给我们准备了好吃好喝，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住下来。他们给王爷送银子，但王爷却让他们分给我们队伍。我们打仗虽然不为钱，到底还是收了下來。

我们不能老住在桐梓，因为我们要把鞑子赶出四川，赶出全中国。石达开解释过好几次，可是我们刚一开拔，老百姓就揪住了他的马鞍哭了起来，我们回过头来又住了一夜，大吃了一顿，石王爷还答应留下一百名弟兄，训练小伙子们打仗。等到我们离开桐梓时，老百姓哭送了老远老远的路。到处都是这样。敌人管我们叫土匪强盗，老百姓可叫我们救命恩人。

某个镇上，有个跟阎王一样阔的地主，给石达开送来一箱银子和一名丫鬟，石王爷站起来大发雷霆说：

“你以为我是做官的？我命令你把田分给你的佃农，把奴仆丫鬟都放走，把你手里的银子全部分给他们。太阳下山以前要办好。”

那地主跑到河边跳河死了，谁希罕他！

嗯，我们的队伍在大渡河边垮了。我没赶上。我跟着插进川南从东面包围成都的队伍，石达开领着四万人从西面打。石王爷的队伍在大渡河边死了几千人，也有些人死在河里，因为他们觉得与其投降鞑子，还不如死在河里。他们粮食都吃光

了，还把所有的马匹和驴子也吃光了。石王爷的先头部队就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了。

鞑子手下的汉人大走狗是四川总督骆秉章，副手是满族人荣禄。这两个混蛋买通了罗罗^①，供给他们洋枪，从后面进攻石达开，切断他的给养。骆秉章的强盗军队还有洋鬼子给的步枪和大炮。他们在大渡河边布防，石达开就无法过河，因为太平军只有弓箭。

敌人在河的北岸竖起了招降的旗帜，上面写的是：“投降保命”。石达开看了这几个字，就对弟兄们说：

“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我们打！”

他们造好筏子，上去了五千人，前面装好皮盾牌，手里拿着长矛。他们的官长身穿红衣，毫无畏惧地站立着，士兵则通力划桨，个个高声喊叫，直望着对岸的敌人。可是外国大炮响了，筏子被打烂了，大渡河上漂满了尸体。

石王爷心里难过到极点，他独自走到一块石头地跪下，向上帝祈祷，当时他和我们多数人都信仰上帝。可是上帝没有表示，石达开哭了。他站起身来，发现有个穷苦的农民正拿着锄头锄地，便走过去说：

“老乡，我是石达开，鞑子悬赏一大笔钱，要我的头。你拿我的宝剑，把我的头砍下来，你就不会再穷了。”

那穷人跪在地上说不行，可是石达开扶他起来，告诉他对谁也不要磕头。

现在，有些说书讲古的人说那穷人接过宝剑就把石达开的

^① 少数民族，现称彝族。从前写作罗罗，有侮辱性。——译注

头砍了下来，送给鞑子。那不是事实。石王爷没有被杀，更没有象骆秉章吹嘘的那样被刚掉。

石达开从石头地回到营帐，他的四姑娘正在等他。四姑娘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她家是书香门第，全家都被鞑子杀了，他把她救了出来。她家一向把她当做男孩子养大，满腹经纶。石达开救了她以后，她为报恩曾想做石达开的妾侍，可是他收她为养女，替他抄发公文信件。

四姑娘有一次在太平军的官长里发现一个酷似石达开的人，便向养父提出要嫁给他，他们的婚事便这样完成了。

这天，石王爷叫天天不应，便回到营帐。四姑娘说，连马匹和驴子都吃光了，恐怕整个队伍都快饿死。已有五千人淹死在大渡河，其他的人不愿投降，也都跳河死了。

四姑娘向石达开苦求，说河对面的招帜上写着太平军只要投降就可保全生命。她要求石达开逃命，带着我们的队伍重打天下，让她的丈夫——他活象石达开——去投降。

事情就照这样办了，投降鞑子、被骆秉章当做石达开刚掉的其实是四姑娘的丈夫。

石王爷落发烧戒，穿上黄色僧袍，装做和尚走了。他可一直没找到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也吃了败仗，溃不成军。我重新干起织布的行当。又过了一年，我们的京城南京被鞑子和外国军队攻陷，忠王李秀成也落在曾国藩手中。于午夜被他杀掉。忠王这个人既实在、又有节操，视死如归。象他那样的英雄找不到第二个。鞑子和洋鬼子攻下南京城，杀了三天三夜，可是没有一个太平军投降。

老织匠叹息着停住了嘴。

“石达开怎样了呢？”有人问，尽管人人都已听过上千遍，知道这故事。老织匠说：

御用文人把为鞑子尽忠的曾国藩吹捧成大将军、大学者，说他打败了我们。那是打胜仗的人随便写历史哟！打败我们的乃是鞑子和绅粮手里的外国大炮。曾国藩怕洋鬼子，可是他更怕中国老百姓。他率领的是鞑子、土豪劣绅和到处杀人劫舍的洋鬼子组成的联军。我们尊敬被压迫的人，我们和穷人一个锅吃饭，我们借钱给缺款的老百姓而不收利息，可是我们的敌人对谁也不帮忙。总督骆秉章的队伍在大渡河边竖起了投降就有自由的招帜，石达开的队伍投降了。他的士兵被解除武装，带到大树堡，都被敌人砍了头。鞑子跟信义是连不到一起的。

每到黑灯下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到现在还能在大渡河渡口和他们被杀的地方听到死去的太平军的鬼哭声。他们要一直哭到大仇得报，才能瞑目。

老织匠望了一阵周围听众的紧张脸色，这时听众越来越多了，他又继续说道：

从那时起，许多人看见过石达开。不久以前，还有两个人看到他在嘉定过岷江。一个是船夫，一个是姓李的商人，从重庆到成都去买麝香和草药。船夫正要解缆开船，来了一个随带纸伞的白须老人，要求免费搭船过河。船夫说有钱没钱都没关系，老人又说：

“要是这会儿就开船，一阵大风浪就会沉了你的船。”

船夫吃了一惊，因为天空并没有云彩。他极目四顾，才发现黑云从山后滚滚而来。他系好船，跟商人和老人到路旁酒馆，还未来得及坐下，大风大浪便呼啸而至，把河心的船打成粉碎。船夫觉得奇怪，便请教老人贵姓大名，可是这位老人答道：

“我不是这世界上的人，用不着告诉你了！真要是说出来的话，要把你吓着！”

接着又说道：“风光依旧，江山何在？”

船夫和商人听了这番暗示中国命运的话，吃了一惊；老人又拒绝他们的敬酒，这就使他们更惊讶了。

风浪过去，三个人渡过河，可是老人下船下得匆忙，把伞忘在船上。商人把它拣起，发现上写“翼王”，还有个和尚庙的庙名。全中国只有一个翼王，就是石达开。两个人到处找他，高叫他的名字，可是他已经无影无踪，除了他们两人外，再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个老人了。商人把伞保存起来，有很多人看见过。

“织布爷爷，”朱德颤声问道，“这真是石达开，还是石达开的魂呢？”

“那都一样！”老织匠随口答道，接着便吟咏起石达开的最好的一首诗：

扬鞭慷慨泣中原，
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贖贖，
欲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
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亦苦，
东南到处有啼痕。①

这个故事在朱德的一生中不知听到了多少次。由此可见，石达开的诗在他那一代，以及其后无数代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民不愿意承认石达开被杀害，”朱将军痛心地说，“承认了就等于放弃了希望。可是石达开的确亲自带着队伍投降了清朝，也的确在成都被刚了。他的缴了械的队伍，原来答应可以放掉，也被屠杀了。我们过去要是投降了蒋介石，我和我的队伍的命运一定也是这样。”

我后来查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川督骆秉章的日记，发现这样一条简单记述：

十三日，携四岁儿来营，率参谋及所部投降。石达开及另三人于二十五日解抵成都，刚死；其子俟届行刑年龄，处同刑。②

① 经考证，这首诗是伪造的。——校注

② 查《骆文忠公自订年谱》和《骆文忠公奏稿》，均无这一记载。——校注

在石达开的队伍中，只有四千人可以作战。其余人因饥饿不堪，已解甲还乡。这四千人悉数被驱至大树堡，骆秉章曾踌躇满志地写道：“六月十八夜，一声令下，”他们就都被“处决”了。一年之后，在不屈的农民领袖李秀成指挥下的太平军主力队伍，遭到了更为残酷的命运。

提到太平天国，后世受到两种说法的影响。统治阶级依据御用文字材料，相信曾国藩是伟大的英雄政治家，他征服了曾经杀死两千万人，使得国土荒芜的乱臣贼子和目无法纪的太平军。但普通老百姓，或者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却相信民间故事或私下相传的民间传说，认为太平军是穷人和被压迫人们的英雄和救主，后来被满族人和洋鬼子打垮。孙中山——民国的创建人，在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生于华南一农家——就受了后一种说法的影响，在华西的朱德这一代也是一样。

六十四年后朱德和毛泽东建立的红军，不仅认真地研究了太平天国革命以便从错误中汲取经验，甚至于采用了它的许多规章和战术，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八十五年后，红军的继承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开入北京时，在缴获的美国坦克和大炮的铁板上，闪烁着“八项注意”的字样，其中有几项，就是从伟大的太平军的纪律中吸收过来的。

在探讨太平天国革命悲壮的历史时，人民的心中常有一种敬畏之感。在一八四七年太平天国革命开始以前，中国的情势已经逐渐酝酿反抗清廷专制的起义。一八三九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一败涂地中结束，一八四二年缔结南京条约，将中国

变为半殖民地，就更为革命的熊熊火焰增添了燃料。由于这场战争，华南出现了大饥馑，强盗海贼横行，群众尽成饿殍，清廷除了长剑出鞘以外，别无解决之道。

就在这混乱、多难的漩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基督教。中国人读了福音书，把书内传播的穷人和被压迫者应该平等、友爱的教义，重新加以解释。传教运动首先起于华南，外国传教士最初为它欢呼，认为这是中国的新世纪的曙光；但当它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又大加非难，怒目而视。一八四七年，塾师洪秀全在广州的美国浸礼教会研究了一个时期，然后回到他的故乡。在把自己的家人和邻居都改教受洗以后，洪秀全和新教徒们组织了一个礼拜上帝的虔诚团体，这个团体在几年之内，就在整个华南的农民中间发展起来了。清廷立刻宣布这些教徒是颠覆政府的秘密会社，教徒的回答则是组织民团，不久即和来剿的政府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斗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反清秘密会社聚集在义旗之下；也有学识渊博和很有才华的人，由于新的信仰和痛恨清廷无道而参加进来。其中一人就是石达开，一个富有的、有教养的年轻的客家地主，他卖掉全部土地，以其所得作为基金，把基督教徒的民团组成军队，名为太平军。这支军队的旗帜定为红色，官长的上衣也是红色。这支军队在一八五一年组成后两年，象洪水一样遍及华南各地，并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威胁北京。

在太平军存在和斗争的时期，他们既不知西方世界人士所努力奋斗的巨大潮流，又与这种潮流毫无关连，因此，太平军使人们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伟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而西方世界在当时以至其后百年中，却始终认为这个民族是反

动、无知，愚昧和自卑的民族。

当时，正是西方创造了很多项伟大发明的时代，其中有不少项发明就被用以征服尚不知道制造近代武器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正和封建主义作斗争，要求更进步的社会制度。英国进步人士已经实现了废除黑奴制。西方妇女正在要求男女平等，而工人阶级则要求组织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权利。

正当太平起义开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同时，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了，但随即烟消云散；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大暴动在流血中失败；美国的工业化北方则对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封建南方开了战。

欧洲和美洲的进步力量可以互相支援，彼此鼓舞，太平军却在遥远的中国孤立地同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展开同样的战斗。如果反动的西方不援救反动的中国，太平军是可能高奏凯歌的。

太平军没收并分配土地，取消奴隶制和解放妇女，致命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他们对贩卖和吸鸦片者判处死刑。卖淫，以及喝酒抽烟，俱在禁止之列。每逢安息日晨，太平天国的人都要集会听道唱诗，并且诵读上帝十法——亦即十诫。

太平天国存在了十五年。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层出现了内部倾轧和腐化。但是，招致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乃是一八五八年英国和它的法国盟友同北京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战争以缔订天津条约而结束，条约规定英国鸦片输入和贩卖均为合法，清朝再度付出大笔赔偿，将中国海关交给英国人管辖。清廷同意执行条约的各项条款，可是太平军谴责了这一

条约，说它是奴化中国的锁链上的又一环节。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此以前还保持中立，到这时便将枪口对准太平军，与清军和地主绅粮的队伍联成一气，着手摧毁拒绝做他们工具的这一基督教力量。同时，基督教传教士又突然发现太平天国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说他们的洗礼仪式不对，他们的教义被孔子学说玷污了，总而言之，他们是假教徒。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基督教传教士由此而支持清廷和豪绅。其实，那些豪绅才是“异教徒”，封建伦理体系的顽固支持者，儒教信徒和不折不扣的基督教的敌人。

一八六四年七月，石达开和他的队伍在川西大渡河被歼灭一年之后，满汉两族的联军，以及由英国人查理·戈登指挥、以“常胜军”为名的外国雇佣军，在最高统帅曾国藩的指挥下，攻陷了南京城，大肆屠杀太平天国的人，连妇孺都不放过，总共有三十万人葬身血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城陷前不久自杀，尸体也被掘出喂狗。俘获的太平天国领导人都被砍了头，由于忠诚操节而获封为“忠王”的李秀成被俘后解到曾国藩那里，被他星夜处死。

有一个外国人——仅此一个，即英国人林德莱，为太平天国效力，被忠王派往英国，向英国人民说明起义的真相。在一八六六年于伦敦发行的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两卷本著作中，林德莱沉痛地控诉基督教国家“毫无良心地出卖了信仰”，并且说，他只能祈求英国不要受到“因摧残近代亚洲第一个基督教运动的罪恶而招来的报复”。他预言，太平军虽遭到镇压，但并未被消灭，它将如“火中凤凰”，从光荣的灰烬中重新站立起来。

和其他共产党将领一样，朱德将军非常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太平革命——他称之为“革命”，而不称为对朝廷“造反”，那是因为这个运动是要使社会获得根本变化，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它是反对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他和那位英国作家林德莱的意见不同，认为革命的宗教色彩只是偶然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会革命，他说，都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就象欧洲过去发生过的革命一样。太平军在部分地区分配了土地，在部分地区分配了粮食、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他们禁止吸鸦片和抽烟喝酒，他们甚至于尽其所知地解放妇女：他们禁止缠足（这反映了许多太平天国领导人出身于客家），允许寡妇再婚，在文官考试中让妇女有与男人竞争的权利。妇女在太平军里组成女军，和男兵们同样纪律良好，行为端正。

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未能完全将农民组织起来，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是因为它的领导人之间自相残杀；是因为它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战术错误，并且未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来进行领导。上帝会并不是政党，而是基督教道德机构，它提出了许多社会革命思想，而未能实现。

多少是因为受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太平天国还反对封建的儒教、偶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这就使敌人（达官、商贾、文人、地主）得以动员各种封建迷信力量来对抗他们。尽管他们有错误、有缺点，他们还是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写下了英雄的篇章，烧起了希望的火焰，在群众心中永不熄灭。

比起英国人林德莱，朱将军说，马克思的著作虽然只是零散地提到，但对于太平革命的估价却具有更大的价值。那时，

马克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记者，在刊载于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该报的一篇文章中，^①他指出太平起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②。

马克思进一步写道，“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狂热，说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他指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正在作垂死的挣扎，而一个新的世纪正在整个亚洲展开。^③

在另一篇文章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连太平天国的人都没想到的惊人声明：太平革命是“建立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啼声”，并且已经在共和国的大门上写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

朱将军说，太平天国失败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却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绝不会重蹈覆辙。太平天国被打垮以后，中国又恢复到中世纪主义，重新陷入更深一层的贫穷和屈辱的深渊。其后几十年中，四处都有农民揭竿而起，但每次都被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中。朱德出生的时候，太平天国认为无论抽吸或贩运都是触犯死刑的鸦片，已经到了被人熟视无睹的地步，

① 这篇文章题为《波斯和中国》，写于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左右，载于一八五七年六月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作者是恩格斯。——校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页。

成为奴役人民的外国武器之一种。

“我们老百姓处在黑暗之中，”朱将军说。“他们咒骂命运，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们屡次起义，屡次被镇压。那些应该领导起义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还不免轻视下层人民。对于农民来说，官吏都象贪吃的蝗虫。只要有钱，不论他是聋是哑是呆是痴，甚至是罪犯，都可以买官得禄。我小的时候，甚至我这一生，都看到做官的初来时瘦得象头饿虎，到临走就脑满肠肥。‘大老爷’、‘税吏’这种字眼代表的就是灾难。

“我们老百姓求解放的斗争已经有一百年了，其中最早和最伟大的斗争就是太平革命。千百万中国农民到现在还是奴隶。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倒把人当奴隶的制度。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有待于我们去完成。”

第 三 章

一旦有了追忆童年时代的记忆和印象的习惯之后，各式各样琐碎的记忆图象便从朱将军当年的生活里源源涌现了。他对它们很不重视，若不是我象猫一样不时扑住话头要求他详加说明的话，这些记忆中的图象很可能一闪即逝。他的确是有问必答，但因为他是公务非常繁重的人，有时似乎觉得是浪费时间。

记忆中的图象之一是这样的：

那年到底是几岁，已经记不清楚。他年纪很小，正站在家门前的小丘上，象往常一样注意着“大路”上的过往行人，这时随风吹过来一阵离奇而凶恶的叫喊声，声音既大，又拖得很长。

“喝——喝——！”最初听来很远，过了一阵，便越来越清楚了。

过往行人曾经跟他说过，山里老虎就有一种奇特的吼叫声，可以把梅花鹿吓愣住。他早就希望亲眼看一

次老虎和吓愣住的梅花鹿，现在似乎有了机会。可是他环顾四周，只看见大人们慌忙从地里逃散藏躲。祖母在家里大声吆喝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了，大哥代历向他叫道：

“小狗！快，快，快下来！”

四周充满着恐怖，朱德一下子就哭出声来。

“我的嘴大，肺又强，”朱将军微笑着说。

代历追到他身旁，可是并不把他往家里拉，反而拉到房后面的竹林里。他哭声震天，还嘟囔着要看老虎，他哥哥却要他赶快停声，说来的并不是老虎，而是军队。代历把他按趴在地上，两个人在竹林中躺在一处，就在这时，又是一阵吓人的、划破天空的叫声。朱德已是吓得一声不吱了。

朱将军说，在那种年头，清朝军队要吆喝“开道”，把老百姓轰开。这种习惯出自何时何代，已无从查考，不过据他想，大概起源于清朝初年打下天下的时候，为的是避免军队和人民亲近。

两个孩子趴在竹林里，先看到的是个骑马的官员顺着大路过来，头戴白色圆锥形的帽子，上插花翎，边垂帽缨，红色马褂，袖口和肩头绣着代表级别的军章。远远随在他后面的是一队绿营兵，身穿黑裤、黑衫，头缠黑布，脚着绳鞋，衣衫的前心后背都缝着一个白底黑字的“兵”字。

队伍携带着各式各样武器——长筒火枪、梭镖和大刀——有的还有扇子随手，一路扇凉。忽然之间，他们都张开了嘴，喊起令人血液为之凝结的喝道声。

两个孩子直到声音越去越远了，才敢爬出来，远眺“大路”，跑到大人正在说话的地方。他父亲痛骂这些军队是行

尸、王八蛋、兔崽子、妓院出来的龟孙子、赌场里的赌鬼——朱将军简洁地说，这些话都对。

以后的几年里，朱德时常看到清朝军队。他们是卑屈的懦夫，官阶越低，神气越足。可是碰到上司走过来，他和他的手下，马上跳到一边去，行起满族人的礼：一腿跪地，一手打千，不敢抬头。在农民面前凶得象老虎，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却又象摇尾巴的狗。

朱德提起当年的军队和税吏，就痛恨不已；可是每逢提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印象是，他还故意避开这种回忆，免得对一个外国人提到中国的丑事和弱点。朱将军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是怀有深厚的自豪之感的。

他继续说道，农民生活悲惨，在税吏的淫威下，常年汗水不停。这些税吏完全跟吸血鬼一样，每月必来，每来必把农民的钱勒索到一个制钱也不剩。除了数不清的旧税以外，他们还临时出花样要新税，以便“和县长说几句好话”，多“关照关照”。监狱里押满了既无力缴税又无钱贿赂的农民和其他穷人，就是在监狱里，他们的生活也要靠家里人负担。假若能够行贿，还有释放出来的希望，为了这笔钱，家里又不知要借多少吸人血汗的阎王债。

“这些就是家里把我挑出来念书的原因，”朱将军解释道。“由于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我家才决定让一两个孩子去念书。不论什么地方的农民，都希望孩子受教育，但那时没有公立学校，而要想上塾师们开设的私塾，若不是绅粮地主，就无法缴足学费。农民也许能让孩子上一两年私塾，可是到了能够下地的年龄，只好去下地了。我小的时候，农

村情况太坏，教育对于农民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都是好的。

“我们家比许多人幸运得多。我们拚了命的干，一个小钱都不浪费，于是有了一些积蓄。最初还想把先辈典出去的大湾的房子赎回来，后来，我的长辈还是决定让我和两个哥哥尽可能多念几年书。”

离朱家不远处，有一位私塾老先生。交涉了好几次，他答应代历每年缴八百钱，代奋和朱德各缴二百钱。这笔钱算得上是个大数目，但朱德的养父是个劲头十足的人。

入塾的好日子——大概是一八九二年的一天——快到了，全家显得很庄重。三个孩子都应该各有一身穿得出去的裤褂、小卜帽和草鞋。天门上的头发剃光，留在后面的头发洗干净后加上头油，编成清清爽爽的辫子。从此以后，他们就是读书人了，前此的小名取消，改以“学名”入塾。不过，街坊们为了要带几分尊敬，还是称他们为老大、老二、老三。朱德就是老三。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老”字，乃是一种尊称，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书人的尊敬已深深地铭刻在老百姓的心上。

入学那天，天还没亮，全家便都起身了，看着上学的孩子洗好脸穿好整齐的衣服，又谆谆告诫说，要绝对服从先生，不许有二话——因为师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吃过早饭，老大、老二、老三随着大伯父象执行神圣任务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一直送到门口，直到他们消失在朝雾里。朱将军觉得，当时所深切感到的严肃气氛至今犹在眼前。

私塾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同年龄的另外十六个学生，都

是小地主的孩子。倒没有特别有钱的人家的孩子，因为大地主家里都有自己的私塾。在私塾的这十六个学生眼里，农民家的孩子来念书，其可笑就等于牵来三条水牛读经学典。农民、苦力和工人这些用手干活的人，是不能期望他们用脑子的。这“三条水牛”——其他学生为他们取的外号——既心慌，又谦恭，在笑骂中忍让了好几个星期。然而，心里还是按捺不下，代历终于和其中一个打将起来，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老二、老三看见其他人有意干涉，也加入了战斗。三个人年龄虽小，却真能打，把地主少爷们打得鸡飞狗走。

被迫伸出手来挨打的乃是这三弟兄，而不是那些嘲骂的学生，而且要罚站面壁一日。老三哭了几下——可是看见其他的孩子暗自高兴，便强制住呜咽，默默地让眼泪往下淌。他从小就尝到了不公平，不仅在学校，在家也是如此。那天晚上，他父亲鞭打他们三个，还是朱老大要他住手，相信孩子们并没做错。

那些学生嘲笑他们在学校受罚的事，这三个又是一场大打，打完了自己走到先生面前，伸手等板子打。这一回谁也没有哭，他们的对手们看到如此光景，自忖最好还是和这类人相安无事。这一学年里，双方保持敌视的停战，弟兄三个上学下学始终采用密集队形。

在这类旧式的私塾里，学生先从《三字经》学起，《三字经》是押韵的三字对句，贯穿着儒教伦理和古代历史，先生从不讲解意思。学生也只能照音念音，一直念到每个字音都铭刻在记忆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意思也就明白了。从清晨到中午，整个课堂就是如此书声琅琅，念完一遍又一遍，大家念得彼此

不同，每个人都力求自己的声音能超过别人。念到中午，步行回家吃饭——离朱家二英里地——吃完又回到私塾一直念到天黑。

念完这一本，学生改念《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和《孝经》。能够在几年之内念得通的，便要再念《四书》和《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

朱将军说，私塾是不教近代课程的——没有数学、地理、自然科学和近代历史。因为，大凡应该知道的事，圣人都知道，后代只要念古圣贤书就够了。主动和创造是被认为不妥甚至于叛逆的。

老大、老二、老三之中，代奋是较差的学生，没有多久，家里就让他退了学，下田干活。老三是用功听话的学生，每晚一直要念到打磕睡，必须由大哥推醒。代历伶俐，记忆力最好，把书本念完，还有闲工夫作几个小曲子，然后用他自己的笛子演奏一番。不过，代历毕竟有年龄大了些的不利条件，如果家里活儿紧，大概也要轮到他退学下田了。

第一学年结束后，朱家人下了决心：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学费，何不找个象样的先生来教。“阎王”为丁家一族办有家塾，先生是同族人，还中过科举，是秀才。因此，一八九三年夏天，朱老大向丁老爷的账房提出要求，希望允许两个孩子入学。

一天，朱老大到丁家，向丁家账房磕过头后，账房告诉他，朱家两个孩子要是能够分担聘请先生的费用，也可以入塾。

“丁家虽然富有，可是什么时候都想要捞更多的钱，”朱将军轻蔑地说。“他们一定要我们缴和从前私塾一样的学费，可是缴了之后，每天又只许代历和我上半天课。我们只有照样接受了。”

私塾就在丁府里。丁府房舍高大，院落重重，还有许多客厅、饭堂，正中是一座华丽的祠堂。此外还有奴仆丫鬟的住房和收量佃户缴谷、打谷、入仓的几个打谷场。丁家的房檐下到底住有多少人，佃户们无从知悉，丁家则夸耀自己是五世同堂。一道高墙围着房屋、池沼和花园，墙外则是果园和一片可摘鲜嫩竹笋的竹林。丁家的男人多数抽大烟，个个有妾侍，对于无论什么样的活计，指头连沾都不沾一下。后来，朱德到成都进入刚刚创办的近代学校，“这一家没有一个人去，因为这家人不尊重近代学问。”

代历和朱德第一次到私塾的先生面前磕头时，心中很是害怕，他们被指定在课堂最里面的一张书桌旁。这里光线极暗，所以从来没有人在此坐过。四周墙上写满圣贤之言和道德文章，可是三十六名丁家学生，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他们都是少爷，“一天到晚游戏和恶作剧的少爷。”先生对他们绝不处罚。可是，朱家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出一点差错，就要挨骂。环境是不顺人意的，但是他们两人拚命用功，没过多久，先生对他们也就亲切起来了。

丁家孩子用同音不同字的读法来侮辱这两个农民子弟，把“朱”字故意读作“猪”。他们也不容农民子弟保有起码的尊严，更不准他们把任何东西视为己有。朱将军童年时代最痛苦的记忆之一，是一件关于梨子的事。他在自己家附近的梨树上摘

下一只梨，带到私塾去吃。休息时，丁家的一个孩子走过来将梨子一把抢过去，张嘴就吃。

“那个孩子说我们没有吃果子的权利。代历捶他，别的孩子一拥而上，我也又踢又抓他们。先生稍微罚了我一下，可是命令其他的孩子不许招惹我们。自从这件事以后，丁家的孩子常常成群地到我家来，从我们的果树上摘果子吃。我们则用棍子轰他们。他们把我们的日子弄得非常不顺心。”

另一幅记忆中图象的时间是朱德在丁家私塾念书的一年。那年冬天缺雨，只下了场小雪，冬季作物长得很差。到了春天，仍然无雨。朱家的人，一边从河沟往地里车水，一边不安地眺望着预兆不祥的焦黄的天空。不论大道还是小路，到处尘雾滚滚。这样一直拖到夏天，丁家存底丰厚，仓廩依旧充实，可是农民饥肠辘辘，着实难挨。给龙王上供的村村户户响起了求雨的鼓声，善男信女的行列出现在乡间小路上，一乘无顶小轿抬出龙王泥像，求他看着苦难人民的惨象，发发善心，变变天气，可是“阎王”照常把佃农们召唤去，要他们抬轿子把他全家送上山去避暑。

大旱的第一年，朱家出动了全家人，不停地往高粱地、菜畦里车水。祖母下令将全家的伙食改成薄薄的两顿。代历和朱德中午从私塾归来，车水一直到深夜。

镇上的商人运米来了，人们用农具、家畜、衣服、家具乃至姑娘去换米。从未见过面的城里人也来收买农村姑娘，好看一点的被卖到妓院或是卖作姨太太，难看的则被卖出去做丫鬟。冬天来临时，朱家还拿得出钱来缴两个孩子的学费。

不象朱家这样勤劳节俭的农民们，只落得流浪他乡，有的

到南部^①的盐井卖身做工，有的去重庆或其他城市充当苦力。大城市里还有人发善粥，饥寒的人可以一天领到一碗，村子里则什么也没有。

朱家的男人夜晚轮班看守庄稼，到了秋天，大人收高粱、南瓜和青菜，孩子们则上山割野草。丁家从山上回到村里，还派人特地从成都带回来外国步枪和子弹，以防万一。

老大和老三又瘦又弱，表情阴沉，缺乏孩子的天真，看上去要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大了好几岁。全家的最后一点储蓄也缴给“阎王”作学费了。这一家人也开始出卖他们仅有的一点财物，包括床上的珍贵的席子。总算没有出卖农具和姑娘。

旱灾的第二年夏天，村里的人们对龙王失去了信仰，多年秘密结社的哥老会的冒险分子，在村子里到处交头接耳。老百姓连夜晚睡觉都时时起来望天，向着那毫无慈悲的热风冷月，免不了说几句埋怨的话。

初夏的一天，丁家又派人来招呼朱家的人把地主一家送上山去，这时，突然之间，不知是谁仰头大喊一声：“听啊！”

老三听到了一阵骚乱声。最初以为是他母亲——她又是在家中待产。后来，才发现有一个骑马的汉子，猛挥马鞭，直奔丁家而去，骚乱声从北面传来，声音越来越大，“大路”上不知不觉间竟滚来一团尘雾。

滚滚尘雾中，一帮行尸走肉似的人出现了。有手持各种武器的男人，有背着婴儿的缠足妇女——还有一群肚子肿胀、眼睛无神、光着屁股的孩子，拖着无力的步子，踉跄地跟在后

① 南部是四川一县，在仪陇之南。——译注

面。人声鼎沸之中，一阵急促的锣鼓声在丁家打响，老三一听便知道，这是“阎王”在召集佃农为他战斗了。

朱家的男人听到锣鼓声，动都不动。饥饿的人群象雪山崩塌了一样，蜂拥到“大路”上，其中有那么几百人涌向朱家院子，大声喊道：“一道去把大户吃光噢！”

朱家的祖父、祖母把孩子们关在家里。在骚乱声中，传出了朱德母亲的轻微呻吟声：又是一个婴儿出生了。

“饥饿行列”转眼过去。朱家还没有穷到必须加入的程度。

第二天，朱家听到强暴的士兵的离奇而凶恶的吼叫声。“喝——喝——”，听起来十分蛮悍。全家马上闩好大门，跑进山里。但这些士兵并未停留，一掠便过。过了几晚，流离失所的农民来到朱家投宿，悄悄说起打了一场激烈的仗，饥饿的老百姓有好几百被杀、被俘或是受了伤。他们打得很勇猛，也干掉不少士兵。在队伍追上以前，他们已经包围了丁家和其他大宅院，虽然也有一些人被杀，到底还是冲进去大吃了一顿。

朱家怎样度过最后一个苦难的夏天，朱将军已经想不起来；可是他还记得，隔些时候便有人在夜晚运进食物来；他父亲和一个叔叔有时不见踪影，一去便是几天。许多农民已经变成土匪，到远处去抢劫。朱家是否有人参加，朱将军始终不清楚。

那年夏末秋初，喜雨初降，饥馑停止了。可是，已经有许多自耕农卖掉一切，沦为佃农。佃农则变成了苦力、大兵或地主的长工。没有一个人身上不背着债，这笔债一直到他们的儿孙辈也还不清。

朱家虽然没有借债，可也别无长物，一天，丁老爷派人来通

知，他们在旱灾时未缴租，老爷也“穷得过不去”，以后得加租。大伯父下跪求情，说他们以往从未欠过租，一心在地里干活，始终听话，人家吃大户，他们也没有跟着吃。对于这一片陈情，账房同意转达给丁老爷，后来果然有话给朱家：以后，一半的地按原来的数额缴租，另一半则加租。

全家计议良久，决定分家，一个家继续耕种照付旧租的那一半地，另一个家则另去佃地耕种。大伯父和四叔两房人分出去，祖父、祖母和另外两房留在老家。

全家决定，本是名义上的家长的大伯父，应该分家出去，这是因为他的养子朱德要继续求学。代历那时已经十二岁，只好退学不上，回到家里和父亲、叔叔、兄弟们一齐下地。家虽然是分开了，收入还要和过去一样，算到一处，朱德的教育还由全家负责。朱德也因此第一次离开了亲生父母。在叙述这一段经历时，朱德的脸色很阴沉，似乎认为分家乃是一场悲剧。事实上，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等于一场革命，因为每个家族都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经济单位。

深谋远虑的大伯父在大湾镇外佃来三英亩地，这地方离着当年的旧房子很近，朱家早就有意把这房子收回来。大伯父选拣这地方，一方面是因为靠近老家，一方面也因为附近有一间席聘三老先生的私塾，已经答应朱德去上学。

大伯父借来一笔钱，足够维持两家到明年大收前的生计，以及向地主缴地租和付朱德的学费。左思右想之后，这位有远见的老人终于决定把四弟的两个孩子也送去上学，就是上一个时期也好。

朱将军还记得，当时一共借来一万钱，相当于成都造币厂

新铸的一百二十块大洋。这在当时的确是笔大数。全家打算早起晚歇，精打细算，好好地干它五年，把债还清。

朱将军解释道，这一远大的计划有一个悲剧般的背景——鸦片。在此以前，这一地区里虽然也出现了种鸦片的地，但老百姓都认为不合体面。朱家人也知道，如果种鸦片，可以赚很多钱，但一种廉耻心使他们没有迈出这可怕的一步。可是现在全家破产了，借来的这笔钱迫使他们把道德观念束之高阁而要来照顾实际。朱老大和他弟弟因此把一部分新佃的地种了鸦片。他们的生活暂时稍见宽裕。

朱将军提到大湾，总是充满了感情，这倒不是因为它的自然条件胜过他当时所知的其他地方——而且并不比其他地方好，而是因为这个小城镇标志着他的家庭向前迈进了一步。

他说，大湾镇里镇外有九千人口，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地方。“它和大城镇有交通往来，我们因此看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新的消息，放宽了眼界。”

对于朱家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城镇就是一个大都市，充满了活力。镇里有一条大街，一星期赶集两次，届时这里就成了闹市。也有许多手艺人，诸如铁匠、弹棉花匠、木匠、石匠、补碗匠和织匠。大街上还有肉店，南酒豆腐房，庠谷店和草药店。一家干净的客店是供有钱的过往行人下榻用的；还有几家又暗又小、虱子臭虫俱全的小客栈，可供苦力和同类的人暂住一晚，一条肮脏的被子每晚收费一两文钱。夜静更深，自有打更人报时，巡视周围，防范火烛和小偷。镇里有一座庙宇，供有温文尔雅的罗汉和一尊慈祥的佛像，由一名黄袍僧人主持。大湾镇外另有一座庙宇，供的则是土地爷。

镇上有个宗教团体，它的成员在承平的年月里，凑集些香金，每年打一次醮，或是到川南的圣山峨眉去进香。这些活动多半是社会意义重过宗教意义。

乞丐、小偷和歹徒——大都是饥荒造成的——每逢赶场，就在充满着农民喧哗之声的整条大街上四出下手。在赶场的日子里，还有代写书信的人坐在沿街的小桌子后面，算卦的、变戏法的和江湖艺人则想尽办法招徕顾客，赚几文钱。流动的理发匠，随身带着小凳、脸盆、面布和剃刀，准备替人清洗、上油和编辫子，甚至于拔牙，收费很少。这是一个使乡间儿童心花怒放的小镇。

这以后，朱将军就不大谈他的一家，而更多谈他的学校，以及通过学校所听说的社会上的事情了。这时他家吃穿都已转好，按时按月缴上地租和利息。到了第三年年底，本来几乎可以把全部借款还清，但他们将积蓄转用到把先辈的房子赎了回来。第四年年初，还在丁家地上住的那一家人，就迁了进去。那是一件大事情。朱家老祖母和老祖父虽然健在，但终究可以买妥上好的棺材，将来能够在自己的地里入土了。

这一渴望了多年的成就并不是轻易得来的。两家人在过去三年里辛勤劳动的积蓄并不够赎回老房子的钱。第二年年底，他们不再让朱德的两个堂弟上私塾。赎房子的不足之数，是后来又借了一小笔钱补上的。

其他一些事也花费了钱。朱德的大姐秋香在十五岁那年嫁到一户自耕农家里。两家人按照习惯大摆宴席来办喜事，还有戏文。代历表演了笛子和胡琴，技惊四座，朱德母亲的娘家人倾全力唱了一台戏，分文不取，只吃了一餐好的。

朱将军用寥寥数语就把这些事情带过，所提到的多是进入席聘三先生的私塾之后在他眼前展现的新世界。私塾就在老先生自己的住所，离朱德家大约有三英里地，他每天早晚徒步来回。

他和两个堂弟入塾时，情况也跟前两间私塾一样，另外十名学生把他们搞得很惨。农民只会用双手干活，哪里会用脑子，放牛娃还能把书念通？希望简直渺茫得很。回忆起当年的不平和屈辱，朱将军到现在心中还有隐痛。从那时到现在^①，四十年的时光流过去，中国贫苦人家的子弟仍然大部受不到教育。不过，每当追忆起席老先生的私塾，他就恢复平静，亲切地提起了最初曾欺侮他们的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几乎都是生意人家的孩子，”他说，“比地主少爷的头脑要清楚，而且用功，因为他们一家也必须劳动。他们学习勤奋，我也不愿落后，大家马上就成了朋友。和我最亲近的一个叫吴绍伯，比我大四五岁。绍伯的家是个破产的书香门第，他学习认真，有时念书念一晚上。我常到他家去。他家里有个书房，他就在那里手不释卷。每到暑假，他甚至去成都找书念。我对勤勉好学、知识渊博的绍伯非常尊敬。老先生膝下有个和我同年的孩子，我和他就不是特别亲近。”

席聘三老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到他退塾时已快八十了。他并未中过举，可是声望很高，都认为他是个对外部世界颇有卓识远见的学者。他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②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

^① 指一九三七年。——译注

“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朱将军不胜怀念地说道，“他为我考科举作了一番准备。”

在老先生的教授下，学生们修完了《四书》、《五经》、《纲鉴》，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们读史读得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一边走着，一边向学生谈古说今，用尖锐的评语批评皇帝、将军、官僚，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流氓恶棍，雇用了一些文人为他们伪造历史，说什么他们又有才学又有德性。

老先生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学，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虽然不知科学为何物，却对科学全心拥护。他常说，中国就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许多深知这一点的改良主义者，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学校。

当时，中国沿海城市也有几家报纸，不论是朱德还是他的朋友，谁也没见到过。朝廷认为，社会上的事只有当官的才有资格注意。象这样小的私塾所能听到的新闻，只能是从过往行人的口中或者外乡来的信中得来的。

人们甚至不知道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的事，只是到了中国大败之后，消息才传到这间小私塾。朱德将军还记得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向家里人讲起日本把中国海军全部击沉，把中国陆军打出了朝鲜，并要让中国付出大笔赔款的事。大人们听到什么日本、什么朝鲜、什么南满、什么中国海军，茫然不知所云。他们总以为他们的敌人就是眼前的地主、官员和税吏。可是他们极为骄傲，家里居然有个孩子能够谈起遥远的地方和国家大事了——将来当个大官，也未可知哩。

朱将军还回忆起席老先生朗诵君主立宪主义革新派领袖康有为和其他各省一千多名举人的公车上书，书里面要求皇上不要批准马关条约，而要使全国实现近代化，以免受外国人奴役。可是朝廷毫无反应。

“全国的知识阶层，”朱将军说，“被马关条约的条款吓住了。小日本帝国突然出头和西方列强争夺统治和剥削中国的权利；它就在中国的大门之外，而这个广阔、落后的国家，在无知和腐朽的清廷统治下，却反对任何变革。”

“从那时候起，”朱德用深沉而愤恨的语调说，“北京政府就成了外国银行团的收税机构，银行团贷款一笔又是一笔，强迫北京接受。不到三年，北京接受了欧洲、英国和美国银行团的十一笔贷款。这些外国人对于贷款抽利息这一点还不满足。他们连同附近的土地，强取了修铁路、开矿山的特权，甚至连行政权和警察权也一起弄到手。”

一八九七年时，他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但到如今，朱将军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那时对于外国人瓜分和霸占中国，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各有其“势力范围”的局面所怀的恐惧。德国人开了先例，他们在山东谋害了两名自己的传教士，以此为借口占据了重要海军基地青岛和附近地区，并宣告将全省划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凌驾于任何国家的商业利益之上，进行工业方面的开发。德国人还借那两名传教士事件从北京勒索到赔款和在省内开矿和修建两条铁路的权利。

如同有了协议一样，其他国家随即要求将中国其他的地区分别作为他们独占的势力范围。帝俄取得了东北，英国人取得了华北的威海卫军港、长江流域和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法国

人取得了印度支那附近的广州湾，宣称邻近印度支那的三个省份是他们独占的地盘，开始测量从海防到昆明的铁路。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宣布云南和四川两省分别属于自己的范围，英国人还派出炮艇到长江上游巡弋，准备修一条铁路贯通四川。

日本人所要求的是台湾对岸的福建，台湾在此以前已经被他们吞并了；意大利要求的是上海以南的一个军港。“北京拒绝了意大利人的要求，因为意大利陆军和海军还吓不住人，”朱将军讥讽地说。

就在中国被“拦路强盗”瓜分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美国在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无数抗议下兼并了菲律宾，从而走进帝国主义竞技场。对于商业利益很吸引人、但已被“势力范围”霸占而无法下手的中国，美国开始打主意了。

英国人虽然已经分得了最大的一份，但也自有烦恼。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由于一切输出和输入都要在此经过，英国商业利益就支配了中国市场。势力范围威胁了英国对贸易的控制，甚至各敌对国家之间还以战争相威胁。朱将军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霸占、瓜分后，与日俱增的恐惧在国内形成了革命气氛，外国人深恐再出现一次太平起义。

那时，朱将军又说，英国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用武力瓜分中国，另一派则要求躲在清廷后面控制全国贸易，这个“和平派”盘算的是一箭双雕的方案。由于强权的英国所提的每一方案都受到猜疑，他们把脑筋转到美国身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唯英国的马首是瞻的。

“和平派”于是派遣赫比斯莱——一个在中国的海关官员

——去华盛顿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这方案也涉及到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就把它当做自己的方案，并且得到所有其他列强的赞同。从一九〇〇年起，它就被称为美国的基本政策，用以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

“势力范围依然存在，”朱将军说，“可是所有外国的商人和投资者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享有同等权利。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情况丝毫没有变化。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制订的，它首先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其次是为了新来的美国人的利益。如果有什么残羹剩菜落到中国手里，那是十分偶然的事。集体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发展工业的行动开始了——中国人民深怕被奴役的民族恐惧在继续增长。”

清朝完全手足失措，它既无能、又无知，却对人民肆虐。那时，全国只有两三镇^①“近代化”部队驻扎在华北。其他的中国军队除了少量的近代步枪外，只有旧式的大口径短枪和十英尺长的从枪口装火药的铳枪，必须由好几个人扛在肩头，由另外一个人点火。一些中国军队还只有大刀、梭镖。甚至于弓箭。这样的军队在外国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对付毫无武装的老百姓却耀武扬威。朱德家乡的一省就驻有两万军队，有五千人是八旗兵，朱将军称他们为“又懒又没有本事的笨蛋，除了跟着所有的队伍一起领饷之外，还要拿满族人都可以享有的皇粮。”

对于外国侵略的恐惧和清朝无能的愤恨在增长着，而各式各样的风言风语也在各村落间传开了。朱德在那时还未见过洋人，只是听到过往行人说，那些人遍体是毛，赤红脸，不会弯

^① 清朝的镇相当于师。——译注

的直腿，一对猫眼深陷，一眼看到地里就知道哪里埋藏着财宝。虽然凡是信了基督教的中国人都被称为“洋奴”，那些加入法国天主教会的人则更受憎恶。“甚至小偷、杀人犯、强盗等等为了逃避中国的法律，都入了基督教会”，朱将军说，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

朱德的老先生对于洋人凶猛残暴的说法却不大相信，他总认为，一定有许多善良的人——即使到中国来的人里面没有，但在他们本土一定会有。席老先生自称是中日战争后席卷全国的改良运动的信徒，所以不断鼓励学生们到外国去求学，研究科学。大家并不确切了解改良运动是什么，而是把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制到广东医生孙中山的共和制这一切东西，都笼统地包括在内了。

只是过了多少年之后，朱德才了解孙中山这个人物，以及他的令人敬畏的思想的真谛；但在十九世纪末期，他从孙中山的最善辩的敌人之一那里听到了“共和制”这个字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变法总督”张之洞，一个君主立宪主义者、孔教徒和实业家。康有为和有名的文人、学者梁启超都是他的信徒。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席老先生弄到一份总督张之洞向中国青年发出的《劝学篇》。他劝大家勤学洋务，不过要提防“共和制”这一危险思想。

张之洞写道：

啊！共和制！他们从哪儿找到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字眼。它有百弊而无一利。如果实行共和，只有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展欣喜若狂，而对于我们，则是叛逆与混乱有如长夜临头。

共和制！老先生对着这三个字考虑了许多时间，也摸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传说，提倡共和制的人，与土匪秘密勾结，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老先生却没有被吓着，因为凡是主张革新的人，一定会被扣上同样的帽子。太平军不就是被称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吗？而外国人不正是因为有了那个有名的总督所提倡的新知识和科学，才有了蹂躏中国的力量吗？

朱将军回想起当年席老先生从一个过往行人手里拿到的一本小册子时，嘴边流露出一种悲喜交集的感情。据说，那是一本介绍西洋科学的教科书。老先生立刻停止上课，和学生们一起朗读起来，就象他们背诵四书五经一样。

这不过是一本最起码的书，介绍当时重庆一家使用新式机器的肥皂工厂，”朱将军追忆说。“它把机器非常简单地勾画了出来。”

其后不久，朱德的学友吴绍伯到成都度夏，带了一本真正介绍西洋学问的教科书回来——一本数学书，这是北京新成立的译学馆出版的第一批书籍之一。第二年夏天，吴绍伯又去了成都，和一位朋友研究，这次带回的是数学用具——丁字尺、半圆仪、计算尺等等。教科书刚一带到私塾，席老先生就把绍伯和朱德找到家里，加上他自己的儿子，一连几晚研究到深夜。在蜡烛光下，三个学生和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对着这本书，一研究就是几个钟头。

“我学习已经达到可以替家里记帐的水平了，”朱将军说，“这样，就减少了家里人对西洋学问的误解。对科学的信仰从此而起，我也成了热心的信徒之一。”

第四章

在深恐外国侵略的浪潮中，席卷全国的改良运动于一八九八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到了登基年龄，他登上宝座，不再通过反动的老伯母西太后的听政而亲自问事。有名的“变法总督”——其后又出卖了改良运动——张之洞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作为顾问，年轻的皇帝就把改革的方案交给他们去施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立刻横扫全国。

这件事在大湾小私塾里点燃起来的热情，朱将军到现在还觉得犹在眼前。古老的中国在“百日维新”的火焰中死亡。“百日维新”影响到各方面——军队、学校、财政以及科举制度。国家要走向工业化，宣布每星期休假一天。甚至作为臣服满族的象征的辫子，据说将来也要剪掉。

尽管以西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反对，洋学堂如雨

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席老先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找些新教科书，但是过了好几年，这些书才运到这偏僻地区。朱德的同学从成都带回的那本数学书只好继续为私塾服务。私塾的学生年年倍增，绍伯和朱德成了教授数学的先驱者，每星期总要分出些时间，给其他学生讲授。

甚至还传说妇女的地位要改变，女孩子也要受教育，并且禁止缠足。朱德一家同意天足，这使妇女便于干活——可是哪个男人愿娶大脚妇女呢？他们谈到放脚，但没有采取行动。

朱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昏时分从塾馆放学回家，帮忙把地里的农活干完以后，就热心地向家人叙述变法运动。大人们听得入神，为这孩子能谈出如此之多的天下大事而感到骄傲——是不是命定可以做得什么大官呢？可是，对于变法却丝毫不感觉兴趣。

朱将军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顽固守旧，“而是因为变法并没有触及土地制度。一八九八年的改良主义者，走的乃是日本的道路，也就是让农民照样隶属于地主，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他们所谓的农村改革，不过是运进一些埃及和美国的长毛棉的种籽，让地主买进然后转卖给农民。

“变法对于商人、地主、实业家、知识分子还有些好处，作为国之根本的农民却沾不到任何光。农民在变法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只是纳税人——为了支付新设立的机构的开支，又添了许多新税。只有从根本着手的土地改革，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

“那些保守的改革派，还一心以为西方民主主义国家会欢

迎近代化、工业化的中国，可是，外国人正是不愿意有这样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中国只会和他们竞争。”

改良派领导人不去进行可以获得农民支持而彻底打垮反动势力的土地改革，却想把西太后彻底搞掉，因为他们认为西太后是敌对势力的最高指挥者。这件事还未成功，袁世凯就倒了戈。袁世凯自称改良派，他曾对新登基的皇帝信誓旦旦，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西太后突然下手，把年轻的光绪幽禁起来，并且把她能抓到的改良主义分子都斩了首。康有为逃到香港，梁启超东渡日本，在那里组织新党，发行《新民丛报》半月刊，仍然继续推行保守的改良运动。至于那个有名的“变法总督”张之洞，他当初曾把改良主义者介绍给皇帝，如今又转而痛斥改良派，为了赢得西太后的信任，甚至不惜进诗谄媚。一直到他斩了几名想行刺他的青年改良分子的头以后，才恢复了西太后对他的宠信。

中国又进入了黑暗时代。朱德住的村子里，从此谁也不敢再提变法运动。小私塾里充满了忧郁气氛，席老先生的辛辣讽刺再度出现了。数学教科书也只能暗地里研究。

没过一年，新的流言好象台风前夕的一阵清风，在四川各村落间吹来吹去。在大湾赶场的日子里，不知道是谁，低声传出了义和团的事情，义和团是从十四世纪以来就有的秘密会社。到处流传着打倒洋鬼子、打倒洋奴（指加入基督教会的人）的传说。

风言风语如疾风一般，横扫过来了。传说义和团已在华北以及沿海外国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活动起来，袁世凯已经出任山

东巡抚——是由他的外国主子撑腰的，着手镇压义和团，川东一带，也出现了痛骂洋鬼子、洋奴的标语，可是立即被当局撕了下来。

对于义和团，朱将军这样说：

“它和变法运动是从同一块土壤上发芽生长的，不过它是与清朝的反动、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当时，农村经济已经濒于破产，国内遍地哀鸿，一九〇〇年黄河决口，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朝廷毫不救济。人民也认为清朝是国家受辱和濒于灭亡的祸首罪魁。

“我记得，就是四川的小村庄，那时都充斥着英国、日本的棉织品，此外，甚至绸缎、绒布、食糖、洋伞、厨房用具都运来了，就连洋钉也把中国钉子压得站不住脚；进口货煤油，比自己家的菜油还便宜。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弄得没神没气。每到冬天就到我家来织布的那位老大爷也不来了，而且没有新人代替。大家到场上买英国布还更便宜。日子越过越穷，只有在衣不蔽体时才买几尺布。”

朱将军已记不起确切的日子，不过记得有一天，饥饿的人群用短木棒、旧鸟枪武装起来，涌向他的老先生家要粮食。抢粮的人又聚集到“大路”上来了，只听得到处都是“吃大户！”的喊声。席老先生的家哪里称得上大户，但还是尽其所有，分给他们。私塾里的学生们一边远远眺望饥饿的人群叫嚷着奔向“大路”，卷起一团尘雾，一边不禁深为叹息。

同一天，朱德又看到一队带辫子的骑兵——黑军服、黑裹头布、新式步枪——从后面穷追那群饥民。据说，骑兵追上以后，立刻“血流成河”。象这样的社会状况，怎能避免群起暴

动呢？

当华北的义和团把矛头指向外国人的时候，朱将军说，在华南、华西一带的义和团，因为朝廷安抚差，还带有社会革命的性质。“我们同情义和团，可是四川人大都不愿参加。在成都，有些传教士和教徒被人扔过石块，就是做官的也有不少排外的人。

“川东也有义和团的分支出现了，农民们纷纷投到余栋臣的旗帜下，余栋臣自称‘余蛮子’，用以吓唬外国人。余蛮子及其部属对传教士和教徒不大留情，但他们的怒火主要还是集中在地主和税吏身上。他们拿走粮食、被褥和其他必需的东西。官儿们惊慌失措，鸡飞狗走，最后是总督从成都和重庆派来了兵。”

一九〇〇年夏天的日子里，朱德和他的同学经常聚集在老先生家，谈论义和团，而且研究一旦义和团扩展到当地，该如何办。

被学生们围着的席老先生开口了：

“我们先看看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和甲午战争罢。每一场战争，对方都只是一个国家——最多两国，就打败了中国。现在中国是不是比那时更强呢？”

“更弱了！”青年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义和团现在和八国联军作战，能打得赢吗？”

“不能！”青年们沉痛地说。

“西太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关注比以前增加了吗？”

“更少了！”他们断然地回答。

“是谁命令义和团作战，自己反而跑到西安去了呢？”老先

生心情沉重地提出这个深刻的问题。

“是当今，”青年们感叹着。

“我曾经对你们讲过救国之道，是怎样讲的？”

“努力用功，将来到国外去学西洋科学。”

“那末，义和团的道路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错的，”回答是悲痛的，有的还落了泪。

中国老先生如此发问，他的学生们则如此回答。

私塾复课后，又过了很久，传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消息。联军统帅是个德国将军，不断地向他的部队下达德皇命令——猛烈打击中国人，使他们肝胆俱裂，从此没有一个中国人再敢于抬头。

命令照实执行了，至少外国人是这样想的。外国军队在其侨民的积极协助下，抢劫了北京的民宅和宫廷，掠走了珍贵的绘画、地毯、花瓶、家具和衣服——然后将建筑物一焚而尽。不分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了。古城的水井和湖泊里堆满了妇人和姑娘的尸体，她们有的因不愿被奸污而自尽，有的则已被奸污了。

朱将军回想起北京的遭遇时，嘴边露出了一丝苦笑。

“这消息使我们的私塾几乎瘫痪了，”他说。“最后统计的结果，在这次起义中大约有两百名外国人和几千名教徒被杀死。但被杀害的中国人又何止百倍于此，可是外国人连提都不提一句，真是草菅人命。我们听到媾和的条件时，气得连话都说不出。中国又要赔款——由农民全力负担。胜利者想尽了各种办法凌辱我们老百姓。凡是受害的中国教徒或其家属都要得到赔偿；凡是有外国人被杀害的城市要停办五年科举；天津附

近的大沽炮台要拆毁，外国人有权警卫京津铁路，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又有几个城市，包括四川的两个，要开埠通商。北京还要给予外国战舰以随意巡弋中国沿海和内河的权利。”

在大湾和其他村镇赶场的日子里，朱德和他的同学混在农民中间，议论起四川的危机，谈到老百姓又要缴纳新税来负担令人目眩的赔款。朱将军说，美国以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在北京郊外创办了清华大学^①，但这并不能表示什么博爱之心。清华之建立是为了把受过训练的学生送到美国去作进一步的学习，以便回国后能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新的苏俄政府无条件地将它的庚子赔款退还，同时将帝俄与北京政府之间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全部废除——就是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也废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奥两国被迫放弃了它们的庚子赔款，可是其他国家直到三十年后才退还庚子赔款，其条件完全是从它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在朱德用这种严厉的态度和我谈起创建清华大学这类机构所隐藏的动机之后三年，我在重庆听到一个法国外交官抱怨中国学生在中国的法国学校受教育以后不知报恩的态度。他相当坦率地说，他们不顺从法国的利益，所作所为倒象在中国大学里受教育的人。他又抱怨说，美国人比较成功些，可是即使如此，他们的许多“产品”还是反咬一口。因此，法国应该调整他们在中国的教育机构——或者承认失败而干脆关门。他对于法国在中国办学校的出发点就是对法国有益。

① 应为清华学校，它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校注

谈到义和团，朱将军对 外国人关于它的看法所知不多，也许完全不了解。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折不扣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所以完全是从这种角度来看问题的。他说，尽管它有缺点，“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但起义无论如何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勇敢和无畏。”他还讲到一个传说：甚至在华北被俘的义和团的驴子都拒绝服从入侵的外国军队。它们一屁股卧在地上，不再移动，外国人即或强拉也拉不起来。

很明显，朱将军对于义和团的驴子比对清廷还怀有更大的敬意。在外国胜利者的最后同意下，清廷从遥远的避难地西安回到北京。西太后向胜利者献媚，请来外国公使的老婆们到皇宫喝茶，献上大批珍贵首饰。朱将军说，只凭她自己的首饰，就能偿付全部赔款，可是政府依然设立新税，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把他们逼得更穷更惨。

义和团以后，他继续说，中国人畏惧乖张的外国人，“可是在外国陆海军未能侵入的内地，外国人又畏惧中国人。”四川的传教士也不敢公然蔑视“异教徒”了。为了不致在中国青年中失去影响，他们还在学校中增设了介绍科学的学科。

在我问他是否考虑过上教会学校去学西洋科学时，朱将军惊诧地注视着我。

“我怎么会呢？”他嚷了起来。“我是个爱国者！传教士把中国人变成轻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懂政治和文化的人。中国教徒虽能说中文，可是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写信。他们以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是天堂，一切善良的中国人死后灵魂都要去那里。”

他继续说，义和团以后，大家对清廷的仇恨更为强烈，孙

中山手下的共和派则更为奋勇。出版了一张新的共和派报纸——《民报》，号召打倒清廷。这张报纸被偷运到内地，可是等朱将军看到什么共和派的刊物时，那已经是五、六年后的事了。保守的改良派胆子也大了，开始在成都秘密发行一种小报。朱德所在的私塾里有了这么一张小报——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报上只有新闻，别无其他，但“那年头，新闻是革命性的。老百姓把它手抄下来，寄给朋友。

义和团以后，朝廷宣布要作一些新鲜然而审慎的改革，但宣布以后，什么也没执行。不过，知识分子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办学教授西方的知识。近代化教科书还是没有，老师只有靠记忆和笔记讲授。朱德所在私塾的学生注意着每一个过往行人，希望能得到几本书，而且每逢有从成都来的读书人由此经过，席老先生一定停课不上，邀他尽量讲述有关成都、北京或其他地方的事情。学生们可以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目不转睛地瞅着讲话人的面庞或跟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对于每一种表情、每一个字眼都不放过。朱德已是十五、六岁，一对褐色的大眼珠，前额剃光，背后拖着一条长辮。他已经到了能够完全理解中国全部问题——虽然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年龄了。

义和团的悲剧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每逢提及此事，他就象忘记了时间一样，喃喃自语起来。

“后来，我到德国念书，”他说，声音冷峻而坚定，“在人家家作客时，常常发现中国地毯、花瓶、绘画、硬木家具和其他样式的艺术品。每当我问起来，主人就有点支支吾吾，我知道这必是从北京民宅和宫廷里抢来的。我还在柏林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义和团的旗帜。我要是留心找的话，一定可以在法

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家里找到同样的东西。”

停了一阵，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义和团起义时德皇给他在中国的军队所下的命令——后来由所有外国军队执行的命令。我因为只有个模糊的印象，便到图书馆书堆里去找。命令没有找到，却找到了马克·吐温在一九〇〇年圣诞节前夕写给《纽约太阳报》的信件，信中叙述了起义之后外国人残杀中国人的情形。这封信是根据美国传教团一个名叫阿曼特的牧师的报告写的，报告中提到，他曾经到义和团杀死过教徒的中国村子里去索取赔款，他拿到的是对每个被杀教徒的赔偿金三百两，“而且还有相当于赔偿金十三倍的罚款”——这位牧师大人说这笔钱“将用于宣传福音”。马克·吐温引述阿曼特的报告说：

阿曼特先生宣称，他拿到的赔偿和天主教徒所拿到的比较起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天主教徒除了现款以外，还要求“一命抵一命”。天主教徒每死一人，要赔偿五百两。温州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杀，欧洲的天主教徒因此要求七十五万吊钱和六百八十个首级。

马克·吐温接着说：

我们的阿曼特牧师，由于会做生意的天主教徒不但每死一人可以拿到大笔赔偿；而且可以“一命抵一命”，于是理直气壮地大表其羡慕之忱了。

马克·吐温又说，如果德皇在义和团时期给予侵华德军的命令在同样情况下也适用于美国的话，命令就会这样写：

踏遍整个美国，格杀勿论，决不留情；把德国人(对美国)的轻蔑留下。……要威震千年；踏遍整个共和国，屠杀、屠杀、屠杀，为了我们的被触犯了宗教，在该国国土的心腹地带杀出一条路。

我的秘书莉莉朗读和翻译这段文字时，正当半夜时分。朱将军静听着，双眼眯成一条缝，听完后他问道：

“马克·吐温是谁？”

我们又用了一个钟头来介绍马克·吐温。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百科全书，莉莉把书上所有有关这位美国伟大作家的内容都翻译出来。在这之前，朱将军从未知道在义和团起义时和起义以后，还有任何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同情。知道确实有人同情后，他似乎大感宽慰，他认为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有好心肠的信念，也因此而更为强烈了。

第二篇 走向革命之路

第五章

朱将军在下一次和我谈话时，详细追述了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民的苦难。广西省发生了大饥荒，政府军队屠杀造反的饥民，夷平村落，遗尸如山，任凭野狗去啃。

许多省内，一年一次的土地税实际上收了六、七回。牢狱里住满了无力缴税、无钱按照官员的要求进行贿赂的农民。朱家比其他人家运气较好些，但也因官方勒索过多而周转不灵了。辛苦了七年之后，以前借入的一万钱已经还清，但新税和新捐把全部所得勒索得一干二净。地租增加了，借款的利息也上升了。这几年，朱家为了缴朱德的学费，又借了两笔小款子，八国联军之后，日子更加困难，想缴朱德的学费，想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都办不到了。

席老先生不愿意朱德离开私塾，就决定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来，只要求朱家分期交大米一百斤，作为朱

德的伙食。从此以后，朱德只在过节放假时回家一行，和家里人一起下地干活。

寄住在老先生的家里，使他会见了许多来往借宿的读书人，他们围坐在烛光旁，畅谈革命的征兆，直到深夜。朱将军说，过往行人中，有许多和成都官府有关，所以消息灵通。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学年过去了，他作为入室弟子，在先生家里一边努力求学，一边听过往行人谈话，见闻大开，增长了很多知识。如果不住在老先生家里，就不会有这种机会了。先是听到英日同盟的消息，一九〇四年，又听说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日俄两国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部分而打起来。一九〇五年日本得胜的消息，隔了好几个星期才传到四川乡间。

据朱将军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有了飞速发展。政府各部门、工业企业、普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都有了日本顾问。“离我家乡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日本人来教书。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兴起得快，北京慌了手脚，送出好几千名学生到日本。此外还有大批自费留学生东渡——主要是学军事、行政和国际法。

“许多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是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和中国不相上下。有些人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去，可是一九〇五年时美国的名声在中国并不好，因为美国当时刚刚最后通过排华法案，也因为消息说中国人在美国受到虐待，甚至被谋杀。全国展开了抵制美货运动，就是大湾的老百姓在买东西时都要先仔细看看货色，怕买到美国商品。

“我们听说俄国在一九〇五年出了点事，”朱将军说，“我们在四川听到的关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也就仅此而

已。俄国离着远得很。日本，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一个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点燃了被压迫国家——从埃及到中国——的希望，要求独立的民族斗争开始爆发了。”

朱将军说，对于日本打败俄国的意义，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中国的土地而打的，中国的看法就与印度、波斯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并不是个个都象孙中山先生那样，认为日本的胜利乃是亚洲人民对他们的白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第一枪。孙先生希望利用日本，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打算利用中国的民族运动来混水摸鱼。

一九〇五年孙先生正在日本，他是因为清政府悬重赏通缉他而流亡到那里去的，他于一九〇七年^①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以便把目的在于武力推翻清朝的秘密革命团体结成同盟，仿照西方形式建立中华民国。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批入会，后来回到中国在各地建立支会。

日本一跃而成为能够战胜白人国家的强国，并且强占了中国的土地，这就越发暴露出清廷的腐败无能。到了这时，清廷反而认为必须与敌对的中国人民进行生死搏斗了。朱将军说，正是为了这一原因，仍在西太后手中的清廷才决定进行改革，答应仿照日本方式，着手工业化、近代化的工作。当然，朱将军说，她把改革事宜都交到那些被老百姓称为“洋奴”的大官手里；而外国贷款人又象恶狼扑向羊群一样，急忙赶到北京。

英国和美国又抢在他们的同盟国家的前面，开始与北京商谈大笔贷款事宜，附带条件是要求铁路权益。由于中国的实业

^① 应为一九〇五年。——校注

家正计划自己出资修建铁路，以便把这项事业的发展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外国银行家便坚持中国政府应该把铁路修建工作集中于中央，然后又把所有新的方案向他们提出。中国人民对这个由英美银行家策划的“铁路阴谋”的反对，不久便成了全国民族运动的核心，并终于酿成了辛亥革命。

清廷一方面压迫人民，一方面又屈从外国，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更大的愤恨。反税运动在华南不断发展，余波一直延及四川；山东人民起来反抗政府抓差做苦役；黄兴将军领导的同盟会在湖南兴起；湖南的实业家着手计划修铁路、开矿山。湖南萍乡的矿工在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朱德将军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在民族解放的战场出现了。”这次武装起义惨遭镇压，牺牲很大，领导人又做了亡命者。

一九〇五年，教育改革案公布后，朱德立即回到家里，要求进入在附近的顺庆开设的新学校。家里人说没钱，不行；他解释道，这学校是官立的，一切免费，只需要些零用钱，还不及送到席老先生家里的大米的多少分之一。家里人还是不同意，说多年来省吃俭用就为的是教育出个子弟来做官，绝不能让他去上赶时兴的学校，说不定哪天它就关了门，过去有好多新学校就是如此的。他们不信改革能维持多久。

在家里讲不通，朱德只好又到席老先生家请他出面代为说项。老先生是个笃信“新学”的人，而且他的话对于塾生的父兄具有无上的权威，于是邀请朱家的家长到他家，长谈很久。最后，朱德的尊长才同意他进入新学校，但是必须继续准备明年考科举，因为新学不仅教授近代科目，也为青年准备参加科举。

一九〇五年秋季开学前几天，十九岁的朱德先在老先生面前，后又在养父养母面前行过跪拜大礼，才徒步到新学校去上学。这是他生活中的大事之一，相当于他当年住在丁家土地上第一天入塾那样隆重。他将要在那里学习全部新知识——自然科学、外国语、世界史、地理，同时还要继续读旧书。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他成为新的、改良的中国的一分子了。

到了新学校之后，立刻办理入学手续，按照习惯写下了学名，朱健德，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当时，中国人时常换名，这已是他的第二个学名了。接着，他的导师对他作了使他大出意外的宣布，说明既不会让他有时间准备科举，也不会让他有时间选择一门以上的近代科目。导师建议他学习日文，是由刚分配到学校的日本教师教授的。物理和化学虽也讲授，但既无教科书，又无实验室，教师只凭记忆，或者依靠当初自修时的笔记，新学在四川还处于襁褓时期。

“情况让人灰心得很，我禁不住留下了眼泪，”朱将军说，“可是，导师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我还是照办了。后来，还是不断地准备科举。虽然也学日文，但会得很少。学语言的天分本来就不高，再加上对教师从心里就厌恶，因为他是日本人，而日本最近侵占了我们的国土。我不管他教的是什么，就连猫啊、狗啊的单字都不相信。

“我想学的科目虽然学不到，但我还是从学校的八百名学生和其他教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晚上，我常和其他同学聚到教师们家里。大部分教师是改良派，其中一名就是张澜，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已经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①。现在，张澜老先

^① 张澜没有参加过同盟会。——校注

生乃是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这些教师在讲课时和在平常的谈话里，都隐约地夹杂着间接的反清政治宣传。他们并不明显地提到清朝两个字，只是反对‘旧制度’。我们深知此中意味，也不明说出来。我们不敢公开地抨击朝廷。”

学年结束之后，朱德回到席老先生住所，一夏天就和席老先生的儿子一起死钻古书，准备考科举。一九〇六年八月底^①，他和席老先生的儿子，随同进县赶考的年龄较大的学生们一道离开大湾，前往仪陇县。仪陇县离家不过二十五英里，然而，朱家从来也没有人到过县城。这地方本是个小县城，但在他们的眼里，却是个到处充满危险的大都市。因此他的养父特意拜托席老先生，要这两个年轻人随着年长些的人一同到县城，以便照料他们，进城以后不要让人骗，也不要让人抢了。

“家里人倒不是怕我乱花钱，”朱将军笑着说。“这都是借来的钱，要缴付我的科举费用和在仪陇县一个月的生活费，除了上一学期曾有过一些零用钱外，我那时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不知道怎样花钱，买东西的时候，一分一毫都盘算得要死。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

到仪陇县一看，朱德发现有不同年龄的考生一千多人到孔庙报名，并且缴上考试费。只有他一个人是农民。大多数人来自地主家——穿戴得整整齐齐，绸衫礼帽，坐滑竿带跟班而来。朱德按着传统的习惯，又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朱存铭。如果做了官，大概就算作一生的官名了。这也是根据当时的风尚，由帮助他准备考科举的老师——席老先生特意起的名字。

^① 参加科举考试应为一九〇五年，因为一九〇五年以后全国都已废除了科举考试。——校注

他和他的年轻朋友租了一间小房间，在市场上买来煤炭、食物，准备在考试期间自理伙食。两个青年谁也没进过饭馆，看到菜牌子上的价钱，便手足无措。两个人每天都上菜市，一分一毫地讲价钱，最后才非常不得已地买下不得不买的东西。

教育改革案虽说公布了，考试制度却无变更。考官还是过去的老人，他们只知道旧制度，按照老一套从经典上出考题。朱将军回想起来，直到现在还摇头不止，他认为只有一个题目还有点价值，因为它需要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作文题目之一是孙子兵法中的一个专题。

考试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每考五天之后，休息两天。在这两天里，考生们一面研究下一阶段考试的题目，一面等待发榜。几百人落第了。朱德和他的朋友则顺利通过初试、二试，直到最后一试。

休息的日子里，朱德四出交往，听人家议论纷纷，有的打算到日本留学，有的准备进入成都高等师范。有这么件怪事，他记得遇到一位已经在日本留学一年的考生。这个人有一副自称购自东京的电疗器械，他说一通电就“嗡嗡”作响，专治风湿。象他这样一个成天嚷着要以爱国的决心去摧毁旧秩序和建设新秩序的人，为什么还回国来应考呢？这对于朱德是个难解之谜。这家伙计划在成都挂起一块医学博士的招牌，专用他那副魔术式的器械治病。

“我给你治治风湿吧！不管哪儿有什么疼痛，我都能治！”他对朱德张罗起来。

“我根本没有风湿。哪儿也不疼。我打出生那一天就没有病过。”

“那没关系，”看对方是个乡下汉，那考生还在催促。“经我这器械一治，你想干什么都会精力充沛。”然后又提到价钱，他说收费极低，比对任何人都低。

朱德从令人厌恶的“新医学博士”那里逃出来，仔细数清身上的钱，看有没有短少。幸好没有。那家伙碰上了对手。

在到处听到的谈话里，最吸引朱德的是成都新设立了一座官立高等师范学校，而且据说特别设有体育科，在那里念一年体育，便可以出来做体育教师。而且，除了体育之外，这一科还教数学、地理、军事教练等课目。体育这一科在中国是一种新科目。朱德在此以前也从未听说过，不过，一年就可毕业，而且可以担任独立生活的教师，似乎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他对于在清廷做官的打算甚为厌恶。即或考中秀才后，再考中举人，他家也没有为他买官的钱。出不起钱，就做不了官。买官的钱实在可观。假如不花钱买官而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就算又中了，到那时的买官的贿款就更令人咋舌。当然，他这次如果考中，家里就会给他找一位有钱姑娘结婚，得到一笔陪嫁钱；这位姑娘不用说，多半是不通文墨、缠足小脚的。家里对这问题早就和他谈起过，可是自由的新风正在吹遍中国，年轻人都说，中国未获自由前，何以家为？而且，他们只愿意与受过教育的姑娘结婚。头一年，他已经从新学生那里听到不少高谈阔论，认为很对。尽管被家里责为自私和不孝，他还是拒不谈论婚姻之事。

在仪陇县的一个月一晃过去了，他下决心到成都进高等师范学校。他这一生中从未对家里扯过谎，现在则写了一封扯谎的信。他对他们说，这次一定能够考中，考中后就到成都去准

备省试，公费开支。他所要的只是一些零用钱。他要求他们再为他借一小笔钱，一年为期，过了一年就可以再考更高一级的科举。

在等待回信和等待最后发榜期间，他抽空到离城不过二十英里的南部盐井去参观，据说那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见过机器，这次是个机会。

朱德和许多考生结伴而行，走到南部，并没有看见什么新机器，却看见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在旧式奴隶劳动制度的合同规定下，从早到晚，不停地做苦工。身上除了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由于患疟疾或黄疸病，全身泛着黄色。脚上腿上脓疮处处，大多数人干咳不止——是肺结核病的咳嗽。他们把自己卖给工头，有一定的年限。包工给的饭食，只够维持生命；住的小屋不见天日、满是臭虫。那时还未听到过工人有医药服务——朱将军又加上一句：“到现在也没有”——至于工会，即使做梦梦到，也会被认为是犯罪的颠覆性组织而遭到镇压。

使朱德感到切肤之痛的遭遇是他遇到一个农村青年，幼年在丁家的地里曾一起玩过。这个青年现在是订有年限合同的盐工，肺病把他折磨得越来越不成样子了。朱德认出了他，想招呼几句，那青年似乎已耻于寒酸，一言不发掉头就走了。朱德眼前也似乎映出了自己一家人的影子。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兄弟、侄子等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令人担惊害怕。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全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前思后虑，心里非常不安，而且悔不该给养父写那封扯谎的信。在返回仪陇县的路上，他不断地盘算，最后下了决心，到成都读一年书，就改做教师，

开始贴补家用。

回到仪陇，在榜上的录取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之后，就是“秀才”了（相当于西方国家“学士”的学位）。

第二天，大湾来了一个商人，他捎来朱德的家信，里面附有借来供朱德到成都上学一年的费用。朱德写了回信，把中了秀才的红“喜报”封回。这份“喜报”，他知道，会在大湾张贴出来，他一家便有了“面子”，镇上的人会向他们道喜，并且送些礼金贴补他在考试中的开支。他现在大为放心了。

第二天拂晓，朱德踏上了前往成都的道路，一套好衣服和一双好布鞋都装在包袱里，掬在肩头。普通人去成都要走十一天，他打算只用一半的时间赶到。作为一个多年走远路来往上学、曾经在地里下过多少力的农民，他当然能够赶长路。

“我那时年轻，就一个人走去了，”朱将军说。

第六章

在步行去成都的路上，朱德一边赶路，一边不由得暗自赞叹，天下哪有象四川这样美丽的地方，哪有这样的巍巍峰峦和滔滔江水，这样的丰硕水果和喷香花朵。他穿过河谷，绕过秋色苍郁的大山，每当拂晓便起身上路，农民歌谣始终不离唇边。到了夜晚，两脚倦懒，浑身尘埃，便随意找个农家借住，老乡们对于过往行人招呼得亲亲热热，谁要说付款酬谢，那就是失礼。至于吃食，自有卖饭挑子。

第五天的黄昏，还不及一般人到成都所花费的一半时间，他已在红土平原上看到了成都的那座高大的、中世纪的城墙。远处，则有巍峨的高山耸立在晚霞里。

小河流水潺潺，他到河里洗了个干净，然后把平时不舍得穿的布鞋穿在脚上，一个钟头以后，就伸手摸到了成都北门城墙，一如完成了什么神圣的誓愿。然后，他踏进熙来攘往的街道，街道两旁是成千的华

丽商店和古老建筑，据说其繁华不亚于北京。怀着有志竟成的狂喜情绪，他忘记了疲劳，终于来到中国西部的文化、教育、政治和商业中心。

幼时使他充满幻想的“大路”，在这里同从东方和北方，以及从南自云南和远自西藏而来的通商大道会合了。在他有生以来的想象之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宽阔清洁的马路，金碧辉煌的招牌，以及无数的饭馆、酒店、药铺和摆满了珍贵的四川丝绸、外国商品的大商店。

第二天早晨，离开仪陇县的第六天，他到差不多拥有一千名学生的高等师范学校报到注册，办了进体育科的手续。引起他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有些教师把假辫子缝在卜帽上。他们在留学日本时期都把长辫子剪掉了，回国以后，买了假辫子。

“我对于那些人十分崇拜”，朱将军说。“那些人是革命的。我对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羡慕。”

其次，最令人吃惊的乃是天足的女学生。这些女学生在私立学校上学，有的坐滑竿来往，有的则三三两两地在街头漫步。他很想和她们攀谈几句，一时又无勇气，因为男女交朋友，在那时还不时兴。唯一的正当关系只有结婚，而结婚只能由双方家庭来办理。结婚需要钱，他却没钱，而且他也无意结婚——至少要等到能够娶上一个受过教育、天足、类似在成都见到过的姑娘。

“我是个很动感情的人，把姑娘们理想化，对她们敬而远之，”朱将军腼腆地说，好象踏入了禁区。是不是他不愿意对一个外国妇女谈及这件事呢？就我观察所得，他是个谈笑风生的人，机智的幽默常使一桌人捧腹大笑不止。当年他在成都是

一个对女孩子敬而远之的羞怯的青年，转眼间三十多年的光阴已经过去。

朱将军很快就把这话题岔开，谈起了在成都的生活。一九〇六年时，成都一共有两所大型官立学校，一所是高等师范学校，另一所就是新办的军官学校，培养新军军官，还附设有官佐训练所。他原来打算转学到军官学校，但考虑到家里人向来轻视当兵的，恐怕要与他完全断绝关系。那时，“新军精神”口号甚盛，四川总督满人锡良组织了新军，由赵尔丰——锡良的后任总督——任指挥官。穿着笔挺军服的军官学校学生，在街上高谈阔论，和身穿制服的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聚在一起，大家都以天下为己任。

朱德虽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但不久对国事就比对正规课程还有兴趣。可他仍然好学不倦，尤其喜欢听戴假辫子的教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这些教师虽然批评新的改革太少、太小，却还不敢明斥朝廷。

立宪君主派的教师比共和派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所以有许多学生追随左右，甚至可以略微自由地提到他们的《四川日报》，这家报纸当时还是半公开的。

共和派“同盟会”的会员，不得不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活动。高等师范学校内有种种传闻，据说有三名教师是同盟会会员，其中一名就是张澜。张澜曾在朱德仅仅上了一年学的顺庆新学校执过教鞭，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虽然年届高龄，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人之一，并任主席。

要想加入地下的同盟会，必须有会员两名作保证人，并且

在入会仪式上歃血为盟，宣誓效忠。朱德正在多方探听谁是会员以便请求担保时，最方便的事来了。不知是谁，在他宿舍的枕头下面，塞进了一小张《民报》。这张小报显然已几经易手，一部分铅字的字迹已模糊不清。小报攻击立宪君主派，而且指出，新的改革是“企图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朱德把这份小报一读再读，最后塞在另外一个同学的床上。

成都也有几所教会学校，但朱德和他的同学视那些学校的学生为“洋奴”。教会学校的学生把自己局限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天地里，对于国事漠不关心，只想着他们的灵魂和来世，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只是为了做外国银行、大商行和教会机构的工作——着眼点都是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教会学校的学生是些超国家的男女，他们受到的是逆来顺受的教育，也从不打算把他们宣传的教义付诸实践。

朱德进入高师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是参观实验室。实验室令人自豪地拥有一架显微镜和一具人骨，据说那是从国外运来的外国人骨，所以看来兴趣很大。学校里挂有许多大的地图，还有一个彩色地球仪，这些都是引人注意的东西。体育科的一间教室里，挂有几张外国陆战和海战的彩色图。朱德对于这些挂图兴趣最浓，一再详细研究，直到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对这几张图仍记忆犹新。但是，学校里没有新式教科书，教师们有的靠记忆，有的靠在海外留学时的笔记在课堂讲课。

成都一派新生活的景象。新的官员鼓励当地开设工厂，发展家庭工业和手工业。一家新式缫丝厂，一家棉纺厂，一家造币厂和一家兵工厂都用新式机器开工了。朱德和四个本县朋友，从这一家串到那一家，希望看到新式机器。每到一家，他们都

遭拒绝，只能站在墙外听听机器的转动声。

朱将军说，城市繁荣起来，乡间的农民却过着和以前一样的苦日子，承担着为贴补这些新的改革机构所需的新税。地主绅粮本来就一动不动，反对进步，现在则更加凶恶，还得了官职，自立新税，加在老百姓身上。朱德走到街头，时常听到一声大喊：

“大人来喽！清路！”接着就是一乘精致的轿子，抬着一个新官大老爷，作威作福地过去了。

成都西北角还有专为满族人——统治民族——居住的特别区域。普通人谁也不敢进去，除非他想挨一顿打。老百姓胼手胝足地工作，满族人却有津贴和皇粮，一生享受。也有一些满族官员愿意做些事情，可是大部分却情愿游手好闲，甚至不愿意把自己这一区整理干净。满族人只知道成天在市区里坐茶馆，老百姓都痛恨那种贪饕的神气。

愉快的一年弹指过去，朱德毕业了。在求学期间，一共交下五个朋友。其中一个叫秦昆，是成都读书人家的子弟，另外四个则和朱德同乡，都是仪陇县开明人家的子弟。这四名仪陇县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计划在家乡创办第一所近代化学校，他们邀请朱德参加，教授体育并兼总务主任，年薪一万二千元。^①朱德热心地答应下来，约定开学之日到仪陇县参加工作。

离家两年，朱德并没有意识到他是怎样成了新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又是如何停留在旧时代中。在他跋山涉水回大湾的途中，他确信家里人能够谅解他为了在成都上学而说的谎

^① 朱德当时的年薪是一百二十吊铜钱。按一吊为一千，应为十二万铜钱。——校注

话。他只要向他们解释一下，他们便会同意自己的新职业——特别是因为他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薪金，这不但可以偿还为他上学而借的债款，而且可以还清全家的债务。

他在动身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的时候，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待，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

说起这次回家，朱将军声调低沉，充满了伤感与忧愁。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给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

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的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者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他不得不尽量拖延吐露真情的时刻，他不敢说明以前曾对他们扯过谎，而今后是要去教授一门不体面的课程——体育。

离家两年期间，他家是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眼就很明白。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是补丁，到处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

“我知道他们觉得该给我说一门亲，”朱将军说，“我也知道我可以找来一份足以还清债务的嫁奁。可是他们总觉得我太高贵太有学问了，心中胆怯，连暗示一下这件事都不敢。他们把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当做金科玉律。只是在我热心地提到新的改革的时候，我的养父才说道，改革只对‘贵人’有好处，跟农民毫无关系。农民为改革付出了高额地租，付出了数不清的税，还要应付政府所能想出来的各种花样。市面上的布现在差不多都是外国货，比土布还要便宜，可是农民只有在衣服实在不能蔽体时才买上几尺。税吏每隔两三个月就来一次，把今年的税又收一道——新学校，新军制服，保安队，永远没建成的新路，整修水渠，以及为当地官员发饷，都是收税名目。地主为把所有的税转嫁到农民头上，提高了地租。要缴税，农民只有去借高利贷。面对着这种痛苦的不安和贫困，我热心提到的改良运动更显得无力和渺茫了。”

在养父家住了几天后，朱德到老家去看他的亲生父母和祖父母，然后又探访亲戚。每到一处，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在老家的时候，朱德终于坦白承认他扯了谎，并且告诉他

们以后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他接着解释道，他可以挣钱，可以开始偿还家里的债务。

“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朱将军说。“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我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以后，他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而结果却是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他大叫大闹道，苦力也会这个！他接着跑出家门，一直到我走，他也没回来。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啜泣。

“第二天早晨，我声明要去仪陇县帮助朋友创办学校。他们极力不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显露出来，可是我体会得到，我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回到养父家，我父亲已经在那里，他说我给全家丢了脸。养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听我为自己辩解：为什么扯谎，为什么这样做。我解释说，科举制度现在已经改了，以后每个考生都得有近代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国际法、历史和其他科目——而这些我都没念过。我在私塾念的功课已经大部分无用。我说，无论如何，我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我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同其他做官的人一样，压榨老百姓，才能够本；可是在新的中国里应该诚实。我提到中国的巨大变化，提到新式教育，说体育乃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的养父是个很慈祥的人，就是不懂的事，他也愿意听个仔细。这件事本身使我大为苦恼，一夜失眠，独自躺在房里，打算重新估价整个生命的意义。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

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

“最后一晚难过之至，第二天早晨，我离家去仪陇县。一向疼爱我的养父，送了我好几里路才回去。他最后站住脚步转过身去，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的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那年他大概是六十岁了吧，很见衰老，穿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他往回走时，我哭了。”

他，一个新的中国的人，一步又一步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他来到了仪陇县，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他和四个同事——李、刘、田、张，本来就料到会遭受旧私塾、旧学究的反对，但却没有想到，刚开学不久，就被卷进公开的斗争里去了。

象成都这样的大城市，据朱将军解释，“封建势力已逐渐衰落，但在农村里，地主绅粮和他们的一伙还在作威作福，统

制一切思想和行为，支配衙门、警察甚至地方军队。旧学究出身于这种门第，他们普遍排斥新学问，认为新学问野蛮，有损国粹。”其实，朱将军说，新学问仅仅威胁他们的生财之道。

除了传统的封建势力外，也还有一些进步的家庭——知识分子和商人，深知中国若不改革，必将自毁。朱德的几个同事就是这种家庭出身的。这种力量毕竟还弱小，因此，新学校开学时，只不过有十二个孩子入学。即便是十二个，保守派也大为震惊，因而警告说，要小心“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为新学问而展开的斗争，就以这样的前哨战开始了。不久，流言蜚语传了出来，说新教师都是些“假洋鬼子”，他们剪掉长指甲，头戴假辫子，专教野蛮思想；并说他们把什么孝道、正义以及什么妇人贞操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要不然，为什么新教师不象其他品行端正的年轻人那样，到现在还不结婚呢？

议论归议论，却有一些学生从旧私塾转到新学校来。于是，保守派更加大肆攻击了。他们说，新教师里有一个姓朱的，出身贫贱，教一门什么“体育”课，所谓体育，就是叫孩子们脱光衣服，在教师面前做柔身体操，让他们出丑！体力锻炼是老百姓和苦力们的事，绅粮家的子弟只应该动动脑筋！

朱将军说，“这条战线，不久就越出旧私塾，一直扩展到家庭、街头、商店、茶馆和寺庙。我们被称为人类的渣滓——由于违情背道的原因而不结婚的男人。象丫鬟一类的姑娘在路上见到我们，马上掉头逃跑，男人们则站住脚步怒目而视，小孩子也向我们扔石块。

“我们的学生家长以很大的勇气和精力来卫护我们，父老们轮流来看我上体育课。他们向外间解释，学生并没有脱光，

都穿着短褂、裤衩，而且学生也应该身体强壮起来，免得生病，叫敌人残杀。他们还说，这些教师所毕业的学校，就是总督开办的。

“然而，这仍然无济于事。一九〇七年年底，学校被暂时封闭了，教师被带到知县面前，我还被斥为教授猥亵的课程。教师和家长都为我辩护。

“那一回，我第一次发表了公开演说。当时讲的是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大致是解释我的教育方法，按照在成都学校所学的，说明体育和运动的意义。我还说明，这种体育课是保持学生健康和增强学生体质的办法，所有新学校都采用。外国敌人接二连三打败我们中国，我解释说，我们就应该和他们一样锻炼身体，免得重蹈印度的覆辙。

“我们获得胜诉，学校复课了，但是封建势力立刻又告了一状，说我们贪污学校基金。进步力量这回又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又告胜利。另外的状子又递上去了，这一次告的乃是我们剪掉辫子，装的是假辫子。这等于是对朝廷的叛逆罪，我们又用事实证明这是诬告。

“到那时，我们的名声更响了，支持者也更多了，学校已经收了七十多名学生。旧势力在法律上接连失败，一般舆论也反对他们，他们又采用了各种卑陋手段。他们雇用流氓在学校门前打翻粪桶和尿桶，还是制不服我们，于是又收罗打手在街头袭击。

“为了让学生学会自卫，我教学生学武术，拳棒都用得上。我们手拿棍棒同街上的暴徒大打一场，并且抓住几个流氓，送到官府去。这些家伙为了顾全自己，也只好把出钱的人供了

出来。”

据朱将军说，全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同样的斗争。除去在大港口城市以外，学生为了获得接受新教育的权利必须进行斗争，而且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自卫上。

仪陇的新学校也是新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它渗透了这座县城，也渗透到邻近的村镇里。不久，老百姓就指出，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腐败、最专制的王朝，清廷宣布实行维新，并不是因为它要求一个近代化的中国，而是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作这样的宣布，以保全自己。西太后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死了，但在她死的前一天，从一八九八年起就被她禁锢起来的光绪皇帝也被毒死了。临死时，年青的皇帝要求他的弟弟摄政王替他报仇。他指责西太后的走狗、戊戌变法运动的叛徒袁世凯将军是杀他的凶手。

因此，摄政王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解除袁世凯本兼各职，并把他驱逐出北京——这一手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袁世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宠儿，在辛亥以后，把袁世凯扶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而把当选总统的孙中山挤走的正是这些人。

朱将军提到，仪陇县这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是重要的经历之一，因为这使他了解到封建势力是怎样地蠢蠢而动，同时，他也获得了积极斗争的信心。他的知识和眼界开阔了，国家危难越来越多，他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在仪陇县的一年里，他和成都时期的学友秦昆书信往还。秦昆有意进入成都军官学校，却因家庭阻拦，无法如愿。另外，朱德听说，私塾时期的好友吴绍伯在高等师范毕业以后，如今已到了云南省，进入那里新设的讲武堂。他也是因为家里不准他厕身行伍而采取

这办法的。

秦昆不断地劝朱德到成都去，再一同从成都出走到云南进讲武堂，这样高飞远走，家里也就无须承认孩子当兵而觉得脸上无光了。一九〇八年的新学年虽然已经开始，朱德的朋友们却鼓励他前往。朱德到仪陇县后，已着手清还家里为他借的旧账，手里只留些生活费，哪里有去云南的旅费？不过，同校的教师们还是给他凑足了款子，解决了问题。

离开仪陇县之前，朱德和四位当教师的朋友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共同发誓，在中国从清廷和外国压制下解放出来之前，绝对不求官，不做官，而且立志不娶！他们庄严宣称：中国青年从李、刘、田、张、朱这五个人身上，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献身。

家里既然不能再仰仗于他的钱，朱德决定在赴成都以前回家一行，说明实情。为了免于面子难堪，他知道他们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儿子参加了军队。他还要向家里保证，只要在云南讲武堂毕业，挣到钱，就再帮助家里还债。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初，他动身回家。“我在家只住了一晚，可是一晚上就够受了，”朱将军说。“我向家里说明我要参加新军，全家人都以为我疯了。”当教师教那种野蛮的体育还没有什么，可是去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兵，他们可受不住了。他们开始显得很和蔼，小心地劝他留在家里，休养休养脑筋；他们认为念书念得太多，影响了他的脑筋。等他说明他完全清醒，并且决定献身于从满族和外国统治下解放中国的事业时，“反应是可怕的，太可怕了！”对于他的养父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起程去成都那天，竟没有一个人来

送别。他离开了他的家，成为一个流浪者，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在跟他作对。

“那的确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朱将军说，“不过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道路，义无反顾了。”

第七章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中旬仆仆风尘走进成都的那个青年，已经不是两年前踏入成都的那个腼腆、羞涩的农村娃儿了。那年他二十二岁，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和自信，当然还谈不上精通世故。但他也受过创伤。他的态度和举动，不论在那时和其后几年，都表现出了农村子弟的纯朴。

正因为这一点，他在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而他那一代人多半是有这种性格的。甚至于在五十岁以后，他的第一项本能仍然是相信人性本善，尤其是青年们。一九四四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一位具有老于世故的纽约市经历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访问。他写道，朱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在政治生活里，玩世不恭乃是最主要的事情。要是不这样的话，这青年记者暗示道，象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是

不可能成功的。……

到了成都，朱德找到他的朋友秦昆。秦昆已暗地租下一条木船，打算顺岷江而下到长江，再徒步翻山越岭，直奔云南。此外还有一个旅客愿意分担船资——他是去昆明某一个法国人家寻求厨师的职业的。

第二天凌晨，两名青年便潜离秦昆的家，来到江边，厨师和船夫已在船上等候开船了。这木船是条浅水小舟，两头朝天，中间有个席篷，可以休息、睡觉，免得再花旅馆钱。急湍的河水奔腾南流，注入长江，需要有七个船夫才能把船撑住。

怒涛汹涌的岷江流经雄伟的峨眉山下时，船夫要使尽全力，才能顺流而过。两岸峭壁屹立，松柏苍翠，竹林茂密，攀藤附葛；远处则是山峦多变、异峰突起的峨眉主脉，历史曾为它编出了千百个民间故事。

赶路人很想多看一些祖国风光，遇到较大城镇，他们便要停船几小时；最后，到了长江边上的叙府^①，他们弃船上岸。第二天，把铺盖和衣服一卷，掬在肩头，渡过长江，便开始爬山。山间小路其细如丝，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象要张口噬人的漆黑深渊。

这条路上设有驿站，以便赶路人在天黑前可以找到地方投宿。远眺近望，都是一些人迹不到、白雪覆盖的大山，耸立着起伏不平的山峰，仿佛是大海中的怒涛突然变成了石峰。有的山峰海拔一万一千英尺，有的更高。山水淙淙，有的在山麓溪谷中流过，有的则从地下喷涌而出，突又不见，只留下一阵咆哮

① 今宜宾。——校注

声。

朱德早就听说过“吃尽云南苦”这句话，到现在才体会到它的全部意义。山路旁边也有村庄，说不上有房屋，只是些低矮简陋的茅棚，那里面，烟容满面的人，患着大脖子症，和许多羊、狗以及不计其数的寄生虫住在一起。茅棚附近，也有几块巴掌大的被开垦的土地，种的大都是罂粟。禁种鸦片的敕令早在三年前就颁布了，但云南省大部分收益仍然来源于它，全省有四分之三的人抽大烟。

一九〇九年二月底，在离开成都十一个星期之后，三个赶路来到一个山岗上，远远望去，在一片细长条的平原上，在海拔六千英尺、翠玉般的滇池北面，已可看到当时被称为云南府的古老的昆明城。正西方，则是终年积雪的高山直插云霄。

那天晚上到了昆明。厨师别了两名青年，径自到法国人的厨房里去寻求生路。朱德和他的朋友拣了一家自称臭虫比其他店子都少的小店住下。秦昆写了一封信给在讲武堂里的一位成都朋友，讲武堂设在距城五英里的巫家坝。据朱将军说，那时，外省人若不经当地老住户或云南大户人家的介绍，是无法进入云南讲武堂的。

在等回信期间，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到市内外去游览，并参观了混有汉族农民、傣族人和傣族人的集市。他们自以为是新时代的解放了的青年，殊不知自己依然是该时代的产物——当时文化的产物，因此相信许多迷信、偏见和历史神话。象其他汉族人一样，他们认为傣族人是野蛮人，而且毫无保留地相信云南是由吴三桂将军在十七世纪开发出来的那类神话。一直过了好几年，朱德才认识到吴三桂乃是卖国贼，他曾在一六

四四年带领满族军队镇压了北方的农民革命。满族军队进关以后，就立刻拒绝吴三桂的金钱和请求，不再退回到原来发兵的地点——东北，反而占领了整个中国，并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管辖云南和邻近的贵州。吴三桂以昆明为据点，抓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族成员，并在昆明城内一座小山下将他处死，这地方现在还叫“逼死坡”。而在一九〇九年，朱德和秦昆在吴三桂暴政的遗迹里四处参观着。

没几天，秦昆的朋友就来了，带他们到巫家坝，着手和川籍军官打交道，这些军官已经在云南很多年，由他们保荐就可以进入讲武堂。

朱将军说，当时云南军队的情况至为复杂。除了原有的封建地方部队外，在几个城市里，又组织了新军。省内在许多年前就有一个川军的步兵标^①，新编第十九镇——新军的骨干——就是以它为核心组成的，驻防在巫家坝。这一标，曾经重新训练和装备，官兵中有很多人被派到由云南人所组成的新标里，做教练工作。

新编第十九镇拥有克虏伯造步枪、机枪、野炮。满族总督把它当作保护朝廷、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北京派来一大批属于帝制派的北方高级官员，占据要津，充当调查可疑的颠覆分子的高级密探。许多同时兼任讲武堂教官的青年军官乃是日本留学生，其中有不少人被怀疑为共和派的秘密团体——同盟会——的会员。

帝制派军官总的说来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军官，可是总督也

^① 标相当于团，标统就是团长；协相当于旅，协统就是旅长；镇相当师，镇统就是师长。——译注

对其中两三名推心置腹。为总督信任的人里面，一个是讲武堂总监；一个是蔡松坡——通常以蔡锷闻名，他是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讲武堂教官；一个是不久为总督见疑的三十几岁的军官，名叫罗佩金，是四川步兵标的标统。^①

朱德和他的朋友立即结识了一名四川籍青年军官，他桑梓情殷，面允作他们入学时的保证人。但是他说，你们两人都是四川人，不一定能录取。两人参加了入学考试，都能合格，可是，秦昆被录取，朱德却落第了。

朱德一个人被淘汰下来，觉得颇为难堪，便同他的朋友研究内中原委。秦昆带着几分不安地解释说，他深怕不能录取，在最后一瞬间报了假籍贯，用云南某地地主家庭的身份报的名。

“这给了我一次教训，”朱将军说，“我决定以后也不能那么照实办事了。那时，我的钱已花得几乎一干二净，我必须想个过日子的办法，好再找进讲武堂的路子。那时，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愿当大兵的，我就提出，志愿到川军步兵标去当兵。那位四川籍青年军官也支持我的行动，并说愿意帮我进讲武堂。

“我的旧名字就是那时候换掉的，改用朱德报了名，这是一个从未用过的新名字。还在籍贯下面填上云南某地^②，这样一来，后来就有很多人传说我是云南人。我当兵当了一个短时期，完成了基本训练，做过凡是当大兵的都要做的苦工。这时

① 据讲武堂同人录，蔡锷未兼过讲武堂教官；罗佩金曾兼任讲武堂教官。——校注

② 朱德同志当时报考云南讲武堂的籍贯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

——校注

候，我和另外三个大兵交上朋友，我猜他们大概是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旧式军队里哥老会的人很多，并且经常在寻找新人入会。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邀我入会的机会，别的事情就发生了。

“基本训练结束后不久，我就升任队部的司书生^①，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我被保荐到讲武堂去受训。标统罗佩金批准保荐后，我又考了一次——不过，这次是以云南人朱德为名了。这次录取了，一同入学的共有五百名学生，一切由公家发给，连零用钱都在内。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

云南讲武堂是仿照日本的士官学校办的，学课和术课都很严格。夏天没有暑假，只有在星期日休息，这一天教官和学员可自由活动。每天上课六个钟头，下操两个钟头。除了艰难的军事学外，还教地理、数学、历史和国际问题等等。除此以外，学员还有自己的团体，夜晚聚在一处，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我在学员里面结交了几个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朱将军带着微笑的说道，“有几个是肯作自我牺牲的爱国者，也有几个是贪官污吏，或反复无常的军阀。我还和我的老朋友，大湾的吴绍伯重新聚首，他已经是讲武堂的历史教官了。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拚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教官之一就是协统蔡锷，一位受云南总督^②信赖的青年将

① 队相当于连，司书生就是文书。——译注

② 应为云贵总督。——校注

领。蔡锷那时年仅二十七岁，比朱德只大四岁，可是已经做出朱德还只能梦想的大事。

蔡锷是湖南人，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早年曾在湖南向梁启超——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执弟子礼。梁启超在长沙开办过新式书院，蔡锷在那里读书时就显得才华出众。后来，蔡锷东渡日本学军事科学，学成后回国，在云南建设新军。

朱将军描绘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象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对待所有学员都要求甚严。时间可以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个连最狡黠善变的官僚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

蔡锷的协司令部就设在讲武堂内，他每晚办公到深夜，朱德有时去看他，谈些有关自己进修的问题。蔡锷的夫人也受过相当教育，但从未在学员面前出现过。蔡锷的办公室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有些书，朱德可以借出去看。他在这里找到一本中文书，其中有一段讲到乔治·华盛顿的一生，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他读到孟德斯鸠的《法意》，这是最初译成中文的外文书籍之一，对于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还看到梁启超、康有为所写的有关近代意大利、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政治的书，还有一本谈到明治天皇。

蔡锷还有报纸，有的是他的家乡湖南的，有的则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其中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京。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蔡锷虽然准许朱德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览这些报纸，却从不表露自己的

意见。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他同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月复一月，他在白天象个驱策苦工的人，使自己和学员忙碌不堪；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朱德很尊敬这个人，崇拜他的敏锐思想和工作能力。他自己的成就不过是来自勤奋的研究和踏实的工作，而蔡锷的头脑似乎充满了天才的智慧。这个农民和他的多才的教师之间虽大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却培养出了一种毫不显露的共鸣和友谊，并且逐渐成熟起来。

朱德进入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有同在一个团体的学员来对他参加同盟会，朱德答应下来，不久就歃血为盟，宣誓入会了。

这个共和派秘密组织在讲武堂内分做两支。教官目成一组，学员则有一个相应的组织，分成七八个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一个人能和中央联系，各小组之间则无联络，以免被任何一个小组出卖。会员只能知道本小组的人。

十年以后，外国和中国的反动派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制度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输入的外国产物。我提到此事，朱将军认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故意捏造，便是愚蠢。他又说，也许这是根据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毫无智慧的论断而来。小组制度，他说，与中国秘密会社的年代一样久远，同盟会就是从古老的哥老会学来的。

同盟会在云南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只从沿海各地偷运文件到内地。学员把重要文章抄录下来传阅。

“我们的秘密小组会议总是谈军事起义。各种理论性的政

治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我们都是战神的信徒。由于国事的发展，我们才被迫拓宽了思路。

“那是我们老百姓苦难最深的年代。洪水、旱灾、饥荒之外，最大的祸害乃是来自朝廷。殊死的斗争开始爆发。许多地方的饥饿农民在哥老会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攻击地主、税吏、政府机关并抢劫粮食。这些起义被政府毫不留情地镇压下去，起义领导人的头颅悬挂在村镇的高竿上。同盟会也领导了几次零散的革命起义。

“这两股斗争潮流从来没有合在一起过。农民进行着自己的殊死战斗，同盟会也是如此。同盟会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商人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这一阶级的偏见使他们不愿意与农民联合起来。其结果是他们都被打垮了。最糟糕的是各省的新军在朝廷的指挥下打垮了他们。

“在此以前，新军士兵接受了近代化的军事训练、武器和制服，但是没有人作任何努力来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始终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还同以往一样，时时遭到残暴的和侮辱性的殴打和责骂。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也认为普通士兵个个是歹徒，必须当作畜生来看待。”

朱德第一个在讲武堂提出应该以人道待遇对待普通士兵的问题。在一批学员的支持下，他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取消对下级士兵的体罚。一些青年军官表示赞成，但由于军规是由北京派来阻止这种“颠覆活动”的高级军官制订的，因而无法取消。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才在隶属他的军队里取消了对士兵的体罚；不过，朱将军说，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又把这种封建办法恢复起来。

“蒋介石的军官还在随意责骂、殴打甚至杀害士兵，”朱将军在和我谈到中国近代这一最大的罪恶时说道。

在辛亥革命以前，朱将军扼要地说，很少革命领袖——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自然更不必说了——想到一般老百姓的民权，当然更提不到士兵的民权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也自诩为未来的仁慈的统治者，只要是对于人民有好处的，就尽量给予。对于他们，士兵不过是掌握在进步而又年轻的军官手中的牺牲品。“没有任何革命理论来指导我们，我们只能从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由于新军被用在对抗革命运动上，这就迫使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下开始在新军中展开秘密政治活动。朱德接到命令，被同盟会派至川军步兵标中工作。这是件危险的工作，因为新任云南总督^①李经羲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侦察网，以搜寻革命分子。

朱德首先找到他在川军步兵标当兵时结识的那三位朋友，他早就怀疑他们是哥老会会员了。他所采用的方式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经常采用的方式，这就是找个四顾无人的地方与他们促膝畅谈彼此的事情和经济问题，并且替他们写家信。从这里由浅入深，就顺便谈论起国家大事。

没有多久，他们就邀他参加哥老会了。他接受了，在山上的一座荒凉小庙里，当着许多士兵会员的面，正式入会。他经过了一场古老的仪式，磕了许多次头，并且歃血为盟。宣誓手续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朱德和会员刺开手腕上的静脉，滴几

① 应为云贵总督。——校注

滴血到一碗酒中。这碗酒传递一匝，仪式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各喝一口。喝完，朱德宣誓信守会规：友爱、平等和互助。他随后学会了暗号、暗话，有了这些暗记，会员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彼此认识，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自此以后，在川军步兵标进行政治工作的危险性就大为减少了。士兵们常向他请教，他也得到他们的保护。他还能够和其中的小部分人直言无隐，由他们向其他士兵下功夫。

“这些士兵都是不识字的汉子，一辈子过着最困苦、最原始的生活，”朱将军说，“不过，有许多人很聪明，渴于寻求知识和新思想，令人十分感动。我非常敬重他们，自从我带兵以后，就从来不允许我的队伍里有任何军官虐待士兵。大部分士兵毕竟是从穷苦的农民家庭中长大的。”

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所以你可以这样说，‘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今天的处境不也和他们一样吗！’”

“应该更正确地说，‘要不是有我伯父收养我，我今天的处境不也和他们一样吗！’”他修正道。

因为“国家危机四伏，全国处处忧患”，他发现与士兵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没有什么困难。这时，士兵们已经谈论起一次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在边境上的河口。川军步兵标被派往河口，增援边防部队，镇压起义，可是在到达该地时，当地部队已经有好几百名参加了起义军。川军步兵标原来听说是要去剿匪，后来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土匪，而是些知识分子，甚至有些商人在内，他们在臂上挂着“敢死”臂章，手里拿着枪，逐屋战斗，并且向这边士兵高叫“打倒满清，中国人万岁！”等等口号。

步兵标把起义镇压下去了，但是好几百名边防部队士兵和革命分子退进印度支那。谁都能了解这件可怕的事，这等于说明，第二次义和团起义又在酝酿中了。

士兵们还为起义者的不畏死的作战精神大感惊愕。那时，中国士兵很少拚死——除非是打一支类似农民起义的装备很差的敌人。若是遇到实力强大的敌人，他们总是后撤。河口起义者虽然装备差，但打得很勇猛，川军步兵标也只能——而且是第一次——去硬拚。哎——呀！难道中国真变了？

士兵们围着朱德，听他解释领导河口起义的同盟会的政纲。他还说清廷的奴性十足、无能和无知，它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抽人民的税缴给外国人，把农民的生活弄得牛马不如。

政府到底怎样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呢？好，拿铁路贷款为例吧，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银行家强要北京借这笔钱，他们要求取得在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作为代价。修铁路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按照外国银行团的条件就不是好事了。全国闻讯哗然，都反对铁路贷款，因为它只会进一步摧毁国家的独立。铁路贷款还和一笔货币贷款有关，债权人竟然要求派一名外国人到北京高居要职，监督开支。有些国家已经被这些办法搞掉了独立，现在中国也在刀俎之上了。

外国银行团计划修建的铁路是南起广州，北到长江边上的汉口，附有一条西奔四川成都的支线。湖南的中国实业家已经集资打算用中国人的钱来修铁路，而四川的实业家也在发行省债，为四川铁路筹款。四川铁路的一段已经动工，可是外国银行团要求把工程转让给他们来修。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外国人坚持北京应该把所有修建铁路的事宜集中在朝廷手里——然

后转交给外国人。

朱德又进一步解释正在酝酿的铁路贷款，谈起法国人正从印度支那修筑到昆明的铁路。这条铁路的租借权，法国早在十年前把云南划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就从清政府手里勒索到手了。最后一颗道钉钉好后，云南讲武堂的全体人员在昆明观看第一列火车到站。朱德和学员们站在一起，第一列火车开进来的时候，讲武堂的一位教官突然哭泣起来。接着，人人都哭了。

反对酝酿中的铁路贷款和货币贷款导致了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失败。得悉这两项可憎的贷款即将签字以后，孙中山先生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号召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此作为最后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信号。

“广州起义是阻止可憎的铁路贷款签字的最后努力，”朱将军解释道，“它本应该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底或四月初举行。从三月份起，几百名受过训练的同盟会会员从全世界各地云集广州，孙中山把所有从国外募集来的现款用来为这次最后斗争准备枪械弹药。还未等准备就绪，计划就被发现了，在广州的革命者于匆忙中被迫作战。驻守广州的新军被调出来攻打他们，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的人被彻底打散了。七十二名同盟会会员战死，其他数百人受伤，余下的只有逃亡。

“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出震动全国革命力量的悲剧。从那时起，同盟会才深切地认识到应该在新军士兵中间认真地展开政治工作。只是在本次悲剧之后，这种政治工作才在全国开始进行。

“我们虽然遭到这样一次大的失败，全国对于铁路贷款的

抨击却是更加猛烈，以致清廷和外国人在六个星期之后不得不用秘密方式签字。贷款的主要谈判人是美国人威拉德·斯特雷特，代表着四家美国大银行。中国方面的首席谈判人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个臭名远扬的官员。不仅是贷款协定秘密签字了，政府而且宣布，一切铁路都隶属中央——换句话说，中国人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就不得筑路。政府完全臣服于外国银行团了。”

朱德同川军步兵标的士兵们就这些令人痛恨的贷款长谈过许多次。他说，朝廷自己签了死亡证。一九一一年七月，四川省闹事。^①商人、实业家、学生和知识分子聚集在成都的总督衙门门前抗议贷款，总督下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农民们在哥老会领导下也开到成都抗议，当局传话说，要进城就得放下武器。他们放下武器进城——结果全部被屠杀。自此以后，人们提起总督赵尔丰就干脆称为“屠夫”。

在这几次屠杀以后，朱德继续说道，四川的经济生活陷于瘫痪。老百姓拒绝纳税，商人罢市，学生和教师把全省组织和发动起来。“屠夫”不敢使用新军，召回驻藏部队，见人便砍。由这些部队开路，当官的挨着一家家商店威胁着问，为什么不开门。商人们连忙打开店门，“屠夫”于是贴出布告，一切如常了。可是街上空得象个坟场。没有人出来买东西。

驻藏部队被派到抗命的乡村，但农民打下埋伏，把他们全部歼灭。同以往的每次斗争一样，农民专门打击他们的传统敌人——税吏、高利贷者和封建地主官僚。

^① 这次事件发生在九月。——校注

传教士们又开始惊叫：“义和团！义和团！”他们和全体在华的外国人一道向政府提议，不要养虎贻患，应即刻镇压，同时要求国际武装干涉。外国报纸提到孙中山和其他共和派人士，都呼之为“半吊子理论家、幻想家、失意的求官者和落魄的政客”。一些外国人不断地把这样那样的蔑视称号加诸于孙先生，直到他在一九二五年逝世那一天为止。

朱将军还记得，外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满族人端方将军身上。北京命令端方放下铁路事宜，从武汉带兵入川讨伐。部队到了川东边界上，端方就贴出布告，宣称他的部队是为镇压土匪而来的。他说，四川人民本应深谢皇恩，现竟敢滋事；学校停课、商店罢市、拒不纳税等等“都是反叛行为”。

“骚乱必须立刻停止，”端方命令道。“商店要照常开门，税款要照常缴付，各地要保持平静。只有这样，才能修建铁路，使皇上龙心大悦，使四川人民全体得到好处。”

四川的一个传教士满腔愤懑地写道，煽动者并没有听从端方的话，反而变本加厉，甚至送出“水电报”。所谓“水电报”乃是一块木头，爱国者在上面写下新闻、通讯，并且号召起义，然后扔到河里，任凭它随波逐流，冲到音讯难通的地方，供人们阅读。

端方带着部队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达重庆，就在当天，他接到消息说，他留在武昌的新军已经起义，把湖广总督赶到了长江的一艘炮艇上，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军政府。这个满族将军闻讯后踌躇良久，不愿再冒险把部队开往成都，可是北京的高官还大发雷霆，力促他急速进军。

通过朱德当时还不知道的某种方法，云南讲武堂的每一个

人都知道在云南总督府里电报有如雪片飞来。他们听说，外国驻北京的使节已经要求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了政府。北京在一个星期之后遵令办理，袁世凯的“灰狼军”不久就南下，攻打起义据点武汉。他们占领了汉口，把该城的大部分夷为平地。

“洋奴”、奸雄袁世凯——朱德提到他的名字时就满腔怒火——回到了政治舞台上。

第八章

朱将军又一次到我这里继续述说他的生平时，谈起了一段挫折和危险的经历。一九一一年七月，他从讲武堂毕业，获少尉衔。帝制派对青年军官心怀戒惧，不让新毕业生带兵，只把他们零散地安插在新军里“见习”，或是给高级军官做些琐碎事情。朱德也为某队队官^①做了一时期副官，队官当他是私人听差，遇到要什么东西就派他去买，还命令他泐水送茶。过了几个星期，朱德才被调到蔡锷的协里做军需工作——他特别喜欢这工作，因为可以借此与士兵直接打交道。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云南，总督立即下令停止新军秋季演习，收回所有弹药，并把川军步兵标统罗佩金放逐到边境。另一方面，他把营防军

^① 队官相当于连长，棚相当于排。辛亥革命后队改称连，棚改称排。

——译注

全部调到省会，发下新式步枪和弹药。总督衙门附近连忙修建工事，由两个机关枪队固守，其中一名队官名叫李凤楼，乃是共和派秘密分子，他立即向同盟会警告：总督要把所有被疑为革命派的人统统杀掉。

“总督以为，他已经把我们装在口袋里了，”朱将军说。

“我们的讲武堂总监——其实是共和派秘密分子——和蔡锷，这两位一向被总督当作立宪帝制派的人，要他不要仓促行事，警告他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他们劝他照常把弹药发给新军，历年必有的秋季演习最好也照常，免得使人得到政府害怕和软弱的印象。”

武昌起义之后，朱德立即接奉同盟会的一项任命：在云南巡防营一个镇统的卫兵中展开政治鼓动，镇统的司令部就在附近一个村子里。这工作很危险，可是朱德又设法与卫兵中的哥老会士兵取得了联系，大家都是血盟兄弟，谁也不会出卖他。

“我只要把新闻告诉他们就行了，”朱将军说。“一省接着一省卷入了革命，而且两个新名词——‘光复’和‘翻身’——已经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从政治上讲，这四个字，就等于说明要推翻朝廷，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镇统的卫兵带着恍惚的神色静听我的新闻报道和解说。后来，他们枪毙了他们的长官，投入革命。”

总督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给新军发下了弹药。部队里传遍了悄声低语：“节省弹药！”从北京来的帝制派高级军官懒得和部队上山，溜到云南府吃馆子、吸鸦片、搞阴谋去了。

十月三十日，秋季演习終了，部队撤到兵营，有两处兵营在巫家坝，另外一处，川军步兵标的，则在省会以北一英里的

地方，被赶走的该标统罗佩金已经潜回，暗藏在那里。部队节省下来的弹药，足够支持到打下昆明。

起义定于十月三十日午夜开始，那知当晚八点钟，同盟会领导人接到消息说，已经有人向总督告密。大家猜这是协统乐韶成干的事，但苦无证据。总督张壘失措，亲自给巫家坝新军司令部打电话。蔡锷接过电话，答称一切平静，各指挥官和参谋长都吃饭去了——其实他们早已被捕。总督下令蔡锷，要把新军里的革命派嫌疑分子一网打尽，铐起来见他。

蔡锷答道：“一个钟头之内，全部抓住带到。”

计划既然已经被人告密，便又向新军各部队下达新的命令，于九点钟开始向省会进击。

“我们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朱将军说，“可是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全部戒备起来。突然，我们听到一个村子传出枪声。我的队官是个帝制派，他带着两棚人，黑灯下火地拉队逃跑。我指挥另一个棚随后紧追。我们包围了他们，追回了大部分士兵，只有队官带着一些人逃跑了。”

九点钟将到，全体士兵都把象征着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剪掉，扯起了中间写着“汉”字的大红旗，向指定的集合点集中。九点整，协统蔡锷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一同到场，坐上了最高指挥官的席位，这倒使朱德吃了一惊。

蔡锷用他特有的冷静、高亢的声音，发表了短演说，说明他已被同盟会推举为都督，新军应即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且同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组织了共和军政府的十三省站在一起。

在检查了队伍的准备工作之后，蔡锷询问是否有什么事要报告。朱德走向前去，举手敬礼，然后报告他的队官带领两个

棚逃跑，他带着一个棚追赶，已将大部分士兵追回。蔡锷命令朱德指挥该队。

“我们立刻向省会进击，”朱将军说。“在沿途村落驻防的巡防营，陆续参加我们，也有些跑掉了。我们才走了几里地，就遇到总督派来的骑兵协，并且传令给蔡锷，叫他负责‘肃清匪帮’，蔡锷问他们到哪里去，那协统说奉命向蔡锷报到，蔡锷回称：

“‘我就是蔡协统。’

“‘你到哪里去？’骑兵协统惊问道。

“‘进攻昆明府，灭满兴汉！’蔡锷答道，‘你也是汉人——把队伍拉过来吧’。

“当时就是一阵大乱。骑兵开始向前冲，毫无目的地放枪，我们这边的骑兵也想把他们圈住。有的人跑，有的人叫，我们的哥老会士兵也呼唤骑协里的血盟兄弟赶快过来。其余的人策马奔向漆黑的荒野中，对天放射空枪。正在混乱之际，省城北边传来了大炮声，一听便知道川军步兵标已在进攻了。在下达最后命令时，我们的指挥官忘记川军离北门只有一里地，而我们还有五英里。因此攻得不大协调。我们还派有一批讲武堂学员暗携枪械潜入城内，在南门附近等候，只要我们一到，便立刻打响，开城迎接我们。”

革命军立即向昆明府急行军，迫近城下，看到城墙上黑影不断，军队甚多。守军并没有放枪，反而探身墙外喊道：

“什么人？”

就在这一瞬间，南门内响起了枪声，那是潜入的学员开枪了。城墙上的巡防营还是一枪不响，只是惊愕地等待。突然，

厚厚的城门打开了，革命军一拥而入，各部队奉命分别占领城内的战略据点。城墙上的巡防营依然一枪未发，就心甘情愿地被缴了械。转眼间，所有的公共建筑和其它战略据点都被占领了。只有兵工厂一处展开激战，革命军的炮手轰塌了大门，把弹药分给他们的同志。

夜色昏暗，已经分不出是敌是友，蔡锷命令各部队坚守据点到天明。

黎明，朱德带领队伍来到总督衙门——旧秩序的最后据点——周围的工事前面。负责守卫的机关枪队队官之一李凤楼下令不得作战。朱德一队人和另外一队人直翻衙门四周的高墙而入，此刻自己的炮队竟向衙门开火，他们全都受到威胁。直到通知炮队停火以后，他们才打开大门。

自此以后，便很少战斗了。革命党人的主要工作是把躲藏在衙门各个角落里的巡防营士兵拉出来。在总督官邸里，他们发现总督躲在床底下，“全身穿着苦力衣服。”革命党士兵抓住这家伙的辫子，一把拉出来，挥刀就把辫子砍下，推他到蔡锷的指挥部，总督一眼看到指挥官之一原来就是他最信任的人，当场就厥倒了。

大部分旧帝制派的文武官员被抓起来枪决了，但总督后来还是获释，放他回北京。这次经验和恐惧对于他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教训，六年后，他拒绝了北洋军阀政府所提出的高官厚禄。

云南其他地方的新军部队也在十月三十日晚上起义，不到几天，全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党只不过战死四十余人，伤百余人。

“清朝已经腐败得不堪一击了，”朱将军评述道。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蔡锷和其他领导人在一次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蔡锷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朱德和他的部队在城内各街道巡逻，“警惕反动派，保护革命党人。”他们开步走的时候，齐唱着古民谣，并在现场即兴高唱新歌。他们在古老的菊花歌———一般人在九月九避邪时唱的歌———里填上新词句。其后好几年中，朱德的部队一直唱着这首胜利的歌曲。

云南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欢庆胜利。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他们的领导人已经计划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四川，因为那里的革命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清廷势力。讲武堂的其他省份来的学员，早就被派回自己的原籍参加革命。四川籍学员接受了向成都和重庆同盟会领导人报到并将远征军计划通知他们的命令，也动身了。只待云南军打到川南的叙府，成都和重庆的人民就应当起义，象其他革命省份一样，建立革命军政府。

蔡锷在起义之后，立刻带领八个营^①———其中有两个营是川军———沿着当年川滇两省的商路，进兵四川。朱德那时已经擢升为上尉，也带着他的连，随军远征。远征军兵力虽小，可是自信确有震撼四川的把握。

三个星期以后，远征军在叙府城下和两营敌军首次接火。敌人胡乱地喊叫一通，又用从枪口装火药的老式枪支放了一排枪。……朱将军提到这一往事，就觉得痛恨不已，因为它就是旧中国封建落后和无能的缩影，只能“在空葫芦里装几把炒豆弄弄声音吓唬人。”

^① 云南辛亥起义后，蔡锷派了军队去四川支援四川的起义军，他本人并未离开昆明。——校注

云南革命军不失时机地继续前进，一个排用新式步枪予以还击。两营敌军顿时崩溃，四散奔逃，许多人“上了山，和原来经常有联系的土匪合流。”

叙府用写着标语的横幅和游行来欢迎革命军，由当地商人，同盟会知识分子（城里有一些）和云南军代表组成了共和军政府。

云南远征军按照计划行事已毕，却接不到预期的有关成都和重庆起义的报告。因此，大军直指成都，进入自流井盐井地区及其外围，用以切断清朝端方军队前进的所有交通线。

在盐井地区，革命军才听说端方及其胞弟已被他自己的部队斩首的事，据说还把端方的首级放在美国制造的汽油桶内运交重庆当局。后来又听说，被称为“屠夫”的总督赵尔丰接到了云南军进攻、端方被斩的报告后，便将大权交给由工商业家和地主绅粮组成的一个成都委员会^①，该会随即向双方要求，“立即放下武器，因为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朱将军在回想起这个走上官僚老路的趋炎附势的“富豪委员会”时，满脸带着不满的神气。云南军还在继续进兵成都，直到预定由同盟会和哥老会在成都和重庆领导起义、并且建立共和军政府的消息传来后，部队才停止前进，固守川南。

朱德和他的一连人接着在盐都自流井巡逻了三个月，不时和来袭的土匪打几场小仗。过去因为土匪出没和其他纷乱而停工的盐井，现在复业了；但生产条件如旧。农民和工人都拥护辛亥革命，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困苦境遇。朱将军说，结

^① 指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校注

果他们大失所望。什么改善也没有，因为“没过一个短时期，共和派就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辛亥革命的目标流产了。”

那一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在他心里深深烙下了印记，对他后来的思想很有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解释：

选举临时总统会议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先生被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会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人民以公民权的宪章。这时，孙先生还在国外，奔走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之间，枉费心机地想阻止一笔新的外国贷款，“善后贷款”，而国际银行团正打算把它贷给当时完全控制着北京政府的袁世凯。孙先生希望这笔款能贷给民国，条件是不侵犯中国的主权。可是外国政府和银行团通知他说，它们只和“被承认的政府”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指的就是北京。于是，直到这时还相信西方民主政府会欢迎一个将要从各方面追上它们的中华民国的孙先生，立即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赶回中国。几天以后，他宣誓就任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一篇最初在海外、后来又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共和政府。他反对在新的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将导致“比清政府糟糕百倍的专制主义”，为了把我们从这种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就要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他提出警告说，在美、英、法诸国，“贫富悬殊太甚”，中国除非“来一次社会革命，否则，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有幸福。”

孙中山在南京的同志们并不同意他的建国方案。他们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说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正是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在南京的同志们要求就新的善后贷款和共和国问题进行灾难性的妥协。西方列强和国际银行团当时正在商讨承认共和国的可能性，他们的唯一条件是，孙中山先生必须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被他们称之为“自由派大政治家，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来接替。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接二连三打电报给华盛顿，催促立即把善后贷款交给袁世凯，否则帝制派就要垮台。电报说，如果交给袁世凯，“叛军有可能在合理条件之下投降”，要是做不到这点的话，外国武装干涉就有可能成为必要的了。

朱将军屡次提到，美国驻华公使是主张国际武装干涉辛亥革命的第一批人中间的一个。中国之能够避免这场悲剧，并不是因为列强承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是因为欧洲国家正为非洲殖民地问题发生冲突，战云密布。只有美国与日本有可能干涉中国，而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不想这么干。

但列强和它们的银行家到底采取了卑劣的手段，使新兴的共和国落入了圈套。在外国支持下，孙中山先生终于让权于袁世凯。为了迎接这一步棋，袁世凯勒令宣统下诏退位，诏书还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制的政府。共和派忍受了这一屈辱，虽然它清楚地表明，一切权力的来源乃是清廷，而不是中国人民。

孙先生辞职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当了共和国总统就会较容易受到约束，同时也因为他希望和平。他认为袁世凯不会在银行团提出的条件下接受善后贷款。

朱德和他的同志们，正在四川进行规模虽小但很必要的工作。最初，他们还不相信孙中山先生辞职、让位于袁世凯的传说，因为袁世凯是个有名的帝制派，而且是在一八九八年出卖过

戊戌变法运动的变节分子。他们彼此问道，这个人既不能够信守效忠清廷的誓言，对于民国岂非也将如此。但是传说终于变成了事实，而这事实在共和派内部很快地引起了混乱和动荡。

回首当年，朱将军认识到辛亥革命曾经一错再错，外国人和袁世凯对于共和派，好象猫戏弄老鼠，一会儿把他们压在地上，一会儿又向他们百般殷勤，表示要承认，要给钱。朱将军说，假若云南军不在四川贻误戎机，很可以直驱华中的武汉三镇，把该地袁军打垮。可是共和派还是和他们的死敌妥协了。

朱将军说，当时城市民众“已经进步到不仅仅是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建立新政权的必要性”，但他们还是掉进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阴谋的泥沼。他们允许封建分子保留他们在军队和衙门里的地位。其后几年中，云南是仅有的获得政治和军事进步的几个省份之一——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朱将军断然说道，“辛亥革命的流产，应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但如果不是中国内部出了卖国贼，帝国主义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在革命党人方面，我们是因为没有推行民主而失败了。而且，在我们阵营里面，高官厚禄的欲念很大，最初那种自我牺牲的革命热情一旦燃过，就很容易丢弃原有的品德。”

朱德确信，在外国有人同情中华民国，并且支持孙中山。但他只接触到当时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在日内瓦发表的论文中所阐明的立场。孙中山在这时还是总统。

列宁写道，孙中山和欧洲或美国的总统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早就“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而孙中山则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

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①他的纲领渗透着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问题。朱德能用准确的字句引用列宁对袁世凯（帝国主义者把他说成是“自由派”和“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铁腕人物”）的论断：

这样的自由派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②

谈到那个时代及其结局，朱将军说道：

三十年的革命经验告诉我，革命必须有一个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革命政党。它必须有一支革命军队，不仅是为了作战，还为了保证执行以群众为力量源泉的民主制度。光有革命的言辞是不够的。许多人现在高谈孙中山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背叛了它。孙中山的真正信徒是永远不会惧怕民主的。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四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四二五页。

第三篇 灾难深重

第九章

一支困惫不堪而又杂乱无章的部队在一九一二年三月离开四川南下，重返云南根据地。四个月前，这支部队曾经满怀希望远道而来，现在又沿着原路回去了。

滇军里面的两营川军被留在四川。云南是中国贫瘠的省份之一，如果要实现蔡锷和其他共和派领导人的云南省近代化的计划，便必须勒紧裤带。

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一路上闷闷不语，沿着当年的商路而归。去年十月过此时，怀着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雄心兴冲冲而来，现在却不得不撤退了。一向乐观的朱德，坚信即使是帝制派，也不敢出卖共和国；他也坚信，云南最终会象它的领导人所规划的那样，成为一个模范省。

回到云南已是五月，在全军大会仪式上，朱德晋升为少校。令他感激的是蔡锷还特别提出他，说他是

获得“援川”和“复兴”两种勋章的人们当中的一个——“复兴”意味着从满族统治下光复。这两个人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友谊的默契仍然在继续，蔡锷有时特意找朱德谈话，不仅问到他自己的事，而且还谈到他的家庭。朱德也和家庭恢复了音讯，将大部分薪俸寄回。

“你的面色不大好，”朱德对蔡锷说。“我们很担心你的健康。”蔡锷用一种漠然的微笑来回答，好象在想很遥远的事。

在对全军的演说里，蔡锷谈到云南各方面问题，谈到要求每一个人准备比推翻清朝时作更大的牺牲。部队已有两个月没发饷了，而且财政上还需要大加紧缩。负伤士兵和烈士家属可以拿到终身的补助金。老年士兵则要退伍，年轻的军人愿意退役的也可以退役。从此以后，任何军官，任何官员，只能拿到一笔生活费，来供养自己和全家的生活。

云南省府进行了改组和精简，行政学校的年轻毕业生不久便可以接替那些已经离职的旧贪官污吏的工作。新学校正在创办，新工业正在建设，近代化的公路和建筑物也将修建起来。一所新的师范学校正在培训男女教师。革命以后关闭了的讲武堂也要在秋天复课。

朱德利用一九一二年春夏两季时间，进行练兵工作。到了秋天，他转到讲武堂，学校将学员分成五个连，由他带领一个连。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以及国家大事，都有了相当变化。

“那年秋天，我结了婚，”朱德淡漠地说。“妻子的名字叫萧菊芳。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是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也

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我是朋友，是他筹办了这件婚事。我那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是个平常人，也希望有个妻子。”

朱将军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可是用不着他向我解释，我便了解到他并不喜爱。他提到两人的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谈。他自豪地说明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人在决定结婚之前，曾经在菊芳家见过面谈过话。这在当时是革命的了，因为高贵的姑娘即使在革命以后也不和她们的丈夫在婚前谈话。

而且，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则住在讲武堂。他们只在星期天会面，他每星期只有这一天有空。“我们都是有许多严肃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革命者”，朱将军说完，就换了个似乎比他和他的姻婚更为重要的话题。

讲武堂重新开学了，朱德和许多来自其他各省的学员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们大部分是青年人，一年前离开讲武堂回本省参加革命，有的甚至到了远方的上海和广州。这次特意回校来完成学业，已经比朱德和他的朋友更富于经验而不那么天真和单纯。也有一些是从其他省份避难来此的学员和教官，因为袁世凯实行了镇压共和派的恐怖统治。云南是由共和派掌握政权的少数省份之一，因此聚集了流亡者。

“他们来到云南当教师、公职人员、军官以及昆明出版的两张报纸的工人，这就使云南的生活丰富起来。”朱将军说，“我有空的时候，就听这些亡命而来的学员或教官摆龙门阵，听他们讲袁世凯怎样派人逮捕、禁锢和虐杀共和派人士。”

当时国家的最大问题是国际银行团和袁世凯正在谈判的

“善后贷款”，其条件对于中国危害极大，招致了全国一致的声讨。孙中山先生警告外国银行家说，如果“善后贷款”一定要强加上那些条件，中国人民就绝不承认。袁世凯对于反对者的答复是逮捕、禁锢和暗杀，以及将所有共和派人士撤职。他只委任听命于他的官员。

有两三个亡命到云南讲武堂任教官的人原是留学法国的学生。朱德希望能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能够成功，而中国革命就失败了呢？因此，他用了很多时间向他们几位了解法国的议会制度。

一九一二年秋天，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企图用接纳一切革命团体成立一个新的统一政党——国民党——的办法，来挽救共和制。云南旧同盟会内率先加入的人士中，也有朱德。国民党人在那时和从前一样仍然处于地下，因为袁世凯的暗探与刺客和清朝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在全国范围内暗布罗网。

朱将军提及此后的事件，认为应当算作一场噩梦，其中的主要角色象是一伙盲从的幽灵，老是重蹈历史的错误。

在一九一二年冬天举行的首届国会选举，在“善后贷款”问题上展开了斗争。不畏死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国内外发动了反贷款运动，指出中国接受贷款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民党在新国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国会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北京开幕。那年三月，出现了一线光明。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宣布他的政府不准许美国银行家参加贷款，这就增加了革命人士的勇气。威尔逊说，贷款威胁了中国的行政主权。美国银行集团因此退出国际银行团，后来只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

集体成员的身份参加。

与美国总统的声明几乎同时，宋教仁——国民党的创建人和反对贷款的国民运动的领导人——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了。这件事发生在他赴北京参加国会的途中。尽管发生了这一新的暴行，国际银行团剩下来的五个银行集团的代表，仍然在英国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与袁世凯会面。他们就在那儿根据外国人的旨意，秘密签订了“善后贷款”的合同。国会的副议长冲进室内，指摘这项贷款违背宪法，但是只见在座的人摆了摆手，他便被卫兵赶了出去。

孙中山先生发誓要阻止贷款合同付诸实施，又向在伦敦的国际银行团总裁提出呼吁，警告他如果银行家坚持独行其是，则难免流血。孙先生的话并未受到重视，好象他根本不存在似的——对于这一悲剧的主角来讲，他的确是不存在的。

到了一九一三年六月^①，华南六省起来反对袁世凯签订为人们深恶痛绝的“善后贷款”。由于袁世凯把贷款用在装备、供养和支持他的军队以及建立他的独裁政权上，反对他的人还未到战场一战便已失败了。孙中山和共和派其他领导人，在重赏通缉之下再度逃亡。孙先生躲藏在东京日本朋友的家里，袁世凯手下的人也曾到东京搜寻过。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遇有该党党员格杀勿论。到了十二月，他宣布儒教为国教，恢复祀天，这乃是历代帝王的典礼。

他的下一步棋是解散国会，由旧军阀及帝制派组成国务会议协助执政。接着，一个新的人物以弗兰克·古德诺博士的名

^① 应为七月。——校注

又出现了，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以袁世凯的“立宪”顾问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到了一九一四年年中，古德诺博士提出了一项以《宪法大纲》为名的奇特文件，袁世凯就把它宣布为国法——朱将军后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部法西斯宪法”。这个大纲规定袁世凯为全中国最高执政者，享有任免文武官员，决定国家体制和法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结条约、颁授爵位的大权。

几个星期之后，古德诺博士又制订了另一项文件，规定袁世凯有指定继承人之权。过了几个月，他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备忘录》，强调中国最适于实行帝制而不适于实行共和制，不过应该谨慎从事，以免公众阻力过大。袁世凯把这项备忘录当作他的帝制运动的宣传品。为了制造公众舆论，他指令各地官吏电京劝进，要求他恢复帝制，自封帝位。“为顺从舆情”，袁世凯宣布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他登基之日。

朱将军说，云南与全国性的大事是如此隔绝，直到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才有人警告袁世凯，说是有个名叫蔡锷的“危险的天才”还远在该省，以他的声望和谋略来讲，最好调到北京加以看管。袁世凯没有暗杀蔡锷，而是命令他入京，让他出任经界局督办和将军府将军。

云南的所有秘密共和派开了无数次会议之后，蔡锷电告北京，即刻动身。朱将军说，他如果拒绝，云南就要被袁世凯的军队夷平，蔡锷也只能在被暗杀和逃亡之间选择一条路。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任职，也许能保住他的性命。蔡锷的计划仍然是维持住云南革命政权，把全省置于国民党控制下，以便共和派重整旗鼓。

临离云南之前，蔡锷将第一师——朱德是该师的一名指挥官——沿滇越铁路全线及边境布防。为袁世凯的得势所鼓舞，所有帝国主义分子都得意洋洋，法国人则以武器来装备土匪和少数民族，让他们袭击印度支那，这样，法国军队就可借口驱逐他们，侵占云南。朱德在此后两年，一直跟持有优良的法国步枪的土匪和少数民族作战，不让他们的后台老板在中国扩充地盘。

在边境的两年内，他的日子相当艰苦。云南南部山峦重重，天气酷热，在疟疾猖獗的山谷中，瘴气甚重，最容易患上肺病；加以水土又坏，每个人都得了严重的肠胃病。他不时到蒙自去取信件和报纸，有时也收到留在家中的妻子寄来的书籍。报纸上全无令人兴奋的消息，都是些令人为之气短的报道。在中国看不到一线光明，而西方列强则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中。

为了调剂过于单调的生活，有时他到蒙自拜访一个在那里认识的法国商人，这个人很乐于答复他提出的关于法国的生活和典章制度的问题，而且将伏尔泰的著作介绍给他看。他也常和一些共和派青年军官摆龙门阵，这些人和他一起痛骂他们的师长和参谋长乐韶成。乐韶成有在云南背叛过辛亥革命的嫌疑。自从革命胜利后，这两名高级军官便都投效共和派。蔡锷启程赴北京以后，袁世凯发动了帝制运动，他们又重新弹起旧调。十五年后，朱将军在江西率领红军时，乐韶成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师长。两个人在战场上交手了。

朱将军继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完全陷入黑暗之中。日本作为协约国之一，占领了德国帝国主义在一

八九七年自中国强夺去的重要海军基地青岛，而且在一九一五年年初，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把中国当作日本的保护国。袁世凯拖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稍作修正的条款上签了字，这样他也就给自己签了死亡证书。

蔡锷后来向国会揭发，袁世凯是以要求日本承认他登基为条件，而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另外，袁世凯为了换取列强的承认，把大宗的权利和特权拱手出让了。

在边境的两年内，朱德两次升级。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他当了上校，率领滇军第十团，他原来的一营就隶属该团之内。他后来才知道，这第二次升级，乃是出自刚从北京秘密归来的蔡锷之手。

蔡锷自北京逃脱的经过，具有无比的戏剧性。他摆脱了两年来袁世凯密探白天和夜晚的不断跟踪，出走天津，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日本和亡命中的国民党领导人长谈以后，又取道印度支那，经滇越铁路，回到云南。

有两件事使朱德猜到笼罩中国的乌云就要消散了。一件是自己的升级。另一件则是新闻报道说原在北京做官的著名作家梁启超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在致袁世凯的辞呈中，梁启超自称外似强健，却患了静脉曲张、头晕目眩、咳嗽多痰、风寒入脾等等一长串病症。为此，他只好辞职去美国，在适合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治疗。

到了距离北京只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的天津租界，梁启超的病霍然而愈。他没有去美国，反而住下来，写了无数痛斥袁世凯及其小朝廷的文章，更使袁世凯痛恨的是梁启超本人原也是立宪帝制派。梁启超在袁世凯的刺客到来前几步，便仓皇出走，

他到了华南，在更为有利的环境下继续进行活动。

刚一读到梁启超辞职并且攻击袁世凯的新闻，朱德和他的共和派青年军官朋友们便聚在一起议论起来。他们推测，如果梁启超跑了，蔡锷一定也先走了，否则他就会被抓起来甚至被杀掉。因为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在北京一直是他的保护人。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朱德在蒙自街头邂逅了一位国民党的老朋友。那个人鞠躬为礼，好象遇到很面生的朋友似的，可是在鞠躬的同时，却匆忙传话，要他当天晚上务必带着最心腹的共和派军官到城外小庙与他见面。

那天夜晚，几个人一同到了那地方，朱德的老朋友见面后取出一块碎布。原来那是蔡锷亲笔写的信，上面写明要大家按照传令人的命令行事。

命令写道，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拂晓为期，蔡锷率领昆明地区的部队起义，宣誓效忠共和，号召全国起义打倒袁世凯。同时，在蒙自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共和派也要共同行动。蒙自的部队必须立即乘火车开往昆明府。滇军的八个团要从那里进军四川，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起义务必在一月一日，即袁世凯登基之日和各国政府对于袁世凯尚未承认以前开始。

朱德和其他共和派军官们，利用起义以前的空暇，训练新兵准备留下来卫戍边境。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前，朱德上校率领特选的精锐部队，向师部进攻，准备把帝制派的军官们一一活捉，可是他们早已闻风逃遁了。

黎明时，蒙自地区的所有部队集合了。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做了关于国内情势的报告，宣誓效忠共和。随即征用所有火车车皮，全体开往昆明。

与此同时，蔡锷和其他领导人出现在昆明军民大会上，他们为共和宣誓，同时通电全国，要求打倒把刀锋对着中国人民却向其外国帝国主义主子磕头的卖国贼袁世凯。

朱德和他的军官朋友们到达昆明后，立即下火车赶到蔡锷司令部，发现蔡锷正和参谋们开会。

“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朱将军说，“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象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有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他确信附近各省的袁世凯军队已经准备入川，并且提醒我们说，这次作战和辛亥那年大不相同。四川驻满了北洋军队，靠的是袁世凯从外国人手里拿来的贷款，所以装备良好，粮饷充足。我们决不可能象打清兵那样，把袁世凯军队一举粉碎。光是在川南，他就有四个旅，由他的亲信统率；他的另一个朋友，飞扬跋扈的小军阀曹锟，是坐镇成都的司令。这曹锟就是后来被称为‘贿选总统’的小恶棍，因为他于一九二三年在国会贿选，凡是选他的国会议员，他每人给五千现洋。

“我们的第二军，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

着调上前线。

“蔡锷亲自率领进攻四川的部队，并且担任第一军总司令。云南军由此改名为护国军。”

蔡锷报告完毕，朱德上校发言说：

“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

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道：“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参加了参谋会议，并为攻川部队——包括他的第十团——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朱德同他的年轻妻子相会，这时，已经是深夜时分。在抵达昆明的第三天清晨，护国军的八个团^①开始发兵川南。朱德的第十团曾经在滇越边境和土匪、少数民族打过两年游击战，因此奉命充任先头部队，以攻击只会打阵地战的袁军。

云南起义并发表宣言号召打倒袁世凯的消息，引起了在华的外国人的恐惧与混乱。外交官、传教士和外国报纸发动了一个攻击革命派的猛烈运动；一个美国记者在给《纽约论坛报》写的报道中哀叹道：

“哎呀！这些胆大妄为到了竟敢举起义旗反对皇帝的家伙是何等肆无忌惮！他们是一群暴徒和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结成的乌合之众！”

护国军继续前进。在川滇交界处，它遭遇了两营川军，这些川军并没有放枪，反倒高举起步枪，在一阵欢呼声中，直向

^① 护国军第一军的编制是四个梯团，八个支队。朱德同志领导第三梯团的第六支队。——校注

他们奔来。他们说，敌军司令部就在长江以南的川南小城纳溪，那里还有电报局，蔡锷可以和南方各省革命军进行联络。

接着，立刻在长江以南和敌人四个旅交上了手。这第一场战斗，以朱德上校的第十团为先锋，连打了三天三夜，毫无间歇。护国军的所有队伍都开上了前线，朱德的部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第二天，蔡锷又把两个团^①交给朱德指挥。直到第四天破晓时分，才彻底击溃了敌人的抵抗，突入敌军在纳溪的司令部。朱德上校和他的部队屹立在长江南岸，对岸就是敌人在川南的最重要据点——泸州。

“在这次推翻帝制的战争里，我们第一次在农民中展开群众工作，”朱德说。“在哥老会领导下，农民武装起来，攻击敌军运输，他们把粮食和弹药转运给我们。船夫撑船往来给我们运送给养，把我们的部队摆渡过河，并且从战场上往下抬运伤兵。”

共和派此时找到了新的盟友。前几年组织“进步党”的著名作家梁启超召集他的追随者支持革命。四川和其他省份的革命党，以及从海外回国的流亡者都设法投奔护国军。流亡者之一孙炳文，不久便成为朱德最亲密的助手，在其后七年中对他起了决定性作用。

初战三天的伤亡迫使护国军停止战斗，以便重新整编，调运弹药和部署军队。蔡锷将军提升朱德为少将，让他指挥一旅人，并派流亡归来的孙炳文出任他的参议，这职务在当时——至少对于朱德来说——相当于政治委员。

据朱将军描述，孙炳文是个老革命家，三十五六岁，中等

^① 应为两个营。——校注

身材，皮肤黑得“象个农民”。他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在北京时，曾参加过暗杀摄政王的密谋。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共和派报纸的工作，直到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革命为止。孙炳文出身于四川的书香门第，全家参加过戊戌变法运动和其后的每一次革命斗争，他的大姐还打破所有的封建旧观念，在辛亥革命中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积极投入战斗。

在三天大战后的整编期内，朱将军奉令固守长江以南所有地区，护国军其余部队则跨过大江，向江北敌人的主要据点进攻。袁世凯的一些部队已经动摇，其中就有后来以“基督将军”著称的冯玉祥将军的一旅人。冯玉祥派来一名代表会见蔡锷商谈停战，并且告诉蔡锷说他不同意帝制。在四川的袁世凯军队的总司令也派代表来见蔡锷试探情况，以便在最适当的时机倒向取胜的一方。

护国军从云南贵州得到增援部队，兵力增至二十六个团，用以对付袁世凯的八万名北洋精锐。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旬，川南全部化为战场，一连激战了四十五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到四月，朱德一旅已增加到六千人，和三倍于他们的敌人增援部队展开了白刃战。

“我们有哥老会农民的支持，”朱将军自豪地说，他们多如恒河沙数。在江北，许多城市进行拉锯战达十几次，我们的部队终于占领并坚守住了叙府和其他地方，还包围了敌军的大据点泸州。蔡锷的司令部就随着我这一旅，视军情移动。纳溪曾经三次易手。蔡锷的声音越来越弱，两眼却依然炯炯有光，军服穿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就象寿衣一样。我的部队损失

也很大，第十团不得不补充三次。滇军至今还赫赫有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得来的。”

也就在这一仗里，朱德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曾经见过他作战的人说，他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他的部队知道他同大家一样，也是农民，拿他们当人看待，绝不许任何军官打骂他们。士兵们热爱他，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作战，要想把他的伤兵长时期留在医院里养伤，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在四川这一仗中，朱将军说，袁世凯玩弄了许多阴谋诡计。二月，他展缓了登基日期，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革命蔓延。三月初，当全国的共和派正集结力量的时候，他在北京下毒手杀害了好几百人，其中有许多是他手下的官员，被控为图谋造反。三月十八日，他派刺客到上海，暗杀了国民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到三月底，眼看全国就要爆发起义，而且护国军已把他在四川的军队打得稀巴烂，这时，他又完全否认帝制，召开了他在一九一三年亲手解散的国会，以争取时间。

“这王八蛋怕得要死，”朱将军说道，回想起这些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强烈的仇恨。“我们不理他那些阴谋，继续打，到了四月初，华南六个省声明反对他，八个省拒绝接受命令。新的革命军政府又成立了，推举当时被袁世凯扣在北京的副总统黎元洪做总统。袁世凯的莫逆只剩下外国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帝制派。听到他的两名得力将领——而且是亲信，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南京——拒绝接受命令，并且要求他辞职，他抓起一把宝剑，冲进卧房，把他的一个姨太太和刚刚出生的孩子砍成好几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六月，我们把在四川的袁军打垮，全中国也一致起义。六月六日那天，我和孙炳文正在纳溪司令部工作，接到了袁世凯刚在北京病死的电讯。我立刻派人传布消息。一直被袁世凯扣留到他病死那一天的黎元洪当了总统，南京的冯国璋当副总统。掌握着强大的军事机器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仍然当国务总理。袁世凯虽然死了，政权还是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共和国徒有其名。”

英国人办的《华北先锋报》在讣告中表示，希望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为“伟大”的逝世致哀，并且说：

袁世凯的逝世将受到所有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深切悼念。……一位伟人逝世了。……他可能有错误，……但那是虚怀若谷的人性的过失。……如果政府的缰绳从软弱无力的孙中山的手中跌落时，不由他拾起，中国过去五年的历史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朱将军听到这种论调，面色发青。他说，袁世凯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当时就是英美帝国主义，而其继承人段祺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他看来，他说，一九一六年建立的北京新政权所处理的唯一有希望的事是委派蔡锷为四川督军——不过，蔡锷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了。袁世凯死后第二天，六月七日，蔡锷命令朱德夺取敌军据点泸州，并戒备附近地区，包括自流井的盐井地区。

“那时候，我这一旅穿得破破烂烂，活象一群叫化子，”

他说。“我的身经百战的第十团得到了首先开入泸州的荣誉。这一团一大半人已经阵亡，就是新补充上来的也都变成老兵。我们把军容稍稍整顿一下，就开进了泸州。泸州人又是放爆竹，又是挂旗，又是欢呼，又是高唱，盛情欢迎我们。我们从这边进城，北洋军队就从另一边逃走，又劫又抢。这帮家伙用征服者的姿态开进四川，逃出去时则和土匪一样。”

蔡锷被抬到朱德司令部附近的住所里。医生命令他卧床静养，禁止见客，等稍好一点就去成都。蔡锷虽然卧床，仍把秘书和参谋长叫到床边，研究重建四川的计划。朱德劝了几次，蔡锷用低弱的声音说，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而他做的事则可能会决定西南的、甚至是全国的命运。

在床上静养了不到两个星期，蔡锷坚持向成都出发。他坐的是轿子，带着五个团的部队。

“他们简直是打到成都的，”朱将军说。“地方军阀的部队到处皆是，他们把自己的地区当作私有财产。用外国的金钱豢养出来的军阀，这就是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遗产。”

袁世凯死后，美国驻北京公使保罗·林治博士拜会俄国公使，问他是否认为中国人把俄国人当作半亚洲人而视为手足？那位俄国公使不耐烦地说道：

“不——就象你和其他欧洲人那样，他们把我们也看成是灾难和祸害。”

第十章

朱将军谈到军阀割据的年代时，从没有打算把自己描绘成英雄。相反，他把自己和所处的环境描绘成一场噩梦，他的身影好象是穿过了混乱的瘴雾，最初满怀自信和希望，接着是茫然和踌躇，最终还是陷入他自己所一直反对的黠武主义的泥潭。

朱将军说，蔡锷到成都就任不过十天，就不得不把督军的职位让给他的参谋长和一向依为左右手的罗佩金，动身到日本去作最后的和枉费心机的治疗。他带着医生和护士顺水而下，到了泸州，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继续前进。朱德看他那情况，绝望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蔡锷看上去象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弓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

蔡锷低声说道，这次去日本，既费时间又费钱，因为已经自知没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

途担忧。冷酷无情的亲日派总理段祺瑞是当前北京的真正主人。蔡锷原来希望把四川重建为共和派的坚强基地，可是他只做到为军事改组奠定了基础，而它又是实现政治改革计划的依据。护国军如果能按照蔡锷的计划，和在南方的孙中山先生的武装力量联成一气，就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外国主子的阴谋。

朱德倾听着这位垂死的朋友和领导人的话，对未来忧心忡忡。这位“危险的智星”的指导力一旦离开四川，护国军内部的野心分子就会脱颖而出，干起军阀的勾当。蔡锷的天才和无私在过去把他们维系到一处。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

但也不是没有足以维持革命队伍团结的有利迹象。倒袁斗争已经转变成保卫一九一二年约法的强有力的全国性运动。护国军当时已改称护法军——或简称护军——，是这一运动在华西和西南的主要武装。

这个新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是国立北京大学，一群光芒四射、卓识远见的教授在一九一五年的混乱局势中涌现出来，他们提出了“新文化”与“新思潮”的口号。外国人把这一新的运动称为“文艺复兴”。

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以后，“新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很快就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它的口号是民主和近代科学，它主张向中国文化中一切封建的东西，包括儒教和旧式的“文言文”（即生硬的古文），进行挑战。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象中国新文艺运动这样，在极端混乱的政治情势中出现了如

此巨大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剧烈变化。

朱将军谈到此事时，他的言谈和举止交织着愁闷和骄傲。他骄傲的是中国知识界永不休止的努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但是想到蔡锷年仅三十四岁便将悲伤地死去，而不能够亲身参加就要声震全国的伟大革命，内心充满了悲痛。

“新思潮”的余波终于来到他身边。一位北京的朋友、并且是他的参议的孙炳文，写信向朱德介绍了一本新杂志——《新青年》，它的编辑人之一就是陈独秀教授，他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党的总书记。当朱德还习惯于用文言文时，这本杂志就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文体，朱德开始使用白话文是很久以后的事。他回顾“新思潮”提倡大众教育、民主和自然科学时的心情，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而终于失之交臂一样。他不可能不听说易卜生的《傀儡之家》和其他戏剧在遥远的华北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的盛况。可是他插了一句，正经姑娘还不能在中国的舞台上出现，《傀儡之家》中的娜拉只能由年轻的男学生来扮演，他们为近代中国的妇女登上舞台铺平了道路。

他还想起孙炳文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伏在蔡锷病榻旁的情景。孙炳文热诚地谈起“新思潮”，而他自己也鼓励蔡锷，说当年选举产生的国会已经在北京开会，废除儒教为国教，并宣布决心要总统、内阁以及各地官员向国会负责，以防再有新的独裁者出现。他要那垂危的人放心，情况并不太坏。中国的青年一定会阻止历史重演。蔡锷似乎并没有失去他的敏锐思想，依然低声嘱咐说，段祺瑞与袁世凯并无不同之处，而他的阴影已经在各地伸展了。

终于到了蔡锷启程的那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以及其他军官在码头送行。他们心情沉重地目送蔡锷的船消失在长江的浓雾里。朱德喏然若失，为此，孙炳文劝了很久。

几乎就在同时，朱德的年轻的妻子从云南来到泸州。由于怀孕，她坐轿子走过了这段漫长的路，随后就在他租的一所小住宅里做起女主人。九月底，蔡锷离去后不久，她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保柱。大家正为婴儿呱呱落地而高兴时，十一月十八日，蔡锷在日本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①朱德受此沉痛打击，几乎连妻儿都忘掉了。

蔡锷的遗体不久就运到上海，举行追悼仪式后，又运回他的故乡湖南，并在俯瞰长沙的大山上^②建起了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祸不单行的年代，另一个革命领导人黄兴将军，也和蔡锷一样身染肺病，经过长期的挣扎与痛苦，而终于无法支持。全国对失去这两个高尚的公民深表哀悼，两人死时都还年轻。

云南省和滇军所有部队都举行了特别追悼仪式，为辛亥以来领导他们的年轻司令官致哀。朱德深感凄凉。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不仅是他多年来依赖的政治领导人，而且是他的良师益友——这两种伦常关系在传统道德上仅次于双亲。他悲从中来主要是因为蔡锷虽非他所崇拜的、也是他所尊重的人物：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蔡锷曾经是他的北极星，现在他却迷失了方向。

① 蔡锷是十一月八日逝世的。——校注

② 指岳麓山。——校注

蔡锷的遗体下葬不久，朱德的年轻的妻子得了类似赤痢的奇怪的热病，不幸去世。刚把她下葬，在朱德家中静养的少年时代的学友吴绍伯，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病敌——肺病而与世长辞。

朱德在这之前，从不知悲哀为何物，如今却是三重打击一起袭来，使他心灰意懒。现在只剩下自己和丧母的婴儿，他只好把孩子托付给朋友代为照料。这时，他的上级长官召他参加重要会议：北京的段祺瑞总理已派出代表同全国各地的省长、军阀密谋，并以银元向他们炫耀。被击败的四川军阀正在重整部队，蔡锷留在云南主政的唐继尧突然间手中宽裕起来，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北洋军阀开始要求解散国会，外国人也把国会称为“一群乳臭未干、毫无经验的小子”，哪能过问国事。

一九一六年年底，四川地方军阀攻击成都，朱德奉命率领两个旅前往救援。队伍还在途中，成都即被攻陷，督军罗佩金弃城逃跑。朱德只好退回泸州；同时，护国军——云南军还以此为名——和成都方面的胜利者取得了停战协议，停战之后，双方口称友好，却暗自募兵扩军，准备最后决战。自此以后，朱德陷入了军阀主义的罗网而不自知。因为他自己觉得，云南军不是在华西卫护约法的部队吗？不是效忠于孙中山和民国的部队吗？这话确实是对的，不过，这支军队有一些军官已经竖起耳朵谛听段祺瑞总理的代表手中的银元声了。他们虽然还没有倒戈，但诱惑力极大。

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是那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和女仆，也不愿意把他送回老家。那时，他已经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好了一些，他却不希

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成为新的中国的一个合乎潮流的、愉快的青年，在新的环境里上新式学校。

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他的妻子虽然去世不久，可是在当时，丧偶的男人立刻再娶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事情。中国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家庭而非个人，朱德虽然自认为是新式人物，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旧社会制度的产物。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基础，不过，婚后可以逐渐发展。他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他需要为家庭找个主妇。

因此，还不到年终，他就同意续弦；由他部队里的一个朋友作了媒人。这婚事在当时也还算是新式，因为这个朋友有个受过教育的妹妹，天足，参加过辛亥和一九一六年的革命，若不在婚前同求婚的人见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于是，这两个军官骑马直奔泸州西面的南溪而去。途中，那个朋友一再夸他的妹妹陈玉贞聪明过人，可是也很“任性”，家里提出的多少次婚事都遭她拒绝，蹉跎下来，已到了二十一岁，在那时称得上是老姑娘了。

朱将军在谈到这个后来与他结婚的妇女时，声调和态度都有很大的变化——这是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爱”这个字并没有出口，不过很明显，他对于陈玉贞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深深地爱上了。

据他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在紧锁双眉，努力形容她的时候，他的声调极为柔和，而且带有几分尊敬，他说：

“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

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一九一六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身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他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谈到第二次婚姻和泸州家庭，朱将军好象又重新沉浸在那个已经失去了的幸福小天堂，而忘记了我们的四周。在穷兵黩武的动乱年代里，他的家是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他的薪俸很高，妻子手里也自有积蓄。两个人虽然都知节俭，却买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款待客人。他们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在那里看书和讨论读过的书籍。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其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传遍中国以后，他们也搜寻有关这类题材的书籍或小册子，并且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玉贞弹琴，朱德吹箫、拉胡琴，后来他又买来并学会了其他乐器，其中包括风琴。

他的第二次婚姻和伟大的五四运动在时间上相差无几。五四运动作为一九一九年学生运动而闻名，当时，北京的学生和教授示威游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中国，抗议协约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把前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运动是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如同森林之火燃遍了中国，抵制日货运

动随即兴起，它把一切爱国分子都吸收了进来。这时，泸州的第一个学习小组在朱德家里成立了，它成了这一地区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的聚会场所。这些人读了书报杂志后便在一起议论，还就世界上流行的新思想展开辩论。

“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朱将军解释说，“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有时还在星期天晚上打打麻将牌，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的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妇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则是其他方面，同时，还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类社会理论。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我们在泸州的学习小组也不曾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力和盐工。更增加混乱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作家都是高级教授、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在我们的学习小组里，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

朱将军在泸州的五年里，共和国又处于由外国帝国主义列强所支持的军阀主义的蹂躏之下，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也陷入了军阀主义的泥潭，而他们却还以为正在同军阀主义作战，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呢。

第十一章

为了赶快把军阀统治中国的时代作一结束，我请朱将军谈谈军阀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又在什么时候结束。

他说，始自袁世凯，而到目前还没有结束。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春天。从一九二四年开始，曾经有过一段充满光明的时期，当时，孙中山领导了反对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伟大国民革命运动，可是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掉转枪口对准中国人民，并接受外国和中国银行家的贷款来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于是，这个时期又告流产了。同他的前辈人士一样，蒋介石政权接纳了许多新旧军阀，混乱而反动的制度仍然沿袭了下来。

一九一六年蔡锷死后，朱德说道，四川成了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而北京则是一切全国性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制造所。在一九一六年以后的五年里，

段祺瑞总理——日本帝国主义的打手——辞职或被赶达七次之多。每一次他都在自己的或和他结盟的军阀军队支持下，在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下卷土重来。他伸出他的长手，在每一个省内都找到了同他一鼻孔出气的军阀。

蔡锷尸骨未寒，由段祺瑞津贴的当地四川军阀便从云南“护国军”手里夺取了成都。在短暂的停战期间，成都的新统治者设立了许多新税，还高价出售官职，把有钱人关在监狱里大事勒索。农民不能事先缴纳好几年的地租，便被赶走，土地也被新贵接了过去。这些将军当时在四川搞到的大片土地，就是对农民巧取豪夺的结果。可是，直到朱将军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这种强占土地的办法还在继续。有些地产的面积达到了成千上万亩之多。

一九一七年占领成都的四川军阀同云南护国军暂时停战以后，又特别派来代表与护国军谈判，声明愿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邻近的贵州和云南。同时，他们又派出代表到贵州和云南，声明愿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护国军。朱将军解释说，这种两面派手腕乃是军阀的典型做法，无所谓什么原则。派到护国军这方面的代表，乃是一个名叫刘伯承的青年，他在三十年后成了西方人所共知的共产党“独眼龙将军”，是中国远见卓识的革命战略家之一。

“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朱将军谈起了有关刘伯承的事。“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的道路。”

朱将军所讲的四川军阀主义的故事，记录了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沮丧和痛苦，由于故事长而且错综复杂，这里只能叙述几个侧面。云南护国军拒绝了缔结军事同盟的建议后，立刻对成都军阀发动攻势，推翻他们并占据了全省大部分地区。败军撤退到四川的偏僻地区“养精蓄锐”，就象朱将军所指出的那样，“等待更强大的军阀去领导他们”。

这军阀不久就出现了，不是别人，就是被护国军在成都拥为督军的熊克武将军。

朱将军把熊克武挑选出来，是要把他当做X号标本，用以说明一度曾是革命派的人怎样转变成为军阀。辅助标本则是他的副司令张群，和另外两个野心极大的军人，一个名叫刘湘，一个名叫杨森，后来这两个人都与朱德有不共戴天之仇。

朱将军所谈的这个故事长而复杂，因为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从来就不会简单。它好象是一座拥有无数甬道的地下迷宫。

熊克武将军，或X号标本，和他的副司令张群一样，当时乃是忠心耿耿的国民党员。一旦权势在手，X号标本就完全仿效其前人的办法：“先刮地皮，后买田地，并把现款送到上海的一家英国银行，两年之内，据说就有了一百万中国大洋的积蓄。”每一个军阀生怕在位时间无多，便未雨绸缪，尽量刮足。

权力和财富滋长了个人的野心，不久，X号标本便暗中接纳被他打败的军阀队伍，扩充私人军队。在这些行动中，他又和地方上一个野心颇大的小军阀刘湘结成军事同盟，到了一九二〇年五月，他认为军力和财力都已有把握将云南护国军赶出省外，把整个四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突然宣布和

北洋军阀沆瀣一气，命令他的老同志滚出四川，不然就武力驱逐。这个人到底有多大野心，不得而知，可是在那时期，全中国的军阀都在混战。能够爬到最高地位的人便可以占领北京，自称是“民国大总统”，还可以立刻得到外国的承认，而且如果他言听计从的话，还能拿到外国贷款。

云南护国军没有接受老同志的最后通牒，反而发兵成都，把X号标本和他的盟友刘湘赶出省外。这些被赶的人经川北退到陕西，在那里抓丁练兵，接受北京的津贴，其后，便长驱直入四川，展开了倒袁运动之后最持久、最激烈的内战。

一九二〇年年底，护国军被赶回川南，原有的四万军队只剩下一半。单是朱德的一旅人便只剩了一个团。

但在这次战争中，X号标本自己也损失重大，以致他的盟友刘湘轻而易举地把他踢走，取得了统治全省的大权，刘湘在这地位上，尽管风云变幻，却一直盘踞了二十年。

在这次战争中，护国军的司令之一、朱德的老友杨森也染上了军阀热。他在川东一带自封为独立的军阀，以重庆为其首府。刘湘和杨森瓜分了四川全省，刘湘的地盘要大一些。

等朱德将军再次听到X号标本的下落时，已经是六、七年以后的事了。这个落魄的绅士因牵涉到企图推翻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建的新国民政府的阴谋，在华南被捕。可是他的地下迷宫另有一个出口。一九二七年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权，熊克武成了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将军，而一度做过熊克武的副司令的张群，在抗日战争的前几年就做了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直到朱将军向我叙述这故事时，他的职务还未变动。公众舆论后来才强迫他辞职，因为他的政策过于亲日而臭名昭著。这几

年来，张群和X号标本都成为“政学系”的骨干，这一系的人，多是职业政客和军人，“政学系”是袁世凯当政时在北京成立的^①。

这迷宫也并不是到此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了在中国的主要外国势力，美国发言人就特别看中“政学系”，认为他们是建立中国民主政府的最适当的“自由分子”和“民主人士”。一九四九年年底，X号标本和张群又回到四川，虽然年已垂暮，却还抓住军政大权，最初是倒向蒋介石，其后又对朱德将军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表示中立。

朱将军谈到他在四川的那几年时，屡次提到他自己和护国军，认为这是在华南时起时落的孙中山共和政府的一只臂膀。这时期，朱德在政治上表现出一个分裂的人格：外表上是卷入军人混战的一员，但内心总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在家里的学习小组上继续讨论新思想。

“我们讨论又讨论，可是得不出结论，”朱将军说道。“我听说中国有几个地方组织了工人团体——中国工会运动的萌芽，可是四川还没有。早在一九一九年，已有几个地方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就是在一九二〇年从这些小组中产生的，可是我当时还毫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只有杂志上的普通文章。我们连一份《共产党宣言》都没有，那是最先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虽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和同志们却为红军打败沙皇和入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而深深感动。为什么俄国革命者能

^① “政学系”是袁世凯死后在北京成立的。——校注

够打败那样强大的军队，乃至西方国家的军队，建立起自己的政府，而中国人就失败了呢？他的朋友孙炳文屡次和他讨论这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如果拒绝出卖自己，外国列强就无法收买任何中国人。他们也谈到护国军本身，它的一些军官与北洋军阀并无不同。孙炳文曾一再表示，愿意放弃这个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朱德则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

光阴如梭，他们仍在空谈而无行动。一年过去，到了一九二〇年，血腥的内战开始，可是他们还在徒托空言。朱将军那时以家庭的理由作为迟迟不能采取行动的借口。一九一九年秋天，他曾将一家二十几口接到泸州，与他们夫妇同住。为了证明他是一个孝子，能够而且做到了养活一个大家庭，很有面子，它又退回到封建主义去了。

他的养父养母宁愿留在祖父母已经入土的大湾，他的亲父母则借大哥代历及其他家人来到泸州，此外，还有朱德的两个已婚弟弟及其眷属，和一个最小尚未娶亲的弟弟。

旅长的薪俸相当高，将近一千块钱一个月，而且按照惯例，还有相当于一半薪水的津贴。再加上日子过得节俭，有些积蓄，他毫不费力地买了一所房子来安置家人。

最后一次离家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才愕然发现，双亲——靠近七十岁的人——已是鬓发如霜。朱德向他们提出保证，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安享晚年吧。他还为全家安排好计划。该上学的孩子和尚未结婚的小弟弟都进新式学校。大哥代历留在家里管家。已经结了婚的两个弟弟，进旅里的军事训练团，准

备走上飞黄腾达之路。

看起来他很象是一个把亲属全都安插在自己部队里的军阀，同时却在谈论什么护国军乃是共和派，仍然效忠于孙中山的立宪但是虚幻的共和国。

家人慑于他的权势和地位，对他的计划不敢反驳一字。老父老母眼看着他把两个弟弟送进军事训练团，心中虽然难过，也没开口，两老只有在朱德与文武官员共同学习时才能见到他，他们谦逊地默然而坐，倾听儿子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

在朱德看来，什么事都已得到妥善的安排，可是没过几个星期，两位老人在家里就象无主游魂一样，不知所措。他们一生从事劳动，从未闲着。在知书识字的儿媳妇面前，他们也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不知所措。五十万人口的都市的杂沓市声简直就扰乱了他们，附近也没有人可以谈谈收成、红白喜事和邻舍的丑闻。他强要他们多休息和享福，可是他们说，现在吃的珍饈美味，还不如多年吃的杂粮有益于健康。

一九一九年年底，朱德的一旅和川东的军阀打了一场激烈的仗。他立刻把自己的两个弟弟任命为旅里的下级军官，并派遣他们出征以使他们在自己指挥下取得一些作战经验。双亲送三个孩子上战场的时候，不由得满面愁容，担心害怕之情溢于言表。朱德还笑着向两老保证，说他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未负过伤！

“这一仗我们打败了，全旅人员伤亡特别大，”朱将军低沉地说。“在一个星期里，两个弟弟都在战场上被打死了。我带着弟弟还没装殓的尸体，将队伍带回泸州。两老受的打击太大了，连哭都哭不出来，很想马上回老家去。可是那时我的处

境很坏，为了我的关系，他们又在泸州暂住了一阵。”

谈到他在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抽鸦片在那时候的军官之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朱德在此之前，不曾有这一嗜好。现在，他卧在鸦片烟榻上，身边放着烟枪和烟灯，一边抽烟，一边和他的朋友、参议孙炳文聊天。孙试图劝说朱德戒烟，但未成功。他告诉孙炳文说，他愿意把烟戒掉，到国外去给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也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他不停地谈论，不停地抽烟，避免和家人见面，也不关心他的军务。

接着就和熊克武——X号标本，展开最后一场血战，朱德的一旅被打得只剩下一团人。

在这次挫败后不久，全家人实在住不下去了，准备回乡，他也不再反对。朱德给了旅费，又雇船送往重庆，准备他们从重庆换船转道川北。十天以后，上路的人来了信，报告老父死在重庆，他们现在扶棺北归，打算葬在大湾附近祖先的坟地里。

现实是这样的，据他讲：云南护国军如果不立即撤出四川，就有被完全消灭的危险。全中国都陷入了军阀主义的混乱之中，生灵涂炭，不见天日。新军阀吴佩孚在北京取得了大权，表面上和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暂时停战，事实上却是要彻底摧毁它的前奏。中苏结盟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它导致后来苏联与孙中山政府的合作，不过这件事既非朱德在当时所知，对他也没有多少意义。他投身戎行，原想为他的国家的解放寻找一条道路，混战十几年后，这一理想竟告烟消云散，对于两个弟弟丧身疆场、老父客死重庆，他尤其感到责无旁贷。但鸦片烟并不能医

治这些创伤。

他参加了护国军召开的多次冗长会议，决定回师云南，打倒唐继尧政权。唐继尧在一九一六年蔡锷逝世后，就把云南省当作他的小王国，赢得了“云南小皇帝”这个可憎的外号。

在会议期间，朱将军从绝望的深渊开始向外探索，和孙炳文就中国的情势以及自己的前途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他们还拟订出不少研究专题，每一个专题都要讨论分析几天，才得出结论。他们认为：军人生涯不是他们所应走的道路，但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当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孙炳文把妻儿留在四川，立刻动身赴北京。朱德则把妻子送回她在南溪的娘家，决定在打倒“云南小皇帝”之后，马上离开部队，去和孙炳文会合。

第十二章

一九二一年新年的曙光初现，护国军突然回师云南，连枪都没放几下，便占领了省会昆明府，控制全省。地方上的旧官僚和军人，转过头来向新政权效忠，以便待机再起；“小皇帝”唐继尧则尽量带满收割来的财宝，逃出省外。

护国军的革命名声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国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再一次涌向云南，协助把这一省变成共和派的基地。不过，局势已是今非昔比，朱德对于大局的发展极表怀疑。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尘雾滚滚，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无政府状态、混乱和绝望一连持续了几年。北京成了军阀和外国银行家以屈辱的国土作交易的市场。孙中山不断地和这个或那个军阀结盟，企图利用军阀之间的矛

盾，其结果却只是一再被人出卖。

前途茫茫，朱德向护国军提出辞职，声称要到外国留学。同行伍的军官力劝他在新政权稳定以前，继续留职，先做警察厅长。经过多次谈话，他同意了，并派人把妻子和孩子接到任上。

他留了下来，可是昆明勾起了他许多痛苦的回忆。漫步在宽阔清洁的街道上，青年时代的身影不断出现，好象在嘲弄自己。在这里，几年以前，因为推翻了清廷，他曾经胜利地高歌行进。在那儿，城墙的外面，就是讲武堂原址，他曾经发奋研究救国之路。还有，在这里，他曾经冲开过总督衙门的大墙，蔡锷还曾在这广场上发表过胜利演说；在那儿，就在那座大楼里，曾经筹划过推翻袁世凯的帝制。蔡锷所说的话——那句令人警惕的话，到今天似乎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了：

“无论如何，我的日子不多了！”

这里是在他年轻的已故领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华丽大楼、宽阔街道和新式学校，那里则是他的年轻妻子曾经读书，或是在星期天陪他边散步、边谈论和平与进步的新中国的远景的地方。她死了，蔡锷也死了。如今，他行年三十五岁，是一个抽鸦片的军官，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有几房妻室。现在，他是站在个人理想和对国家所怀有的希望的废墟之上。

为什么留下来不走呢？他问自己，结果，在孙中山先生对全国发表的新的宣言中找到了理由。孙先生说，辛亥革命只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而没有实现他的另外两个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先生说，新生的广东省将要成为培植三民

主义的土壤，不久就可以根深叶茂，向长江和黄河流域发展。

是谁曾经向他问到关于解救中国的问题？对了，是席老先生问他，中国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事那一年，是不是比前几十年——那时屡次被一个、充其量也不过是两个外来的强国所打败——强了一些呢。一九〇〇年的中国已经比前半世纪弱得多了，可是现在，二十一年后，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染指北京政府，并且各有其扶植的军阀作走狗。

云南能象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样拯救共和国吗？这个或那个曾经多年来舔吮“云南小皇帝”唐继尧大皮靴的将军，能够坚贞不渝地效忠共和国吗？不能够，朱将军对自己说。

一九二一年五月来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又为朱德的滞留提供了新的理由。在孙先生的号召下，共和国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了，并且选举孙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项激烈的声明中，孙先生宣布新政府将要铲除军阀，用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并砸碎近一个世纪以来桎梏着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还传说孙先生要和苏联携手。

到了秋天，朱将军安排好出国的最后步骤。他买了一种据说能够戒烟的广东草药，决心立即服用。他把积蓄中的一万元存到一家法国人办的银行，以便他的妻儿在手中拮据时可救燃眉之急。

转眼就到了一九二二年年初，滇军接到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为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向东进军。留在昆明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兵。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滇军主力部队开向远方，混乱又笼罩着昆明。“小皇帝”唐继尧率领地方民团和土匪重新向昆明进

军，当年在他手下的官员和军人们，耳边又听得银元的响声，他们伸出手去，开始接应。知识分子有的外逃，有的隐匿起来；朱德也把妻儿托付给一个准备逃往四川的朋友的家里。

争夺昆明府的战斗，几乎是不发一枪就定了大局。指挥地方部队作战的新督军，被抓起来砍了头。朱德连忙带着准备前往欧洲的旅费，身佩枪支，骑着他那匹著名的战马，连同十九位国民党领导人，率领骑兵队伍，突破西门，直奔昆明西面的楚雄，从那里就可以南下，踏上前往缅甸的公路。这二十个领导人中包括蔡锷的老同志、老革命党人罗佩金将军。

策马良久，这一群流亡者来到一个村子，在这里听说楚雄驻军司令华封歌将军刚刚宣布倒向他的老主人——“小皇帝”。

罗佩金将军对这消息嗤之以鼻。他说，华封歌是他的老朋友，而且曾是他的部下。他一定会念在旧友情份，放大家过去转赴缅甸。

不行！其他人叫了起来。封建时代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银元的丁当声里了，华封歌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一定会把最后一个老朋友出卖给唐继尧以换取高官厚禄。不应该相信这反复无常的家伙，而应该立即掉头向北，沿着长江上游金沙江的旧商路，穿过西康和四川西部，逃往沿海。到了上海，他们就可以去广州和孙中山会合。

罗佩金却认为北路是死路一条，表示反对。他认为一路之上，山荒岭恶，又有少数民族和盗匪出没；而且现在统治四川的新军阀，正是当年曾和滇军大战的刘湘和杨森。

议论难决，全体分裂为二。罗佩金带着几名卫兵直奔楚雄，其他人则北上进入深山。走北路的这些人在四个月后到达四川时，

听到了他们这个老同志的最后遭遇。楚雄的华封歌果然不以友情义气为重来保护旧友，反而将罗佩金将军抓住，解送给“小皇帝”。唐继尧当即在昆明街头，把他同其他几百名俘虏一同问斩^①。唐继尧为了大捕革命党人，还曾重金悬赏，一时有许多人被搜出解交给他。昆明在几个星期之内是一片恐怖与残杀的景象。屠杀所造成的破坏是如此深重，以致全省的文化活动在数十年内都难以复苏。

和多年的同志分手以后，朱将军一行一路策马行进，穿过滇北的穷山恶水。罗佩金到楚雄请求保护时，曾说出关于北路一行的路线，华封歌果然又派一个骑兵营前来追击，而且出大笔赏金捉拿他们。

一场追踪战就此展开。流亡者夜晚露宿，天色方曙便又登程，直到黑夜再次降临。奔波多日，终于来到金沙江边，但没有船可以渡他们入西康，从而摆脱后面的追踪者。于是，一行分成两批人，四下搜索船只，他们攀上崎岖的羊肠小道，下面就是夹杂着冰凌的激流，在深不可测的黑渊中汹涌而过。

朱德这一批人首先发现渡船，他们一边派卫兵去指引另一批人，一边渡过河去。其他人也到了，开始渡河。六名长官和几个卫兵刚刚过河，敌人的骑兵突然来到，剩下的人作了几分钟绝望的拚杀，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

第一批人进入了西康省，可是敌人也渡过河去，继续追击。这个地区已在大土匪头子禄国藩的控制之下，他这小王国从江岸

^① 华封歌没收了罗佩金卫队的枪支。罗佩金逃往华坪。唐继尧指使土匪追捕罗佩金，在苴却的双金坡把他处死。——校注

一直伸到北边的会理，骑马也要五六天的路程。这批流亡者几乎立刻就和禄国藩的边防卫队相遇，他们说明自己正在逃难，想见见他们的头子。边防卫队在自己的领域内行事非常细心，先让他们派几个弟兄和禄国藩商谈，其他人随后缓行。边防卫队则负责驱走跟踪的敌军。

两天后，流亡者一行看到北面有一支骑队绝尘而至，不多久，已可以看清骑马的人当中有自己的弟兄，于是下马迎候。队伍靠近后，其中一个短小精悍、三十多岁的汉子，下马走了过来。朱德一行人内心里疑惧和希望交织在一起。那汉子按照旧礼表示欢迎之意后，随即说明自己就是禄国藩，特来迎接远客。

朱将军猜测这汉子可能和自己一样，也是哥老会弟兄，在寒暄致意的时候，便按照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了解彼此是结盟弟兄的办法，说了几句话和做了几个手势。禄国藩的两眼一阵闪亮，也按照规矩回礼，经过这一瞬间，这批流亡者是更加安全了。

为了感谢主人的礼遇，流亡者当即向禄国藩赠送几支步枪，禄国藩敬谢，直到对方再三相赠，证明并不是客套，才收下。他于是带领他们到他的山寨，下令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有几百人作陪。禄国藩穿行其间，其风度宛如一个达官显贵。

流亡者一行在这里盘桓了十天，等候裁制便装，以便扮做商人，穿过敌区。

朱将军提到禄国藩，对他深表同情。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受到描写中国农民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的《水浒传》（此书的英文译本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影响。辛亥革命前

和革命期间，他和其他哥老会弟兄与共和派同盟会失掉了联络。待革命爆发，他们赶走地主，没收和分配了土地。他精力充沛，有领导和组织才能。他把农民组织成一支队伍，到一九二二年，已有五千人马，而且很奇怪，还有几个傣族人。地主和四川军阀都把他称为可恶的土匪头子。

“他的确是一个土匪，”朱将军说。“每逢没有收成或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就打进富裕的城市，劫富济贫。比起军阀来，他应该算是正直清白的公民。土匪毕竟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如果成功了，可以建立王国，子孙会变成王公贵族。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动乱中，禄国藩看到和听到许多奇怪的事情。不少人逃到他那里避难，他则保护他们。他尽力模仿民间故事里那些赫赫有名、为人崇拜的土匪头子。一九二二年，四川军阀对他施加压力，想把他赶出他控制的地区。但他冲退了他们的多次进攻。

“我们交了朋友，促膝畅谈中国现状。他是一个理解力很强的人，问了我许许多多问题，并且希望我留在那里，为他出谋划策。我说明留学外国的决心，他听了很为惆怅。出发的时候，我把自已最心爱的东西——自动手枪和高头大马都留下送给他。我只收下他送的一匹山地小马，以便登程。我还把妻子在南溪的住址告诉他，并邀请他在外出或是避难的时候，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出发那天，他策马送了好几里路，然后又派一队卫兵护卫我们一直到离会理一里地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边界。其后几个月，我到了上海，接到妻子的信，提及禄国藩曾派人到南溪，送还我的马匹，并探询我平安否。一年以后，我到了德

国，妻子写信给我说，禄国藩自己到过南溪一次，打算劝我同他一道到他那里去，听说我已出国，懊悔不已。我妻子一家待他如上宾。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国内报纸说，他已经被四川军阀刘湘的侄子打死，他控制的地区也被侵占了。我难过了很久，因为禄国藩要比他的敌人善良得多啊！”

离开禄国藩的地区后，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化了名，作为商人带着武装护卫行进，因为通过这类危险地区，护卫是很必要的。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山，他们又渡过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六十年前，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就是在这里覆灭的。朱将军这次穿过这一地带，对于十三年后他率领中国红军通过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雅安境内，一行转向东行，进入四川。正是在雅安，朱德吸了最后一次鸦片。每天早晚，他十分认真地服用几个月前买来作戒烟用的广东草药所煎成的汤药。但这也是一段折磨人的日子。在戒烟期间，他晚上睡不着觉，因此，白天体力很弱，精疲力竭，在马鞍上难以支撑。这是一场很艰难的战斗。到了五月中旬，一行人到达他妻子在南溪的家。他苦于失眠，经常深夜推被而起，在屋内踟躅或看书。不过他已经是向着胜利迈进了。

四川军阀暗探很多，已经知道他们的行踪，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并没有动手抓人。他的妻子和老朋友们诉说了他们的被俘同志在昆明的悲惨下场后，又说明四川军阀现在正谋扎根立业，甚至想录用素有经验的军人。朱德打算留下和妻儿盘桓几天，其他人则立刻坐船前往沿海。他儿子现在已是个皮肤黝黑、终日不停嘴的小家伙，刚满六岁，简直就是他爸爸的袖珍

版，欢欢乐乐，最喜欢坐在爸爸膝头上念妈妈教他的字。

“苦——力，”孩子满怀信心地念道。“苦——你看吧。就象个小老头的脸——满脸皱纹，这个人多难过，日子多苦。”

朱德正准备动身去沿海，接到霸占川东的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他“念在旧交”到重庆去作客。

朱德回电接受邀请，就告别妻儿。此后他从未再见过他们。十三年后他们被西南的军阀谋害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正是端午节，朱将军的船只在重庆靠岸，杨森从卫队堆里走出来，亲亲热热地欢迎，好象他们的友情中从来没有过阴影。刘湘刚刚从成都来，参加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开的是什么会，朱德连问都不问。可是，不问也能明白。国内其他地方的战争已经打了几个月。孙中山先生征讨军阀的攻势已经失败。滇军也参加了这次讨伐。当孙中山在前线的时候，留在广州的广东省长接受了香港英国银行家的贿赂，发动政变。孙夫人宋庆龄逃到上海，孙先生不久也跟她会合。

革命运动再告失败，英帝国主义的打手吴佩孚就变成了北京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人。朱将军不必打听，便知道四川军阀已经和吴佩孚沆瀣一气，事实上，他们绝不会以真心对任何人。他还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也各怀鬼胎，打算一旦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便干掉对方，占领整个四川。

朱将军很不愿意提到在重庆这一星期的事，说得虽然简单，却很象中世纪的故事书上显现出来的场面。宴席和麻将牌接连不断，歌女、刺耳的琴声、满溢的烈酒，一切都笼罩在鸦片云雾之中。

觥筹交错之中，三个人好象封建诸侯一般，谈起大局。提到过去的战事，彼此回忆起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事，赞扬对方用兵如神，又为自己谦逊不已。没有一个字提到象秋风落叶一般跌倒下去的士兵，没有一个字提到受苦受难的农民和被双方铁骑践踏了的农作物。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提到孙中山和中国的前途。

不出朱德所料，杨森邀他入幕。杨森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年已三十六岁的败军之将，既无家产，显然又无前途，竟对此加以拒绝。

“为什么拒绝呢？”我问朱将军。

“我既没老，也没那么堕落！”他答道。

“那又何必去重庆呢？”我又追问下去，因为我还没有认识到封建关系和封建影响的蜘蛛网是怎样缠绕着他的全部生活的。我更无法充分了解这个一度是贫农，又曾显赫一时、拥有权力和声望的人，心中是如何的混乱。

朱将军咧着嘴苦笑地解释说，如果不接受杨森的邀请，他和全家人都有生命危险。他还心怀好奇，想看看这个曾经是革命党的人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无可否认的：他的一只脚虽然已经伸出去寻找未来的立足点，另一只脚则还留在旧秩序里。

他对主人们说明，正想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生活，他们笑了一笑；刘湘问道，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够了？

想起这件事，朱将军的讥讽的才智出现了：

“你应该知道，失败了的军阀政客总爱找个类似峨眉山的

名山去韬光养晦，他们住在寺庙里，为的是使人觉得他忠诚爱国，饱学博才，以期卷土重来。他们还要写诗寄意，表示修身养性。不会写诗的人，也要雇几个失意的墨客代为捉笔。有时，他们还不惜长途跋涉，祭扫祖茔，以示孝行。似乎暂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我还是对杨森申明，打算到外国留学。他向我保证，回国以后，一定虚席以待。一个星期之后，我便到了上海。”

第四篇 探索

第十三章

在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顺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

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虽然他时常接触到，但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科学上的都市，无异于一棵摇钱树。

第三，他希望现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

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

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已经戒烟，但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疗否？

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生平时，似乎仍是不自觉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的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的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弱小，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不过它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从对英帝国主义

的斗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新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轰动了全国。一九二二年一月，当朱德和他的同志们还在云南山区艰难行进的时候，香港中国海员已在要求增加工资，承认他们的地下海员工会为合法。当时，英国海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刚刚赢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重大胜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已经八年没有调整，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倍。

香港英国当局拒绝了海员的要求，并且监禁了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脱了大逮捕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的号召下，香港海员团结一致，举行了大罢工。二十四小时之内，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国雇主家里服务的仆役，都一律罢工。曾经被骄傲地称作英国权力堡垒的香港，整整瘫痪了五十天。罢工最终胜利结束。英国当局承认海员工会，同意增加工资，并向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工人赔礼道歉。

当朱德将军谈到这一激动全国人心的反帝斗争的首次胜利时，他的声音都发颤了。广州的孙中山政府曾为罢工提供二十万亿美元的基金，中国的军人们给了大量的捐献，而全中国的工人更是倾囊相助。苏联工人曾为中国海员募捐，而英国工党则在议会提出了香港大罢工问题。

朱德将军宣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在香港大罢工期间，京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天后，罢工结束。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一元，工人争得组织工人

俱乐部（这是工会运动的萌芽）的权利。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以及香港大罢工的部分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达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①。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他酷刑对待工人。

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精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更多，工资则少得可怜，工人靠这种工资过活，至多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象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外国和中国的资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

^① 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的。——校注

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殓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象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象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

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过，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都有传闻，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么悲惨。”

当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社会上

的重重灾难，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场白日梦。而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象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倾泻出来，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一支幻梦般的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跟随着他参加战斗。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冲去，杀死想象中的洋鬼子，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

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沮丧。他不象一般人，谈起白日幻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

“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人的时间太长了，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

离开上海，他到南京游览。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个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经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王朝。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

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

朱将军以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的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三十七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

“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

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始终渴望美国的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谈到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新政策是什么。直到两年后，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他当时是在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

和孙中山会谈之后，三个人又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这次会见的时间极其短促。朱将军毅然用这两句话否定了胡汉民：“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随后访问的是汪精卫，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领导人，享有盛誉，在国民党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孙中山。怀着素来尊敬知识分子之心，朱德在访问他时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顾这次会见以后的十五年，汪精卫的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表现，使他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不是想不起来就是不愿去想了。

即使不从政治上考虑，汪精卫在朱德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从头到脚充满了大丈夫气概的朱德，对于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象的人物是毫无好感的。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以轻蔑的口吻说。“他呶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象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几个钱。而他则是个穷光蛋。他夫人控制

了钱，通过钱，也就控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于共产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终于会见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卓越的作家和编辑，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这时大约四十岁，面色黝黑，有些麻子，简朴地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他精力充沛而又果断，谨慎而又寡言，他就在这间屋内领导着共产党进行组织地下工会的工作。

对这次会见的回忆，显然引起朱德内心的很大矛盾，他对此也不愿多说。近年来围绕着陈独秀而展开的斗争也许能够解释这一情况，虽然这仅是部分的原因。朱德去会见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将军痛苦地说。“我感到绝望、

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探寻解救他们的国家的秘密。

第十四章

提到坐船出海经南洋到马赛，以及后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旅行，朱将军的叙述一点也没有使人感到他仅仅是一个旅游者。他和我相对而坐，低垂着头，两只紧攥的手放在我们中间的小桌上，有时他简直忘记了谈话时的环境。回忆起狂涛大浪和无边无际的海洋，他的声调极为不安和惆怅。

首先来到南洋各港口。南洋是千百万华侨移民来此寻找生活出路的地方，他们在矿里、大种植园里工作，或是在溽暑天气下干着白人甚至当地人都不愿干的苦工。这些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他过去简直以为是天堂。

他和同伴急着上岸，几小时后，在茫然与绝望中回到了船上。这里乃是半中国化的地方，就象上海一样，他的同胞和当地居民在他们亲手建造的摩天大楼、宫殿式住宅和巨大桥梁的阴影下，过着既穷困、

又污浊的生活。

过了这里便看不到中国人了，孤独感侵蚀着他的心灵。印度是一具灰暗而浮肿的躯体，羸弱的身体只剩下一对大眼闪耀着受苦受难的神色。宫殿耸立在峰峦上，贫民窟则布满在黑暗的小巷边。接着看到了非洲的黑人，他们赤裸着身体，为白种主人扛着无限重荷。在冷酷而又傲慢的豪华背景下，埃及成了一个两眼满是脓液的骨瘦如柴的人。

朱德的声调低沉而又恍惚：

“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苦难的黑暗世界。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最悲惨的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贫穷和奴役的问题到处都是一样。在法国上岸后，我发现欧洲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法国工人固然比中国人穿得好、吃得好，却也喘不过气来。而法国政府不过是官僚们做交易的市场。我们在法国街头从早走到晚，还参观了欧洲大战的战场。法国是战胜国之一，可是每个人都在谈战争的灾祸，美好的过去已不堪回首，四肢残废的伤兵、寡妇和孤儿象幽灵一般在街头游荡。

“瓜分世界的欧洲大战，一下子打垮了三个王朝；就算是战胜国，也一样元气大伤；然而，那时候我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

这两个人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就是后来和他的战友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蔡畅（李的妻子）回国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个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

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们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他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他们两个人坐火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这个人会不会象同胞手足一样接待他们呢？会不会疑虑重重，详细询问他们在军阀时代的经历呢？朱德想起自己的年龄，他已三十六岁，青春象一路鸣叫的鹰，早已一闪而逝，留给他的的是衰老和幻灭。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目，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有些腼腆。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

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持秘密。

朱将军解释说，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他原来是滇军将领，而且是资格颇老的国民党员，有朝一日，很可能被共产党派回云南去工作。他虽然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朱将军说他已经和过去的许多关系，和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断了联系，“从而卸下了沉重的包袱”。那时，德国有好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很多是富家子弟，在过去，可能免不了与他们交往。现在他则敬而远之，而和其他留学生——有些几乎可以做他的儿子——在一起，如饥似渴地钻研学问。

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几乎把时间完全放在学习上。除了在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党员们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朱德作为刚加入的“候补党员”，只在这些讨论会中坐着旁听。会后，再由一个年轻的同志帮他学习。他们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细读《向导》杂志上，这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登载关于中国革命史及其问题的学习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党组织分析了中国以往的革命斗争，朱德也开始分析自己过去的生活和行动。同时，他开始学习德文，以便进入某个德国大学。

时间象狼群一样在后面追逐着他，他顽强、虚心、毫不松懈地学习着，并且责备自己对于德文——它与中文毫无任何关系——学得过于缓慢。他想，也许是年岁太大了；也许是因为离开学校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是当军人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

习惯于动的生活，象中国学生那样长时间地埋首书堆之中，那实在是受罪。

他来欧洲并不单单是为了读书本，虽然书本即或说不上是多年来智慧的结晶，至少也可说是多年来思想的积累。他来欧洲还想研究欧洲文化，包括能使它强大得足以征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和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完成这项任务的唯一办法是走到外面去尽力观摩。

他象当年学习古典书籍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件事。他首先买一张柏林地图，把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机构的名称都用中文注音，标在上面。他的德语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问路的程度，他决定信步所至，沿路遇有博物馆、学校、画廊，或是啤酒酒店和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要去参观。他也要去欣赏歌剧，听音乐会。他还要访问议会，游览公园，走访普通人的家庭，看看他们的陈设和生活。他甚至还要参观教堂，看它与中国的寺庙有什么不同。

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念书，念得头晕眼花时，他就要出外去了解德国社会，多半是独来独往，不过有时也和新结识的朋友邓演达在一起行动。邓演达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知识青年，后来在中国革命中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最后壮烈牺牲。邓演达有时与他在一起走一个下午或晚上，由于无法忍受无尽无休的走路，最后只好中途退出。有时朋友们问起朱德在哪里，他答道：

“城内哪里都有他。昨天是在美术馆，前天是在军事博物馆，昨天晚上又去听音乐会。音乐会——他坐在那里听一个叫做贝多芬的人发明的噪音。他居然喜欢听！他说要把这个人的作品完全听一遍。”

另外一个学生曾经说：“朱德拉我去看歌剧。我睡着了。后来，他问我喜不喜欢？我说，我喜欢休息时的点心，回家时，他教训了我一路。其实，我也喜欢听体育宫群众大会上的歌曲，可是德国其他的音乐，简直就是大噪音。”

起初，音乐会和歌剧在朱德听起来也象是大噪音。但他逐渐懂得了音乐的旋律和主题，以及整个乐曲中那种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的格调。他从未理解乐曲的全部，但他能够沉浸在有如世界的黎明，大部队的进军，以及人的绝望斗争这样一些雄壮的交响乐声中，悄然进入梦乡。

放下了书本，他便日夜四出探索，走啊，走啊，走个不停。在柏林军事博物馆，他研究了过去战争中的武器，和德军在历次战役中缴获的旗帜。在这些旗帜面前，他有一次突然目瞪口呆。在他面前，竟有一面德军在义和团时代在中国缴获的旗帜。他不知道他在这面旗帜前凝视了多久，一支想象中的军队又从他的脑际涌现了，象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一样，他自己成了一个指挥这支军队作战的将军，这支军队杀死中国的敌人，并且把他们赶下海去。其后，好几天，每逢他走在街头，这支想象中的军队便重新出现，紧随着他。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在柏林街头筑起障碍物，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德国士兵和想象中的中国同志并肩作战。每一次他都获得胜利，敌人则望风而逃。

朱将军频频摇首，象是要把这想象中的军队驱走，同时又说道：

“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

不久，他自觉已经熟悉了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

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他访问了许多工人家庭，也访问了许多知识分子家庭。还参观了城内城外的大公园和树林，游遍了波茨坦的宫殿和庭院。他曾访问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营地，男女孩子们坐成长长一列，详细地向他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发现其中有很多难于答复。

接着，他拿着中国领事馆的介绍信去参观工厂，那些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使他感到惊异和困惑。随后，他的探索又扩展到其他城市。他手持中国领事馆的介绍信，先访问柏林附近各城市的工厂、矿山和其他机构，然后逐渐伸向远处。

“当我对柏林了若指掌，并着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之后，”朱将军说，“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看了从铸铁一直到火车头制成出厂在铁轨上行驶，所得到的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时都要深。”

四年后离开德国时，朱德几乎遍访了德国的重要城市和主要工业设施，并且还信步莱茵河畔以及哈兹和巴伐利亚山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在笔记本上，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工作最后告一段落时，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满满地装了一箱子。

一九二三年年初，他离开柏林，进入戈丁根大学政治系，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此就读，这里的共产党支部也最强大。而

且，他寄住在—一个曾经在德皇军队里担任过将军的男爵家里，由他教授军事课程。

提到这个男爵，朱将军轻蔑地咧起嘴唇。这个人限定学宿费都要用中国钱支付——德国那时正闹通货膨胀，争执了好久，才决定每堂课学费两元。每堂课讲授完，男爵就开口要钱，并说就自己的身份和学识来讲，这学费真是微不足道，朱将军也照实回答说，他始终还未学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他虽然苦读德文，而且大学的所有课程都去听讲，但他认为比在学校得益更多的，乃是中国共产党支部每周三晚上的讨论会。《向导》，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刊物，继续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革命问题提供学习资料，同时，在巴黎的共产党支部还发行中文报纸，报道国际形势和新闻简讯。

一九二四年年初，他离开戈丁根大学，重返柏林，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路线，给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了支部。孙中山那时已经夺回华南的革命根据地，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原是由从地主、商人以及资产阶级家庭分化出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性质含混不明，现在则成为包括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种不同组织的统一战线。天才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周恩来、朱德的老朋友孙炳文以及一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到广州。在孙中山手创、而由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任副主任。蒋介石是一个年龄和朱德不相上下的军官，辛亥革命时在上海担任次要角色，后来他变成上海交易所的经纪人，与臭名昭著的青帮同流合污。青帮是一种地下组织，敲诈上海每一家中国商号。专干赌博和贩卖人口的勾当。不过，青帮的最主要收入和权势来源于

鸦片，在中国的外国人提起青帮的封建头子，总是把他们叫做上海的“鸦片王”。

孙中山先生曾派一批军官到苏联作短时期旅行参观，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回到中国，他曾发表演说，说共产国际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指路明灯。

国民党转为一切革命力量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朱将军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之外，还制定了三大政策，作为新政府的基础。这三大政策就是联共、联俄和扶助农工。

在孙中山先生三十七年的革命斗争中，他曾经希望并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给予援助。确实有一些人同情他并且帮助他，但是这些国家的银行家和政府，以及在中国和国外的外文报纸，却用各种恶毒的字眼来咒骂他，称他为“愤世疾俗者”、“空想家”、“广东理论家”、“失意政客”。

一九二三年，经过长时期谈判后，孙中山先生终于和苏联携手。苏联新政府曾声明种族平等和殖民地人民有独立的权利。它还废除了帝俄与中国、帝俄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孙中山先生作为盟友，正式请求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鲍罗廷出任他的总政治顾问，加仑将军出任他的总军事顾问。

外国政府和在中国的外国报纸立即给孙先生和他的政府加上“赤党”和“过激派”的称呼。就连多年来追随他的老同志也认为扶助农工政策是舶来品，视若毒蛇猛兽。这些从地主、商人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不久就听到农民喊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农民协会则组织起农民自卫团，为二五减租

和取消高利贷而斗争。在广东，农民运动兴起了，地主和他们的民团伙同当地军阀拿起武器和农民展开战斗。中国农民运动兴起了。

直到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为止，他始终把所有民族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只是在他死后，他的旧部属才组织起公开的和秘密的派系，要求取消他的三大政策，而这三大政策正是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年初，当朱德离开戈丁根大学回到柏林，着手把在德国的全体中国人组织在广东新的国民党政府旗帜下的时候，血染中国山河的惨烈阶级战争正在孕育之中。朱将军认为，在戈丁根继续住下去，实在是浪费时间。他的德语那时已经可以会话，但还不能完全理解较高深的学术讲演。他不是一个高明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没有要得哲学博士那种学位的兴趣。他到欧洲来为的是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增长对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并且为中国寻找一条新的革命的道路。在柏林，他可以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同时，以孙中山的政府所据以建立的新政策来组织和教育中国学生。

朱将军眼望着我们这间屋子的阴暗处，就好象凝视着过去的情景一样，他的语调有时是轻蔑的，有时则充满了愤怒。

“在柏林的许多有钱的中国学生，非但不参加新建立的国民党支部，反而组织了一个青年党，和我们敌对。他们甚至在德国的保皇党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里寻找盟友，还要求德国警察来迫害我们的组织和我手创的中文小报。

“我们手里没有中文印刷机，我们的报纸只好用油印机来印刷。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报纸上，从发行主任直到打杂、送

报工作。我照管稿件，操作油印机，包扎和书写姓名住址，贴邮票等，最后把报纸送到邮政局交寄。我和同志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德国暗探跟踪。关于这些暗探，我们得知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乃是‘殖民地专家’！这些德国人曾经到过青岛，而且会说中国话。

“德国帝国主义分子正在渗入魏玛共和国，做着重占青岛海军基地、恢复过去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的美梦。他们当了警察，而我们的同胞就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我在德国上了严肃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中国人竟和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有句老话：‘虎鹿不同行’。”

朱将军除了忙于组织人们加入国民党，并为出版那张中文小报做一切必要的零碎工作外，还抽出时间到德国工人的集会上去演说，他逐渐地从这些活动中扩展了工作范围——参加国际性会议。在参加那些抗议镇压保加利亚革命的恐怖活动的会议时，他曾经两次被捕。

第一次被德国警察逮捕时，由于中国使馆的交涉他被释放了，但第二次被捕时，则在监狱里关了两天。

“警察把我关了两天监狱，以便找出什么法律上的借口来拘留我。但借口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把我放了，可是从此以后，暗探们——就是那些会说中国话的‘殖民地专家’——就一直跟踪我。在那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有钱的德国投机商挤满在餐馆和咖啡馆里，穷人则倒毙街头。我们注意着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北京政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与苏联签订新协定，美国驻北京大使竟阻挠苏联大使加拉罕进驻原帝俄公使馆。当外国帝国主义分子采取暴行破坏中苏友好的时候，我们举行了

一次中国人的集会。

“我还记得，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作家发动了反对中国‘黄祸’的运动，指责苏联是‘白人世界内部的敌人’，因为它鼓吹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他们还称广东革命政府为‘过激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说他们实行性爱自由，激怒了中国人民。”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世界各地的中国革命人士同声痛悼。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追述孙先生四十年来为拯救中国而艰苦奋斗的经过。这本小册子包括了孙先生的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在遗嘱中，他要求他的继承者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在致苏联的遗书中，他写道：

亲爱的同志：

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朱将军沉痛地说，不仅是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有为孙中山之死感到高兴的人，但在柏林追悼会上有许多人痛哭失声。四十年来，他领导着中国革命，现在，他的决定性的双手离开了国家生活的舵轮。人们象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和哀伤。国民党的领导人都想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但没有一个人具有象他那样高尚的人格和大公无私精神。而年轻一些的人更缺少他那样高的威望。他死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就出现

了秘密的派系组织，对孙中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党的机体进行干扰和破坏。在德国那些和他敌对的中国人也壮起胆子，重新攻击国民党员。

倾听着朱将军回忆这些斗争，而当时也在柏林但从未听说过他的活动的我，回想起一次曾经发生冲突的中国人的集会。这个约有五百人，包括德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参加的会议，是由当地国民党支部召集的。朱将军也是该支部领导人之一。一群保守派的中国学生团坐在一起，当一名中国学生演讲时，他们发出了辱骂和斥叫声。

我不知道演讲人是谁，突然之间，一个身穿双排钮扣西装的中年中国人，快步走过甬道，直奔那群闹事的人而去。他一言不发，伸出手去便抓住一个捣乱分子的衣领，几乎是一提便提到甬道，然后硬推着他奔向门口。他一脚踢开了门，好象扔一口袋白薯似的，把那个捣乱分子扔到门外去了。

回转身来，这个人又穿过甬道，后面还跟着三四个中国学生；他再伸出手去，抓住一个捣乱分子，半提着他走向门口，跟在他后面的学生也照样每人提起一个，接连扔到会场外面。捣乱分子被清除后，只剩下一个顽固的女人，仍在继续不断地冲着讲台上的演讲人大吵大闹。

听众屏息静气地注视着，那中年人再次穿过甬道，伸出手去，一把将那女人从椅子上拉起来，毫不客气地推到门口，象对待她的同伙一样，把她扔到门外去了。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十分钟，进行得很象军事行动。那中年人于是在会场后面占据了一个指挥地位，他的那些学生助手们也分散在各个战略角落里。

我讲了这件亲眼看见的事情后，向朱将军问道：

“这件事你有份吗？你就是那个中年人吗？”

“也许是！”他笑了起来。“我们举行过很多次这样的集会。反动分子总想破坏集会，我们每次都把他们扔出去。可是自从接到五·卅上海大屠杀的报告后，情况就变了。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工人和学生们游行抗议在日本工厂里杀死中国工人，英国警察竟向队伍开了枪。这次屠杀使得许多保守派的中国人都觉得太过分，他们参加了德国人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群众大会。

“中国掀起了强大的抵制英货运动。外国租界实行戒严，外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外国商人自动组织义勇队，租界里的白俄军团对中国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凌辱。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人群众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而他们的统治阶级则在叫嚷镇压‘中国的无政府力量和暴乱’”。

当参议员威廉·布拉宣布美国人民愿意看到中国的权益得到尊重，治外法权予以取消时，美国参议院因为大辩论而震动了。而当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粗暴地拒绝美国人民的这种情感时，参议员布拉警告说，如果美国商人继续其肮脏的行径，他将公开予以揭露。

华南的抵制英货运动是成功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离开英属香港，回到大陆。

于是，发生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惨案。广州沙面的英法军队向正在游行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五十二人，打伤一百一十七人。

香港的全体工人立即行动起来。中国海员离开了英国船

只，工厂工人举行罢工，中国仆役工离开了所有外国人的住宅。在这以后的十六个月里，作为英帝国主义堡垒的香港成了一座死城。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涌进广州，他们中的一部分参加了革命军，其他人或者加入了广东政府的警卫队，或者在整个广东海岸线巡逻，以防英国货物走私入境。

在中国南北，大江上下，英国人开始到处屠杀中国人，而每一次屠杀事件都使中国人更为坚强起来，抵制英货的运动也更为坚决。阶级的界限消失了，甚至刚刚上台的北京军阀政府也对那座古城里的抵制英货运动加以默认。

在德国，朱将军和他的同志们，联同德国的工人阶级，在两个月内组织了十次大规模集会。在法国、英国、荷兰和美国，也有同样的示威。法国政府的回答是将二十名中国领导人驱逐出境，英国政府要求德国政府也起而效尤，未有结果。不过，德国政府采取了折衷办法，即禁止中国人在德国参与公共事务。在德国的中国人可以参加集会，但只要一起立讲话，就有被捕和驱逐出境的可能。有三个人违反了这项命令，果然被捕，并被勒令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德国。

到了这时，朱将军便决心回国了。他的同志们提出异议，要求他在重新走进国家政治生活以前，在德国再多留一些时候，有系统地专心研究经济问题和国际事务。在此以前，他说，他的研究乃是比较一般的和理论性质的。他同意了朋友们的意见，觉得的确需要有系统地学习一下。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秋天起，朱德便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指导下，研究文件、报告、统计资料、新闻报道、杂志文章和其他有关中国及国际事务的材料。

“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非常困难，可是对我大有益处，因为我由此知道，不根据事实的概念就是无用的抽象概念。从此以后，我就能够通过其所用材料是真实的，还是模糊不明、泛泛而论的空想来判断人们是否认真，书籍和报纸的报道是否可靠。”

研究工作有时对他较为困难，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中国的消息说，孙中山先生下葬不久，国民党内部就出现派系，以破坏广州国民政府据为基础的三大政策。孙先生的独子孙科加入了反动的西山会议派，这一组织向三大政策宣战，并在帝国主义的据点香港和上海建立了行动中心，以致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西山会议派的领导人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不过，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阻止西山会议派继续进行地下活动。

也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的工农政策的制订者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死，据说，凶手曾经供称他是

由国民党右翼胡汉民派系分子出钱指使的

乌云又笼罩了中国革命，朱将军开始准备回国了。但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他又平静下来，重新回到书本上。这次大会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的，它重申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对全国发表的宣言中，它告诫说，过去革命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与工农结成联盟。宣言指出，目前的革命“必须在农村和工厂里发展起来”，任何中国人如果破坏民族统一战线，那就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最好帮助。

宣言向全国发表一个月后，朱将军又因另一个威胁性的事

态而放下学习。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发动了一次政变，其目的显然是要建立他的最高统治权。左翼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以及苏联顾问有的逃离广州，有的躲藏起来。蒋介石这一击也是针对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这次政变是短命的，朱将军说，因为蒋介石的实力基础在上海，而不在革命的广州。

与国民党谈判了很久，才勉强实现停火。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为了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在蒋介石坚持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前提下辞职。为了拖延时间，蒋介石答应下来。他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执行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中辞职的有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年前和朱德在柏林结识的革命知识分子邓演达接过了周恩来的职务。朱德的老朋友孙炳文在邓演达领导下任副主任。

“蒋介石也恨邓演达，”朱德说，“可是在那时还不敢下手。过了几年，到底还是派他的党羽在上海秘密劫持了邓演达，在押到南京以后杀了他。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的政变虽然失败了，但他伺机而动，当他带着革命军到上海时，这个机会到来了。他奉派为北伐军总司令，准备六七月间北上。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我们犯过许多错误，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这样对待蒋介石就是错误之一。当时我们的党还年轻、幼稚和缺乏经验。我们只是民族统一战线各党各派中的一个政党。蒋介石流产了的政变和其他反革命的行动和事件，使世界各地的中国革命人士警惕起来。许多人回国了，我也加紧学习，以便在北伐军七月北上出击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能赶到国内。最后这三四个月，我几乎白天夜晚都在学习。”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朱将军放下书籍和文件，和另外九个

中国人到柏林体育宫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群众大会。按照德国政府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不能参加这类集会，可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坐在听众席中，倾听各方意见

大会散了，离开会场的时候，朱德这一批人突然被警察包围，并被带进黑囚车，直驶到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监狱。在那里，一关就是十天，当局打算找些法律根据来拘留他们。

“我以前被关过两次，每次都被释放了，”朱将军微笑着说。“这次被捕，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倒好奇地想见识见识关在牢里是什么滋味。狱中平静、安宁，我苦干了几个月，倒是借此补充了睡眠。每天早晨，一个看守走进我的小牢房，在桌上放下一杯稀淡的咖啡和一块黑面包。吃完后，我就做体操，唱几首歌来消磨时间，然后又上床睡觉。中午和晚上，看守又进来，在桌上放下一盘豆子和一块黑面包，便走出去。

“就这样过了十天，我们全被带上法庭，他们要我们拿出护照，答复一些简单问题。法官然后通知说，我们是捣乱分子，限令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德国。

“中国公使出面干预了，在我们这一批人里，取消了对八个人的驱逐令，可是我和另一个同志则还要执行。我们两人都被捕过，并且怀疑我们曾参加筹备这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和大会有关系！不过，中国公使告诉我们说，英国政府曾经秘密要求把我们驱逐出德国，德国政府同意了。

“我本来已经准备回国，而且所准备的钱刚好够买一张经过苏联回上海的火车票。另一个被勒令出境的同志经法国回国。我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坐船从什切青前往列宁格勒。”

轮船横渡波罗的海，朱将军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为过去四年的经历作一次总结。他和一九二二年离开中国时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虽然还为中国的反革命事件感到不安，但他已经完全摆脱了一度支配着他的悲观、混乱和失望。他认为不但对于德国有了许多了解，并且通过各种关系和研究，对于其他国家也有较多认识。最重要的是，他在德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学习了几年，在他看来，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怎样挽救，都有了解释。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未来胜利的关键。

他说，他的新知识的根基，就是恩格斯所阐明的伟大的历史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规律，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或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不仅是朱德将军，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为了参加反对军阀和霸占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决定性斗争，一个个归心似箭，都在回国途中。想到中国的危险情况，他庆幸除了对党内同志之外，还保持着共产党员身份的秘密，而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员。广东革命政府正打算中立或争取一些态度暧昧的小军阀，他觉得他在过去的军事同僚中间也许可以做一些工作。他还记得，四川的杨森——一九一一年时也是革命党人——曾在一九二二年邀他共事。说不定——也许现在他能够在中国未来的新的革命浪潮中，担负起政治以至军事任务呢。现在，他相信自己能够避免重犯早年的错误。四十年华，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事业不过刚刚开始。

第五篇

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十五章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朱德小心翼翼地 from 上海公共租界走向邻近的中国人地区闸北，在那里，中华总工会、共产党、国民党都秘密设有总部。朱德已经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过一次话，陈独秀要求他再去一次，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批负责军事情报的人员开会。南方的革命军已离开广州开始北伐，朱德与各方面军人的多年关系是大有用处的。

穿过街头，朱德发现在过去四年之中，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轻视国民党员的外国人，现在一变而为充满恐怖和仇恨。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竟然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徒”和“无政府的暴乱力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及其苏联军事顾问的工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中文报纸受到严格检查，群众大会、乃至小规模集会都不准举行，中国人的住所时常被突击搜查，还有人被拉去坐牢。

过街时看到英国警官一边咒骂一边撕掉电线杆上国民党的招贴画，朱德笑了一下。不远处，又看到几个警官正指挥手持刷子和油漆桶的中国籍巡捕，把墙上的国民党口号用白漆涂掉。这些口号每天被涂掉或漆掉，可是每天早晨它们又出现在全区的墙上。粉笔写的口号布满于人行道、商业大楼的窗户、甚至外国人的汽车上。

四年前他出国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忍受着白种人高踞他们之上的处境，穷人被外国人一把推倒在地时，还心存畏惧。现在，中国人可以抬起头来走路，并敢于面对面地看外国人了。工会还是非法的，但工人都已组织起来，工资也提高了——而每一分钱工资的提高乃是用多少男人、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换来的。朱德出国以后，中国各城市有许多中国人死在外国人手里，可是一个新的国家终于在他们的尸骨上站立起来。现在，反对军阀和外国人统治的最后斗争似乎已经在望了。

到了闸北的目的地，朱德进了一座房子的前门，又穿过后门，接二连三穿了几个门之后，才到了一间屋子，那里有一群人正等着他。会后离开他们，朱德回到公共租界开始执行被指派的工作。有许多云南老朋友还在上海。朱德找到了他们，开始搜集有关军阀部队的情报。有人把他介绍给南京孙传芳的参谋人员。他跟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这些军官跟自认为一伙的军人谈到一起，就什么都脱口而出。英国人正用军火支持孙传芳，并拨现款来补贴他那批唯利是图、只为饭碗而打仗的雇佣军队。

据朱将军说，当时的全盘军事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政府由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他曾经做过土匪，在日

本帝国主义的协助下，变成了关外的土皇帝。

华北的山东省则是“另一个日本走狗”张宗昌的势力范围，他以他的高大、蛮干、家财、妾侍和白俄部队闻名于世。这个人能够在床上搂着姨太太或是抱着一个姨太太放在膝头上接见外国外交官员。作为一个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张宗昌以他的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而自豪；他有一次走入北京一家外国大旅馆的屋顶花园，后面真的跟着一队姨太太，鱼贯而入。

西北的山西省是阎锡山将军中世纪式的小王国，他总是和任何一个能够统治北京的军阀结盟。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时，他也有入主北京的野心。

英国人自视为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由两个军阀统治着，都受英国人支持。长江下游，包括上海和南京以及江南各省，归孙传芳统治，由此上溯直到四川，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虽被北京政府赶了出来，却又与新贵结成同盟。吴佩孚的僚属唐生智占据湖南，但正与国民党打交道。吴佩孚是军阀中兵力最大的一个，司令部设在武汉三镇，为此掌握着中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

西部的四川省还在刘湘和杨森这两个军阀手中，可是杨森已经被他的盟友挤出重庆，带着十万军队以万县为根据地吃遍川东。既然被他的当年盟友削弱了势力，他便与长江中游的吴佩孚携手，请他保护。

杨森曾经与朱德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后来变节，逐渐转成军阀。朱德赴欧之前，杨森曾向他保证，等他回国之后，杨森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朱德和同志们讨论了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后，同志们认定他也许能阻止杨森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七月底，朱德结束了在上海和南京的工作，搭船赴四川。途中，他要在汉口稍停，进行某项工作，再继续登程。

八月初在汉口上岸，朱德发现全城都在戒严，吴佩孚的军队不分黑夜白昼在街头巡逻，每一个钟头都在搜查餐馆茶馆，遇到逃跑或拒绝搜查的，便开枪射击。长江里的英国军舰派出海军陆战队保护英租界，中国人进出租界都要被搜身。恐怖笼罩着全城，仇恨已发展到顶点。

摆出一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阔人的傲然自信态度，朱德阔步街头，丝毫未受检查。他进入一家中国银行，给当地共产党书记、湖北省的劳工领导人留下一封信。第二天，他与一批在武汉三镇负责军事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一起会见了这位领导人。他给这些人带来了一项危险的命令：等南方的革命军迫近时，他们要发动一次总罢工，瘫痪交通，并为革命军夺取和占领汉阳兵工厂。

结束了在汉口的工作，朱将军继续登程，几天后在川东的万县上岸。在杨森的司令部，他将国民党代表的证件递交给杨森。

“杨森对我的接待，好象我是他最亲切、最老的朋友，”朱德冷冷地说。“我没有抱幻想。他象所有的军阀一样，哪一方给钱多，就愿意加入那一方，他以为我是给他送钱来的。他几乎马上就谈到需要钱发饷，其实他的部队在川东一带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过境的所有货物都收‘过境税’。这是当时所有军阀都要的手法，他手里有的是钱。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只在长江里有治外法权，中国商人正利用这类外国船只不付‘过境税’。而杨森的关卡人员则到所有这类船上去搜中国货。”

杨森向朱德信誓旦旦，说他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可是必须有钱发饷。国民党可以给他多少钱？最后，他大胆地提出，莫斯科正在资助国民革命运动。

朱德说明他并没有带钱来，而且莫斯科也没有资助国民革命运动，杨森还认为他是在讨价还价。

“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必然得胜，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朱德告诉他说。

杨森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一旁观望究竟哪一方得胜。一天又一天，朱德跟他谈国民革命运动；一天又一天，革命胜利的消息纷至沓来。北伐军胜利前进，有几十万、几百万揭竿而起的农民和工人为它开路。经过一场徒然无用的战斗，唐生智——吴佩孚在湖南的部属——投到国民党方面。在北方，两年前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将军带着他的国民军，与北方军阀作战。冯将军原来信了基督教，教会人士引以为荣，称他为“基督将军”。可是，等他参加了国民党，教会人士和其他外国人又轻蔑地称他为“所谓基督将军”了。

华南兴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新闻要比当地小军阀倒戈——杨森早就知道他们各有打算——的消息更使杨森不安。农民协会象烈火燎原一样席卷了南方，赤脚的农民用沾着泥巴的大手正把地主赶往大城市，工人们也打击地主，把他们赶往长江上游和下游。这些事情就够那些军阀害怕的了，因为他们都是大地主。

杨森总算未派部队去帮助他的盟友吴佩孚。到了九月初，武汉大罢工的消息传来了。工人们挺身战斗并且牺牲了，但革

命军跨过了长江，占领了汉口和汉阳，包围了武昌城，而且不久也拿了下来。以“铁军”著称的第四军在武昌和华南其他城市的城墙上写下了该军的番号，其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叶挺，出任汉口卫戍司令，并且把工人武装起来。铁军中其他军官的名字，不论是高级军官或低级军官，如贺龙、林彪^①、陈毅和聂荣臻，以及政治工作领导人的名字，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工人和农民中已经家喻户晓了。

甚至在铁军拿下武汉以后，杨森还在踌躇不决，朱德不久就找到了原因。从湖南和武汉逃出来的地主和实业家到了他的司令部。带来北伐军内部发生大规模冲突的传说。他们对杨森说，北伐军里有许多军官本身就是地主或地主的子弟，有的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参加北伐，并不是想叫一辈子不穿鞋、不识字、散漫的农民来抢夺和没收他们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农民协会在各地成立，接收村庄，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没收并分了土地。国民政府反对这样做，可是农民却充耳不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为农民协会和工会问题与共产党员和激进的国民党员闹意见，还要求取消军队里的政治部。

杨森听说，军队中设“政治工作人员”，是从俄国输入的办法，一切麻烦事都由此而出。他们向士兵灌输各式各样的东西，鼓动他们的政治热情，又散布到农村中协助农民组织农会。他们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煽动人们破坏社会秩

^① 林彪后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后，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议，将林彪永远开除出党。——译注

序，弄得士兵、农民和工人都觉得自己同上流人一样，应该享有各种“权利”。

最糟糕的是，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是妇女和姑娘，她们把头发剪短了，穿起军装，跟男人一模一样。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咄咄怪事，出自名门的女学生居然与大兵们混在一起，宣传“过激思想。”

可是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国民革命军内部冲突迭起，四分五裂，蒋介石正要求停止与苏联合作，并把内部分裂的责任推到苏联顾问的身上。孙中山提出了三大政策：联共、联俄、扶助农工。可是，这些地主报告说，国民党大部分“有地位的”领导人都反对这三项政策；这种政策的取消，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整个革命运动就要烟消云散，法律和秩序就可以恢复了。

就在这紧急时分，朱将军说，一艘英国轮船溯长江而上，停泊在万县江面上，杨森的关卡人员照例登船检查。当关卡的船只靠近时，轮船上竟发射过来一排子弹。关卡的船被击沉，船上的人都被打死了。

杨森大怒，命令部队占领该轮船。经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死了不少人，才完成这项任务。从这次事件发生时起，朱德和杨森始终是并肩战斗，朱德出主意，杨森照办。

善后谈判开始了，可是，正在进行之际，两艘英国炮艇溯江而上驶，打算用武力夺回那艘轮船。它们遇到抵抗后，就把炮口对准万县，一下子炮轰了两个钟头。杨森的地面炮队也还击了。两个钟头的炮轰一共打死五千名中国人，万县成了一片火海。英国人于是抢过那艘轮船，把中国兵抛在江里，启碇开行。

“万县事件”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声明，抗议英国的暴行，各人民团体也采取同样行动，共产党还发表了一篇《宣言》，历数英国的罪行。

从他多年来收集和保存的历史文件中，朱德取出了印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一页有折痕的纸。《宣言》有一段这样写着：

英国早先就有过多次挑衅行为。上海、汉口和广州的大屠杀不算在内，光只从北伐战争开始，英国军队就在广西梧州登陆，逮捕从事抵制英货运动的中国人。……北伐军到达武汉，英国炮艇公然支持吴佩孚，炮击我军。……九月四日，英国炮艇在广州港抛锚，逮捕中国工人纠察队，扣留私人船只，强行运送英货进城……“万县事件”是对中国的第四次干涉行动。

英帝国主义不但使用一切手段来扰乱北伐军的后方，而且还采取各种办法来支持被打败了的吴佩孚。为了使北方的军阀能存在下去，并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英帝国主义给了吴佩孚一千万美元的现款和两千万发子弹。在支持孙将军的同时，它还建议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早已开到广州。

《宣言》在结尾部分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摧毁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并给予北伐军以一致的和坚决的支持。

朱将军说，“万县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迫使杨森投入了革命阵营。大火扑灭，尸体掩埋以后，杨森派朱德到汉口表示要效忠国民革命军。

到汉口时，朱德看到了长江江心中的英国战舰，它们的

威胁性炮口对准着武汉三镇。与此同时，在英国租界工事后面的英国兵，死盯着学生和工人的游行队伍，只见他们伸起拳头高呼口号：“为万县复仇！抵制英货！收回租界！铲除英帝国主义！”

汉口成了群情激昂的大火炉。希望和决心夹杂着愤恨，人民是无所畏惧的。一千名工人经过训练，武装起来，维持秩序，其他没有武装的成千上万的人则抵制英货。不时有工人和学生排成长长的队伍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旗，唱着歌高呼着口号。

朱将军看着他们，感受到气氛的沉重。他回想起辛亥革命，那时似乎全世界都变得年轻起来，充满了新的活力，中国青年甚至认为可以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他原以为这次革命不同于前次，因为这次革命是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的。可是，他在往来于武汉三镇时，不断听到流言蜚语，在这里听到一种传说，在那里又从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出卖革命的幽灵又在他心中游荡，使他感到异常苦恼。他知道，旧军阀永远是危险分子，而现在，新军阀似乎就要在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

他自己出身于农民家庭，自然注意农民运动，这运动已象一股洪流在华南进发出来，配合着襁褓中的工人运动，这就吓坏了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他们有的人本身就是地主，有的人则出身于地主家庭，或者是出身于商人和买办家庭。

朱将军回想起他读过毛泽东所写的几篇有关农民运动的论文。不久之后，毛泽东便成了朱德的知心朋友，两个人的生活互相交织在一起，以致多年之中，一般人都把他们当作一个人看

待，而称之为“朱毛”。

毛泽东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曾在辛亥革命中当过兵作过战，五四运动时在家乡湖南省起过重要作用，他在湖南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后来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次大会上成立的。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曾经当过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评论家和诗人，并且在一九二五年为湖南的第一个地下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他曾参加过孙中山在广东的政府，在那里创办起第一个培训农民领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农民运动渗入了邻省湖南，在广东农民兄弟的鼓舞下，湖南逐渐出现了农民协会和武装的农民自卫团。在北伐前后，地主和当地军阀用封建制度中各种最为野蛮的办法进行镇压。曾经有过多少次激烈战斗，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有些农民组织者和领袖被秘密绑架和砍头，地主们还经常把土匪从山上请来，在黑夜里杀人放火。

北伐从广东发展到湖南，队伍一临境，农民就起来解除地主民团的武装，占领村庄，把地主赶跑。国民党虽有土地改革计划——减租和取消高利贷——许多农民协会还是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就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一样。朱将军到武汉时，已经有两百万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连同家属，他们代表了至少一千万农民，或相当于全省的一半农村人口。

读到毛泽东所写的关于这次大规模起义的文章，朱将军大致看清了将来可能出现的灾难的轮廓。农民运动跟工会一样，遇到的强烈抵抗不仅来自旧的社会力量，而且来自革命军里面的

许多高级军官，包括总司令蒋介石；在许多地方，国民党右翼领导人已经开始逮捕和监禁农民领袖。

铁军——第四军——占领武汉、当地工人群起协助它前进的时候，这问题到了必须摊牌的阶段。当时，三十万产业工人——相当于三镇全部工人的一半——已由共产党组成了工会。国民党必须有所抉择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使得革命胜利在望，但也因此而威胁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国民政府正从广州向汉口迁移。指导政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则已先期到达，它的主要委员和蒋介石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而蒋介石当时的要求是，群众运动即使不能立即取缔，也要严加限制。

蒋介石对于国民党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军队里的政治部——国民党对军人实行监督的政治力量，对于蒋介石和许多其他将领犹如芒刺在背。军队里的政治委员有些象副司令员，有权批准或否决军事命令。这制度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而建立的，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军阀的兴起，因为过去常有个别将领利用军队为其私人财产，而变成军阀。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有责任在一般科目上教育部队，而且还要讲解革命的纲领、政策和目标。政治工作人员还要动员农民和工人支援北伐，这就唤起了威胁封建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军内军外，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员。

蒋介石因此要求取缔群众运动或“限制其发展”，军队里的政治部必须全部取消，朱将军听说，那是因为蒋介石嫌它干涉军事命令。蒋介石还认为，群众运动，加上政治委员制度，再加上共产党，都是苏联传来的，与中国国情不合。他因此特

别指出，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是万恶之源，是他的主要敌人。他还认为，在鲍罗廷后面隐藏着共产国际——而他一度曾赞誉共产国际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那时候，革命军各个司令部都有苏联顾问。对于他们，朱德不论在当时或者以后的日子里，都不太强调。他在当时没有见到过任何苏联顾问；甚至在以后，他也只远远地看到过和蒋介石在一起的两个苏联顾问。那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时代，新老军阀交替上台，他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玩弄阴谋和权术。将军倒戈的事层出不穷。朱德还隐约地听到关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之间有矛盾的传说，甚至还听说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主要是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一个要求在武汉提出来了——朱德也支持这要求，工人和农民应该武装起来，挽救革命，免得从内部被出卖。朱德不知道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但在鲍罗廷支持下的中共领导人拒绝武装工人和农民，说这种行动会分裂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他们怕分裂之势一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又占到上风。

不管共产国际有过什么建议，朱将军是支持武装群众的要求的。谈起中国历史上这段混乱时期，他把问题集中在土地和农民运动上，认为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朱德是千千万万认为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人之一。朱德懂得，不论俄国人作出什么样的建议，革命总不是靠俄国人来策划的。在他向我叙述他的生平的多次谈话中，他不只一次地声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并不是俄国人策划的，同样，一九一三和一九一五年的革命高潮也不是俄国人策划的。俄国人确曾援助中国，那就是把斗争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可是蒋介石在事实上并

不反对外国建议，甚至由外国来干涉中国事务，他在后来的行径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希望是“外国人代表他和他的阶级来进行干涉”。

朱德在一九二六年冬天到达武汉，有一项特别任务须要完成。他曾被派到四川去中立杨森的军队，或者拉它过来参加全国性的斗争。他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现在特来要求允许那支军队参加国民革命。他因此打算见蒋介石，但发现这位总司令“正忙于自己的阴谋”，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朱德去见老朋友、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他那里才知道蒋介石不但要求压制群众运动，而且坚持自己的军事战略，反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战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坚持应该继续北伐，直到打倒和接管北洋军阀政府。占领北京以后，恢复上海这个外国帝国主义的据点，也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则坚持先占上海，然后继续北伐。

蒋介石的战略是个“阴谋”，朱将军说，上海是他的老窝，他曾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据点当过交易所赌徒，并且参加过地下的青帮，青帮的老头子们个个富有，他们贩卖鸦片和人口，干尽各式各样的罪恶勾当。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外国和本国资本的中间人、掮客。地主和官僚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他们一变而为富商、工厂老板、银行家和外商工厂代理人，替它们搜罗受多年合同束缚的工人。这些买办和他们的外国主子，再加上为买办和外国帝国主义服务的青帮，就是蒋介石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

与邓演达畅谈到这些潜伏着危险的暗流后，朱德觉得以往

有过的悲观情绪似乎又向他袭来。在这种失望的不安中，他象一个溺水的人一样，伸出手去用力抓紧他在欧洲学到的社会革命理论。他对自己说，中国人自己就能拯救中国，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虽然它有革命理论作指导，但不可否认它还年轻，缺乏经验，而且被当时轻易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中国的广大人海中，它不过只有五万党员。共青团的人则更少，实在没有时间去训练他们。

他痛心地说，共产党领导人只是因为国民党当权，便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匍匐前进，而从不想到在基本的革命问题上，争取自己的领导权。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杰作，这个人不了解土地问题和土地革命。朱德还说，陈独秀曾一再压制毛泽东提出的“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要求。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甚至拒绝将毛泽东的土地计划交付讨论。

朱德显然不理睬俄国顾问对陈独秀的影响，他坚持他的论点，即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

朱德在当时地位还不重要。他还有事要做。即或这件事可能做不成，但他却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一定要做到底。邓演达不但同意杨森的军队参加到国民党这一方，而且命令朱德挑选一批约三四十人的政治工作人员，带他们回四川，在杨森的军队里建立政治委员制度。

朱将军带着这批政治工作人员动身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又战胜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顺流而下去执行他的占领南京和上

海的计划。朱将军回到万县，立刻到杨森的司令部，交出同意他的军队参加到国民党一方、并委派朱德为国民党正式代表——政治委员——的证书。杨森看到朱德的四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等到听说这些人是来按三民主义的原则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

“钱呢？”四顾无人后，杨森向朱德问道。朱德微笑说，没有钱，国民党正在进行革命战争，而且杨森所收的税也足够维持他自己的军队了。

一场争钱的冗长辩论又开始了，朱德再一次解释革命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并且说，他和他的部下，跟所有其他的国民党军人一样，并不拿饷，只有些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这时，杨森又接到国民党政府的一道命令，要他调兵去打吴佩孚，协助铁军把吴佩孚赶出湖北省。当天晚上，杨森和朱德又辩论了通宵。

至于那些政治工作人员，杨森宣称，他看不出在他的军队里有丝毫用处。他的士兵不需要政治教育；道理很简单，士兵的职责就是接受命令，战死沙场；这些文质彬彬的人，和士兵谈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侈谈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谈论，只能惹出抗命或公开叛乱的事，别无其他效果。而且他也不打算允许农民协会和工会象在华南一样惹事生非。

“从汉口来了军事命令，”朱将军说，“要我必须在政治工作人员问题上，以及我所不能确定应否执行的军事命令上，都作出让步。杨森终于准许我的政治工作人员在他的军事训练团——专门训练低级军官的机构——里教课，但除了民族主义

外，其他一概不准讲授。他们不能讲孙中山的其他主义，也不能讲他的政策。

“我作了这样的让步以后，他又找借口说他不能够调动部队帮铁军赶吴佩孚出湖北。他最后才调一师人到宜昌附近，却按兵不动。虽然吴佩孚在那里的守军很弱，只要几口唾沫就可以把他们冲到江里，可是杨森连唾沫都不愿吐，反而向我诉苦，说吴佩孚是他的老朋友，曾经帮助他在四川站稳了阵脚；谁也不能打好朋友啊！”

深知军阀行动无常，朱德找了一位已经与他建立友情的参谋，和他深谈多次，这才知道原来在朱德去武汉的时候，杨森和吴佩孚的代表曾经开过秘密会议。又过几天，这位参谋在晚间悄悄地来到朱德的住处，要他不要掌灯，只仔细听他讲。他说，杨森已经同意把赌注再次押在吴佩孚身上，同他一起向武汉三镇进军。作为这个步骤的前奏，他还决定先把朱德及其全部政治工作人员杀掉。

没等到天亮，朱德就把他的政治工作人员带出万县，穿过山路直奔武汉。十天以后，他们到达国民政府所在地，朱德打了一封电报给杨森：

“兹警告，如敢与我为敌，必将全部消灭你们。”

可是杨森并不真想与任何人为敌，更不愿意与那支曾经在华南各城市的墙上写下自己番号的部队作战。铁军立刻向军阀吴佩孚开火，把他赶出湖北，湖南也打了一场大仗，吴佩孚损失甚大，从此挺不起腰来。杨森并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帮助他的“老朋友”，只是掉转尾巴，逃回到他一向在那里刮地皮的四川。

其后，在混乱的几个月中，铁军回到武汉三镇，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汉口国民政府垮台，而且有许多政府高级官员暗中顺流而下，投进蒋介石的阵营。杨森也和蒋介石联成一气，眼看着武汉政府逐渐解体，便强占了湖北省几处村镇。他从一个村搜到另一个村，象一头瘦弱贪婪的豹子，凡是农民协会的农民，凡是工会的工人，凡是剪了发的妇女，见一个便杀一个。农民的头颅高悬在坚不可屈的村庄的高竿上，男人和妇女被活埋在山岗中，老百姓家被洗劫一空，晚间，到处都有憧憬自由的农民离乡背井的脚步声。在这次大屠杀中，杨森毫无损失，因为民众还没有武装起来，而铁军则远在江西省，正在为革命而战斗。

第十六章

铁军是朱德所热爱的部队，他总是带着感情提到它。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北伐军离开广州北上时，它只有六万人，到达武汉后，已经增加到二十万人。铁军——第四军——离开广州时拥有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但年底在汉口整编时，已发展到三个军，四十万人。

成千上万投附北伐军的新兵，是打败后投降过来的旧军阀部队。这就说明蒋介石的部队在占领南京以后，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外国人被抢被杀的事件。但是，铁军的新兵是农民和工人，朱将军称他们为“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或暴动分子。到了武汉以后，更有成千上万的印刷工人、矿工以及汉阳兵工厂和其他厂矿的熟练工人参加到队伍里来。

在国民党军队里，铁军是最有阶级觉悟、最有训练和纪律的队伍。早在创建时期，它在广州招募的人

员就大多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产业工人；大部分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拥护者。黄埔的政治部人员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在用政治信念武装起来的铁军面前，敌人土崩瓦解，工人和农民在它的号召下，纷纷起义，从而在封建地主和军阀内部造成了混乱和恐惧。

铁军的总司令是张发奎，一九二六年年底在武汉整编以后，它的一个军（第四军）由张发奎的部下黄琪翔任军长，另外的两个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都由共产党员叶挺将军和贺龙将军率领。①

叶挺出身于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深谋远虑，寡言少语，在他的要求下，他家曾送他出国研究物理和化学。叶挺后来为参加革命，放弃了他的科学事业，回国投奔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二年，他曾经从一个在英国煽动下打算推翻广州共和政府的军阀手中救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命。黄埔军校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后，叶挺也参加了工作，并在北伐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在铁军担任指挥官。②

另一名共产党员军长贺龙，是中国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只要一提及他的名字，他的朋友和同志在嘴边总会挂上笑容。在军阀时代，贺龙是个穷苦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他觉得既然差不多人人都当了军阀，自己也最好走这条路。但他这种军阀主义与众不同，他把象他自己一样贫苦的农民组织成一支队伍，

①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的部队是独立团，占领武昌后，扩大为第二十四师，直到南昌起义后，才扩大为第十一军。——译注

② 叶挺，广东惠阳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叶挺于一九二五年留学苏联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校注

专门对付湘西的地主，因此而获得了“土匪”称号。

他一家人似乎生来就是个“永动机”。就连他的大姐——一个大脚妇女，几乎有他那么高，并且在地主家做过苦工——也带领着他的一部分队伍。在三十年代，她在带队作战时阵亡，死时手中还抓着一杆枪，年四十八岁。

贺龙是农民秘密组织哥老会的会员，据说已经到了最高的双龙头地位。青年时代，他很象个太平天国人物和古时某些中亚细亚酋长的混合体，甚至四十岁过后，从头到脚都还象个双龙头。他又高又壮，人、鬼、猛兽一概不怕，所以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他还有个怪脾气，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

“哈，我来了！”

关于他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他的队伍和朋友们能够坐在他旁边几个钟头不动，听他谈他的趣味盎然、出神入化的冒险故事。看他在小麦地里踏着步子走过，就如同看一头豹子在跳动。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

“我数不过来！”

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建立广州革命政府的时候，贺龙把他自己和他的队伍交给孙中山指挥，并且立刻申请参加共产党，但遭到拒绝。北伐的时候，他是铁军旅长，到一九二六年年尾，提升为第二十军军长。他一再申请参加共产党，党也一再予以驳回，直到他申请了十次之后，党有些不胜其烦，觉得与

其说使他服从不如说使他遵守纪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接受他入党。①几百名武汉工人被派到他的军里，从政治上训练他的农民队伍。在汉口时，他接纳了几百名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这些农民在著名的农民领袖、知识分子和地主之子彭湃的领导下，长途跋涉而来，参加铁军。

彭湃也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东江地区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者，他把自己家的土地没收分配给农民后，开始土地革命。这一行动使得全家都以为他疯了。他们把他锁在家里，可是这青年在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下，逃了出来，继续组织运动。三十年代初，他终于在上海被蒋介石抓到后处死。

朱将军和他的四十名政治工作人员逃离杨森的军队到达武汉时，正值铁军整编竣事，准备把军阀吴佩孚的雇佣兵赶出湖北省。这时，据他说，全军大约有三成士兵是共产党员，而且具有全面渗透作用的政治教育还在吸引另外的人入党。他原来希望在铁军内带兵，本来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国民政府却委派他出任一个新设的军官教育团的主任。这教育团是他的旧部滇军刚刚在长江中游的江西省会南昌创办的。滇军原已改名为第三军，其后又被蒋介石改名为第五路军，由朱培德统率。朱培德当时还听命于汉口国民政府，但非常倾向于蒋介石的政策。因为这支军队警卫着江西全省，并且在南昌开办教育团，汉口政府因此派朱德前往加强学员的政治训练，以便由他掌握。

这个新设的军官教育团的一千三百名学员都是班长、排长和连长等，经过八个月训练，将在南昌警备部队服务，保护

① 贺龙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校注

群众运动，免受国民党右翼的破坏。朱德因此自然而然地出任了南昌警备司令。另外，为了统一管理所有的治安机构，政府还派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除此以外，朱德还奉令创办并负责一个训练南昌四百名警察的警官教导团，来保护群众运动。由于负责这么多职务，朱德还成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

正是因为革命运动中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手太少，不足应付全国需要，每一个被派到南昌军官教育团的年轻的黄埔学员必须一人做三人的事。一面在教育团教课，一面还要在警官教导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这些学员里面，有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也是国民党左翼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抓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

南昌的反动派数量很少，但政治力量很强，因为他们都是高级军官、官员、富商及大实业家——这些人的多数同时也是地主。在有关群众运动问题的内部纠纷越来越多时，这些人也就宁愿迁就蒋介石而不愿意再接受汉口国民政府的领导。作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朱德能够听到他们在酝酿中的计划，他们始终坚持要压制农民协会和工会，要不然就限制它们只能在支援军事行动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对于这种主张，朱德表示反对。他们特别反对农民讲习所，所里大约有六百名自全省各地抽调来的农民——也有一些妇女，经过训练后回去当农民领袖。

朱德所负责的教育机构按照孙中山先生生前规定的政治科目来教课：怎样做群众组织工作，三大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历史，以及中国和世界的简史和地理。军官教育团的主要课程集中在军事科目上，另外两个则以政治科目为主，附加些军事

训练。农民所接受的则着重于组织群众的方法。

朱德说，在南昌的时候，他连想个人问题的时间都没有。从黎明到午夜，都忙于处理军官教育团和警官教导团的行政工作，检查农民讲习所的讲课。遇有节日，他必须去讲演，每逢星期一早晨，还要到军官教育团主持中山纪念周。不仅国民党的许多会议，他觉得必须参加，而且还有共产党的会议，要解决诸如工人和学生的特别学习小组的组织与管理问题。

许多次共产党会议是在农民讲习所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的，该所所长是方志敏。他是中国最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农民领袖之一，一个受过教育的机械工程师，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他也是领导人，其后参加了共产党。朱德说他高大、健壮，大约三十岁，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讲演，但在会议上却口若悬河。

在全国五万名共产党员和三万五千名共青团员中，大约有一千人在南昌及其近郊。其中一部分是学生，其余则是铁路、码头、航运和瓷窑工人。党的中央理论刊物仍然是《向导》，朱德最初是在德国见到的，现在则不常有空闲去读。地方党支部也各自出版小报、小册子和书籍，组织读书会和学校。

国民党右翼分子建立了秘密组织，在南昌就有个中山俱乐部。自从孙先生逝世以后，那些在他生前背弃了他的政策的人，反而发现他的名字可利用作招牌。在南昌的国民党右翼中山俱乐部很快就变成反革命的秘密总参谋部。在一九二七年年年初以前，它的会员一向不敢抛头露面公开活动。那年年初，蒋介石进兵南京和上海后，开始镇压农民协会和工会。驻扎江西的滇军于是起而效尤，杀害许多工人和农民领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南昌反动势力第一次暴露自己，他

们花钱雇用歹徒，手持木棒和铁棍袭击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厅内和门前大街上展开了一场混战。朱德抓了一批歹徒，他们承认是遵照中山俱乐部会员的指示行事的。

这次事件之后一个月，四川传来消息说，军阀刘湘在川南镇压了一次革命起义，用最野蛮的办法杀害了几千名进步人士。朱德的两个侄子也遇害。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其后以“独眼龙将军”闻名于世的刘伯承，他原是川军将领，参加革命后，成为共产党员。朱德与刘伯承曾在万县会过面，并且派刘伯承到川南组织群众支援革命。朱德对这次会见记得很清楚，因为刘伯承一头冲进他的办公室，把共产党的证件往桌上一抛，走过来就在他背上给了他一巴掌，几乎把他打倒地上。

“记得我吗？”刘伯承叫道。“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我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

“刘伯承这个人一时一刻都不能站稳坐稳，”朱将军说。

“他对我讲他怎样放弃军阀生活追随孙中山，又怎样成为共产党员。我们谈了个通宵，彼此述说怎样经过长期的探索而终于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来找我，想在杨森的军队里工作；我派他去川南，拿着我给我妻子和朋友的信，在那里组织革命力量反抗刘湘。这个人有组织和领导的天才。没几个月，他就把四川南部的进步力量全部组织起来，并且领导他们举行了一次反对军阀的暴动。刘湘派来强大的部队打败了他，杀死好几千人，其中也有我的两个侄子，他们是从大湾去找刘伯承的。刘伯承只身逃出来，设法到了汉口，再转到南昌。”

就在这革命发生分化和恐怖日增的黑暗时期，一支特派的

英国远征军伙同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蒋介石的军队也正在向上海集结。二月十九日，在他们登陆三天之后，上海工人展开了三次大罢工中的第一次罢工^①——三次都是由周恩来组织的。控制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出尽全力打击第一、第二两次罢工，镇压下去以后，特意砍了几百人的头，以儆效尤。

工人们并未气馁，举行了第三次罢工。三月下旬，整个上海陷于瘫痪，这时，蒋介石的军队接近上海。工人们以三百名手枪队为前锋，捣毁了警察局、卫戍司令部，最后还冲进了兵工厂。有了缴获的武器，他们就展开战斗，把孙传芳的部队赶出了上海地区，并派出代表团欢迎蒋介石到上海。

作者本人就有一个朋友是代表团成员。他是个铁路工程师，参加过攻打北站和铁路沿线孙传芳方面白俄军团的工人武装队伍。他连续打了一夜又一天，直到这批雇佣兵抱头鼠窜而逃。作为欢迎蒋介石军队的代表团的一员，他高兴万分。可是到了国民军前沿部队——广西部队——的司令部，所受的待遇十分冷淡，又使他和他的同伴感到茫然和惊愕。

“会见我们的那几个军官听我宣读欢迎词，他们眼盯着我们，不发一言，”他说。“我们早就听到过蒋介石军队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内镇压工人运动的传闻，可是总以为这是个别将领的举动。我们以为这是反动分子散布谣言，企图分裂统一战线。我们曾经作战，而且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哪知蒋介石的军官们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我们向总工会汇报时，人人都

^① 这次是第二次大罢工。——校注

感到恐慌，可是我们手里还有枪，估计他们不会对我们采取敌对的行动。”

两天过后，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的另一支部队攻入南京，将数千名敌军赶出城外。敌军边逃边抢劫，而蒋介石的军队大部分是从军阀那边过来的，也大抢起来。兵荒马乱之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以及外国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有六名外国人被杀，十二名受伤。

英国和美国的炮艇立即向南京开火，直到骚乱平息后才停止轰击，然后又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护送外国侨民到炮艇上。这次事件中，有数百名中国人死亡。

— 这次“南京事件”几乎酿成国际武装干涉，是促使蒋介石终于转向反革命的众多因素之一。蒋介石早就打定了主意，到了这时，便将“南京事件”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并说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应对这次事件负责。外国人对于这种说法极表欢迎，可是他们和蒋介石忽视了一个事实：几乎完全由共产党员控制的铁军是全国最有纪律的部队，从来没有打家劫舍，也不曾殴打外国人。

朱德将军在叙述“南京事件”和上海大罢工以后出现的悲剧时，这样说道：

南京事件刚起，蒋介石就坐船到了南京，他不但没有进城安定秩序，反而立刻换了一只船去上海；到了上海，他立即要求工人缴出武器，解散纠察队，停止罢工，回到工厂去。工人们这时才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表示拒绝。武汉国民政府刚刚发布命令，宣称从今以后军事力量应当隶属于政权。上海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工人们宣布，他们将只接受这

个政府的命令，而这个政府又将接受武汉政府的命令。

工人们得知，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中国的银行家、工厂老板和地下的青帮举行秘密会议，而青帮的人则不断往来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之间。蒋介石与解放了上海的革命力量反而没有什么接触，只是严令他们回到原来受奴役的地位。

青帮拥有成千上万的暴徒、鸦片贩子、小偷、拆白党和职业骗子，与外国人和中国反动派都有联系，工人们和其他革命力量对青帮恨之入骨。

朱将军说，这时，反对革命的国际阴谋网从世界上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伸向上海，外国人已经声明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个大好人。“外国人一手抚诱蒋介石，另一手则以国际武装干涉相威胁。”

蒋介石的方针早就定了，只是到后来才真相大白。中国银行家在外国人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出一笔贷款，并且保证，如果他与革命斩断关系，建立他的军事独裁政权，外国可以承认它。这笔贷款的数字传说不一，据估计有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美元。不过作者到一九四九年才从最可靠的外国方面获悉，这笔贷款实际上是六千万中国银元。

贷款的条件是蒋介石不但应该与武汉国民政府断绝关系，还要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把他们驱回工厂，打垮共产党，废除国民党和苏联的盟约。这项阴谋的内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完全被人揭露。朱德在一九三七年与我谈话时，确信外国曾预谋此事。可是没有确实证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所有人和总编辑约翰·鲍威尔发表了他的自传《我在中国二十五年》，里面就明确地揭露了外国参

与的事实。

蒋介石知道不能依靠他的军队里的普通士兵来镇压上海工人。他只能依靠地下的青帮，可是青帮没有足够的武器和军火来完成这项任务。鲍威尔写道，青帮头子和法租界工部局获得了公共租界总董、美国人费森登的积极帮助。青帮又得到五千支步枪和弹药，以及进攻闸北区工人时穿过公共租界的权利，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指挥部就设在闸北。

在青帮开始杀人放火之后，蒋介石的满腹狐疑的军队才被告知说，工人正在暴动和杀人，他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恢复法律和秩序。

四月十二日午夜，几千名武装的青帮分子从容不迫地穿过公共租界进入闸北。警卫在闸北和公共租界之间的外国军队悄悄地打开了交通栏栅，大屠杀于是开始了。他们首先进攻上海总工会，主要工人领袖都睡在那里，全部被杀。此后，屠杀扩及闸北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外国警察和暗探在租界里到处搜人，只要搜索到，便交到暴徒手里。

在夜幕的掩盖下，蒋介石的军队奉令“镇压工人的暴动和屠杀行为，恢复法律和秩序”。三天之后，大约有五千名工人、国民党左翼分子、共产党员和无党派知识分子被杀害。朱德的老朋友孙炳文，也在被杀之列。大罢工的组织者周恩来被抓了起来，交给广西军的一个部队，那部队把他放了。^①

大屠杀过后，蒋介石指定一个青帮头子出任新改组的总工会的书记。这个人后来又当了蒋介石军队的政治部主任。青帮

^① 周恩来同志这次被捕是讹传。——校注

分子还编成班组，陆续被派到农村和长江下游各城镇，重演屠杀惨剧。

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且将他撤职；蒋介石反而组织了自己的国民党，自立为主席，在南京建立起军事政权。他拿到了那笔贷款，可是直到两年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才再度给他贷款，承认他的政权，并且派出许多顾问到他政府的各个部门进行监视。外国人要他看钱办事，而且要努力办事，他们只是在他确实有了“诚意”——亦即完全摧毁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之后，才承认他是中国的统治者。

蒋介石在新老军阀中间一下子就红起来了。新老军阀开始参加国民党，进入蒋介石的政府。许多在汉口的国民党左翼分子开始溜到南京，有的在最后投靠之前先到上海思量一番。山西省的中世纪式军阀阎锡山被任命为北方革命军的总司令，后来又做了蒋政权的国防部长。一九二七年年底以前，蒋介石已经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北京军阀张作霖沆瀣一气，宣称取缔“共产主义”——他们所指的乃是大革命以后从人民群众中迸发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北京的张作霖用逮捕并屠杀几百名进步人士的方式来庆祝这一新的同盟，被害者还有女学生，罪名是衣袖不及手腕，仅及臂肘，有伤风化。

朱德听到了他连想也想不到的上海大屠杀的消息，深感震惊。他说，刘湘在四川杀人，他并不奇怪，可是上海毕竟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啊！其实，上海也是中国买办资本主义的中心，有着一具资本主义的躯壳和屈服于外国银行资本的灵魂。

“其后十年里，”朱将军说，“原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资产阶级却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结成了同盟。他们把蒋介石奉若神明，出卖革命，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上海大屠杀事件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没有参加。国民党领导人曾列席会议并致词，其中就有刚从欧洲回来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可是，他在动身去汉口之前，却在上海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到汉口之后，他立刻召集他的左翼国民党员秘密开会，会上批准了他和蒋介石的协定。

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言，承认过去对于群众运动看法的错误，可是他依然阻挠讨论毛泽东的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主张。就是在大会之后，朱将军说，共产党也不曾武装工农，反而跟在左翼国民党领导人后面，认为如此可以避免最后与国民党分裂。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月和七月整整三个月里，反动派的屠杀使血流成河。成千上万反抗的湖南农民，千百名反抗的广州工人，象猪仔一样被杀害。在江西的滇军——朱德还是该军军官教育团的负责人——屠杀工人和农民，并把起而反抗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境或杀害。

反革命在全国汇成巨流之时，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威胁汉口的军队之间，都谨慎地避免打第一枪。“基督将军”冯玉祥现在在两股力量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和蒋介石达成了秘密协议，要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镇压下去，把苏联顾问遣送回国；国民党左翼领导人如果同意这样做，就让他们出国“休养”。汪精卫赞成这一建议，但始终认为蒋介石是

暴发户，只有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与蒋介石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他把他所认为的心腹部队铁军，派往长江中游的赣北。唐生智的部分队伍也沿江下移，其余的队伍则留在武汉，分别占据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的办公处作为它们的司令部。

回想起在很久以前发生的这一场悲剧，朱德将军凝视着我的屋子的阴暗处，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沙哑。

“左翼政客和军人不但不转向工农来反对由上海大屠杀开始的反革命，反而镇压起群众运动来了。武汉政府本是和群众运动血肉相联的，到了七月中，它军国主义化了。失去了群众支持，汪精卫和他的左翼集团只能在汉口虚张声势，好象空葫芦里装上几粒炒豆。他们利用铁军摆出与蒋介石对抗的阵势，而那些初露头角而且大喊大叫的政客却悄悄地溜到南京和上海。财政部长宋子文去了。孔祥熙和孙科早就在上海。左翼和右翼国民党员都自称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而事实上，真正作为孙中山的发言人的，却是他的未亡人宋庆龄，她对两个派别都加谴责。宋庆龄指责那些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的人。她说，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下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就已经倡导农民革命了。她说，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先生最初发动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镇压群众运动是对民族的背叛，她相信，已站在革命旗帜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将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孙夫人和一批真正忠于孙先生的主义的国民党领导人逃亡到欧洲去了。其中有陈友仁，不过他是汪精卫系统的人。几个月后，汪精卫本人也去欧洲了。不久，汪、陈及其随行人员

又回到中国，从事夺权斗争。汪精卫终于与蒋介石合作，可是还跟他继续争权。到了这阶段，两个人在政治方面已经没有差别。蒋介石因为掌有军权，所以占了上风。

“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大革命结束了。左翼革命分子连同苏联顾问都逃亡了，血流成河，将军倒戈，到处兵荒马乱。蒋介石掌了权，他把新旧军阀都拉了过去，让他们互相牵制，自己始终居于举足轻重的权力中心的地位。跟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权在握的情形一样，蒋介石由外国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混合力量支持上台。蒋介石和袁世凯毫无不同，也被外国人称为爱国者、政治家、行政人才和统一中国的最有力人物。”

蒋介石至少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一个教训。袁世凯仅仅是请求外国人代他祈祷，蒋介石却立刻加入了教会。他还撇掉妻子和姨太太而与孙中山夫人和孔祥熙夫人的妹妹宋美龄结了婚。朱德将军评论说，蒋介石的这些办法都是“狡猾的战略”。做了基督教徒，“基督教会的宣传机构便完全支持他”，与宋氏姊妹之一结婚，他就坐在中国最富有的两大家族——宋家和孔家——的膝头上了。

这个“狡猾的战略”也是为了要把孙夫人作为他的大姨，而接过孙中山的合法衣钵。可是这个阴谋锁链的最后一环拒绝陷入圈套——孙夫人自动离开了中国舞台，以免她的亡夫的名字被利用为反革命的外衣。蒋介石还以姻亲关系的名义致电给她，要她从欧洲回国“检点她的行为”，这电报被她撂在一边了。

第六篇 土地革命开始

第十七章

宋庆龄在致国民党的历史性声明中，揭示了中国问题的核心：

“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志忠于这种信心。”^①

可是国民党已经出卖了群众。每一个大城市和内地无数的村镇已经染满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鲜血。反动派狂呼着“共产主义”，其行动就是屠杀那些内心已经燃起伟大希望的穷人。中国共产党的确鼓舞、组织并且领导了这些人，因为它就是穷人的党。

伟大的希望幻灭了，这个党目前面临的是战斗或投降两条道路。多年以前，在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太平军领导人石达开曾经被迫面对同样的抉择，并且说

^① 见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

道：

“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我们打！”

共产党人深知历史绝不会重演，所以决定：以战斗求生存。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朱德将军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离南昌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去参加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当天傍晚，他进入一间大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已会聚在那里。环顾四周，他看到许多已经见过面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闻名已久而从未见过面的。从上海死里逃生的周恩来在那里，大家都称他为“铁人”。从四川绝处逢生的刘伯承也在那里。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武汉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农民部长谭平山。铁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的军长和参谋长以及政治工作领导人都到齐了——这些在后来创造历史的人物有：叶挺、贺龙、叶剑英、李立三和林祖涵。林祖涵曾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信徒之一。

有些人朱德虽然见过面，但还不知道名字，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名叫毛泽东，农民领袖，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朱将军只扼要地介绍了会议的决定：

“我们改变了过去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会议决定在继续进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还要武装农民和工人，开展土地革命。我发言支持这项决定。但就在这决定性的时期，我们所采取的农村政策仍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没有打算利用铁军来没收土地，甚而支援农民起义。我们让群众组织和我们党的干部去考虑这些措施。我们的党还年轻，经验不足。它发展得太快，以致我们没有能够加以巩固，没有

从理论上去教育我们的干部。我们开始是由于轻易获胜而冲昏了头脑，其后又因遇到反革命而陷于绝望。

“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铁军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之后便进军广州，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政府。这次起义也是农民秋收起义的信号，农民在起义中要夺取民团的枪械来武装自己。正如以后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是唯一用武装力量支援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率领武汉警备部队南下湖南，利用他们支援农民，后来，他又吸收了最积极的农民志愿分子来扩大他的队伍。

“我们在这次秘密会议上通过的政策被总结成这几句口号：‘继续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开展土地革命。武装人民。’

“我对所有这些措施都投票赞成。我们在混乱和恐惧之中站了起来，但我也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在这次会议前，我对于党的方针政策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是竭尽所能地把交付给我的任务加以完成。

“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分别前往自己的岗位。毛泽东去汉口，待南昌起义枪声一响，便和武汉警备部队中的一些黄埔军校学员一起率领队伍南下湖南。苏兆征到长江一带发动工会团体为起义做准备。被选入总指挥部、准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的几个人动身赴南昌。我也当选为总指挥部的成员。此外还有第十一军的叶挺将军，第二十军的贺龙将军，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和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是副主任。^①其他人员

^① 党领导这次起义的机构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校注

有叶剑英、李立三和张国焘，以及谭平山和林祖涵。

“鉴于我对南昌了若指掌，分派给我的工作是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的情况，不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时间很短促，可是一切情况在我都很清楚。我们的敌人将是国民党第六军的几个团，驻扎在南昌附近；还有滇军——第五路军——的几个团，驻扎在南昌市内和市郊；我们也许不得不和滇军的另外一个师打一仗，它已经调来这里，距离南昌还有两天的行军路程。自从反革命的高潮出现后，这些部队都打算拿下南昌，镇压群众运动。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有南昌所有的群众组织，例如工会、农会和学生会，还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方志敏也参加了秘密会议。

“铁军的大部分部队都可以依靠，但总司令张发奎除外，还有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他和张发奎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都想利用铁军作为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第四军的大部分部队驻扎在长江边上的九江，张发奎的司令部也在那里。铁军在南昌有办事处，负责人是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的所有部队都在南昌附近，第四军有一团人布防在九江—南昌铁路线上，准备参加起义。

“我们还可以依靠南昌的全部公安人员，它跟军官教育团一样，是由我指挥的。但是，在我出发参加秘密会议之前，我接到了滇军方面的命令，要我为军官教育团的一千三百名学员主持毕业典礼，并把他们全部送到军部，分发各部队。这些学员的课程还未学完，可是滇军司令已经在准备投向蒋介石，并夺取南昌了。到那时，他不希望有任何学员留在城里。把他们

分散到各部队，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我被迫执行这项命令，可是只有三百名学员毕业，分发出去。另外有三百名愿意参加起义。我原打算越多争取越好，只是时间太仓促，未能成功。”

起义的当天晚上，朱德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大宴第五路军和第六军在城里的全体高级军官。他请的只是团长和团长以上的人。客人还以为他是个滇军军官、国民党领导人，所以都到齐了。

这顿饭吃到晚上九点钟，客人们坐下来打麻将牌，朱将军计划让他们打到午夜，起义也就开始。就在这时候，贺龙的第二十军的一名营长忽然心神不宁地推门进来。这个青年军官也是云南人，而坐在餐厅里的这些客人多数是他的云南老乡。

这个青年军官慌慌张张地说道，他刚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一听此言，朱德震动了一下，而那军官还在问道，自己是云南人，也搞不清应不应该对同乡下手，该怎么办？

整个餐厅马上一片死寂。朱德掉过头来对客人们哈哈一笑说，在这纷乱的时期，真是什么样的谣言都有，没什么。

“大家请接着打牌，不用为那些流言蜚语操心。”

有一个将军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说道：

“也许是谣言，可是我已听说今天晚上要出事。每一个人都应回到岗位上去。”

大家都站起身来，准备回去。朱德不敢强留，以免招惹过多的猜疑，便打着哈哈，开着玩笑在门前送客。等客人散尽，他马上赶到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于是下达即刻开始起义的命令。

新的命令传送到铁军所有部队颇费时间，可是不久，便听到了开火的声音，随着命令逐渐传遍，全城也就响彻枪声。朱德和他的同志们通夜指挥，到了天明，全城尽入铁军掌握。过了几个钟头，稍远一些的村落也拿了下来。南昌东南十英里的战略城市抚州，在两天之后才从敌人一个团的手中夺过来。

南昌成了革命旗帜的海洋，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和士兵涌到街头参加群众大会，那里特别为发言的人准备了十多个讲台。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①，解除陈独秀党总书记的职务，瞿秋白接任。这个新书记是著名的作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领导人之一。

大会选举出一个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员及一些始终效忠革命的国民党员组成，其中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铁军和革命委员会在南昌的委员应该在八月五日早晨开拔，向广东省进军，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为了支援这次远征，铁军和共产党又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搜查全城，没收了银行家及其他富户的钱财。

同时，朱德奉令组织一个新师——第九师^②，由他亲自指挥。他的三百名军官学员，整个南昌公安局的四百名人员，以及几十名工人和学生都编入这一师中。不过，几乎所有在起义中缴获的步枪都已分配给工人和农民。农民讲习所的六百名男女学员已把步枪和弹药装满小船，上面覆盖稻草，顺流而下，以便回到家乡，开始组织和武装农民。方志敏带着一批农民。

① 这次紧急会议是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校注

② 应为第九军。——校注

前往他的老家——江西东北角的弋阳，第二年就建立起红军第十军。

因此，朱德只能够动员到一千名武装人员组成他的新师。
土地革命开始了。

第十八章

八月五日拂晓，铁军两路纵队保持着十英里到二十英里的距离，南下进军广州。朱德的部队被委派为先头部队，走在东路纵队的前面约两天路程，以发动老百姓，筹措粮食，并准备宿营处所。两路纵队有一天晚上在宜黄会合，开了一次会，接着又继续前进，他们在几个星期的行军中，就这样不断地定期会合。

在过了宜黄不远的地方，铁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将军临阵脱逃，把队伍向东一拐，带进了福建省。过了几个月，他重新投入前铁军总司令张发奎的旗下。同时，张发奎带着留在九江的部队两个团走另一条路线向南行军，到广州后，与当地军阀会合，打算坚守这座华南城市，作为他的领导人汪精卫的根据地。

第十师开小差的消息在铁军内部传开了，士兵们开始脱队。全国都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决定回老家去。就象无数条溪流一样，他们带着武器，在家乡的

秋收起义中尽了力。许多人向战友们托词说，他们不愿离家乡太远到广州去；有的则说，他们的家人需要他们回去帮助应付白色恐怖。

朱将军说，革命并没有失掉这些人。他们在秋收起义中重新战斗，不少人后来又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又说，这种情况在美国革命和美国内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南昌起义使得敌人乱了手脚，因此，铁军在开到江西的最南端以前始终未遇到抵抗。地主连风声都没听到，还出来与朱德的先头部队为买卖粮食讨价还价。

“我还有时间考察农民的生活，”朱将军说。“江西农民被压迫的情况和我家乡的农民一样深重，甚至于更穷苦，更绝望，更悲惨。

“江西大部分是山区，收成很差。地主索取的地租高达收成的百分之七十，大多数农民每年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以致这一辈、下一辈乃至子子孙孙都偿还不清，永世为地主做牛做马。他们穷得锅里连一滴油都不沾，一次顶多能买一把盐。他们只能把一撮盐溶在一碗清水里，用青菜蘸着盐水来下饭。他们形容枯槁，衣不蔽体，只字不识；住的是又黑又脏的小屋，村子围着泥墙，只有一个门。

“石城县更是其他各县的典型。这地方的大部分土地为姓雷的一家人所有，雷家有两个人是国民党军官，其中一个还是将军，指挥着当地的部队。全家在城里有一幢住房，此外，在古老的山寨里还有一所乡间宅邸，储藏着粮食、现款和其他财宝。除了佃户外，还有几百名相当于农奴的长工在地里干活，吃得差，住得坏，顶多能穿上雷家人扔掉的破烂衣服。”

八月底，朱德的先头部队来到赣南的瑞金附近，终于遭遇了以会昌——瑞金以南三十英里——为根据地的国民党两师人的巡逻部队。从接火地点直到会昌，铁军一共打了四天四夜。这是土地革命的第一仗，经过激烈的战斗，获得胜利，但是在清点队伍时，发现牺牲了几百人，近千人受伤。朱德的先头部队也损失了三百名。

伤员过多，无法按照原定计划穿越高山，铁军只好掉头东向，前往闽西山区的长汀。在大革命时期，长汀的革命者曾有很好的表现，可以托付他们治疗并收养伤员。其中有一个基督教家庭，家里有几个人是受过训练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当中有个傅连璋，是长汀英国浸礼会医院的医生。

一直随着故事情节而变化不定的朱将军的声调，这时又变得极为亲切，甚至在惊异中带着激动。

“傅连璋医生和那家医院的英国医生为我们医治伤员！重伤的抬入医院，轻一点的住在老百姓家里，无关紧要的则随我们继续前进。”

铁军现在进入了彭湃了若指掌的地区。彭湃来自广东东江地区，距离这里没有多少路。他就是在一九二六年年底，率领几百名武装农民，长途跋涉到汉口参加铁军的那个人。在赣南一战之后，朱德指挥一个团，由彭湃和他的农民弟兄充当先头部队。这些农民四出搜集敌军行军的情报，采办食品，并为部队安排住处。

铁军已进入危险地区，很容易在沿海地带遇到敌人的部队，行动迅速成了第一要义。凌晨一点钟，大军离开长汀，彭湃引导着向南强行军，直奔他的老家广东东江地区，这地区在

孙中山先生的保护下，曾经是第一批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的诞生地。现在，这里的农民运动已被迫转入地下，“土豪劣绅”及其民团经过流血挣扎，又占了上风。

彭湃的先头部队的尖兵用飞快的速度跨过了闽粤边界，在各个村子散布铁军就要来到的消息。急速行军的部队接踵而至，又风驰电掣而下。他们一路上击溃和扫荡了地主民团，并跨过省界，进入有名的东江地区。

从这一时刻起直到沿韩江而下的时候——韩江通海海口便是汕头，他们的行军几乎成了连续不断的欢庆活动。手拿一切可以认为是武器的农村男女们，最初是一小群一小群来参军，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一边跟着行军，一边诉苦。所有村子都准备了饮食等候他们，几百名韩江的船伕闻风而来，准备渡他们过江；他们则停在江边，筹划进攻汕头。已经有一师国民党军队在准备接战，另一师也正从南面赶来。

络绎不绝的农民用扁担抬着大筐大筐的大米和蔬菜到他们营地来，兴高采烈地叫道：

“你们可来了！你们可来了！”

船伕成批地从汕头溯江而上，把敌军准备情况告诉他们，还提醒有英国炮艇停泊在港口里，国民党将领不时在炮艇上进出。汕头还有传闻，说另有一支国民党军队正从海路而来。北面来的农民又提醒说，还有敌军一师人从福建下来了。

朱德来到东江地区，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妇女人数之多。农业人口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姑娘，她们跟男人一样，给他们担米，渡他们过河，而且手持武器与他们一同行军。

为了解释这现象，朱将军重新提到华南诸省的历史，他

说，“这地区首先遭到外国侵略的冲击。”当地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也在吸吮民脂民膏上尽了最大力量。因此，多年以来，大批的男人被迫到南洋去谋求生路，把妻子留在家乡维持生计。大部分家庭穷得只能依仗海外的男人每月寄回的两三块钱过活。

因此，东江地区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妇女，她们耕耘土地，在河道里撑船摆渡，或者到汕头及其他海港城市充当杂役。妇女也是农民协会的创建者，并且在农民自卫队里与男人并肩作战。她们和男人一样战死沙场，她们的头颅也曾在土豪劣绅得势时被悬在自己村子前的高竿上。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身体结实、解放了的妇女，”朱将军说。“妇女们都是天足，跟男人一样打赤脚，既健壮，又能干。既然必须肩负起各种责任，她们就从历代相传的父老、丈夫和叔伯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但她们也一样渴望离家的男人，有许多民歌表达了这种向往之情。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妇女唱出一首悲感而富战斗性的民歌时，有些人掉下了眼泪。这首民歌共分十节，每一节的开头都叫声‘有情哥’。歌的名字叫《十愿》。我可以唱给你听。”

朱将军站起身来，走到我房间里的小风琴旁，唱起了这首民歌。开头是：

有情哥，何必长久处远方，
收拾行李回家乡，
为了革命献力量，
反租抗税要多帮忙。

末一节则是：

有情哥，小妹十愿已唱完，
对付白鬼莫惊慌，
工人农民手牵手，
我拿刀来啊你拿枪。

“白”字已经被用来形容反革命分子，“红”字则表示所有革命者。从远古以来，红色就象征欢乐、希望和新生活，而白色代表死亡。就连戏剧中扮演坏人的脸谱或假面具，都是白脸或带有白条纹的脸，而忠义之士都是红脸或是在脸上涂以部分红色。

就是这些妇女，成了铁军的耳目和通讯员，补给和运输的助手。鉴于眼前的情势是速度决定一切，铁军应该早到广州建立新的革命政府，参谋部决定在敌军援兵未到之前，先击溃汕头的一师人。朱德被留在韩江重镇三河坝，带领三千人马殿后，以防敌军抄袭后路。铁军全队立即进攻汕头。这一仗从九月初开始，前后共打了四天，可是头两天过后，除了各种传闻外，朱将军从前线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听说，铁军全队和几千名农民都投入了战斗；港内的英国炮艇也开炮轰击他们；从南面开来的一师敌人已经接近战场，其他部队也在从海路来增援的途中。随后，什么消息都没有了。

铁军如果战败，必定会退回三河坝来；朱将军因此断定，战斗仍在拚杀阶段。第四天，从北面来的敌军沿江下来了，由

于找不到渡船过河进攻，便隔河开炮轰击他们。接着，出乎朱德意料，从汕头移动过来的竟不是铁军，而是敌军的几个团。朱德令其部队和并肩作战的农民男女沿着山坡摆开阵势，控制住向东去的路线，接着就指挥了一场为时一个星期的战斗。

自动前来支援朱德的农民组成了几支队伍。五百名妇女组织起担架队，清扫战场。她们毫不畏惧地在枪林弹雨中工作，把伤员送到后方，再由那里的担架队送到更靠近内地的村子。老人队和儿童队为战士们送饭送水，赤脚妇女为他的指挥部当传令兵，迅速地给各战斗部队下达命令，又把各方面的报告迅速地传到指挥部。妇女侦察员昼夜不停地为他的司令部送来敌军调动的情报，其详细和准确使他吃惊。

汕头的主力部队仍然没有消息。战斗了一个星期，朱德这方面的伤亡已达一千五百人，约合正规部队的一半兵力，此外，还有好几百名农民伤亡。既然不能再坚守，他下达了撤退命令。一切可以行动的人，不论是正规部队还是农民，限定在午夜向上游集中。船夫将他们渡过河去，而农民战士带着这支小纵队机灵地进入北部山区。在福建边境的饶平，他们遇到贺龙的学训班支队三百人，这才从他们嘴里知道铁军在汕头一败涂地。

大批敌人增援部队开上战场，在四天的战斗中，铁军被切断得七零八落。参谋团和全队失去了联系。朱德后来才知道，他们先是藏在一个渔村里，随后偷渡到香港。贺龙和刘伯承去了上海。刘伯承随即又赴莫斯科，在红军军事学院进修；贺龙则溯江而上回到湘西故里，又组织了一支队伍继续革命。叶挺和叶剑英留在香港照顾周恩来，他患了疟疾，躺在床上昏迷不

醒。康复以后，周恩来也动身去莫斯科，叶挺和叶剑英则留在华南，率领部队在十二月里建立广州公社，后来也在血战中失败。

铁军在汕头被打散以后，农民领袖彭湃收容了脱队的战士，派他们到海陆丰地区。他们大约有两千人，由彭湃分别组成敢死队和游击队，联合农民，没收和分配土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他们召开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第一次会议，创建了小规模的海陆丰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当时，东江地区为军阀部队所蹂躏和摧毁。村落化为一片瓦砾，成千上万的农民被捕杀。一九二九年，作者曾看到一本小册子，刊有广东军阀炫耀庆功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拍摄了村里村外的凄凉景象，死尸和落叶一样，遍地都是。还有一些肥头大耳、军服煌然的国民党军官照片，和面容又瘦又干、被捕杀的农民领袖照片，并列在小册子上。

彭湃还留在东江地区，维持地下的农民协会直到三十年代初。后来他到上海参加共产党会议时被捕，他拒绝出卖同志，终被蒋介石手下的人砍了头。

铁军失败后，朱德和他的小纵队成了敌军和地主的目标，到处被赶。在福建边境稍作停留，开了一次简短会议后，所有人，除了一百名农民战士外，都掉回头去参加彭湃的队伍。此外，七名女护士中有三名身体过弱，无法跟上快速行军，也让她们离队回长汀了。

在这次会议上，朱将军建议全队穿山西进，直奔湘南，那里的农民运动强大，战斗性很强。朱德的参谋长周士第心灰意

懒，在一部分干部支持下，要求解散队伍。这建议被否决了，因为正如朱将军所申辩的那样，每个人都不止有一支步枪，而且有人还有轻机枪，更有少量迫击炮。弹药和现款虽不多，但可以没收地主的粮食，从敌军手里抢到弹药。他的意见获得支持，但部队出发西进时，混乱和绝望还笼罩着全队。

第十九章

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边境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秋雨哗啦啦地下着，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失败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再度出卖了革命，而且与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联成一气，势力大得无法抵抗，”朱将军回忆道。“反革命军队具有雇佣性质，军官们又多出身于地主军阀家庭，就更加加强了反革命，以致全国情况比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还要糟糕，几千名党员被杀了，有些人放弃了斗争，有些人甚至依附了敌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被杀。他们认为，我们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所有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应该对此惨剧负责。陈独秀这些人则组成少数的托派，用与国民党差不多的语言来攻击共产党员。他们

说，这些力量过于强大，因此，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主义。”

朱将军说，“我回答道，他们对于反革命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结论却完全错误，如果接受了这种结论，就等于出卖革命。与反革命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少数知识分子也许能够安全无事获得职业，也有人可以回乡或者出国，可是工人和农民都办不到。人民绝对没有后退余地，他们不是作战到底，直到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成功，就是被迫重新陷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深渊。

“我指出，我们打的是一场殿后战。一切殿后战，如果不打起精神继续斗争，那就会军心涣散。工人和农民穷得已经到了不作战便死亡的地步，打死了总比当奴隶而死光荣得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心头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们需要的是领导，而我们可以领导。华南许多地方都已举行秋收起义。这些起义有很多已被打垮或者被赶到地下了，可是农民们夺到了武器。我们也有武器增援他们。放弃了他们就是背叛。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

朱将军并未能说服失败主义者，他们还在进行涣散军心的游说；不过朱德得到多数青年军官的支持，这些人在今后二十年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其中有林彪^①、陈毅、周梓昆和王尔

^①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悲观动摇，在部队离开江西大庾县城时，曾一度开了小差。——校注

琢，他们在纵队里都是低级军官。

朱德手里的钱不久就用完了，部队开始挨饿，有些人开了小差。在江西九连山中，朱德因此而包围了一个地主家，要他“捐款”。那地主拿出二千块钱，部队用来维持到赣西的信丰附近。在这里，朱德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解决失败主义者问题。他指出，这些人应该对部队的军心涣散和绝望情绪，对逃兵现象，对某些队伍的抢劫事件负责。

朱将军用坚决的语气提出，凡是愿意离队的，必须即刻离队。他的意见立刻被某些人接受，而且付诸行动。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就是在十年后的一九三七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其他人也络绎走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朱德眼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出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走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他的心。

“我怕整个队伍垮下来，”他说，当年那一情景好象犹在眼前。“离队的人终于慢慢少了，停了下来。我们剩下不到九百人，衣服破烂，身上又脏，而且饿得心慌，可是仍然直挺挺地站着，许多人背着三四杆步枪。

“我们召集了一次排长会议，仓促间整编了一下。我们指定了一个没收委员会，我还下令，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地主的财物。失败主义者走了以后，一股充满希望的新精神代替了绝望和涣散。第二天早晨，我们扑到信丰，打垮了地主民团，没收了有钱人家的大米和钱财。两天以后，我们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庾，休息一个星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四军在这里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

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加了军。我们的没收委员会出外搜索，没收了有钱人家的大米和钱财，而把我们要不了的东西都分给城里的穷人。

“在大庾，我们把部队分成五个支队，每一支队设政治指导员一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尽量吸收新党员。旧的军事指挥制度取消，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不过我们还打着原来的国民党旗号。在指战员大会上，我被选为总司令，陈毅当选为我的政治委员。林彪指挥五个支队中的一个支队。我们在大庾开了许多次群众大会，把我们的纲领和目标告诉老百姓，并且要求他们忠于革命，直到我们壮大起来建立人民政权。”

在大庾这一星期快结束的时候，朱将军接见了范石生派来的一名参谋——这参谋原来就是共产党员。范石生是原滇军、亦即第五路军的将领，他的部队当时驻防湘南和广东交界地区。他在给朱德的信中说，两个人既然是老同志老朋友，他不愿意与这支革命队伍作战，而且希望能给予协助。他在信中又说，他的部队里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的作风证明他们都是很好的革命者，所以他也不反对他们的活动。他还写明，原滇军的强大部队正在向大庾进兵。

在此以后的二十天内，这支小小的革命军驻扎在大庾西北丛山中的一个商镇上，在那里练兵，进行教育，恢复被压制下去的群众组织，为土地革命打下根基。他们派出通讯员到湘南和广东各地的党支部送信，要求派人到湘南的桂阳，参加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会议，制定由革命军打前战的农民起义计划。同时，朱将军派出一名联络员到范石生的司令部，要求拨

给被服和弹药。

在这期间，二百名原已离队的人重新归队，正如同朱将军所说，“被毫无偏见地收容下来”。驻兵这个商镇的最后一个星期，队伍突然奉令进入阵地，准备与自北面山区下来向他们突击的一批数目不明的敌人部队交手。

这支来路不明的部队一路欢呼向前奔来。他们原来是五百名装备优良的精兵，武汉警备部队的一部分，在南昌暴动后，由毛泽东带领进入湖南支援秋收起义。两名指挥官都是黄埔学生。

朱将军从这些人打听到，毛泽东已经上了江西西北部、靠近湖南边境、以井冈山为名的战略性大山。由于几十年极端贫穷的结果，井冈山同其他类似的山寨一样，成了土匪窝。大革命时代的农民运动揭示了社会目标，井冈山上的头目王佐和袁文才，也领导其下属，为重新分配土地而进行激烈斗争。他们受到了反革命的回击之后，不得不重操土匪旧业，直到毛泽东领导着他的队伍和农民们上了山。他与王佐和袁文才结成同盟，将井冈山转变为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土地革命。

朱德派出联络员到毛泽东那里以后，便率领他的小规模的工农革命军——当时也有两千人了——穿过丛山，直向西进，以便与各地共产党的代表在桂阳开会，商订农民起义计划。

朱将军谈到的这次进军，听来很象取材于《水浒传》的故事。自从革命被打垮，过去压迫人的统治阶级卷土重来后，全国又是盗匪遍地。小股土匪把绝望的农民拉到他们的队伍里，建立地方政权，还不时对比较富庶的区域进行血腥劫掠。朱德有一次带领一连人夜晚投宿村庄，曾经和一小股土匪遭遇，他

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为了迅速与主力部队会合，他派了一个排跟土匪一块撤退。有二十名土匪在黑暗中跟了上来，以为他们是自己人。到了集合地点，一经点名，这二十名土匪才发现自己是被革命军包围了。

“和他们谈话之后，我们把那些惯匪放了，邀请那些跟着土匪的贫农参加我们队伍，他们也愿意，”朱将军说。“我们到处遇到或听说国民党军队的零星队伍漫无目标地在各地乱转。我们只要一靠近他们，他们就跑了，以致无法跟他们谈话。到了桂阳以后，听说有一整团桂军精锐开过来，我们不能跟它硬拚，便退至城外，在山上摆好阵势。这支部队原来是一个团的散兵游勇，正在流浪回乡。据我们调查，他们都是逃兵。”

来自湘南和粤北的代表所举行的桂阳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会后，代表们分头回去，准备在十二月中旬举行起义。会议的最后一天，一队民伏从范石生司令部来，送到几百套制服和相当数量的弹药。朱将军刚把五百名武汉警备部队派到湖南东部的山城茶陵，并正打算把其他部队派到别的地区，便接到广州共产党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南进，支援在十二月中旬发动的起义。

他立刻南进，那时正是十二月初。但是，部队刚刚移动，农民们以为革命的钟声响了，开始起义。这支革命军马上被卷入从湘南一直伸展到粤北的剧烈的农民革命中。农民挺起身来，攻击地主和地主的民团，并迫切地要求朱德派人协助。朱德向各方派出小部队，限令他们在南方某些地点会师，并继续向广州挺进。

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只带领几连人向南进发。地主看到他们的国民党旧军旗，误认为是来镇压农民的队伍，欣喜若狂，出来迎接。

在这种情形下，朱将军采用了一种策略，使得国民党在其后二十年内还称他为“狡猾和无信的土匪头子”。他这一生有个习惯，每当用心听取重要报告的时候，喜欢叉开两腿，把双手背在身后。他在听取地主要求他使用部队去镇压农民起义的紧急呼吁时，就是这样一种姿势。朱将军提出问题：除了那些地主狗腿子屁股后面挂着的自动手枪以外，民团还有多少枪械和武器？他们怎样镇压农民，杀死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他们怎样要求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

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答复后，朱将军命令民团列队等候检阅，而当这些人和他们的主子全部立正后，朱德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武器发给农民，然后把他们交给农民法庭。

第二十章

分散了的革命军队重新集合起来，到达离广州两三天路程的粤北韶关地区时，已是十二月中旬。那时，他们所在的地区尽是民团和军阀部队。

革命军正在山区探路，遇到了一批广州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兴奋地高叫着直奔他们而来。学员告诉他们说，广州起义已在十二月十一日开始，他们和他们的训练团都参加了。起义期间建立的广州公社三天后便被国民党军队和英国炮舰的联合力量打垮了。几千名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惨遭屠杀。逃出来的小批人员也和他们一样，正在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以便参加进去继续革命。

朱德将军把历史上这段时期的国内情况大致总结如下：

广州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反革命恐怖浪潮。每一个地方都成了革命反抗的小岛。

增加了这二百名学员以后，朱德直接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大约有一千七百人。在东北方面的茶陵有五百名武汉来的警备部队，在不远的井冈山上则有毛泽东指挥的一千人。

贺龙在湘西北某地，又组织起一支农民队伍。农民领袖方志敏在江西东北部领导着农民，江西中部的东固山区也有一小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彭湃仍在广东的东江地区领导着铁军的残余部队和农民游击队。

以产生中国最残忍的几个“老虎地主”——农民统称他们为“土豪劣绅”——的领地而著称的湖南省，如今也被农民暴动所震撼。每当黑夜降临，绝望了的农民便把民团的岗哨一个个干掉，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冲进“土豪劣绅”府第；“土豪劣绅”于是加以报复，带着民团摸到沉睡中的村子，包围和杀掉农民领袖，并且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高竿上，以示警告。这是一场无情而残酷的斗争，双方谁也不退让一步，衣衫褴褛的农民在进袭、在战斗，甚至在死去时嘴里还在咒骂。

湘南千百个村子上演的悲剧与作者在其后数年亲眼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那时，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投靠了日本皇军，以对付反对他们的共产党游击队，而其中大都是农民。

没有粮食、没有避风歇脚的地方，造反的农民带着伤员，有时在晚间踏入沉睡的村庄，敲起上了闩的门户，低声说道：

“兄弟，开门。我们是农民自卫队。让我们歇歇！”

全村一片寂静，每一个茅屋都在谛听，可是哪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和一线光亮。在茅屋里，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从草垫上爬起身来，静听敲门声，妇女悄悄地对他们的男人说：

“别开门！也许是地主吴老财和民团呢！”

农民游击队又拍门催促道：

“兄弟！我们跟民团交过手。有受伤的人。”

沉寂了不知多久以后，才会有一家打开门，一个老头子从门缝里向外张望，跟手持梭镖、土枪以及也许是抢过来的手枪和步枪的农民低声谈话。把大门敞开，老头子走进茫茫的黑夜里，对那些静听动静的人家说：

“他们的话是真的！”

好象梦境一般，村里的门户一下子全打开了，男人们都走出屋来，从稻草垛抽出稻草，搬到屋里铺在地上当床用。然后，门户又都关紧了，游击队员和他们的主人坐在稻草垫上悄悄谈话，妇女则点起灶上的火，从坛子里取米煮饭。

这种情景在其后数年之内，在整个华南地区不知重演了多少遍，使得朱将军一再提起，“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好的领导、正确的纲领和武器。在一九二七年那个惨淡的冬天，朱将军率领他的队伍来到湘南这个小世界，建立了土地革命的一个样板。他和毛泽东在其后二十二年中所领导的队伍始终体现了这一革命的特征。

进入宜章县境，离县城没有多远，他遇到一队农民自卫队，大约有几百人之众，为首的是一个十八岁青年，名叫陈赓。他说，他一家人除了自己外，都已被地主杀掉。自卫队其他人的身世有的和他一样，有的也差不多，陈赓——在一九三七年已是八路军的师长^①——把他们组织起来，带领他们袭击“土豪劣绅”的碉堡式宅第。自卫队现在参加朱德的队伍来了。

^① 应为旅长。——校注

跟着来参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名叫胡少海，自称是宜章城里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之一。因为他们的家庭是地主，所以他们才能够公开而合法——在反动据点中的所谓合法——存在。胡少海报告说，宜章县只有三百名民团守卫，全城由一小撮地主统治着，这些地主同时也是商人和国民党官员。他们派他到粤北搬兵，要求增援部队来镇压暴动的农民。

情况既是这样，胡少海献上一计：朱将军可否交出两连人由他带进城内解除民团武装，活捉城里的当权者？

朱将军从老兵里挑出两连人。他叫他们装扮整齐一些，举动要尽量模仿国民党士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这两连人在胡少海带领下开进宜章县城，城里的当权者兴高采烈地欢迎，当天晚上还邀请连排长吃饭。

黄昏时分，两个连的连长坐在宜章县当权者的欢迎宴席上。宾主杯觥交错之间，两连人已经包围了手足失措的民团。解决了民团后，两连人又包围了宴会厅，连长便立起身来对主人说：

“各位，你们现在被捕了。老老实实地走出去，我们的队伍已经占领了宜章。”

朱将军率领队伍开进宜章，第二天早晨，广州公社的红旗飘扬在宜章的城墙上。

“从这时起，我们就打起这面旗帜，”朱将军说。“这是一面红旗，中间有一颗白星和镰刀斧头——象征工人和农民的统一。第二天早晨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由各受压制的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委员会组成了湖南省第一个工农苏维埃。

“苏维埃建立了各部门，分管武装力量，财政，教育，司法，以及工人、农民和妇女工作。八小时工作制颁布了，工资提高了，还计划救济失业者。地主、军阀和官僚的财产一概没收，被没收的地产均无赔偿。债务一笔勾销，并宣布高利贷是犯罪行为。司法部把逮捕来的反革命分子交付人民公审，凡是对人民犯有重罪的一律枪决。轻罪的罚款后释放。

“我把队伍整编为一个师，包括两团人。第一个团由铁军老兵组成。第二个团由参军的农民自卫队、新加入的宜章工人自卫团组成——总共大约一千人。志愿参军的人络绎不绝，第二个团不久就扩充了一倍，可是那时我们的政策不是将我们的正规部队扩充过大。我们的政策是组织和武装农民。后来，中国红军——即现在的八路军——有许多干部是在这第一次湖南农民斗争中产生的。比如现在（一九三七年）已经是旅长的王震和师长肖克。肖克出身于有六个男孩子的农民家庭，其中三个孩子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另一个兄弟在这时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后来在作战时牺牲。我们队伍里千千万万个战士都有同样的身世。”

宜章被朱德的部队攻占以后，湘南湘东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农民开始分地。他们川流不息地到朱将军司令部来，要求协助对付地主。他便选派干部跟他们回去，或是派遣小部队去帮助他们。没过多久，他的大部分队伍便分布在远近各处，而地主都逃向国民党或当地军阀部队控制下的大城镇去保命。敌军从南面来威胁时，朱德还照样派出两营精锐去动员和武装农民；唐生智的部队移到北面的郴县时，朱德仍然向外派人。最后，宜章只由寥寥可数的工人自卫团来守卫。

占领宜章三个星期之后，蒋介石的两师人开始向宜章进兵。司令官是许克祥，以“农民刽子手”著称，因为他曾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湖南屠杀过几千农民。全城处于紧急状态，人们撤到四周的村子里。朱德召回他的部队，连同宜章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撤至湘粤边界的丛山中。进入这地区的第一天，革命军就解除了两千名民团的武装，将武器交给农民。

许克祥派出两个团来清剿“土匪”，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回去向他报告经过。接着，他亲自带领五个团来进攻革命军。朱将军所描绘的革命军的作战方式，充分体现了他的部队在其后若干年中所具有的特点。

“我们依靠人民，”他说。“选定了一处背后靠山的战场，我们就把敌人引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去，接着截断他的交通线，攻击他的侧翼，然后加以围歼。”

“农民们听说‘农民刽子手’亲自带队来了，便拿起从棍棒到土枪的各式各样武器武装起来，成千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我们。他们要活捉‘农民刽子手’。在一星期的战斗里，我们以主力部队攻打他的主力部队，农民们则破坏他的运输队，把敌人的散兵游勇当豹子来捉。有一营敌军跑到一座木桥上打算逃走，木桥垮了下来，全部人马掉进河里。农民们跟着就在河边上下追逐，开枪把他们打死在河里，谁敢爬上岸来，也被活活打死。混乱之中，‘农民刽子手’藏在一条顺流急速而下的小船里逃了命。这使农民大为失望，许多人掉下眼泪，埋怨运气不好。可是这一仗打下来，他们有二千人得到了优良的步枪和装备。”

“我们占领了‘农民刽子手’司令部所在地坪石，发现了

可以供应一整师人的军需品、粮食和现款。大街上都堆得没处下脚，我们必须爬过这些军需品才能通过。我们缴获的枪支，足足把第二团整团用优良的步枪和轻机枪装备齐全。

“我派队伍紧追一支逃军，直到宜章，那时，宜章是被‘农民刽子手’占领着的。这支逃军一边穿城而过，一边招呼守城部队，窜入城西的山里。我们的队伍也跟上山去，山里的农民配合我们队伍，最后解决了他们，农民又拿到五百支枪。”

革命军高奏凯歌，回到宜章，重建苏维埃。朱德又率领几百名精锐北进，直扑由唐生智的十一连部队固守的郴县县城。路上，他遇到一群预先潜入郴县探听情势的农民。他们对朱德报告：

“唐生智在郴县的十一连人有六连不是旧式雇佣兵。他们是从小学和中学征召来的学生，被编成训练队，准备作军官。大部分不到二十岁，还有一些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的待遇好，而且对于当军官的前程颇为自豪。这六连人已经离开郴县向你们开过来接火。这是他们的第一仗。他们以为你们是土匪，如果受到惊吓，他们就会真打。你们何不把他们抓过来，真要是打起来，再干掉他们。”

朱德的双手拢在背后，站着听取报告，两眼闪闪发光。他对陈毅和其他参谋人员说：

“这六连人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还受过一点军事训练！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他们到宜章重新训练，然后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一声令下，部队聚拢在他的四周，席地而坐，把步枪夹在膝头，听他和陈毅解释这六连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要伏击这

六连人，解除武装，俘获他们，一个也不许打死、打伤。对待他们要象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开始攻击的时候，喊口号要先喊“兄弟们！欢迎参加革命！”等等，这样可以从一开始就扰乱或涣散这些学生兵的斗志，说不定可以避免一战。

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六连人果然全部被捉，解除武装。他们被带到一个山谷里，由朱德和陈毅讲解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纲领。陈毅的讲演有如跟朋友们叙家常，对于俘虏们影响最大，因为陈毅自己就是从书香门第出身的。他说他曾经在四川成都的大学和法国的大学毕业，还从孙中山手创的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在说明为什么他——和他们出身同一阶级的人——选择了继续与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道路以后，陈毅要求他们安安分分地随着卫队到宜章，在那里再与其他象他和朱德一样的人谈话。如果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可以回去，还可以拿到路费和军用路条。凡是愿意为革命而战斗的，欢迎之至，不过要认清革命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难道我们中国青年，会因为害怕吃苦耐劳而情愿受奴役吗？”陈毅问道，俘虏中许多人高声说：“不会！”

革命军的一个青年军官站起身来，说明自己原来也是学生，全家都参加了大革命。反革命开始后，他的一个姊妹和两个兄弟都被杀死。接着由一名农民士兵叙述他全家对抗封建地主后的悲惨遭遇。他一边述说，一边泪流满面，不得不把话头停住。朱德看到俘虏群中也有不少人在啜泣。

这种集会，又名“诉苦会”，是中国革命在胜利以前的二十年中最常用的方式。

这六连受过教育的青年被送到宜章，只有十五人除外，其

他都参加了革命军。朱将军在一九三七年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许多人已经成了他的部队中的军政干部。

郴县城里其他五连人听说朱德的队伍来了，马上逃走，朱德未发一枪便占了城池。郴县苏维埃是湖南的第二个苏维埃，其后各村落的苏维埃也都建立起来。自此以后，湘南有许多县份和县城都站到了革命方面。那时，在江西的毛泽东已经从井冈山带兵下来，在茶陵的武汉警备部队一个营也四出活动，直到如朱将军所说的，“湘南和湘东全部建立了人民政权。”

郴县的北面是一个大县，耒阳县，那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好勇斗狠出名，地主则以手段残酷著称。”朱德亲率队伍进攻该城，离南门还有几里地，他遇到一千名左右武装农民，他们报告说，大地主们亲自带领民团一千人守城，在南门外修建了防御工事，可是其他地方全无戒备，北门经常大开，不过只有六七个人看守。

朱德这次又采用了农民提出来的办法。那天晚上，他们穿过耒阳东面的山岭。经过沉睡的村庄时，老百姓都起身拿着自己所能找到的武器，随他们一同前进。第二天早晨，地主指挥官们和民团到南门工事去接替夜班岗警，革命军却从后面开进城里，直穿城心，开始进攻。农民象饥饿的人群一样直扑民团，夺取武器。有些落到农民手中的地主，当场被打死。

耒阳解放和耒阳苏维埃的成立，农民一直庆祝了两个星期。成千上万的人们秩序井然地列队进入县城，到各处观光和参加群众大会以后，又结队回村。每一支队伍都打起农民自卫队的大旗——红地中央画有一个白犁。当初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时候，农民协会和他们的自卫队打的就是这种旗

帜。

朱德从早忙到晚。新的志愿兵不断前来参加军队，还要组织农民支队，派他们下乡开展革命。他还要抽出时间给每天都有的群众大会讲演。他开始听说、后来又亲自见到一名女宣传员，她在农民中真是无人不知，是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年龄只有二十五岁，演讲富有魄力、才智，大脚，体格非常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她并不好看，可是一双大眼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

有人把她介绍给朱德，她名叫伍若兰，是个作家，出身于大革命时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两个兄弟立刻参加了革命军，她参加了该军的政治部。

“伍若兰和我在耒阳结了婚，”朱将军说。这时，我用目光向他扫视，他看上去有些窘，连忙解释道：“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再能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象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我打断了朱将军的话问道：

“提到伍若兰，你为什么显得很消沉呢？不爱她吗？”

在这间阴暗的屋子内，他冷冷地凝视着想象中的情景，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她后来被国民党抓去了，折磨她很久，才砍下了头，悬挂在她家乡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

沉默了很久，他从回忆中摆脱出来，重新提起耒阳，说了

许多关于农民的勇气的故事。农民们由于连续胜利的鼓舞，竟独自向国民党正规部队冲锋，因而一再遭到屠杀。例如一九二八年四月，桂军两师人占领了战略要冲和工业城市衡阳，桂军将领的打算是要占领湖南全省，和蒋介石争夺全国领导权。名叫大刘和小刘的两个农民弟兄决定把他们赶出衡阳，夺回城池。

他们也不等候正规的革命军队，就召集农民开始进军，他们边前进边收留入伍的农民，最后扩大到了大约一万名满怀希望的战士。在衡阳郊外，他们向那两师桂军猛扑过去。等到硝烟散去，战场上布满了几千具他们的尸体，包括大刘和小刘。

在这时期，水口山铋矿的八百名矿工参加了朱将军的队伍。原来是铁匠、后来转为矿工的宋乔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组织者之一，大约四十岁，曾经为他们的工会和学习小组领导过许多次流血斗争，自从工会被反革命赶入地下以后，他还能保持工会实力的完整。他们手持铁棒木棍，和铋矿公司的武装警卫大打交手仗，夺过了三十支步枪，便一路行军而来，参加朱德的队伍。

朱将军听到消息便走出他在耒阳的司令部，到街头迎接矿工。他们中有几个孩子不过十一、二岁，深怕不让参军，故意装成又高又大的样子。这些孩子已经当了三四年矿工了，每天干活时间和其他成年矿工一般多。象其他参军的穷苦孩子一样，他们被转到政治部，为各司令部作传令兵、通讯员的工作，有时间便接受正规教育。这些“小鬼”们——这是对孩子们的亲热称呼——就在部队中成长起来，以后成为干部，把全部生命奉献给革命。

朱将军在一九三七年谈起这批矿工的时候，有许多人还在他的部队里，并且成了军事指挥员或政治领导人。他们的领袖宋乔生则在战斗中阵亡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桂军五师人在湖南发动了攻打革命军的战役，那时，朱德的队伍已有大约一万人。他们当中只有几百人能身穿制服，大部分打着赤脚，后来还是耒阳妇女发动了“编草鞋运动”，他们才有了绳鞋和草鞋。

和装备精良的桂军以及湖南唐生智的军队交过几次手以后，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体会到，他们如果再打下去，就会全垮下来。在同桂军的一场战斗中，虽然有朱德的老朋友范石生的支援，伤亡仍然惨重。范石生也被迫退到了广东。

朱德和毛泽东两支队伍内的共产党军事部的代表为此举行会议，他们决定，朱德的主力部队应该向湘赣边境的酃县集中，然后撤到战略基地井冈山。以此做据点，他们要把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变为土地革命的根据地。朱德的许多干部，穿上便服，留在湖南，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朱将军下达了集中命令，行动立即开始了。他说，他的部队里工作开展得最好的部门之一是交通联络。在整个湘南地区和赣西地区建立起了交通网，“白”区里面也发展有地下交通线。交通网全部由农民主持，有些人一天可以走一百里（三十多英里），面不改色。一般要求是每个人一天走一、二十里（三至六英里），把信件、报告或命令传给另外一个人，再由他传到下一站。船夫传得更快一些，而且，自从缴获了敌人的马匹以后，有些通讯员还办理起快递信件。

第二十一章

且战且退，且战且退，朱德的队伍向东撤着。到了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在酃县地区安营扎寨，准备前往井冈山。那时，在江西一直跟毛泽东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酃县县城，切断了进入湖南的交通线。毛泽东因此从井冈山攻下山来，打算重开此线。他率领了两营人，亲自到酃县和朱德会见。

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①朱德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自从在酃县第一次会见的一刹那起，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多少年来，国民党和外国报纸经常把他们说成“赤匪匪首朱毛”，而称红军为“朱毛军”。

^① 这次历史性会见，是在江西耒市龙江书院。——校注

他们具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显著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小十岁^①。朱德当时是四十二岁。两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民，从辛亥革命以来，曾经参加过每一次革命斗争。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在四川军阀主义的泥沼中彷徨犹豫。毛泽东曾经在湖南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是建立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其后，他是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

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个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远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

^① 应为小七岁。——校注

带着这样的品格和正直感，朱德在会见的一瞬间，立即觉得他遇到的是知心朋友，在今后的生活中，这个人的判断力是可以信赖的。

由毛泽东的两个营作先导，朱德的队伍继续穿山越岭前进。一路上，他们击溃了拦阻他们前进的敌人；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巧妙地走过了这著名战略山区仅有的五六条羊肠小道中的一条小道。

井冈山是方圆一百五十英里的山区的总名。松柏成林，青竹处处，蔓藤附葛，每到春天：清风吹拂，遍山都是花香。这是一个景色极为秀丽的地区，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却为云雾所环绕。云消雾散以后，朱德翘首可直望到高耸的峰顶。

在这荒野未开、几乎毫无出产的山区，有一个宽阔的圆形山谷，周围都是丛林茂密的山坡。多年以前，“匪农”——他们的后代现在有一千五百人——在这里兴建了五个村子，每个村子的中心都是一口水井，因此这个山谷在当地以“大小五井”而闻名。朱德的队伍就在这个山谷里和附近的山上建起了营房、讲习所、医院、兵工厂和其他机构，作为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和司令部。毛泽东前此已在山谷和山后的农民中间发动了土地革命，并在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的协助下，把五个村子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山区的农民靠种菜或售卖竹笋、茶叶和草药为生。可是单靠这些是不足以维持生活的，他们最后只有袭击远处的村镇。而对当地的地主他们却丝毫不碰。

“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朱德说。
“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

时期去当土匪。以井冈山为例，当了土匪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地主就和他们的头目达成协议。我们上山之前，王佐和袁文才受到地主的小恩小惠，他们也就使这些地主平安无事。地主说：‘不要干我们——去干别人。’我们发动了土地革命之后，情况就变了，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地主于是要求国民党军队来攻打我们。

“国民党在井冈山周围六个县的主要城镇都有重兵驻扎，我们到了井冈山之后，便决定建立苏维埃，以此作为根据地，将革命扩展到更大的地区。”

这决定是朱德的队伍上山以后，共产党立即召开会议作出的，朱将军说，这是“国民党开始反革命以来共产党的第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回顾了革命历史，制订了长远计划，为革命战争确定了战略战术。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五项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会议所通过的军事和政治战略。^①

毛泽东说，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国家，在沿海和内地几个近代化的城市里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而同时存在的有生活在落后的、半封建条件下的几千万、几万万农民。

第二，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国。它所经历过的大革命已经播下了革命种子，而且发芽成长为工农革命军。

第三，代表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已经攫取了国家统治权。它已经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而且就要获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正式承认。由于它已统治了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七二——一七五页。

全国，国民党就可以支配巨大的人力，取得武器，用以发动对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的无情的战争。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第四个特点是革命军弱小，而且目前处在山区，条件落后，情势不稳，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粮食、衣服、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的困难就决定了革命军的战略和战术。

第五个特点是土地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使革命军获得农民的支持，得以生存、发展，并抗御敌人的进攻。

毛泽东强调——后来又写成文章——革命军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战士们都是从土地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是因为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政治上的一致。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反对土地革命，因此，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且，他们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指挥官永远不能使广大战士和下级军官为国民党拚命。

接受了这一分析，共产党的这次会议便为斗争制定了基本原则，这原则虽然依据客观条件而时有修正，但多年来基本上并无变动。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

- （一）敌进我退。
- （二）敌驻我扰。
- （三）敌疲我打。
- （四）敌退我追。

井冈山会议决定将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定名为红军第四军，因为队伍中有很多人来自大革命时代的第四军。它的旗帜是红地白星并有镰刀斧头。它列出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

一切缴获要归公。

此外还有八项注意：借住人家临行时要将门板上好^①，稻草归还；说话要和气并随时为老百姓做好事；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保持清洁——厕所远离老百姓住房，临行填好；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②

会议还决定，先将井冈山周围的六个县改造成土地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不断地扩展，直到在江西和邻近省份发展出更多相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均予无偿没收，分给农民；农民和其他一般老百姓都要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训练，条件许可的话，还要让他们受教育。

朱将军说道，“那时，我们什么都需要，却什么都没有。我们在山坡上种菜，没收附近地区地主的粮食，围在山上备用。”

那时在农民中流行的一首民歌里，提到“朱德赤脚挑粮上山岗”，恐怕太诗意的了，因为朱德说过，脚上穿有草鞋，不是打赤脚。

在军事整编中，他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毛泽东负责军队和群众中的党的工作，以及部队中的所有政治教育工作。政治部是“军队的生命线”，以免它变质为军阀主义。

① 农民家的木门是用铁合页钉上的，很容易取下，放在中国的小木凳上，就可临时作床使用。——译注

②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因为这些内容在各地各军中略有出入，曾作统一规定。“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译注。

朱德补充说，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有文化有觉悟的钢铁般的革命队伍，献身于国家自由和人民解放的事业”。同后来的发展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是首要的，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部队还要学习革命历史、外国侵华史以及怎样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要学会怎样向敌军宣传、怎样唱歌和演讲。

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也最先进，而农民的队伍则遇事漫不经心，“甚至在行军当中都想在路边停下来做饭吃”。为了提高他们的效率，朱德分派水口山矿工在农民队伍中担任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还把五、六百名农民“起义领导人”调到特别训练支队去。

在井冈山时，朱将军开始收集部队唱的歌曲，把它们装订在一起，并不断补充，到了一九三七年，他已经订成两百多页厚的小册子，其大小刚好可以装在军服口袋里。这本小册子因为经常翻阅，都卷了边，而且有几页看都看不清了。小册子里有歌曲、短诗、军事规则、有关党史和党章的文章，以及部队要举行纪念活动的国内和国际纪念日一览表。

这些纪念日既有理论意义也有象征意义：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四月十二日，上海大屠杀；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五月四日，学生运动的诞生日；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许克祥屠杀湖南农民）纪念日；五月三十日，五·卅惨案纪念日；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二月十一日，广州

公社纪念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倒袁之役纪念日；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纪念日。

朱将军的歌本中，最前面几首读来好象是刚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倾诉，其他的则是旧调填新词。有一首是《国际歌》，另一首是《国际青年歌》。还有简单的下操歌和射击歌，就连军事规则都谱成了歌曲。有一首歌是用来对敌军宣传的，另一首是回忆广州公社的。

这本歌集包在一块褪了色的、沾有许多墨迹的红布里，装帧极为粗糙，朱德珍惜地用大拇指一页页掀着，顿时，井冈山的悬崖峭壁，青山翠谷，竹丛树林，芬芳花朵，以及山顶上几乎经年环绕的云雾，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井冈山地区房屋的房顶是用树皮铺成的，上面长着茂密的青草，从空中俯瞰，真象一片绿绒。

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

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他们的大炮也是树干制成的。一棵大树砍下后，把树干锯成五六尺长，一头是实的，一头挖空，靠近实头的一端再挖开一个发火的小孔。他们把黑色火药、铁片、铅块和三棱石子都装在树干里。

这些木制大炮暗藏在通往井冈山的五六条小道的工事里，等敌人走近了，他们便点燃信管，然后跑开以策安全。爆炸声响了，大炮也炸得七零八落，但是“它们能把敌人炸得尸骨无存”。

井冈山用的弩箭很大，弩弓有五六英尺长，甚至还要长些，箭头也达三英寸到六英寸，尖上有毒。弓的一端摆在地面上，用脚一踏机关，就可以发箭。

“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朱将军笑着说。“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人们都痛恨国民党军人，暗地里侦察他们的行动，伏击他们的小股部队和散兵，并且俘掳他们的运输队。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敌军只要看到远处有一个赤脚农民望着他们，就不敢向前移动。”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红四军开始攻打附近六个县的地主和军阀。一个星期之内，红军歼灭了三个县的全部敌军，缴获了他们的全部补给，抓了一千二百名俘虏。县里组成了人民代表会议，村子里则成立了小型代表会议。土地分给了农民，还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训练，妇女协会、青年协会、工人协会也都成立了。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传统首次被打破了。

从江西中部前来向革命进攻的敌军被击退了，他们被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不仅是身体壮实的农民参加了战斗，就是儿童和老年人也各尽其力。

大城市里的外文和中文报纸登满了“赤匪暴行”的传闻。蒋介石跟连年交手的敌对军阀暂时休战，然后下令动员三个省的四万名部队包围井冈山，要饿死“赤匪”。

被派封锁山区北部的湖南部队中，有两名其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年轻军官。一名是营长黄公略，一名是团长——当时兼代旅长——彭德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朱德是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则是副总司令。此外，还有一名青年连长孔荷宠，此人在三十年代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投靠了蒋介石。

这三名国民党军官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他们的部队驻守在井冈山以北萍乡—醴陵矿区一带。七月，他们接到紧缩封锁线的命令，彭德怀便带领他的一旅人率先起义。混乱之中，他的部下几乎有一半人来回倒戈六七次。彭德怀终于带着两千名队伍和几百名矿工进入农村，同农民联成一气，建立起一个游击区，这就是后来的赣西北苏区。

与此同时，朱德将军带领红军三团人下山进入湖南，作牵制活动，截击由广东开来的封锁部队。他这次作战含有报复和喜剧两种因素。他的滇军老朋友范石生已经把友谊这些事抛到九霄云外，转到反革命那一边，朱德决定教训教训他。

范石生的部队驻扎在湘南一座城市里，军火囤积得很足。朱将军的队伍扑到该城城郊时，把正在郊外练兵的范石生的几连人吓得目瞪口呆。朱将军若无其事地走到他们中间，他的队伍未发一枪，便将几连人全部缴了械。接着，朱德悠然自得地走进城里的一间大会议厅，里面正有几百人在听讲。一声令下，他的队伍立刻把挂在墙上的步枪和子弹带全部缴获，而那些人愕然坐在桌旁，只有眼巴巴地望着。同时，他的其余队伍，用扁担、绳子把弹药一箱箱搬走。

整个突击行动还不到一个钟头，等范石生的部队喘过气来

的时候，朱德早已率领队伍回井冈山去了。

朱将军的队伍满载而归，向着山区缓缓进发，毛泽东带领了两团人前来接应。毛泽东对他们说，敌军对于井冈山的封锁已大致完成。他们时而行军，时而放下战利品击退来犯敌军，朱德和毛泽东终于来到一条盘旋崎岖的羊肠小道，爬上了一片荒芜的井冈山。

“从井冈山上的根据地，我们可以望到敌人的队伍，”朱将军说。“我们对于他们的行动了若指掌，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做饭。中秋节之夜，满月当头，我们派队伍下山，去俘掳在山脚路口扎营的六连敌军。过了两三个钟头，他们就把这些人和补给全部带到山上来了。这六连人都是农民，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又过了一个星期，封锁部队一营人开小差投奔过来，因为他们是四川部队，而又听说我也是四川人。”

前来紧缩封锁线的部队越来越多了。红军接连几个星期采用夜袭办法，下山作战，可是弹药耗费过大，得不偿失，而且伤亡很多。村子里的群众运动不是被搞垮便是被赶入地下。井冈山开始配给粮食，部队只好种南瓜。在相当多的日子里，蔬菜只有南瓜。

从九月底起，严寒来到前线，到了十二月，红军开始闹饥荒。五千人住满了医院和营房。有一些是伤员，但大部分是饿出病来的，还有一些得了肺炎和肺病。天气又潮又冷，他们只有很少的御寒衣服。

十二月中，彭德怀带领一千人——一半是农民——从北面进入山区。他曾组织起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可是在战斗中损失了一半。他把一千人留给黄公略指挥，其余的则带到井冈山。

彭德怀上山后，山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制订了突破敌人封锁的计划。彭德怀率领一千五百人和伤病员留在山上，毛泽东和朱德则率领其余的四千人，包括政治部的一批妇女——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也在内——突破封锁，进行游击战，引开敌人。出征的每一个男人和妇女仅在干粮带内带上一磅米。除去发给尖兵班少许弹药外，其他的弹药都要留在井冈山。

第二十二章

朱将军画了一张他和毛泽东率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突破敌人封锁的荒凉山区的草图。除了井冈山的“匪农”之外，谁也不知道可以潜离山区据点的这条险路，而且更少有人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作这种尝试。既没有道路，又没有山径可循，到处都是嶙峋怪石；无底的深渊之上则耸立着参差不齐的突兀的山峰。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黎明^①，这些面庞瘦削、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开始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那些不知经过多少个世纪风吹、雨打、雪盖的石头和山峦，变得异常平滑。白雪漫谷，刀子一样的山风吹打到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只能一步一步前移，匍匐爬过巨大的石峰，他们还得一个紧拉着一个，以免滑入山下漆黑的深渊。

^① 应为一月十四日。——校注

夜幕四垂，他们来到一处又窄又陡的有着坚硬石质的高地上，拿出随身带着的饭团，各自吃了一半。大家挤在一起，臂挎臂，就这样坐在陡坡上过了一夜，人们冷得直哆嗦，不时传来咳嗽声。天刚蒙蒙亮，他们又向南爬行，将近傍晚时，来到了一条杂草没膝的小径，从这儿穿过满是树林的山坡，便可以到大汾村，那儿有一营敌军驻守。他们在这里停下来，吃了剩下的饭团。天色暗黑之后，他们悄悄地沿着小径而下，一路上禁止人们发出任何声音，连咳嗽都不准咳一声。

到了山脚下，他们包围了大汾村，配备有弹药的几个班，开进村去制服了守军。

“我们那天晚上吃了一顿！”朱将军微笑着满意地说，“跟俘虏谈过话后，我们放了他们。我们不打算训练这些人，我们要他们去散播惊慌情绪，希望封锁部队会掉头来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倒是引起了其他部队的警惕。”

红军迅速南下，虽然穿得破破烂烂象稻草人一样，打起地主和民团来却快似闪电，他们从敌人那里找到食物和补给，从地主家里找到衣服穿上，而且到处号召农民干掉他们世世代代的敌人。

粉碎地方守军后，他们占领了赣南的钨城大庾，大庾人民过去就知道他们，因而都拥到街上来开群众大会。他们在这里停留三天，恢复已被镇压下去的群众运动，这就使得敌人的一个团有了开上来的时间。一场混乱和殊死的战斗打下来，红军损失了几百人。

朱德和毛泽东下令撤退，一连十天，这支小部队在粤赣山

区且战且走，敌人则从四面八方拥来，踏着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向前追赶。红军经常缺粮少食，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们带着伤病员，翻山越岭，一天要赶五十或六十英里路，才在深山旷野，或者某个开门欢迎的村子里停住脚步。休息几个钟头之后，午夜刚过便又继续前进，因为敌人只在白天行军，这样便能把敌人甩在后面。

每逢接近一个村子，他们便先派出一两个人去打前站，农民出来为他们收集粮食，并把伤病员和无法行动的人隐蔽起来。每一个留下来由农民照顾的人，都发给他枪支和少许弹药，以便他康复之后，能够组织和训练农民。

“我们采用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个人活下来，他就能站起来领导人民，”朱将军说。“我们在这一极度困难的时期内打过许多次仗，有一次一下损失了二百人。又有一次，我们有二十名战士和一名黄埔军官被俘。他们参加了敌人驻防赣南某县的部队。过了几个月，他们率领整个一团人起义，把那个县变成了游击区，后来成为我们最有力量的苏区之一。”

在另外一仗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失踪了。这个妇女饱受折磨后被砍了头，头颅还送到她老家长沙，悬挂在大街的高竿上，警告那些和她有同一思想的人。

中国旧历年来了，家家户户都贴上大红春联，送旧迎新，饭馆和大户人家传出阵阵丝竹和锣鼓声。在赣南的小县城瑞金，地方部队的一团人回到城里吹嘘他们怎样消灭“朱毛匪帮”的大部分人，怎样把“朱毛匪帮”一直赶过省界，进入福建。城里的权势人物为了感谢他们的丰功伟绩，特意为全团安排下年夜饭招待。笑声混杂着酒气菜香，营房支起长台，点燃

守岁的红蜡烛。全团人觉得高枕无忧，连卫兵都不派一个。

珍馐美味在长台上摆好，士兵们刚刚入座举起筷子，突然间响起一道子弹划空的声音，全座立刻悄然失声，惊得目瞪口呆。由于长期饥饿和苦难的折磨而枯瘦如柴的“朱毛匪帮”好象森林中的狼一般从地下钻了出来，一字排开包围了大厅，个个举枪待发。一声令下，地方部队的一团人象一个人似的举起双手站了起来。在夜色里，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把他们锁在一个石头建造的古庙里，派岗哨监守。

“我们替他们吃了这顿年夜饭，”朱将军大笑。“第二天早晨，我们转向东北，进入大柏地山区，敌人有一师人从两个方向对着我们开来。可是我们跑够了，开了一次会，决定用一劳永逸的方法摆脱追兵。我们选定了自己的战场。部队详细讨论并弄清楚了作战计划，然后召开指战员大会，人人举起拳头宣誓，不歼灭敌人，誓不生还。”

朱将军有个习惯，越是打得厉害的仗，他的叙述就越详细，但又附加一句，这仗“其实是很简单的”。林彪率领一团人乘夜色赶十英里路，要在天亮战斗开始以前插到敌人背后。敌人装备齐全，而红军每人不过二十发子弹。当他们从四面八方，并用他们所有的各种东西向敌人打过去时，子弹很快就用光了。他们便用枪托甚至树枝当棍棒。到了太阳当头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打垮了敌军一整师人。

只有大约一千名俘虏，朱将军从中拣选了一百名贫农。他要求他们加入红军，有苦同当，战斗到最后胜利。其余的俘虏都释放了，“因为他们是兵油子，鸦片鬼。……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

大柏地战斗是土地革命也是敌军士气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追赶红军的敌军始终保持一个相当距离，福建军队也撤回本省，声称此事与他们无关了。

红军派出无所畏惧的鼓动队去“发动农民”，不几天便占领了江西中部的宁都县城。地方部队和地主听说红军到了，早就鸡飞狗走，而商会按历来的惯例，扯下国民党旗，改悬红旗，并缴出五千块现洋和全城各处的钥匙。

朱德和毛泽东收下五千块钱，但是回绝了商会的邀宴。红军接收了地主的粮食和其他资财，把多余的东西分给城内穷人，并且召集了全城居民的群众大会。象占领其他的城镇一样，红军也打开了监狱的大门，不论罪名是什么，监犯一律释放，因为朱将军说明，“犯罪乃是阶级问题。”许多是政治犯，铁链琅琅，受过许多严刑酷打，弄得一身残废。还有一些是穷人，仅仅因为侵犯了私有财产，比如偷了些食物和衣服，就被关了起来。

在宁都三天，红军集中了伤病员，没收了地主的粮食，便转向西进，直奔已经准备欢迎他们的东固山区根据地。

向东固进军的队伍活象凯旅游行，农民们从每一个村子涌出来帮助运送伤兵和补给。东固山脚下的龙冈镇原是农民运动的强大中心，家家户户出来迎接红军，要求在家中款待他们。朱德和毛泽东在这里遇到李文林，他过去是黄埔军校学生，现在带着一连游击队，来领他们上山。

就象过去介绍井冈山一样，朱将军怀着对于大自然美景的深厚感情，描述了东固山区。这座山是贯串赣南赣北的一条大山的余脉，树木参天，地势极高，但没有井冈山那样险要。幽

径四通八达，到处都是苍松翠柏，竹林矮树，每到春夏，遍山漫谷开的都是野花。近山顶处，是一块宽广富饶的高原，散布着几个小村庄，中央便是东固镇。在灌溉高原的河谷里，也还有另外一些村庄。

东固南面二十五英里便是城墙环绕的兴国县城，过了几个星期，红军便拿下兴国，同东固联在一起，建成“东固—兴国地区苏维埃”。

东固原有的小医院小得无法安排红军的伤病员，许多人便应邀住在农民家里。

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着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鞋底和鞋帮有不同的颜色。他们的教育一天也没有停过。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一连一连的队伍在出操或者演习，一天两顿饭，第一顿吃完后，他们就听军事指挥员或政治领导人讲课，或者举行讨论会。

普通的教育课目，例如阅读和写作，当时并没有象后来那样作系统的讲授，但就在这土地革命开始的时期，指战员们也设法抽出时间来扫除文盲。铅笔和纸张十分珍贵，大家常常围成一圈坐在地上，用细树枝在地上写字和写数码。

但红军最有力量的教育方式、并且是它一向所用的方式，乃是总结过去战斗或战役的会议。这些会议每一个战士每一个指挥员包括朱德和毛泽东都参加。一切等级都没有了，人人有充分发言的权利。不但讨论——必要时还批评——战斗或战役，就是任何指挥员或战士的行为，都可加以批评。当然，如果批评失当，人人可以为自己辩解；如果批评是正确的，他们就要

受到司令部的处分。

朱将军把这些会议放在头等重要地位。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多方面得到培养和教育，而且可以保持军队民主化。有了这种办法，他说，凡是在战斗中失职的人，或是违反军队民主规章的人，都要降级并接受再教育，凡是那些表现优异、特别勇敢的人，都可以晋级，同时，那些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意见的农民战士，也可以学会思考和讲述他们对军事、政治和个人问题的看法。他可以体会到民主军队的性质同旧封建军阀军队有什么不同，他懂得了警惕性和责任心，他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革命军队一名成员的重要性。

在同样的会议上，新的战斗或战役计划也提交全体讨论，朱德十分重视大家在会上提出来的问题或想法。

“我们指战员虽然在战斗中接受任务，可是我们从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只让他们奉命执行而不了解其中意义，我们是一支正在建设未来的人民革命军。”

他记得有一次在东固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和他是主要发言人。“我们很弱小，”毛泽东向大家说，“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同平常一样，解释了革命的一般战略和战术。他说革命一定要首先占据农村小据点，建立牢固的山区根据地，例如东固山区和井冈山山区，最终联结起来。“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他继续说道，“人民政权就可以伸展到有大城镇的地区。从全国一小部分地区的解放，我们就可以扩展到较大或更大的地区；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

这个战略其实既简单又实际，人人都能理解。但着眼于整个大陆，并透过一层难以预知的未来的薄雾去观察，那就非常复

空，而且很容易使人满腹疑问了。

朱将军也有自己独有的讲题，他在演说中永远不忘记强调两种思想。第一，他对军民讲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从太平天国历述下来，这就使得他们认识到他们乃是伟大革命传统的继承人。第二，他一再重述，“象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果不进行武装斗争，就没有农民和工人的地位，没有共产党、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的地位，革命也绝对不会胜利。”农民在农村中的斗争，他说，只有在城市产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才能够成功。

在一九二九年的早春，他坦率地就他所知对军队和人民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他说，蒋介石已经派了国民党军队的十一个团封锁东固山区根据地。蒋介石也正在跟桂军交战，争夺领导权，因此无法象封锁井冈山那样派遣精锐部队来封锁东固山区。朱德又说，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福建军队不过是加入国民党军队的职业土匪，奉令来封锁东固，到现在也还没有露面。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能够躲在自己的老家不受干扰地抽税和贩卖鸦片”。

盗贼之间正在吵嘴打架，他说，人民就应该利用这机会组织和武装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他还进一步说明，东北的统治阶层和帝国主义也有冲突和矛盾。统治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而竖起了国民党旗，为了保护自己，他还把东北的外交事务全部交给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处理。就象蒋介石在其统治地区所做的那样，张学良声称有权任免在东北的所有国民党官员，这样，国民党在东北也就不过是一个军人政客的政党。可是日本人对于

张学良还心有不甘，对于东北也不愿放过。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也不愿撒手，因为每个国家都想夺取这一广阔的地区。

回想起这些影响深远的日子，朱德将军承认，反革命力量和帝国主义固然有冲突和矛盾，革命力量之间却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他说，例如到了东固，他和他的同志们发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中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些人乃是地主的儿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轻，受过教育，在大革命时期担负过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有几个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其中有一个是该校的教官。他们全都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后便回到东固家乡，开展土地革命。

这些“知识分子”——朱将军这样称呼他们，为革命做了一切，只有一样，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佃农们。作为曾经给过小恩小惠的地主，又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也得到农民和他们自己的佃农的支持。

这里，就在共产党内部和它所开展的土地革命中，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还有封建主义的明显残余。毛泽东、朱德和他们的参谋人员所碰到的事更为复杂，因为当时强大的敌军正在集结起来，对红军虎视眈眈，所以不敢坚持限令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要依照其所献身的党的纲领和政策办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的话，很可能发生激烈的内部斗争。红军因此只好等待革命的酵母逐渐在东固群众中间发生作用。

一年以后，这酵母果然发生作用了，土地革命象燎原之火一样在江西全省展开。由东固人民组成的红军第二十军团——指挥员和政治领导人都是东固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居然起来反抗红军。这些指挥员害怕起自己的农民军队，他们不敢否

定共产党和红军，却指控毛泽东和朱德为假共产党员。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小型共产党。

在这些地方领导人中间，只有一个人还忠于红军。这个人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五军团的参谋长，在朱将军于一九三七年谈起此事时，他还在红军，并且是延安抗大的教官。其他的人由于逆土地革命的浪潮而动，结果失败，因为土地革命已经不再是个人的事了。

第七篇 《上杭之歌》

第二十三章

一九二九年华南早春时分，集结在东固山区的这支小小的“穷人队伍”——农民就是这样称呼红军的——看起来根本就不象一支军队；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二十年后它踏遍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在东固的游击队，经过整编以后，全军大约有四千人。其中，有三千人在山上休息了仅仅八天，便出发作战。其他的人则留在后方，开垦土地和保卫东固根据地，这里面还有三百人是朱德、毛泽东手下的老兵，住在医院里，身体还未恢复到能够重新作战的程度。

在那出发作战的三千人里面，只有不到一半人携有某一类新式武器，其他的人只手持梭标。有一些人穿得破破烂烂，倒还能看得出那衣服过去曾经是军装，其余的则穿着满是补丁的裤褂，脚下是绳鞋，头上缠

着中国穷汉通常裹缠的五颜六色的头巾。

他们是消瘦饥饿的人群，许多人不过十五、六岁或靠近二十岁，手掌又大又硬，脚板生满厚茧，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不过是经年劳累、穷困、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大部分人识字。每一个人携带着一条长得象香肠似的干粮袋，斜挂在一边肩头上，另一头扎紧，斜拖到臀部。袋里装着够吃两三天的大米，过后只有靠地主的米缸，或是截获敌人运输队的大米来补充了。

他们的第二件装备是一条布制的子弹带，长得除了可以斜挂在两个肩膀上、在前胸和后背打两个交叉，还可以围缠在腰部。手中有步枪的人，子弹带里还装有几发子弹；那些手持梭标的，子弹带里却空空如也。朱德最后检查部队的时候，便对梭标战士们说：

“你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拿上枪，你们的子弹带里也会装满子弹。”

简直无法把朱德或毛泽东，或任何其他的指挥员从士兵中分辨出来。我看到过一张在一九二九年给朱德拍摄的褪了色的照片。镜头是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的不过是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

一九二九年早春时分，朱德在东固山区举行的军民告别大会上讲话时，也一定是这种姿势。他谈到从北面、西面、南面向山区根据地逼近的敌军十一个团。他也许曾经这样说——象

多年以来曾经讲过千百遍的一样：“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

敌人内部的冲突和矛盾，的确在多方面表现了出来。大家都知道，东固山区的东面，依然看不到敌军踪迹。正在与广西将领作殊死战的蒋介石，曾经命令福建军队开到山区东面，以便完成包围态势，可是命令并未执行。因为照朱将军的说法，“福建军队不希望别人干扰它抽税和贩卖鸦片”。朱将军说，蒋介石也不能够抽调出他的精锐部队来打红军，只好把第二流的地方部队调来作战。现在红军就要将敌军自山区引开，然后各个击破。

对于疲劳不堪、需要休息的人，八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开到东固山区的第九天晚上，正是满月当头，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着三千名战士，从东山坡下山，开始战斗。在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时，红军不仅使用自己创造的、适合现场情况的战术，而且运用了古时中国军队、蒙古军队的战术，十九世纪太平军的战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专门对付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的战术。

队伍开到山脚，快速行军的小部队就顺着红军主力部队的相反方向前进，到大城镇佯攻，把敌人吸引过来追赶他们，然后他们就在村落中消失，接着突然间在其他城镇出现。同时，朱德和毛泽东在很远地方的村子里解决地主民团，发动和武装人民，并且留下干部继续开展工作。

不久以后，敌人就在赣南到处追逐行踪飘忽的红军，而红军在农民的指引下，不时在夜间偷袭他们，用快速坚强的攻势

截断他们的运输队，然后销声匿迹，但不久以后又出现在多少英里以外的地方。

紧跟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红军并没有计划拿下长汀。为了躲避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红军一连强行军二十小时，来到赣闽交界处的一座迤邐南北的山脉，安营扎寨，这地方在福建长汀以北，距长汀不远。

长汀那时由当过土匪头子的郭凤鸣把守，他是从土匪头子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地主和国民党将领的。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从惯匪和鸦片客里收编为国民党军的。只要能把这支军队从长汀城墙后面引出城外，就有办法击溃它；不过，它除非确信红军又小又弱，是不敢出城的。

它只能从一条路线出城，这就是长汀北面的一条狭长山谷间的小路，山谷中间还有一条又急又深的河流奔腾穿过。红军露营的地点正在可以俯瞰这条山谷的冈峦上。

红军派遣他们的农民向导进入长汀，散布“赤匪”在城外一箭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的消息，说他们的武器既少，弹药又缺；然后，他们就枕着步枪睡大觉，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午前，敌军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出来。通讯员跑来报告说，敌军司令官坐着四人大轿跟着队伍，朱将军笑道，“大概是郭凤鸣亲自捡便宜来了。”敌军来到朱德和毛泽东计算好的地方，红军前哨便稀稀落落地开了几枪，装作仓皇失措、大叫大嚷地跑上山去。朱将军猜道，“我们的前哨只要放几枪，一定会把他们引上山来。”敌军果然立刻向上赶，而且越爬越高，一边喘气，一边流汗；一路上丝毫没有遇到抵抗，胆子越来越大。红军最后终于从隐蔽地点

一拥而出，敌军吓得心惊肉跳，掉头便跑下山去，红军则如泰山压顶，直扑下来。在小路上虽然也有一些战斗，但敌军到了河边绝路，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最后阶段正打得热闹，一名卫兵跑进朱将军的指挥所高叫道：“一个穿着高级军装、带着一身贵重财物的大胖子想坐船从河上逃走，被打死了！”

事后证明，这个大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郭凤鸣，那身贵重财物包括大金表、金链和在他的肥胖手指上所戴的好几个戒指。

黄昏时分，红军占领了长汀，把城内的敌军统统缴械，第二天黎明，就在城内和城外方圆五十英里的地方建立起政权。毛泽东一如往常，毫不休息就展开工作，象在土地革命开始时一样，重新建立群众组织，并且筹备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长汀是整个地区的中心。有一些地主被捕了，有一些潜往南面的上杭城。不久，这一地区的土地就由村委会和区委会分配了。

经常只睡三四小时就能不停地工作的朱德也有他自己的事务。他对俘虏兵进行审查，遣散了其中大部分鸦片鬼和兵油子，他动员并吸收了一千名年轻的农民志愿参军。他和他的下属把另外二千名农民组织起来，年轻人则编入赤卫团。在解放了的地区内，到处可以看到这些农民一队队地练兵，学习按照节拍正步前进的困难艺术。

赤卫团是一种民兵组织，不脱离农业生产，主要是用梭标武装。在树林丛生的大山里打交道，梭标往往比步枪还实用。正规的农民游击队都是些健壮能干的小伙子，比起赤卫团，装备要好得多。他们成了正规红军的预备队，但在作战

时，只算作辅助部队，绝不作第一线战士。他们在敌后活动，伏击敌人的通讯兵和巡逻队，毁坏敌人的营地和交通线，在树林里打冷枪，并且向白军喊话，展开自己特有的宣传战：

“弟兄们！不要给地主军阀当炮灰了！把那些打你们骂你们的军官们枪毙了吧。穷人不打穷人。过来跟我们吧！”

许多有关长汀的情景铭刻在朱德的记忆里，他特别提到其中三件事。第一是郭风鸣的尸体，农民们要亲自看过才确信他们的敌人是真死了。而且，在他们来看的时候，朱德亲耳听到他们说：“那个就是天下第一大坏蛋！”

他还记得供应郭风鸣武器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在缴获的武器中间，有两千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都是崭新的，而且是日本造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风鸣，专给他的部队做军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现在则组织了工会，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每班八小时，给红军做军服。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

“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他带着惋惜的笑容想起这段往事。“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带有红星的军帽。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过了很久，我们必须从长汀撤退，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作人员愿意

随我们一起走。他们随身带着机器，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长征期间，缝纫机也跟随我们，那时，裁缝常在露天地里就干起活来。他们现在还在我们这里，还有那些缝纫机。”

在朱将军的建议下，我访问了这家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建设起来的被服工厂。缝纫机上还带着它们的日本商标，那些裁缝现在都近中年了，个个又瘦又黑又严肃，仅仅抬头张望一眼来客，便继续埋头工作。

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占领没过几天，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通讯员就到了这里，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由于中国的白色恐怖，这次会议是一九二八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决议，这个决议和中共六大决议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年以来，这是由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首次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向是根据情况需要和信念，自己选择道路并采取行动的。

上海来的通讯员到长汀后没有几小时，一个农民走进了朱德的司令部。他解开短褂，在衣服里子里，取出了上面写有几行小字的布块，下面署名是彭德怀。朱德和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一月突破敌人封锁下井冈山的时候，留下年轻的彭德怀指挥留守井冈山的队伍。此后的情况，他们就一无所知了。彭德怀来信说，他现在带领队伍驻扎在瑞金，请示朱德和毛泽东，是他们把队伍带到他那里去呢？还是他到长汀来。瑞金是江西南部一座小城，从长汀往西走，有两三天的路程。

毛泽东和朱德带着一批军政代表和一营卫队，还带着那个从上海来的通讯员和文件，立刻前往瑞金。在瑞金，彭德怀——这个沉着严肃的汉子，向他们报告了如下的经过：

自从朱德和毛泽东在一月初离开井冈山后，敌人只是逐渐收缩包围圈，最后来了一次奇袭。敌军派出一名士兵，在腰间系好长绳，爬上山中峭壁，直到峰顶，其他人也跟着上去。他们在偏僻的山径上杀死了红军哨兵。于是，成千上万的敌军部队便从这条山径涌上山，扑向陷入重围的革命军。这批红军大约有六千人，因为饥饿不堪在医院或营房中濒于死亡。

彭德怀尽最大可能延长抵挡敌军的时间，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伤病员逃入森林中。有一些伤员踉跄爬出，终被捕杀。其他的则被砍死在床上。营房和医院被烧成灰烬。井冈山上的每一所房子、每一座建筑物都被烧毁，防御工事也遭破坏。

在恐怖的屠杀进行之中，雪花飞飘，寒风呜咽，好象唱起挽歌。彭德怀收容了劫后余生的人，大约有七百名，带领他们沿着朱德和毛泽东突围时所走的道路，穿过峭壁，爬过石山。这支部队的情况比年初下山的那一支还要恶劣，可是一旦逃避开敌人的封锁，便立刻向敌人展开有力的攻击。他们到处打听朱德和毛泽东，但始终没有找到。偶尔在几个地方从农民嘴里打听到行踪，但过不了好久，便又失掉踪迹。彭德怀曾猜想朱德和毛泽东已经遇害，开始单独进行加强红军和组织群众革命的工作，许多农民投到他的部队，现在在瑞金已有一千五百人之众了。

彭德怀在江西西部听到了长汀被红军攻占的消息。他转过头来，一路向东边打边进，直到打败瑞金守军，占领了瑞金，开始组织和武装农民。

这就是彭德怀在瑞金会议上报告的经过。自从朱德和毛泽东偕同其他同志到瑞金后，会议一连开了三天和三个大半夜。对于上海来的通讯员所带来的报告和决定，也作了研究和讨论，朱德就这次会议的成果，简单而严肃地说道：“我们接受这些决定，着手执行。”

有了与外部世界的一线交通，朱德和他的同志们感觉到不再是在黑暗中战斗了。这几份写在最薄的宣纸上的蝇头字迹的报告，向他们指明了帝国主义在国外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在中国国内为了控制蒋介石南京独裁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关键部分都有外国顾问）而引起的冲突和矛盾。一名从印度来的英国官员是外交部“顾问”，美国人高踞财政部和交通部的要津。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的金融界正在筹划如何购买中国的全部或部分工厂和矿山，例如江西西南部的著名大庾钨矿。外国人在中国还另有一笔好生意，即不但把军火和枪械卖给蒋介石，也卖给那些反对或支持他的新旧军阀。报告里还详细提到中国的新旧军阀之争。

正当中国遭受劫掠，而蒋介石和广西将领在各自的外国后台老板支持下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全国许多地区爆发了革命斗争。在长江沿岸和江北某些地区，农民挺身反抗但又遭受屠杀。远在北方的山东出现了零星的暴动。受过教育的农民方志敏在江西东北部建立了一支农民队伍；农民领袖彭湃仍在南方的广东东江地区领导游击队；中国的“盘科·维拉”①贺龙在

①“盘科”是墨西哥民族独立运动战士弗兰西斯科·维拉的绰号。他生于一八七七年，是贫农之子，反对戴伊兹的专制政权，也反对美国的武力干涉，在一九二三年与同志三人一起遇害。——译注

湘西组织起一支农民队伍。

在南方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广西警备部队发动兵变，在省内建立了大片游击区，其中的村镇组成人民代表会议，由人民自己执政。可是一年之后，广西将领们败于蒋介石之手，重新缩回本省。他们的军队获得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补给，用火和剑扫荡了游击区。六千名广西革命者一路转战来到赣南，朱德将他们整编为红军第六军团。

沉思往事，朱将军回想起上海的一份报告里提到“托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他说，这些人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指责共产党——尤其是指责朱德和毛泽东，说他们不但“没有回到城市去领导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完成民主革命而斗争，反而退却到偏僻的内地山区，进行军事冒险主义和土匪活动。”

“在这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空虚字眼后面，隐藏着对革命的背叛！”朱将军愤怒地说，“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人民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只有靠枪杆子才能争取到手。在上海、汉口、广州和其他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要求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要求在法庭中能有替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而在大街上被砍了头。任何人只要使用‘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就会被当作共产党，抓到就枪毙。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童工，以及要求自由组织工会的思想，都被打上‘共匪’的印记。

“从一开始，毛泽东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便认识到，只有用武装打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走狗，中国人民才能得到民主权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可是地

主统治下的最单纯的农民，或是处在国内外反动力量的鞭子之下的最单纯的工人，却了解这种看法。对于毛泽东和我以及我们所率领的队伍来说——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而向国民党刽子手们引颈就戮。”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瑞金会议制定了两项军事和政治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要在赣南和赣中击溃反革命力量，把这个地区连同闽西地区变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应该不断扩大，以便与华南地区的零星苏区联结起来，这个方案由朱德和毛泽东执行。

第二个作战方案由彭德怀负责，派他重回井冈山，尽可能恢复群众运动。这项工作完成后，再前往他当年的根据地——江西西北的萍乡煤矿地区，把这一地区巩固和发展起来，直到把邻境的湖南、湖北地区包括进来，最终与朱德和毛泽东在赣东南建立的中央苏区联结起来。

休息了两个星期，拿到从长汀送来的新军服之后，彭德怀和他的队伍便出发执行计划，毛泽东和朱德也折返长汀。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率领一千人马，进兵赣中，攻打兴国敌军。兴国在东固山区游击根据地以南不过二十到三十英里，他要把兴国和东固打成一片，成为坚强的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军的学校、医院、兵工厂和其他机构才能确保安全。

毛泽东出发以后，朱德又把部队重新挑选和调整，以便在长汀和瑞金地区组织和训练游击队。一个星期后，他也自长汀出发，向赣南推进。东固以东的宁都城（红军曾一度占领）是他的最终目标。

朱将军在叙述这些战斗时通常把军事情况讲得有条有理，

详细说明这些仗是怎样打的，缴获了多少和什么样的武器，缴获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装备，这就为长期以来在困难中成长的革命描绘出一幅清晰的图画。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就是不懈斗争和耐心教育的化身。

他虽然谈的多是军事，却是一个见闻极广的人，只是他的平易近人和相貌平凡，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谈到作战的时候，他有时只不过把战斗情况提上两句，而事实上那一仗打得非常激烈。他不提这些，却生动地谈到穷人们的悲惨遭遇，很象一个社会学家；有时他也谈起深山茂林、山峰支日托天的壮丽景色，并把这片景色和当地的野花同他的四川老家比较一番。在他的回忆中，也时常流露出他对民歌的兴趣和热爱，甚至令人不禁猜测，如果他在另外的年月和环境出生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现在，在叙述他对赣南的地主民团和地方部队的猛烈攻势时，他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一面又出现了。他说，在这些地区，农民居住的小村子只有一道残破的围墙，仅有一个门可供出入。墙里面是两排污浊不堪的茅草小屋，中间有一条街，到雨季是一片沼泽，而在干旱天气，两边的阳沟里又堆满了腐臭的垃圾。

昏暗的茅草屋只有一个门而没有窗户。屋里面，有些人家就把稻草铺在硬地上当床睡，也有人架起几块木板当床，上面堆着稻草，又铺又盖。大家穷得连被子都没有一条，就穿着仅有的一套衣服入睡，一件短袄和宽腿长裤不知缝了几辈子的补丁。家里也许有一张粗糙不堪的木桌，几条板凳，供吃饭用。水炉是泥巴砌起来的，下面通风，上面架一口锅，这就是

全家唯一的做饭锅子，柴火是孩子们上山捡来的干草和碎树枝。饭碗是土碗，打烂的碎块又重新锯上。筷子就用竹子削成。

文明之光从来没有在这些村子里照耀过，这是疾病和疫病的温床，还不时发生惊人的刑事案。高达收成的百分之七十、甚至更高的地租，高利贷，灾荒歉收，当地政府和军队的赋税徭役等等，决定了死亡率必然极高，以致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朱将军断定，农村里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是贫农——佃户——和长工，几乎个个都是文盲。镇上和城里虽然有学校，但只有那些能缴学费、能为孩子缝制学校制服的有钱人家才供得起上学。

那些“头上长了一百个脑袋”的地主——农民这样称呼他们——住在大城镇里，安安稳稳地躲在高墙背后。他们既是官吏，又是法官，陪审员，执行者。民团司令在秋收的时候，派出地方警备部队去监收，不许农民把一颗粮食埋藏在地里头。

农民对于悲惨生活的宿命论和无能为力的观点，这时象千年冰河在春风吹拂下解了冻。谣言从东传到西，说是有一个名叫“朱毛”的农民，正带着一支“穷人队伍”，专门对抗达官显贵。据说这个人神通广大，可以呼风唤雨，帮助部队打击敌军。

那些为部队打前站的又瘦又黑的汉子，用具体的事实而不是神奇的咒语来给农民讲革命道理。听了这些话，农民抬起头来，往往不等队伍开到，就拿起最原始的武器开始战斗，直到最后被城内开来的民团打垮为止。农民领袖的头颅被悬挂在起事村子前的高竿上，夜间，妇女跪在高竿下面嚎啕大哭。真象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朱将军称他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

诗句所说的：如闻泣幽咽^①。

许多农民死里逃生，精疲力尽地带着血红的眼睛，投奔朱德。有些人为自己的儿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我要拚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细听了他们的遭遇，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年轻指挥员说道：“发枪给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

就是这样，在赣南朱德的四周，在兴国毛泽东的四周，在赣西北方彭德怀的四周，响起了农民的怒吼声。中国其他几十处地方也有同样情况。二十年后，正是这种怒吼声摧毁了自古相传的压迫。

“我们根本用不着围攻村子，”朱将军说，“整村人都迎到村外，甚至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欢迎我们，不过，地主的据点还是要攻打才能占据的。我们把矿工组成小型工兵队，就在城墙下挖洞，把农民制造、准备做爆竹用的黑火药装在里面。如果爆破失败，部队不能够钻洞入城，农民就扛过竹梯来，由我们翻越城墙。妇女、儿童经常与我们一起前进，随身带着扁担和筐子，准备到地主家清仓。我们的部队在自己的干粮袋内装满够吃三天的米，剩下的都由农民拿走。我们每到一处，都要留下些受过训练的人，在当地组织和领导农民。”

东荡西除，南征北战，一连打了好几个星期，朱德最后直奔北面，进迫宁都城下。他当年曾经不发一枪，占领了全城，这次城内则有一团人驻守，由国民党的团长雷世宁指挥。这个姓雷的人出身于附近石城县有名的地主军阀家庭，雷家的老

^① 见杜甫五言古诗：《石壕吏》。——校注

大，已做到蒋介石军队里的将军。据农民说，雷团长一共有三十个女人，而且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要把“赤匪匪首”“朱毛”的头悬挂在宁都城墙上。

宁都城墙坚厚，红军无法爆破，于是先包围了全城。不久就开始冲锋，农民运来长竹梯，靠在城墙上，部队就冲上城去。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好几百士兵和农民，不过，城池和全部守城部队都被红军拿了过来。

当时军政工作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人都是遇到工作就做。朱德的名字在宁都苏维埃的名单上也出现了，远处的几个村子还选他当他们的农民协会主席。朱德不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种象征，一个与红军不可分割的名字；而红军指战员往往也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农民都管他们叫“苏维埃先生”！

“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朱将军说，“我们永远大开牢门，不管犯人的罪名是什么，都把他们放掉。犯罪是个阶级问题，这些犯人中间绝对不会有真正的犯人。他们不过是无还债付税、或是偷窃一点东西就被关起来的穷汉子。我们经常发现，犯人中间有许多人被疑作农会或者工会的人，甚至于共产党。这些人大部分已经死亡了，就是侥幸活下来的也是上着脚镣手铐，两条大腿被铁链磨得遍处伤痕，连走都不能走一步。人人一身虱子，长发蓬乱，不少人得了肺病、心脏病，有的还患上赤痢、伤寒，已经濒于死亡。牢里不供给伙食，要由犯人家属送饭，看守把送来的较好食物都吃到自己肚子里去了，犯人个个骨瘦如柴。”

朱将军经常找时间与俘虏们谈话。宁都的俘虏都是些穷苦、不识字和心地朴实的农民，据朱将军说，“除了放枪之

外，什么也没学过。”朱将军为全团人开了大会，说明政策，凡是愿意参加红军的都可以参加，不愿参加的，也可以领路费回家。

有一批人参加过来，被调往东固山区根据地受训，其他的则按照会上的诺言予以释放，有如朱将军所说，“让他们在农民和国民党士兵中间起酵母的作用。”

攻占宁都时，敌军团长雷世宁换了便服，躲藏起来。大家终于把他搜出，拉到朱德面前——雷世宁当初许过愿，要把朱德的头悬挂在城墙上。

听说这个人素以玩女人出名，朱德以为他必定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色鬼，因为三十个小老婆的确需要高度地耗损精力。因此，两名身体健壮的卫兵把雷世宁夹在中间带到司令部的时候，朱德几乎大吃一惊。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干瘦的汉子，而且从未见过有象他这样矮的，此外，在俘虏中也显得最为怯懦。

“有三十个小老婆，还想把我的头挂在宁都城墙上的家伙原来就是你！”朱德惊愕地喝道。两旁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阵哄堂大笑，把那小矮个子的最后一点矜持也全部破坏无遗了。

“听着！”朱德对小矮个子说，“我们本应该枪毙你，但只要你服从命令，就可以不执行。你在石城的家里，存有许多步枪、机关枪、军火、银元，以及从农民手里抢去的大米。你已经有五个月没给你的部队发饷，这笔钱也被你吞掉了。现在，你应该把这些枪支、军火、现款和大米运到我们这里来；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张药品单子，要从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买到。这些东西在交到我们手里以前，你是我们的俘虏。只要

东西交到，我们就放你。”

这“龟孙子”——红军士兵都这样叫他——写了一封信，由他的一名部下送到石城他的老家。过了几天，他的大老婆坐肩舆来到宁都，随带有大批夫役，除了药品之外，什么东西都运到了。当天晚上，她和她丈夫住在一处，朱德的几个参谋闲来无事打赌，猜她一定痛骂他不该让人家俘虏，要用这样大的代价来赎他。他们倒也有一件事捉摸不透：这女人为什么还赎他呢？

三个月以后，红军正在福建作战，雷家终于送到所需要的医药补给。朱德一直把雷世宁当俘虏，现在则实践诺言，给了一张安全通行证，把他放掉，但冷冷地向他说道：“如果再抓到你，绝不会再象这样便宜！”

占领宁都几天之后，毛泽东从西面的大山上下来，他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来负责进行宁都县的政治工作。朱将军还想得起宁都城墙上悬挂的大幅标语：“没收和分配土地！……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武装人民！……扫除文盲！……焚毁鸦片！……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宁都的胜利并没有维持很久，占领该城两个星期之后，红军便再度踏上征途。敌人三个师血红着眼睛从北面扑来。红军首先协助宁都苏维埃和各群众组织转移到山区乡村，然后开拔奔向长汀，后面还有两师敌人紧追。从沿海和从广东调遣来的敌军也同时施加压力。

打仗要挑选敌人最薄弱的一环，这一次偏巧福建军队从沿海开到前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掠过长汀，发动闪电式的

攻击，一举便攻占了福建军队的补给基地龙岩。他们在那里缴获了各种军需品和一万磅鸦片。

朱德和毛泽东在追悼牺牲人员的大会上都讲了话。参加大会的有整个龙岩地区的老百姓，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死难士兵还享有这样的荣誉。大会点起篝火，把缴获的鸦片烧掉，由朱德举行点火仪式。毛泽东对群众说，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朱将军选定了—个讲题，这讲题在其后年代中，不知重复了几千遍。他复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从太平天国一直说到—九—、—九—五、—九二五———九二七年的革命，要求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乃是伟大、神圣的革命传统的后代，而这传统正是殖民地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许多年以后，作者本人经常听到朱将军在同样的场合中讲话，所采用的方式总是一样的。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演说家，在露天会场中声音显得微弱，也没有戏剧家或演说家那样的风度。他倒是象一个教师，而且时常停下来问道：“懂不懂？”下面的回答如果是不懂，他可以选用其他更平易的字句，再重复和讲解—次。

闽西、闽南和赣南，这些人民经常保持斗争的地区，出现了艰难的日子。强大的敌军占领了所有大城镇，人民埋藏了珍贵文件，逃到农村，神出鬼没地不断伏击。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领另—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的主要

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

夜间行军，同时还要伏击随后追来的敌军，经过千百次小规模的战斗，朱德迅速推进到沿海港口漳州。

大城市里的国民党报纸嘶叫道：“赤匪首领朱德践踏福建，残害农民，奸淫烧杀”，事实上，农民在夜间为朱德的部队带路，白天在村子里为他们掩护。各大城市议论纷纷，一向把福建省划入势力范围的日本人也向蒋介石询问是否能打败“赤匪”，如果不能，他们就不得不越俎代庖了。蒋介石要求稍待时日，并希望外国多给武器和军火；而他的确拿到了。

朱德还记得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与两倍于他的敌人打了一场激烈战斗以后，队伍来到一条奔湍的河流旁，用绳子系在两岸树干上，他和队伍用双手一把一把地从绳上迅速过了河。他们在一片秋阳的草地上休息，正在啃嚼青草的黄牛用一种忧戚的眼光直望着他们，刚从欧洲回来的团长刘安康——当年就阵亡了——对着正在休息的队伍讲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情况。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领导下执政了，国际银行家正在扶植德国资本主义，想把德意志共和国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筹划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把中国变成和平和进步的基地，就没有办法拦阻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年九月一日，朱德回到闽西苏区。那时，由于毛泽东的队伍不断袭击，福建军队已经闻风逃窜，而国民党嫡系军队也撤走了。可是毛泽东正患疟疾，又没有奎宁丸可吃，情况很是危险。那一年，疟疾夺去的生命比战场上夺去的还多，内地商

人用高价卖出来的奎宁丸不过是苏打片，只搀杂了少许奎宁粉，以便药片带着一点苦味。

红军医疗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医疗队伍——派了一个人穿过敌军防线到上海去买奎宁丸。他胜利归来后，又一次被派去，但是这次他永远不能回来了，他在途中被抓去砍了头。不能再派人去牺牲了。

毛泽东虽然病情危险，到底在绝处逢生了。在英国浸礼会受洗的傅连璋医生在长汀参加红军以后，就负责医疗队工作，他经常到毛泽东在生死关头挣扎时所住的小村子去探视他。

红军还由朱德率领，他把长汀的敌人困在城内使他们无路可逃，同时攻击并收复了几个星期以前丢失的村镇。疟疾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可乘之机，至于这是什么原因，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经历了四十三个寒暑，出入死亡之门不下千次之多，可是还始终不知道疾病是什么滋味。

“朱将军为什么连蚊帐都觉得不重要呢？”我有一次问傅连璋医生，他疑惑不解地摇摇头。

“谁也说不上，”他答道。“这个人生下来就结实。我记得他晚上就盖一块布，从来没有蚊帐。我有时见到他，但凡能够谈几句话的时候，他总是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信基督教，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他对什么都好奇，很有幽默感，惹得农民和战士个个喜欢。而且他永远乐观。不过，这些事情当然都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疟疾。”

第二十四章

朱将军再来叙述他的生平的时候，他谈起了歌曲和战斗；对于他来说，唱歌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他自己的生命和思考也都溶化在战斗中了。

“在我们来到以前，”他开始说道，“老百姓很少唱歌。当然，他们那里也有几首相传已久的山歌，由几个单身人唱；只有革命到来以后，老百姓的能力才表现出来，他们创作了各式各样的歌曲——有的很简单，甚至很原始，就好象农奴刚解放出来时所唱的一样，可是也有一些很有内容。这些歌在有钱人听来也许觉得可笑，因为有钱人只喜欢些歌颂爱情啊，酒啊，月亮啊或者小老婆的眉毛的诗歌。可是在这些歌曲里，农民表现了他们的希望，或是表现出他们体会到可以引导他们奔向自由的新事物。教给老百姓学会集体合唱的是红军。福建和江西山区的农民还在旧调中填上新词，有时也创作全新的民歌。

有一首新歌叫做《上杭之歌》，农民几乎把从红军那里学来的东西都编在歌词里，充满了对穷人的同情，对地主的仇恨，这些地主正据守闽南城墙环绕的上杭城，如同中世纪的领主据守城堡一样：

工人农民听我唱，
我们都是穷苦汉，
我们累死累活，
地主寻欢作乐。

一要高举红旗团结好，
二要袖章挂臂上，
三要消灭反动派，
四要从地主手中夺步枪。

人民大众要记清，
打倒军阀卢汉民，
俘虏敌兵要待好，
他们也是贫穷人。

进了上杭莫把商人扰，
保护穷人要记牢。
捉住地主狗豺狼，
坚决斗争不能让。

切莫忘记狗地主，
军阀、高利贷和县官，
税吏、警察、民团、商会、国民党，
全是狗彘之辈大混蛋。

工人农民要听清，
订日攻打上杭城，
消灭吃人大地主，
中秋节过就发兵！

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朱将军在九月中旬带着两团正规军和几队赤卫团进攻闽南的上杭城。一路上，农民们拿起锯子、斧头和梭标，跟他们一同前进。一个靠近黄昏的下午，朱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站在树木葱绿的山坡上，在落日余晖中，俯视着脚下山谷里作为地主根据地的坚厚城墙。只有一条路可以从陆地上通往城池，那就是西门大路。西门修筑起坚强的工事，城门每天只开几个钟头。其他的城门都关闭了，从城里用沙袋堵死。

朱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仔细观察进攻路线。朱德并不打算象敌人所预料的那样从西面进攻。他转过头来对站在旁边的林彪团长，手指西门前面的那排山头说：

“在那排山头上摆上几门迫击炮，就可以把所有敌人吸引在城那边，我们从后面爬城进攻。”

他们已经熟知地形，因为赤卫团作过详细报告，甚至在沙地上绘出草图。城北不远，多固河恰好在那里沿着城墙折向北、东、南，形成马蹄形；河曲和城墙之间有一狭长地带，要

在当晚拿下。靠近北门外，有一个树木很多的小山冈，朱将军决定在那里建立第一个指挥所。

朱将军对戏剧很内行，现在，在他们脚下的整个情况便极富戏剧性。他们有数以千计的人站在这个树木茂密的山上，眺望着丝毫不知道他们已经来到身边的敌人。敌军士兵还在下面河沟里坦然无事地洗澡、洗衣服，懒洋洋地躺在河岸上，甚至连农民和红军砍伐巨竹、制造云梯以便当晚攻城的声音都没听到。

夜幕垂落，上杭变成了仙境。它有一个电力厂，市政当局和守城的官儿们在城墙上挂满电灯，认为这样一来，城墙下有什么风吹草动，城墙上的巡逻队都可以发现。事实上，这些灯光反倒把巡逻队暴露在光亮里，赤卫团从山坡下来，在夜色中渡河，进入马蹄形地带后，就向城上的光亮处射击。朱将军微笑说，这既是“打靶练习”，又可以扰乱敌军。守城的人认为这种进攻无关痛痒，也就不加理会了。

月亮升起了，一切按照计划行动。林彪带领一个团向城南出发。农民已经调配好船只，渡他们过河。过河之后，农民们又回到马蹄形地带内。同时，朱德率领其他部队和赤卫团前往城北渡河，农民们把船只并排摆好，用竹篙撑稳，船上铺好木板，变成一条船桥，队伍转眼间便跨过河去。

过河之后，马上有人带着迫击炮到城西的小山头上架炮，“摆出排炮架势，把敌人吸引到那个方向。”

午夜时分，朱德在北门外马蹄形地带内的小山头上建立起指挥所，他的部队和赤卫团，连同推着云梯的农民，团团围在北城和东城的城墙外面。调动上出现了一些毛病，所以直到攻

击开始以后，林彪才赶到南城城下。

狙击手几枪就打熄了城墙上的灯亮，这是让城西迫击炮手开炮的信号。敌方守军连忙找地方藏躲，以为这次又是赤卫团的无关痛痒的攻击。接着，迫击炮弹在西门上空落下来了，敌军一旅人连忙向西城增援。农民们于是敏捷地扑到城脚，架起云梯。红军和赤卫团——朱德和农民跟在后面——象人流一样涌入城内，赶到街头。

这场战斗也并不象朱德所料的一下子便定了大局，敌军部队和武装地主们由于无路可退，一直顽抗到第二天中午。红军把他们全部缴了械，把监狱里的犯人释放出来，又把地主们关进几百年来肮脏不堪的监狱内。这些中世纪的暴君浑身颤抖，望着红军把饱受凌辱的政治犯抬到监外。犯人折磨得有的不能行走，有的甚至失掉了说话的能力。

毛泽东还患着严重的疟疾，用担架抬着来到城里，他在病床上指挥所有的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恢复各群众组织和成立上杭苏维埃。远近农民涌进城来庆祝胜利，参加分田，参加公审地主。朱将军回忆起这些审讯。年已花甲的老母、寡妇、父亲和兄弟们冲到地主面前大叫道：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的兄弟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听不见答复，他们抡起拳头便打。负责维持秩序的赤卫团拒绝执行保护地主的命令。

在上杭没有几天，朱德再度踏上征途，扫荡闽南的全部敌军。最后，他和他的队伍在十月底涌入了邻省广东的东江地区。两年以前，铁军就是在这里被打垮的。这一次，他又被十九路军打败了，十九路军派出装备精良的三个整师来穷追。他

损失了几百人，然而最大的损失之一乃是红军出色将领、受过高等教育的团长刘安康阵亡。朱将军的心看来好象是一幅卷轴，上面刻满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战役以及在他指挥下的阵亡将士的姓名，他念念不忘。

留下两连志愿部队加强东江地区游击队，十一月底，他再度北撤，穿山进入江西。行军时，他感到心情沉重。

“国民党损失几千人也不在乎，”他沉痛地说，“可是我们的士兵不是军阀棋盘上的小卒子。我们就是这样教育每一个红军士兵的，就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也要能够号召起一支军队，继续革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他也知道，在理想的中国没有出现以前，会有许多挫折或部分挫折，成千上万的人会因此而牺牲。但每次受挫和每牺牲一名部属的时候，他还是深感痛苦。他屡次想使自己把思考转移到部队这次又带回来几百支新枪、弹药和补给，可是仍然不能释然于怀。直到部队在粤赣边界遇到一支游击队以后，这层愁雾才稍稍揭开。

这支队伍有六百多人，其中将近两百人曾是老红军，一年前跟着他和毛泽东突破敌人封锁，离开井冈山。那年严冬，红军在附近山区中且战且走，他们有的伤了，有的病了，就脱队住在农民家里休养。红军给每一个人都留下步枪和几发子弹，告诉许他们，只要好了，就组织和领导农民展开游击战。

生还的人果然这样做了。他们一个个串连起来，就组织了小小一团人，完全依照老红军的方式，连每一班都设有政治人员这件事都不例外。他们回到红军队伍以后，便引领朱德到了一处安全的游击区休整，同时派遣通讯员向在福建的毛泽东报告

经过。

通讯员带回报告：在朱德出兵之后，敌人的强大部队攻占了所有大城镇，上杭也在内，可是农村还在人民手中。毛泽东已经退到福建山区的古田，建立苏区，并且打算在那里举行筹划已久的第九次红军代表大会，开会日期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①，离现在只有两个星期了。朱德队伍中的每一个连都要选出代表去开会。

一路上打回古田，朱德还企图重夺上杭。他失败了，但曾经把长汀的敌人赶走了几天。敌人增援部队来到，他便放弃了长汀。朱德在新年的凌晨时分来到古田。全村人都来迎接他和他的队伍，好象他们是凯旋归来似的。

“那年收成很好，”离开了原来的题目，朱将军说：“把地主赶跑以后，分了田，农民不但够吃，还有余粮拨给军队。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到古田区，人人带着铺盖和一个星期的粮食，每一处的人都来给我们送礼。他们带来大批白米，还有鸡鸭，甚至还赶来猪啊牛啊，让我们过年时吃一顿好的。

“我们的队伍和老百姓在一块儿做饭，一块儿吃，到了晚上，满街响起锣鼓声，爆竹噼啪乱响，歌声四起。在几千只彩灯的照耀下，彩龙飞舞。农民们一边游行，一边唱歌，我记下了其中一首。它开头是：

你穷我也穷，
十人九个穷，

^① 古田会议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校注

九个穷人团结好，
老虎地主哪里跑？”

朱将军在红军代表的古田会议上提出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毛泽东就政治问题提出报告，不仅谈到红军和苏区，还谈到国内局势和他当时所了解的国际局势。

毛泽东说，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出现了经济萧条，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国民党政权正使中国进一步沦入殖民奴役的深渊中。在国民党独裁政治下，三年的时间还不到，中国矿山、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大部分股票便转移到外国人手中。英国和比利时资本家正想购买著名的江西大庾钨矿，并且为了此事，限定蒋介石要摧毁红军，维持“和平与秩序”。

中国处于持续性的经济萧条之中，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发展，它也更显得萧条了。中国大城市的工厂，关厂之风大盛，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失业队伍。那些还在开门的工厂则大量使用廉价的童工和女工，就是这些儿童、妇女有时都不得不冒险罢工，但又被棍棒枪械镇压下去。谷贱伤农，蒋介石又在华北对冯玉祥展开攻势，以致又有几百万农民家破人亡，这些农民沦为土匪、歹徒，有的则为每天三顿饭而参加了军阀军队。

毛泽东指出，作为人民的武装力量，只有红军才能为既贫穷又受迫害的中国人民提供革命的解决办法。可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军队中实行一定的改革。他在会上提出的一项关于未来政策的方案，是在会前与朱德和其他领导人长期磋商的结果。

第一，他说，必须首先由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作出决定，然后交给大家讨论，直到广大战士都弄清决定的内容并同意执行为止。这就改变了过去所用的办法——招致了许多次军事失败的办法。

其次，军队里的“绝对平均主义”必须肃清，因为它只会造成团结涣散，而且有时会导致失败。在这之前，部队里流行一种思想，即无论是分配粮食、衣服，携带供应品，分配营地和勤务，以及使用马匹，都不应该有任何差别。他们甚至于反对给伤病员分配特别食品，并且坚持不管年龄、性别和身体情况，每一个人在行军时应该负担同样重量。他们还批评指挥员骑马是不民主。

毛泽东指出，粮食和衣服可以而且应该由战士和指挥员平均分配——对于伤病员则应该给予特殊照顾。每一个人不应该负担同样的重量，这要量力而行。有一些队伍需要较大的营地和较多的勤务才能执行任务，而那些指挥员之所以要骑马，是因为他们要工作至深夜，在战士们安歇以后他们还不能休息。

毛泽东也提醒部队中的许多知识分子要避免“唯心主义”的倾向。他说，唯心主义者只在头脑中考虑抽象的理论，而不认真研究社会、军事和政治的具体问题，不根据事实便作出了结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会议结束以后，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单位召开大会，经过详细讨论和辩论，接受了这一方案。朱将军认为，这些改革大大地巩固了军队，它因此得以解放赣中和赣南，而且夺回了已经丢失的闽西各大城镇。这块名为中央苏区的地方，从此不断扩展，最后包括了江西和福建的大部

地区。

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到四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的主力部队，敏捷而有力地打击老滇军——他自己原来是老滇军的旅长。蒋介石命令老滇军狠狠地打击红军，甚至“连根拔掉”，但是到了六月，滇军士气低落，溃不成军，蒋介石只好另派队伍调换。

滇军瓦解的情况使朱将军为之失笑。他说，这支部队不仅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还经常派遣农民通讯员向他传递消息。很多人要求农民带领他们投奔附近的红军部队，还情愿付出一两块现洋作为代价。

早在一月，当滇军的攻势刚刚开始时，“剿匪司令官”罗炳辉上校就率领全团人投向红军，他后来在红军里南征北战多年，直到十三年后逝世。

在这次极其特别的战役中，毛泽东也指挥着一支部队，迅速担负起新解放区的组织和重建工作。朱将军则不失时机地动员和组织青年农民参加革命。

朱将军回忆道，在城镇和乡村按照手续建立起人民代表会议之后，一切旧税都予取消，取代它的是一种粮食累进税。由于部队的补给是从敌军手中缴获过来的，所以全部税收都可以用于建设。各地严禁高利贷和鸦片，将抵押品和借据通通发还，小学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都建立起来，第一个小型农民银行也出现了。

在重新分配土地以前，毛泽东派出政治人员调查土地状况。这是附近地区的第一次调查。统计结果，土地（其中包括房产、庙宇和世袭领地）的百分之七十为仅占人口百分之一至

二的地主所有或由其掌握。其余的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有一半是富农所有，另一半则属于中农和贫农。

调查结果将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划为贫农，百分之二十为中农，百分之十为富农。富农占有并耕种土地，同时也象地主一样雇有长工，并从事高利贷活动，只是规模要小些。中农占有土地，自己从事劳动，不雇长工。贫农靠租用别人的土地耕种，在最好的情况下，有时也有少量土地。

以这项调查为根据，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贫农和长工。虽是中农但收成不能糊口的，也分到了土地。

各苏维埃的文化部门把庙宇改成公费学校，让穷孩子们上学。夜间，孩子们走出校门，成年人便走进校门。庙宇也成了训练群众工作者的地方，或作为群众组织的办公处。教师极少，没有课本，纸张也缺乏，甚至连黑板都没有一块。红军在那年七月占领了湖南长沙，在十月占领了江西吉安。他们把国民党的印刷机没收，搬到农村，这才能够印刷识字课本、小报和小册子。第一批为群众用的小册子，有《农民讲话》、《工人讲话》、《战士讲话》和《妇女讲话》等等。

从此就开展了朱将军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这运动可以从涂在山岩或树干上的标语反映出来：“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到天黑！……边耕边学！……囊萤映雪！”

“被压迫和被损害”的人毕生第一次拚命学起文化来了，这件事在朱将军的记忆里充满了骄傲与伤感。他回想道，部队在那些日子里几乎什么事都得做。部队里每一个能讲解一些东西的人，只要有空暇，都去教授普通常识和政治常识。教师实

在太少，这些临时小学的教师只要一宣布在庙宇里开学，到了上课时间去看吧，几乎全村人都来了，从老祖父到怀抱着婴儿的母亲，跟他们的孩子并排坐在学校板凳上，有时人多得挤在院子里。教师们尽量讲解，过了不久，便选择出成绩最好的孩子，让他们充当“小老师”。

妇女工作过去做得始终不好，自从各苏维埃都建立起妇女青年事务部门后，在它的指导下，工作有了迅速进展。在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中，妇女表现了最为出色的力量，发明了很多方法来对付顽固的男人。

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江西是个贫瘠省份，跟国民党地区进行贸易的数量极少，也不经常。很多物资，尤其是盐，又少又贵。

在这重建时期，朱将军主要是处理军队事务。他必须应付各地敌军的零星攻势，有时敌军的一个团为了想出风头，或者想拿到蒋介石的“剿匪”赏金而发动进攻。这些部队到底怎样向南京打报告，朱将军不得而知，不过他敢断定，他们绝不敢据实呈报。敌军有一个团大胆地从广东某地开了上来，朱将军在山区伏击，红军象雪峰崩塌一样，扑下山去。他们紧追敌军残余部队，直到对方的基地，回程时，一路上把敌军所有补给站的物资都带了回来。自此以后，他的声威远震，驻守瑞金——后来是苏区首都——的敌军，只要听到他带队来到附近，立刻就哗变逃跑，两条腿跑得飞快，朱德就是派他的快速部队去追也追赶不上。

他说，那几个月最为忙碌，连他的妻子都没见过一次面。她正在某地为新成立的妇女协会做组织妇女的工作。他这次顺口

提到的是他第四个妻子康克清。自从他的第三个妻子，女作家伍若兰被国民党抓到砍头后，过了九、十个月，他便在一九二九年年底和这个农家姑娘结了婚。

当时，康克清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农家姑娘，身体壮健，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他刚刚见到她时，她还不识字，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她已经在延安成了训练军政人员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和其他的女学员一模一样，她也穿了好几年军服，住在抗大的女生宿舍里，一星期只有一天能够自由活动，她便去看丈夫，探朋友。

朱将军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自从她加入军队那天起，就开始学习，并且执行共产党——她已是党员——交给她的任务。她曾经参加长征，踏遍了平原，跨过了大河雪山，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会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名严肃、苦干、有纪律的老战士。谈到朱德时，她丝毫不带个人感情。她这样分析朱德：他的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于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这个品质，使得他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她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是的，他只要能找到军事和政治书籍，就要精心阅读；看报纸和报告，也要仔细划线，不放过一字一句。他在抗大的讲演，事先都曾经做过详细准备，是个脚踏实地的教师，作为他的学生之一，她是很了解的。在军民大会上，他用最普通的话讲演，如果他们不明白，他可以重复讲

解。他的幽默感则没有毛泽东那种辛辣的讽刺性。

朱将军和康克清都不大提到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别。直到我与他谈话时，他虽已五十一岁，但身体健康，精力正达高峰。他们显得十分匹配。两人原来都是农民，都象哺育他们的大地一样茁壮。她显然从他那里学得了很多知识，并且很听他的指挥，不过她自己也充分表现出中国新型革命妇女的高度独立性。在四十三岁那年，他找到了这位终身伴侣，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可以在他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的妇女。两个人谁也没有提到过对方对自己的重要性——他们与其他的恩爱夫妻一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婚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二十五章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朱德正在闽西长汀城内，等候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江西前来举行一项重要会议。在过去五个月中，他的部队曾经有过几天休整，他却一点也没有休息。他和部队一起行军，一起走了五个月。他四十四岁的年龄，那副干瘦的身体象钢铁一样的坚强，每天只睡四小时或更少一些。但自此以后，连四小时都睡不到了。

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通讯员刚刚到达长汀，他为红军带来两项命令，都是由共产党组织部长、政治局最有影响的委员李立三签署的。

一项命令是军队整编计划，不仅要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进行整编，而且全国其他地区所有的红军都要进行整编，统一指挥，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另一项文件则命令朱德毛泽东的队伍以及其他队伍离开农村，攻取工业城市。大城市

里的产业工人也应该仿照大革命时期的行动，举行总罢工。

这项在全国范围内都要实行的新的战略计划，号召把革命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理论是身无长物的无产阶级可以单独地领导农村和全国革命迅速获胜。

回顾这些计划和命令，朱将军指出，李立三和他的支持者既不信任也不了解中国的土地革命，以及群众可以行使权力的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他们更不信任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情况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据说李立三曾经这样说，“用这种战术，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头发也都白了。”

根据这项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四个军整编为军团：朱德仍任第一军团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或称党代表。贺龙在湘鄂西的部队改称为第二军团。在赣西北的彭德怀的部队为第三军团。在华中的长江以北山区作战的游击部队改为第四军团，徐向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政治委员。

朱德和毛泽东对于新的革命战略所根据的理论颇表怀疑，同时，他们坚决反对整编军队计划中的一点是：一切武器都要集中在红军手中。换句话说，农民游击队也要成为军队的正规部分，并且要随同军队离开苏区进攻工业城市。朱将军解释说，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样一来，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不过，“我们在原则上接受了命令”，把农民游击队编成三支队伍，放在第一军团里，命令他们留驻原地，保卫自己的乡土。

朱将军对于新战略的看法是这样的：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是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因此，在六月十九日，整编工作完了之后——我们一共有两万人，我们首先宣誓效忠革命。后来，红军的每一支部队都在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纪念日那天宣了誓。”

朱将军说，革命军事委员会也是这时候组织的。委员会包括了全国各地各军团的司令和政治委员。但他又加上一句：这个组织在当时“还是理论上的，因为我们的交通联络只能靠通讯员，条件不够，跟其他的红军联络不上。”

抑制住他们的怀疑，朱德和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二日共同签署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在扼要复述了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情况分析之后，指出了进攻城市的任务、进军路线、每一个军的集结地点。在他们指挥下的队伍都要向江西中部某个城市集中，然后一路北攻，穿过敌区，直扑江西省北部的省会南昌。占领

南昌后，再夺取南昌以北、长江边上的九江，然后沿江西进，直奔辛亥革命的诞生地——武汉三镇。

同时，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应该离开赣西北的井冈山根据地，向西出兵，占领湖南省会长沙，然后转向北进，直趋武汉。在西面的贺龙第二军团和在北面的徐向前第四军团也要同时进迫武汉，三镇的产业工人就会象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北伐时一样，起义响应。武汉三镇位于长江中游，控制了大江上下，加以北有京汉铁路，南有粤汉铁路，在人民武装力量的夹击下不难攻克。武汉之后 目标就是全国。

“从文学的观点看，”我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个战略是庞大而富戏剧性的：一支大部队踏上征途去解放被压迫的城市。……群众奋起挣脱一百多年以来的枷锁。……这个国家就要天亮了！”朱德将军的两眼眯成一道缝，满脸是疑惑的表情。

“噢，简直太富戏剧性了！”他笑了一声答道，“可是实行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我们的部队不是庞大的——人数少，而且只有轻武器。军阀部队人多，他们有大炮，有全国资源可依仗，还有帝国主义的海军舰艇在沿海内河游弋，驻守各大城市。这种战略完全是冒险主义——想回避解放中国所必需面对、必需解决的重大困难问题。

“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象我们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政治工作人员成批地走在部队的前面，号召农民起来。敌军不是躲藏起来便是溃散或退往南昌，红军踏遍江西全省，向北推进。

“我们一路行军，一路收留了成千上万参军的农民，”这

是朱将军的原话，“我们当场收留他们，分发到战斗部队里，边行军，边训练。白区各大城市都下了戒严令，成师敌军开入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头在大街上翻滚。大罢工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工人领袖已经牺牲。除非我们攻破城池，否则工人将一筹莫展。”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正当盛夏，朱德和毛泽东来到江西北部的南昌城郊，从远处眺望密密层层防御工事。就在那一天，消息传遍了全中国，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在数不尽的农民支持下，在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响应下，占领了湖南省会长沙，宣布成立湘赣鄂三省苏维埃，由李立三遥领主席。

朱德和毛泽东进迫南昌和长沙被红军攻占的消息，使得列强直接投入了战场，支持国民党。

美、英、意和日本的炮艇本来已随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撤走，但在七月三十日，长沙被占的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在湘江下锚之后，它们一连炮轰了四天，城内大火四起，几千名军民死亡。这次轰击是由美国炮艇“派罗斯号”领头的。在外国炮弹的掩护下，原来在红军进攻时仓皇逃走的地主军阀何键又回来了。

八月三日黄昏，红军和所有曾经协助红军的群众组织开始撤出长沙，携带着印刷机、白报纸、大米、现款和从反革命部队手里没收过来的其他物资。铁路工人开着仅有的一个火车头和三节车皮连夜不停地奔驰，往来于长沙和赣西北的铁路支线上，首先运送伤病员，再运送没收过来的物资。

八月四日，军阀何键回到长沙。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一连屠杀了几千名平民，工商界人士为此发表了一项宣言，谴责这

个“只会杀害无辜的屠夫”。

与此同时，八月一日那天，朱德和毛泽东发动他们的身体瘦弱、汗流浹背的战士去攻打南昌周围密密层层防御工事，大家既无休息，又没有睡眠，在敌军炮弹轰击下，就象秋风中的落叶一样，成批地簌簌落在地上。朱德面如土色，而且土中发青——作者本人在后来抗日战争中发生同样情况时，亲眼看到过他这种面色。^①在他的指挥下，战士相继仆跌下去，谁也不知道后果将会怎样。

二十四小时后，他和毛泽东下令撤退。他们分成三路纵队，彼此相隔几英里路，扑向武汉。途中，他们遇到彭德怀派来的通讯员，于是在赣西北山区里将部队集结起来，先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师，然后立刻召集会议，就李立三的命令进行辩论。李立三命令再占长沙，夺取武汉，并说红军第二和第四军团已经迫向三镇了。

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特别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支持。朱将军说，他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受到毛泽东、彭德怀和其他许多人的支持——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

^① 作者这里描绘的是朱德同志看见战士们牺牲时沉痛的表情
——校注

但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第二次进攻长沙于九月初开始，直到九月十三日的黄昏结束。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帮助红军挖掘战壕，运送粮食和弹药，抬运死伤，清扫战场。但血肉之躯究竟抵挡不住钢铁。九月十三日下午八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他们分散为八路纵队，撤回江西，准备在当月三十日直扑逃亡地主的避难所——仅次于南昌的江西第二大城——吉安。

这些命令获得了彭德怀和大多数但并不是所有指挥员的支持，它迫使武汉的另外两支红军为此不得不改向后撤，也迫使党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全国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全部计划。可是，朱将军指出，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必然造成“生气勃勃的革命中心”覆灭的后果。他又说，李立三路线完全是冒险主义——毫无根据、孤注一掷的赌博。

朱将军有一种完全忘却周围环境的能力，这时，他重新回想起当年的惨烈情况。战士们不顾生死，在敌人炮火下一倒就是一片；在夜色笼罩下，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去破坏敌军工事周围的电网，他们视死如归，触电而亡的尸体成了堆。

部队还从农民手里买来五十只水牛，利用它们作“活坦克”去冲击敌人的电网，战士随后跟进。这是《三国演义》中的战术的翻版。把水牛向着电网一字排开后，农民在牛尾巴上系上鞭炮。鞭炮喇叭一响，水牛并不是一齐前冲，挑开电网，反而是四散奔逃，毫无目标，这种绝招只能适用于耶稣出生后不久的年代，而不能适用于一九三〇年。朱将军回想起来，不禁苦

笑。

他最后下令撤退的时候，许多党员提出抗议，其中有些人甚至声明否认他和毛泽东的领导；部队反倒毫无问题地接受了命令，并且热烈地为他们的领导人辩护。朱德和毛泽东用不着替自己辩护，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把司令部迁移到彭德怀在赣西北的根据地。吸收了一千多名志愿参军的新矿工以后，他们偕同彭德怀前往吉安附近的预定集合地点，部队早已在那里等待了。

毛泽东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然后提出攻取吉安的计划。朱德也回到部队，战士们象往常一样，围拢在他身边，用他们的结实的大手拍他，战士讲话的时候，他也伸出两臂，放在战士的肩头。

吉安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午夜攻占，毛泽东接过行政管理工作，组织吉安苏维埃，朱德则再度出城，跟一万名志愿参军的工人和农民会面。吉安城挤满了进城的农民，到晚间，满街都是露宿的人，据朱将军说，他们“逛过了吉安，参加了群众大会，便排队回乡，抓地主来审。”红军在城内驻扎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整整有一百万农民出入吉安。

朱将军对吉安记忆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敌军司令部的重要文件，有些文件提到第一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在华北的战事已经结束，派了十万军队到江西来进攻红军。这场战事要在十月底开始。

缴获的文件还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这些文件使朱将军颇觉棘手，因为在苏区的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党在好几个

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中显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朱将军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文件上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

在那时以前，红军也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对付敌人的特务活动，不过还是到了吉安之后，才组织肃反委员会，慎重地开始工作。甚至在AB团的密码解开以后，朱将军说，红军也没有抓人。肃反委员反而设法与AB团员交朋友，参加他们的秘密组织，直到把敌方的整个间谍网探听清楚。

朱将军好象在回忆一场噩梦。他说，那时“我们很多好同志被秘密杀害了；我们在东固的一支部队，在东固一个地主儿子的领导下，发生叛变，在这种混乱和猜疑的情况下，人们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敢信任了。AB团员还组织了宗教的秘密会道门，预言什么红军有毁灭的预兆；为了拉拢群众，孤立我们，他们甚至组织起‘爱情自由’团体，地主派出自己家的女人来引诱红军战士。”

红军纪律严明——若不是这样严明，农民也会反对他们——因此，地主就一心想破坏军纪。他们失败了。朱德处理这问题的方法是直接到战士中去，说清楚AB团的鬼蜮伎俩，要大家警惕。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有受过特别训练的卫兵保护，然而在AB团大本营被彻底破获之前，也有三名卫兵被秘密杀害了。

一九三七年年初，朱将军对我叙述这段与妄想恢复特权、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宴会

上遇到朱将军和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那时，委员会负责人乃是一个从十一岁起就做矿工的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把朱德和这个矿工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农民和中国产业工人的差异。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

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就不同了，他从不会在任何农民堆里消失。他没有休息和松懈，很刻板。他精明而又警觉，不论是行动还是外表，都象西方产业工人在大罢工的日子里那样，显示出一种有克制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和许多象他一样的人存在，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和共产党领导人才没有被他们的秘密敌人杀害。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开进北京的时候，在告示中限令所有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和蓝衣社分子缴枪登记，否则，就要予以肃清。

北京城外清华大学的一个态度斯文的教授接受了这项命令，到公安局投案，自认是曾经威胁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蓝衣社“上尉”。公安局让他填上登记表，告诉他回学校照过去一样继续教书，不过新任公安局长平静地对他说：

“你在登记表上写的稍微有点错。你并不是蓝衣社的‘上尉’——你原是一名‘中校’！”

第八篇 反围剿

第二十六章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第一次大“围剿”开始了，上海和中国各大城市的赞美声高入云霄。刚刚打垮北方对手的蒋介石是当时的英雄。此刻，他又派出十万部队，来进攻江西的“赤匪”。

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不妥协的力量，也是唯一的一支组织起来的力量，其成员用事实证明，他们愿为主义而献身。

这种人是危险的，但是现在力量还弱，只要及时攻击，还能消灭。现在，时机已到，而且是左券在手了。在江西的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民和工人，最低贱的人。全世界谁不知道，中国农民从不过问谁来统治他们，只要让他们耕种脚底下那几分地，就心满意足了。

国民党报纸和它的外国同行喧嚣一时。前者得意洋洋，报道了军队向红军进击的详情，甚至连进军的

路线都发表了。可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红军，更没有提到朱德和毛泽东；据这些报纸说，他们的部队已经被连传捷报的国民党军赶出吉安。红军仅仅剩了些“残匪”，不久就可以包围消灭。

在江西那边，朱德、毛泽东和他们的同志们仔细地研究着国民党报纸，朱将军还在国民党引以自豪的报道上详加圈注。红军还没有电台，然而通讯和情报工作已经大有进步，国民党军方的新闻报道本身也泄漏了不少。上海那方面还没有消息来，但是朱德和毛泽东已经派人到上海去反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李立三路线。不管结论如何，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十月中旬，朱德、毛泽东和他们的同志们在吉安以北彭德怀的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他们在会上决定撤出吉安，因为面对着多出一倍的敌人来防守吉安，必定招受损失，实在无此必要。他们把四万名主力部队撤入巩固的苏区，在那里可以得到人民的全面帮助。这一地区北到东固山区根据地，南迄广昌，正如朱将军所说的，“可以选择自己的战场，迅速集结，突袭，再分散、包围、进攻，把前来围剿我们的敌军，一师接一师地各个击破。”

在为时四个月的整个战役中，朱将军只挑选了一场战斗来说明红军是怎样作战的。毛泽东在后来写他的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时候，一定也想到了这场战斗。他写道：

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次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

的。^①

这一场打垮国民党全部攻势的战斗是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进行的，敌军是张辉瓒亲自指挥的第十八师。张辉瓒的另外两个师是第二十八师和第五十师，这三个师是国民党军队的支柱，兵员充足，正规化，全部是精良的外国装备，还有极好的补给。

在叙述这场决定性战斗之前，朱将军把话题岔开，谈起红军内部的一次背叛事件，这事件几乎使局势变得有利于敌人方面。他说，在战斗方酣的时候，一个地主的儿子刘迪藻率领由东固农民组成的红军第二十军哗变。当时，红军尽管在吉安缴获了AB团的文件，证明东固至少有一户地主家庭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有关系，还是派刘迪藻在吉安附近抵御福建敌军。

刘迪藻和李文林乃是李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而朱德和毛泽东正与这条路线进行斗争。李文林是东固一兴国地区的政委，曾有资料证明他家与AB团有关系。至于李立三路线和AB团在何时何地发生的关系，这些人如何和何时从李立三路线转移到AB团，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到后来才搞清楚。尽管情况复杂曲折，朱将军断定，地主要复辟乃是红军第二十军哗变的真正原因。

刘迪藻和李文林当然不敢向农民组成的部队暴露自己的真正动机。他们因此硬说朱德是“第二个蒋介石”，说毛泽东是出卖共产党的“党皇帝”。他们的煽动造成了预期的哗变，并

^①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六〇页。

且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投奔到吉安以西的国民党区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小共产党，发出一些前后矛盾的宣言。在这些宣言里，忽然把朱德誉为品质高贵，把毛泽东贬为叛逆；在另一个宣言里，却又大捧毛泽东，而大骂朱德。

朱将军说，不论他怎样伪装，红军是用事实来判断一切的。事实很清楚：国民党军队对这批叛徒丝毫不采取行动。最后，东固农民也觉悟到这一点，逐渐逃亡，归附红军。红军收留下来，重新组织，重新教育。

这次叛变给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可乘之机，占领了兴国，张辉瓒的第二十八师占领了东固。东固的游击队和人民曾经奋起战斗，可是村子终于被毁，数百人遇害。后来，他们向东撤走，投到红军主力部队。

这就是朱德、毛泽东和他们的部下决定打一场决定性的仗，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时的局势。

朱德把进行这场战斗的战场画了一张草图。他标明敌军司令部和阵地的位置，也标明了他自己的司令部、第一线部队、预备部队、战地医院和俘虏收容所的位置；他还注明了红军的辅助部队——民兵的位置。他们可以袭击敌军的小股部队和运输队，也可以输送红军的补给，运送战场上的伤兵。

朱德和毛泽东的司令部位于一个山坡的小村里，离张辉瓒司令部所在地的龙冈不过四英里。张辉瓒的第二十八师分散在东固山区，刚好在他们东面；他的第五十师则在东北方的源头。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部署在龙冈、第二十八师、第五十师之间，打击增援。南面和东南面则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部

队，只有快速行军一天的路程。

朱将军说，红军的联络非常紧密，他的司令部里的几名传令兵都是农民小伙子，迅速灵敏。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八点钟，他和毛泽东发布了战斗的详细命令，准备在第二天拂晓打响。这些命令分发到各主力部队和预备部队，连有关“政治动员”的工作都指示得清清楚楚。在“政治动员”会议上，军事指挥员要把战斗计划以及已经知道的敌人兵力、部署、装备和士气详细说明，政治委员则要把这一仗对整个战役和整个革命运动的意义解释清楚。

朱将军在命令中提到一点，要求所有红军部队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敌情，特别注意缴获医疗物资，以及保全“每一架缴获的无线电报机”。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林彪和黄公略的部队先攻龙冈，把第十八师从龙冈吸引出来，然后佯作败退，直到敌军深入之后，才予以各个击破。黄公略的部队都是赣西北的农民和矿工，张辉瓒的三个师曾在那里烧过成千上百的村庄，把凡是有子弟参加红军的家庭满门抄斩。黄公略的部队因此是满腔仇恨奔赴战场的。朱将军说，这些部队“就在我们司令部门前激战，敌人的机关枪弹不时落在我们的墙上”。

战事达到高潮时，张辉瓒下令他的第五十师增援第十八师，“可是我们马上就占领了他的电台。”第五十师开了过来，却很久接不到电台上的指令，所以到了源头遇到彭德怀的部队，便又缩了回去。在东固的第二十八师一动都没动，第十九路军也是如此。

打到中午，第十八师死了上千人，其他九千人全被俘获、

缴械。张辉瓒和他的参谋部以及全体指挥官都在被俘之列。战利品包括八千支步枪、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小炮，第十八师的宝贵电台——还有电务人员，以及战地电话、医疗器材、马匹和大批口粮。整整三个师的现款也缴获了。

“我们立刻开了一次俘虏大会，”朱将军说，“向他们说明我们为什么打仗，凡是愿意参加过来的，都可以参加。有三千人参加了过来，其余的每人发了三块钱，让他们回家。”

敌人占有火力和补给的优势，“而我们的优势则是信心、士气和运动迅速。”朱将军说，这就说明了这场速决战的胜利以及敌军全部攻势随即垮台的真正原因。这不能说成事出意外，因为双方已经交手两个多月，第十八师应该预料到有此一着。

朱将军说，还有，“白军”——他跟红军、老百姓一样，都这样称呼国民党部队——是在苏区里，苏区的人都把它当做誓不两立的敌人。胜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心理上的。“敌人真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认为我们是土匪——土匪还不是一打就垮？”

张辉瓒被俘之后，朱德将军马上把他找来谈话，这场面很富戏剧性。这个被俘的将军，身穿笔挺的卡叽军服，带着全副军章，足登黑得发亮的长筒皮靴，被解到朱德的司令部。他在司令部里看到的却是一些又瘦、又脏、类似苦力的人。朱将军用冷峻和坚定的声调说道，很明显，“他真相信我们是毫无水平的土匪，他另外那两师人就会把我们打败，他自己也可以重新获释。

“全军覆灭以致被俘这件事虽然吓住了他，可是他依然妄自尊大，还想骗人。这家伙是个大胖子，他的司令部里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贵重物品，虽然有匹马，却宁愿坐轿子让人抬来抬去。”

张辉瓒傲慢地问道：“出多少钱就放我？”朱将军郑重地回答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我们要在你自己的部队面前，以及我们的一支被你在赣西北清剿过全家的部队面前公审你。”这个被俘将军的气焰立刻就被压了下来。

朱将军说道，“我们打算成立一所红军学院，我问他愿不愿去教课。他说愿意，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在拖延时间——还以为他那两个师能救他。我问他，我们下一着应该攻击白军哪个部队。我本来用不着问他，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经去进攻他的第五十师了，可是我要试试这个人的人品。他建议我们去攻第十九路军，甚至把第十九路军的情报都说个清楚，跟我们得到的情报完全相符。他出卖了自己的人，还以为可以骗过我们。

“为了要让他看看我们怎样打垮他的另外两个师，”朱将军在红军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粉碎第五十师的时候，就把他和他的下属都带在身边。红军接着又进攻在东固的第十八师。第十八师闻风逃遁。这时，第十九路军也撤出了兴国，一直缩到老家广东省境才敢停脚。

在打垮第十八师后的三个星期内，敌军在红军的闪电攻击之下崩溃了，第一次围剿于是毫无光彩地结束。张辉瓒和他的僚属在一个三千人的大会上受到公审，到会的有他自己的部队，东固的老百姓和家在赣西北惨遭烧杀的黄公路的部队。朱将军说，到这时候，张辉瓒的嚣张变成了恐惧。他和他的僚属被判死刑，由那些家人遭受屠杀的战士执行。

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海派来的通讯员来

到朱将军的指挥所。他送来一封信件，要求释放张辉瓒，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释放大批政治犯，并愿付二十万现款。

“我们对杀了他很感后悔，”朱将军说道。“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蒋介石对此进行了报复，杀害了我们许多在狱中的同志。”

红军大捷的消息的确震慑了国民党和它的外国后台老板，他们于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恐怖屠杀。蒋介石在一九三〇年年底自任为南京政权的教育部长，并且发表宣言，对于学生“深信共产主义”表示“痛心”，他认为学生开会、散传单，甚至“反对大学校长，就等于反对政府”。蒋介石宣称，他“不惜枪毙学生”，而且果真实行了。

五所大学关了门，上海有大批学生秘密被捕，从此不知下落。上海报纸用寥寥数语报道说，国立北京大学有六十名学生，天津有十几名学生，广州、长沙和汉口各有十几名学生被捕。

一九三一年二月，国民党在南昌发行的反共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某国民党高级官员访问记，他说道：

关于解决赤匪问题，政府如果找不到比目前使用的更好的办法，就将被迫隔离这些地区，施放毒气，一人不留。凡是从十岁到六十岁的人，不论是男是女还是儿童，不是共匪间谍，就是红军。

第二十七章

朱将军再次来我这里叙述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建议他在一九三一年里挑选最典型的一天，跟我说一下他从早到晚都做些什么事。

思索了一阵之后，他说，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没有办法记起某一天的全部事情，不过不妨试一试。以下就是他所讲的：

“我一生有很早就起身的习惯。我要把工作都做完以后才睡觉，时间很晚——通常在十二点钟以后。我这一生是从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的工作和学习却从来没有规律，因为我们的战斗决定了许多事直接听命于司令部。

“我时常——但不定期——给部队上军事课，也时常视察驻扎在附近的部队，看看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我按时参加定期的参谋会议，党的会议一星期有一两次，司令部也有党组会议。部队各部门首长之间经常

有会，遇有特殊问题出现，也要开会解决。每次战斗之前，都要召开一两次战斗部队的动员会议，由军事指挥员报告我们的计划和敌情，政治委员讲解这次战斗或战役的意义，以及在战争中瓦解或争取敌人的政治战术。

“每一仗打完了，只要有时间——但通常都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总要开两个会：第一个是指挥员会议，第二个是指挥员和战士的联席会议，以便分析这次战斗或战役。我争取参加每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对于我们部队具有最大的技术和教育价值。在联席会议上，每一名战士和每一名指挥员都有充分发言的自由，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得失。这样，我们就能够改正错误，发现能力不足的指挥员，提升有功的战士。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就消灭了封建遗风，保持了军队民主化，并且在战士之间发扬了自觉的纪律。任何人如果有畏缩不前或判断错误，或是在战斗中破坏命令，都必须说明原因，保证改正错误。任何指挥员如果打骂战士，或是违反军事规则，就必须在这公众舆论的法庭面前解答；罪名一经确立，就由司令部处分。这一类会议的结果都印成小册子，作为全军的学习资料。”

其他的工作也很多，他接着说道，每逢春耕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凡是没有军事任务的人，都要帮助农民。朱将军遇有机会就在地里干活，“觉得这是维持健康的好办法”。在那几年里，红军的文娱活动相当少，然而也有几个演剧队在苏区为部队和老百姓巡回演出，只要演戏的地方离着司令部不远，朱将军就会坐在地上或者前排的小凳上看戏。部队也唱歌，他说，可是还没有提高到象在延安时这样。

“每天也有许多情报和其他的报告需要研究、处理，”他接着说。“我只要拿得到报纸和书籍，一定不会放过；可是那些年找书籍杂志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从上海寄来几包书，然而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等我去拿，早就分光了。那时候，我决心增加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凡是我们能找得到的这类书，我都反复地研究。在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里，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在占领长沙和吉安时期，红军没收了国民党的印刷机，搬到农村。于是发行了一种《军事双周刊》，报道其他红军部队、游击区和全国局势。那时候，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国民党城市的教员和教授中，有一个为红军和苏区小学校准备教科书的运动。这些教科书有的是铅印，有的是石印，穿过敌人防线偷运进来，朱将军也一一过目。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朱将军继续说道，“我们的部队在广大地区里分散开来。彭德怀在北线指挥，我们刚在那里占领了两个县。彭德怀攻下了南丰城，这个地方一向由‘农民刽子手’许克祥占领，他在那里牵制我们，以便蒋介石准备第二次围剿攻势。

“正因为敌军准备进攻，我们扩大了防区，在各战略据点建立军需站，训练部队。敌人的飞机这时经常来轰炸，AB团到处加强活动。为了应付AB团的活动，我们有时彻夜开会。

“因为轰炸和我们的粮食问题，司令部在四个月内搬了四五次家。粮食是个严重问题，那时候正是春播季节，我们的地方太小，资源也有限，我们必须节约粮食，才好应付敌军下一

次攻势。我们的部队没收了地主的大米，但数量也有限，我们不但帮助农民耕种，还开垦荒地，不过这些地实在太贫瘠了。

“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师都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管理军需，维持风纪，负责教育和娱乐活动。一九三一年整个春天，这些委员会领导着节约粮食运动。他们把大家的口粮减少，改吃两顿，十点钟一顿，四点钟一顿。吃的很差，一天到晚都觉得饿。只有伤病员才能吃饱。

“我们还在苏区内建立空袭警报制度。由矿工们组成的工兵则为部队和老百姓修筑起十分有效的空袭避弹所。这些矿工都是技艺高超的工人，样样精通，连炸药都会制造。他们有许多人当初在矿里工作，炸药用得多，连耳朵都聋了。就在参军之前，他们的政治水平已经很高，因为大部分是老党员，曾经组织过工人运动，从工人运动刚萌芽时就做工人领袖。我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以便总结新的防卫方法。

“我每天还要忙其他的工作。既然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力量，我们就要和所有的群众活动紧密相连。我们帮助重建老苏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没收地主的粮食和土地，协助分配，并建立群众组织和苏维埃，领导耕种，以增加生产。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我们接到了在上海秘密举行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①我们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终于谴责了李立三路线，肯定了我们的路线。党的决议指示我们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军队、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之间要有

^① 应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校注

清楚的分工。大会还要求我们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四周年纪念日在赣南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我们根据决议召开了所有苏区的党代表会议，并且把司令部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山上一个小村子向塘村，村里有一个大祠堂，可以安置司令部和会议代表。

“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除去其他问题之外，我们成立了几个委员会，筹备八月一日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然而敌军攻势不久又开始了，大会只好延期，先延到十一月七日，后来又延到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公社纪念日。

“在向塘会议上，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有时也担任主席。会后，我们的工作顺利了许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从此与军队分开。苏维埃里的私人关系——不少地方有这种现象——也都取消了，这种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成了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处理财政、土地、交通、民兵、保健、教育、生产和妇幼等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呈金字塔形，从村到区，由区到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后，最高机构就是设在瑞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我们还在部队里订出了正规化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和政治科目，加强扫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从外边进来帮助我们，可是还不够分配，我们军医队伍也太薄弱。上海印刷工人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穿过敌人防线来参加我们。

“自从由国民党第十八师手里缴获了无线电报机，我们就办起电讯训练班，我也兼管。敌军电台台长王铮参加到我们这边，立刻就组织了电讯训练班。王铮到延安还负责我们的电讯工作。

“参加我们之后，王铮开始截抄敌军电报，我们从电报里知道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有一套新式无线电报机。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恨不得把它弄到手，我也跟他们说，一定可以到手。从截抄的电报里，我们也知道了敌军军需站的位置，他们为了准备第二次围剿，修建了防御工事，军需站就在工事后面。我们对于这些工事了若指掌，因为那都是强拉农民修起来的。

“到了四月，我们的粮食和军火情况非常严重。为了避免动用为第二次战役准备下的粮食，我们向农民借粮，说明日期，到时必还，农民问我，我们怎么能够订出日期来；我也反问道，有没有过答应还而还不出来的事。他们说没有过，我们都大笑起来。”朱将军骄傲地加上一句：“农民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到朱将军讲完的时候，午夜已经过了。他伸腰打个呵欠，洁白整齐的牙齿在烛光下一闪，然后幽默地说道：

“这就是我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典型的一天！”

第二十八章

五月上旬，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下，进入阵地，部署攻势；这些阵地从江西吉安一直向东延伸到福建的建宁，共长七百里，约为二百五十英里。第二次围剿开始了。

朱将军坦然指出，红军对于敌军工事的情况已经了若指掌，因为被迫修建工事的农民不但说明了位置，甚至连工事有多深，每个堡垒有多少枪眼，一共用了多少砖瓦，都讲得清清楚楚，还在沙地上划出草图，指明通向工事的道路。

“我们决定运用第一次战役里运用过的战术，把敌人从工事里引出来，诱入苏区，我们的部队和老百姓就把他们攥在手掌里，然后两翼包抄，攻击敌后，解决他们。我们决定首先打垮东固和吉安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和另外两个师。我们急需敌军工事后面的粮站和军火库——我们的电讯训练班对于第二十八师的新

式无线电台也心向往之。”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对红军和民兵辅助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之后，朱德和毛泽东把司令部搬到东固山区根据地，根据地里有医疗队建立起来的两个后方医院。群众满怀胜利信心，成千上万的人到各地集中，带着各式各样的担架准备抬运红军伤员，还带着扁担、箩筐准备挑运缴获的敌军物资。

朱将军不但不讳言农民头脑里的旧的封建思想，还特别提出这些思想来跟他们讨论。他说，农民拒绝接受把敌军伤兵送往红军医院的命令，不愿象对待自己的伤员一样来对待他们。为了解释这项命令，专门召开了群众大会，然而朱德发现，只谈近代战争规则是无济于事的。农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用人道主义来对待敌军，尤其是敌军的伤兵。归根结蒂，敌军是来清剿老百姓的。有一条道理他们还能听得入耳，觉得这些人可以争取过来参加革命事业，话虽如此，他们依然不是心甘情愿地去做，有些人还满腹怨言。

敌军攻势预定开始的三天以前——朱德知道敌方所订的日期，红军主力部队强行军至吉安地区，插到敌军的后方。因为敌机轰炸，他们只在夜间行军，在月色下作战。而夜晚如果昏暗，便改为拂晓进攻。

战斗预期在十七日夜晚开始，可是朱德和毛泽东没听到一声枪响。两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接到战斗报告，听不见枪炮声。黄公略的红军第三军奉令把守东固至吉安一线，彭德怀和林彪的部队则进攻敌后，然而黄公略这方面没有消息，对面山谷里也没有任何回声。

寂静得有些蹊跷，朱德便偕同参谋长带着两连卫队，下山

西进，看个究竟。他刚刚来到山脚，正在两峰夹峙的山谷里，突然迎面来了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正准备向山上行进。

“我们只有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分散开，边打边退，”朱将军说道，“可是我也看得出来，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大兵力，动作极为小心。打了三个钟头，我们已经靠近东固平原，等毛泽东准备好司令部、医院和老百姓撤退时，我发现敌军开始后撤。远处传来了炮声——我们红军第三军进攻第二十八师的后背了。到夜幕四垂的时候，第二十八师大部被解除武装，师长公秉藩也在被俘之列。他在第一次战役中学了乖：穿上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不带任何军章符号，混杂在士兵队伍里。我们发给每名俘虏三块现洋，让他们回家，公秉藩也排在队伍里领了三块钱——他在这一生中只有这次拿钱最少。他骗过我们，可是我们缴获了他的枪炮物资，我们电讯训练班的学员围着新式无线电台和发电机高歌不止，这两样东西都完好无缺。”

当天晚上，彭德怀派来的通讯员也带着报告到了。这是第二名通讯员。第一名已经被俘遇害。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一连两天两夜强攻敌军第四十三师——北方军队——的正面和后卫，占领了他们的山头工事，把他们赶进山谷，一半缴了械，另一半则投奔他们在遂安的兄弟部队第四十七师去了。

整个西线处于红军掌握之中，但是朱德在回忆这两次战斗时，还颇表遗憾，因为他们“仅仅”缴获了七千支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另有医药品、大批粮食、弹药和现款。他说，这一仗成绩欠佳，是因为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三师也不过仅有上次战役中被打垮的第十八师的一半兵力。

留下民兵和几连红军固守解放区，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司令

部和电讯训练班返回主力部队，又发动了红军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攻势。

几千名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带着箩筐、扁担，有如潮水般随军前进，攻打遂安镇，守军乃是第四十七师和残余的第四十三师。这些北方军队有一个团被缴了械，其余的便扔下仓廩充实的军需站不管，一路东奔。红军提起“白军运输大队”，个个笑逐颜开。

朱德检查了农民群众早已清理过的军需站。他说，“我不是早就说过订个日期保准还粮吗？”这时大家都笑了。

回想起农民做事的敏捷彻底，朱将军的声音都带有几分敬畏之情。他们一涌而至，把箩筐和牛车装满，节俭的妇女和儿童用手扒扒拢拢，把最后几颗粮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人、妇女和儿童排成整齐的队伍，走向苏区。青年人则组成几个大队，跟着红军东征，他们担着粮食和弹药，对于哗啦啦的春雨，和红军一样，毫不在乎。

朱将军提到这次战役，好象又身临其境了。

“我们的攻势连绵不断，部队打完了睡，睡完了打，一直干了十五天。战斗部队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其他的人爬起身来接着打，在敌后展开了扫荡战。遂安之役两天以后，我们在白沙解除了第四十七师残余部队和第四十三师的武装。那些高个子北方大汉频频摇头，抱怨说不能在山地、在雨里作战。他们被民兵解到我们的俘虏收容站，我们的伤员和敌人的伤兵则运送到后方医院。

“我一向不需要很多睡眠。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几乎记不起有睡觉的事。我们决定教训敌人一次，让他们毕生难忘。

部队象洪水一样漫山遍野地前进，边打边唱、边呼口号，大家怀着愤怒的心情，争夺每一寸土地，所向披靡。大雨倾盆而下，敌机无法出动轰炸，我们把敌人赶到水田里，再把他们浑身泥浆的一个个拉出来。他们穿的是国民党军全套军服，裹腿，皮鞋或草鞋俱全；我们的部队只穿短裤短褂，还打赤脚。我记得我有双草鞋穿，不过也记不大清了。是的，毛泽东和我跟战士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敌军人人背包沉重，装满了从我们村里打劫去的东西。

“在敌军侵扰过的苏区，我们发现村子被烧为灰烬，横尸遍野，有的枪决，有的砍头。连儿童、老汉都没放过。妇女四肢伸开地躺在地上，在被杀以前或被杀以后都遭到淫辱。自从看了这幅浩劫图以后，只有那些重伤的战士才能勉强被劝离战场，部队日夜不停地唱起一首坚定有力的歌曲：

哪怕枪林弹雨，
前进啊！杀啊！
活捉败将何应钦！

“大路小径，到处可以看到农民运送我们的伤员和敌军的伤兵到后方去。有些担架是用门板改作的，前后系好绳索，还有许多人就把伤员背在背后。我们虽然一再命令，对待敌我伤员要一视同仁，农民却自有执行命令的办法，用以表示他们对白军的愤恨。走累了，他们就把白军伤兵放在地上，又骂又踢，甚至拣起树枝抽打，不断地骂道：

“‘白匪！杀人奸淫！地主走狗！’

“然后，他们又抬起伤兵上路，等走累了，又把他们放在地上，问道：‘我为什么要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说着又打。也有些人劝阻他们，我没有时间管，因为我们边打边进，不容稍停。”

“在北线宁都地区，我们又遇到第二十六路军的好几师人，他们是北方军队，刚由蒋介石调到江西。蒋介石并不信任这批原属冯玉祥的部队。这些部队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全军一片不满现状的空气。我们刚一交手，三团人未发一枪便投降过来，其他的也就后撤了。我们让他们去，以便他们多想想。我们则继续前进。”

这次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是五月二十九日在福建省的建宁进行的，建宁是敌军防御工事的终点。红军在这里与刘和鼎指挥下的国民党第六路军遭遇，刘和鼎这家伙多年来乃是福建省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之一，自从归顺国民党以后，自己做了国民党将领，一万名土匪也就改编成第六路军。

“就在我们开始进攻的一刹那，”朱将军痛恨地说，“刘和鼎逃出了建宁城里的司令部，他的部队也跟着跑。我们一直穿城穷追，直到闽江桥上。我们有一批部队已经过了江，早在对岸等候了。”

“那座桥转眼间就挤满了匪军，又是马匹，又是行李，谁也不能动弹一步。西岸上的我军机关枪向人群中扫射了几梭子，他们立刻抛掉枪支，跳到江里，我们部队把他们一一打捞起来，凡是已经逃过桥的，对岸的我们部队也都将他们缴械。”

红军占领建宁之后，把战斗部队留在后面，倒转回头，沿着敌军所构筑的防御工事巡绕一圈，把全线工事悉数毁掉。在

工事两旁，他们占领了许多新区，政治工作人员便着手“巩固”，并入苏区。

把敌军全部工事毁掉之后，红军急速向南，穿过苏区，直扑从广东开上来的第十九路军。这支军队同样精于撤退，一直撤到老家广东之后，才敢站住脚步。朱将军说，他们之所以后撤是因为两广将领和蒋介石又发生了新的矛盾。红军已经把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变成举世闻名的笑柄，外国人和中国统治阶级对蒋介石深表不满，两广将领便力图说服外国驻华的外交代表，表示蒋介石这一败仗如果由他们来打是可以取胜的，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支持。

朱德将军把第二次围剿总结如下：

“这次战役一共打了二十个日夜。在这期间，我军纵横八、九百里，日夜作战，在大雨倾盆之下，头枕步枪躺在地上休息。我们一共打败了白军十三个师，至少打死一万人，活捉二万人。我们的战利品多得都难记清楚：包括二万支步枪和其他武器；现款、军毯、药品、被服、收发报机和发电机、望远镜、掷弹器、自动手枪、手榴弹和大批的米、面和弹药。俘虏里有许多军医，我们命令他们到医院去工作，后来有一些人入了党，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这里。但也有些人与AB团有关系，谋杀了我们的一些受伤的指挥员。我们枪毙了他们。”

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朱将军说，“给千万户农家带来了悲伤和痛苦”。除了农民被屠杀之外，红军也损失了四千人，赤卫团和其他民兵伤亡更重。可是死亡和悲痛压不下人民的革命热忱，在大捷以后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出现了很多动人的情景。

由于反革命 AB 团的间谍活动，红军不再把白军俘虏一股脑儿收容过来，而是要逐一仔细甄别，才能接受入伍。

“我们对志愿参军的人说得很坦率，”朱将军说道，“不说别的，只说明在我们胜利以前还要经过艰难困苦和长时期的斗争。我们现在只能吸收那些愿意放弃家庭甚至牺牲生命的人，或是那些已经家破人亡除了革命别无希望的人。我们把这些入编入红军，其余的则再留两三个星期，给他们讲解中国革命历史，我们的党和军队的方针和政策。然后，我们发给旅费，准许他们前往愿意去的地方。

“敌军第二次围剿证明，国民党军官曾鼓励他们的士兵为非作歹，命令他们强奸、焚烧、劫掠、屠杀，好让他们不敢向我们投降。这种办法也有一些成效。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让部队不受我们的宣传，让他们尽力作战，避免被俘。”

尽管使用了这些野蛮战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皇军在中国为着同一原因也采用了这种战术，国民党军队几乎每一个团或师总有些人派农民来给红军送信，或是设法留字给红军。这些报告和消息是谁写的，无从知晓，朱将军因此更为感动。有些报告写得歪七扭八，不成字样；可是也有一些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执笔，写得非常工整，文理通顺，字迹端正，把他们那部分白军的计划、位置和武器数量都写得清清楚楚。

“拿这些报告与我们的情报相比较，我们发现都是正确的，”朱将军特别指出。“每占领一处地方，我们常在桌子或门板上发现粉笔字，告诉我们敌军开往何处。”

朱将军又说道，红军的情报工作当时已经组织得很好，不但满布苏区，而且深入国民党区域。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

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于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

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的电码、公报、出版物，并且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再有一组人专搞历史工作——仔细研究敌方每一个军，把军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调查清楚：这个军是从哪一省来的，军里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历史和组织，它的战斗力，等等。根据这些研究，朱将军解释道，“我们最后可以决定应付某一个军的最好办法。”

朱将军从他收集并保存多年的历史性文献里，拿出那个时期他的战地司令员提供给他报告让我看。许多材料的曲折变幻，就是擅于写小说的作家也无从想象。例如彭德怀将军的报告就是上乘之作，里面详细叙述了军事和社会情况，行文简练，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我看到他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第二次围剿开始时写的报告。一张黄色明信片，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在叙述了那天晚上开始的战斗后，彭德怀写道：

敌军在此遗下大批米、面。群众深恨白匪，对我军作战帮助极大。伤员已转移到杨梅岭苏区。敌军士兵系北方人，尚未受到我们的影响，他们封建观念很深，不伤不投降。我军前进过远，战斗前已行军八十里。部队甚觉疲劳。

在报告他的一师人占领敌军山头工事后，彭德怀写道：

我方指战员伤亡达全师三分之一。有的部队干部伤亡过

半。

报告的开始总是这样写：“朱总司令”“毛政委”，结尾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彭德怀”。

彭德怀和其他指挥员写的报告都扼要地叙述了包括敌我情况，双方伤亡，俘虏，战利品，转移伤员，当前问题等项，最后大都写道：“请指示。”

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有一个报告是在战斗中缴获的军事地图上写的。有一个师长和他的政委所写的报告屡次以“庆祝第二阶段战斗的完全胜利！”为结束，朝气蓬勃。

朱将军还取出第二次战役中农民所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共分九节，第一节是：

军阀蒋介石，
南京打哆嗦！
动员大军反革命，
啊哟！啊哟！
派遣走狗反革命，
啊呀！啊呀！

“在第二次围剿之后，我们举行追悼会，我们唱歌，我们工作，我们研究作战计划。”朱将军总结道，“我们是胜利了，可是也遭受到重大损失，部队太疲劳了。”

第九篇 长 征

第二十九章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从长征出发地江西和福建开始，穿过广袤的平原，渡过奔腾急湍的大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大山，这条路程估计为两万五千里，约八千英里。朱德走得还要远。毛泽东率领主力部队直奔西北以后，朱将军和他的部队还在康藏边界地区多住了一年，一直到离开江西两年之后，才到达西北。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经过长时间筹划，”朱将军开始叙述了。“我们把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计划。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委员会委员项英从东线来到。我们通知他留在中央苏区任司令员兼所有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部队的政治

委员。在兴国前线率军作战的陈毅也留了下来，负责军事。陈毅的政委聂荣臻正患疟疾，与我们同行。

“留下来的武装力量有：周建平的第二十四师的五千人；福建红军三千六百人；江西军区红军二千四百人；赣南红军二千四百人，另有在江西东北的抗日先锋队一万五千人。

“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有一人是中华总工会主席，七个月后被国民党抓到砍了头。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何叔衡已经六十多岁，而瞿秋白身患肺病，健康极差。瞿秋白曾经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做过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何叔衡和瞿秋白原要潜入上海。八个月后，他们被国民党抓到，在龙岩就义，另外还有几名妇女领导人也牺牲了。

“我们还留下大约两万名伤员，分散在山区医院里。康复以后，这些人纷纷出院报到，要求工作。残废人员都资遣还乡，每年可以拿到五十元抚恤费。只要我们在江西的同志有钱，这笔费用年年照付。

“敌军用二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区重要城镇。他们从来没有将武装起来的农村征服，倒是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大批妇女、姑娘被抓起来，以五块钱一个人的代价卖给国民党士兵、军官、地主和妓院老鸨。

“前几年逃跑的地主和二流子都跟着白军回来了，摇身一变做了官，然而他们绝对不敢下乡，农民见着就开枪。白军占领苏区的行动很迟缓，但很残酷，而我们留下来的武装力量从来没有被围剿过。”

十万名男子和三十五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参加长征，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身经百战、纪律严明的老战士，其余的则是党和政府的干部，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积极活动的老百姓。

中央红军兵工厂的总工程师跟我谈起当年组织撤退的经过。他说，他在九月底接到了毁坏某些重型军工设备和大炮的命令。命令执行之后，兵工厂分成六个单位，一个跟随长征，其余五个则分散在江西和福建五个不同地区。一百名军工人员参加长征，其余的跟随机噐分散到苏区各地。军工人员连同五百名赤卫团分别组成为连队，在长征期内，始终携带着军工器材和军需品。

“十月十三日，”总工程师说，“中央兵工厂厂长——一位关外工程师，和我站在大草地上，看着我们的六百人络绎出发。每个人携带着五斤口粮，每个人都有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两小箱弹药或手榴弹，有的挑着大煤油桶，里面装满我们最重要的噐器和工具。每个人的行囊有一条军毯或棉被，一套棉军服，三双结实的布鞋，前系鞋带，后附铁掌。老百姓也送给我们菜干、辣椒等等东西。每个人有个水杯，一双筷子插在绑腿里，帽顶里缝着一口针和几根线。所有的人都有一顶晴雨两用的斗笠帽，两层竹子夹一层油纸。许多人在行囊中插一把雨伞。每个人带一支步枪。

“参加长征的，人人都是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装备。人人有枪。

“我们虽然还在苏区里面，老百姓仍然都来送行。我们还是在夜间行军，以便在进入敌区之前熟习夜行军。十月十四日，我们到达集结地点宽田。一向在兴国前线作战、由林彪指挥的

红军第一军团和从东线来的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已经出发为主力开路，负责野战的参谋长刘伯承也和他们一起动身。

“后续部队有一些已经到达宽田，其余的也在那一两天内络绎涌到。我看到朱德和周恩来骑马率领总司令部人员来到，后面就是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人员。毛泽东看来消瘦而憔悴。

“十五日傍晚，我们开始出发，穿山向西南进军。长征命令是由朱德将军发布的。第一纵队是红军大学的一个团，由校长叶剑英亲自指挥。后面紧跟着是总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再后面是苏维埃政府、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反帝联盟的部分人员。随后则是供应部，我们工兵部队，印刷工人和他们的印刷机和器材，政府造币厂，医疗队（里面有医生、护士和一百二十副担架——每副四名担架兵），红军被服厂（许多裁缝带着缝纫机），以及为每一部门运送物资的长列纵队。

“红军第七兵团掩护我们的左翼，第九兵团保护右翼，第五兵团担任后卫。”

“我还记得项英，他是中国早期工人领袖之一，这次随朱德和毛泽东一同来到宽田。项英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亲自送我们出发后，才回到第二十四师。过了几天，他在电台通知朱德，第二十四师在瑞金以南的会昌打垮敌军一个旅，但因敌军过于强大，这一师只好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的第一、第三军团在信丰地区突破敌军第一道防御线。我们也随后通过。十一月三日，我们穿过第二道防御线，再过十天，又在粤汉铁路附近穿过第三道防御线。敌人直到我们穿过第二道防御线时才知道动静，这时，我

们已经转到他们后面了。

“进入敌区以后，我们经常夜间行军，避免空袭。如果月色皎洁，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附近没有敌军的时候，部队就唱起歌来，此唱彼和。如果夜色昏黑，敌军还远，我们就用松枝或竹批燃起火把，那可真好看极了。站在山脚纵目眺望，远远一排亮光就象一条火龙盘在山坡上。到了山顶，我们俯瞰两边山坡，几里地长的火把队活象火浪。行军路径的上空映出阵阵玫瑰色光辉。

“我们穿过江西，沿着湘粤桂边区的山峦前进。我们有几个星期进入平原作战，占领城市，从地主粮仓和敌军军火库补充物资。我们以三路纵队队形前进——第一兵团在右，第三兵团在左，我们位在中央，第五兵团殿后。

“单是涌到湘南的敌军就有九万人，军阀何键深怕我们和贺龙的红二军团接上手，一口气在八个县实行了焦土政策。何键一边放火一边破坏，却对全国宣称是我们烧光了湘南。广西军阀也把我们行军路线上的农民赶跑，烧光拆光，也说是我们干的。我们在华南时常遇到夷成平地的村庄，而我们从前连到都没到过这些地方，我们也抓住不少在农村放火的广西特务，都枪毙掉。

“我们的第一和第三军团时常强行军，占领城镇，保护村庄。在这些地方，我们总是没收地主和官吏的财产，把我们的粮食补充够了，便把剩下的分给贫农和城里的贫民。每逢占领了大盐仓，部队里人人都把口袋装得满满的，象吃糖一样，放在嘴里吃。我们的医务人员到处搜寻奎宁丸和其他药品，可是永远不够用。

“我们还举行群众大会。文工团给老百姓演戏唱歌，政治工作人员则写标语、散传单。只要我们在一个地方过夜，就教农民学写六个字：‘打土豪’和‘分土地’。

“被占优势的敌军追得紧的时候，我们就白昼行军，这样一来，轰炸机就来炸了。我们分散卧倒，起立前进，接着又分散卧倒，这种动作时刻不停。我们伤亡很多，医务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农民们经常帮助我们，要求照料伤病员和垂死的病人。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拿到一些现款、弹药和他的步枪，只要康复，就马上组织和领导农民展开游击战。在战斗中，也不时有一两连人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他们也退进深山，发展游击区。

“朱将军经常到各部队视察，鼓励每一个人。话虽如此，我们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朱将军虽然是个心肠软的人，看去很瘦，但十分顽强。他年龄很大了，脸上皱纹极深。他从来不生病，也永远不悲观。”

其实，朱德在长征那年，是四十八岁。

长征不仅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还孕育了伟大的民间文学。在由红军各级人员百余人所写的故事、诗歌、特写和日记所编纂而成的两卷本《长征》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每逢部队经过窄而险的山路，穿过狭隘的关口，通过小桥，或者是游过飘满冰块的小河时，我们就要经受最艰辛的考验。这时，先头部队减缓了速度，后面的就只好走一步停十步。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坐下来休息。有些人站在那里就睡着了。

有时又在暴风雨中行军，狂风大雨猛扑在身上。碰到这种情况，既不能点火把，脚底下的路又滑又险。常常是一天晚上只赶几里路，浑身湿透，还要在露天里宿营。

广西边界上有一座老山，爬上这座山的陡峭山坡，我完全可以看到前面一个人的脚后跟。山坡上开凿出来踏脚的石磴，每一磴有及腰那样高。政治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鼓励我们这群拚命的人，还帮助伤病员向上爬。……消息传过来了，先头部队遇到一个陡立的悬崖，马匹没法上去。过了一会儿，命令大家睡觉，天亮再爬。

这条山径哪儿也没有两英尺宽，就是躺下去，一翻身就会掉在山涧里。到处可见巨石嶙峋，就是山径上也满是尖石块。

既然别无办法，我就打开军毯，放在身子底下，打算在山径上蜷卧一阵。哪知身体太累，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不知睡到夜里什么时候，又冻醒了。我把毯子裹得严严实实，使劲蜷成一个小圆球，这回可睡不着了。我就干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星星眨眼。这些星星好象缀在黑幕上的宝石，四周的黑沉沉的山峰活象虎视眈眈的巨人。我们就跟躺在井底一样。

山径的上上下下，都有冻得睡不着的人点起的篝火。他们围火坐着，低声谈话。四周太静了，谈话声虽然又低又远，我照样听得清楚。声音时近时远，忽高忽低，有时也象蚕吃桑叶那样窸窣窸窣。我仔细听来，它先是象如泣如诉的山泉，而后又象在远处喃喃自语的海洋。……

第二天早晨，我们这一队也来到昨天晚上阻拦大队前进的悬崖。这地方名叫雷公崖，石崖冲天，足足有九十度角。崖面上凿出来的石阶最多有一英尺宽，没处抓，没处撑，只有干往

上爬。崖底周围，躺着不少跌断了腿的马匹。

我们的医疗队最为辛苦，伤病员不得不从担架上下来，不是拉呀、推呀地爬上去，就是由人背上去。医疗队的女同志不停地安慰和帮助她们的病人，没有一点厌烦的样子。……

爬了这么多山，以老山最为难爬。……可是渡过金沙江，爬过大雪山，穿过大草地，它的确又算不得一回事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遭受相当损失之后，冲进贵州省，攻垮敌军工事，强渡乌江，占领了省会贵阳和重庆之间川黔公路上的遵义城。那时，蒋介石从沿江各地征调来军队，修筑障碍物，加强川江各渡口的工事，不让红军渡江北上。同时，四川军阀实行恐怖统治，就连被疑为具有最温和的自由倾向的人，都要予以逮捕打杀。

尽管在数量上是一比一百，红军反而扑向敌人，展开了为时四个月的牵制战，对于这种战术，朱德和毛泽东都是相当到家的。朱将军说，地方军阀的那些烟鬼军队丝毫不成问题，没有多久便瓦解，无法再战；然而贵州挤满了蒋介石的二十万精锐部队，蒋介石还亲自来到省会贵阳，就地指挥。

红军完全击溃了敌军五个师，吸收了大约二万名志愿参军的新兵，四出活跃的政治工作人员渗入了贵州省的村村镇镇，召开群众大会，组织人民。红军包围了贵阳，但发现自己的兵力处于严重的劣势。话虽如此，蒋介石却急忙逃离贵阳。

在朱将军保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记录中，我发现了许多潦草的铅笔笔记，显然是他在村子里休息时，或是在深夜临睡前匆促记录下来的。有一页笔记提到一月十五日在遵义举行过群众

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追悼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敌军轰炸机就在那时夷平了附近一个小镇。同一页笔记上也提到工会已经组织起来，可是“会员们很怕白军回来以后被杀”——后来确实有二百人被杀死。

另外几页笔记显示出朱将军对人民的生活问题的不间断的关怀。有一处写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只能卖粮付租付高利。军阀还抢米，算作“战时粮税”。……老百姓管地主叫“绅粮”，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劳苦大众吃黑盐巴。农民就连黑盐巴也吃不起，放一小块在碗里，吃菜的时候就把菜在盐巴上沾一下。

显然是在村子里休息的时候，朱德草草写下了这么几行：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批编成小门。……除了城里的地主家外，没有见过被子。一家十口人，两张大床，丈夫、妻子、婴儿睡一张，老太婆睡一张。其余的便围着火睡在地上，没铺没盖的。

另一处写道：

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处处可见寺庙，城里才有教堂。

朱将军必定是在村子里一间小茅屋中写下了这几行字：

一个年青的长工自觉卑下，不敢参加红军，因为红军是一支“有学问”的军队。他说他给地主干了五年活，总共拿了三千铜板（约合二十七元九角九），也管吃。我们开过来，地主先跑了。那长工拿了米、面、玉米，回家埋在地下，免得军阀来抢。还回去为老娘拿了一床被和一条裤子。

谈到贵州战役，我给朱将军看了几份我保存下来的中英文剪报，因为这些报纸报道并“证实”他已经死了。这些消息系一个中国人、路透社采访主任赵敏恒所发，是当时中外报纸有关红军的最典型报道。第一篇报道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尸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裹缠由其亲信抬运。……朱德由于重伤，不治而死。……其红军亲信在逃命之暇，不断在红绸裹缠的尸体前用三牲祭祀，……现经证实红军残余已不足一万人。

朱将军看剪报时，轻蔑地笑着，这已经是第十次传说他死了。他把剪报推到一边说道：

“我有一次在上海《申报》上看到，青年会的一个美国人演讲说，红军征兵的办法是先包围村庄，凡是拒绝参军的就割掉耳朵！”

我问朱将军是否受过伤。“没有过，”他说。“我一生之

中从没有病过一天。可是，说实话，过雪山的时候伤过一次风。……国民党经常传说我死了。……那帮人不会说真话的！

“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要我的头，要毛泽东的头和其他人的头。他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订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

朱将军继续叙述贵州战役。他说，到了四月，敌军已经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贵州省。云南军也向贵州南部集结，通向云南的西路因而洞开无阻。红军抵挡不住这么沉重的压力，便突然在五月一日向西挺进，穿过朱将军以往熟悉的山区，进入滇北。为了让部队在敌军轰炸机发现之前渡过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派林彪率领一师人佯攻昆明，把敌军和敌机都吸引到那方面去了。

林彪一师人大张旗鼓地向昆明挺进，野战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先头部队强穿滇北。五月四日晚上，他来到绞平渡，把大吃一惊的四川守军缴了械，抢过九艘大船、武器、军火、粮食以及蒋介石的全部计划和命令。后续部队络绎而至，安全渡过江去。

在开往昆明的路上，林彪一师人缴获了一批增援贵州的军需品和药品。这一师人挺进到昆明在望的时候，从贵州偕同其他国民党要员逃到昆明的蒋介石夫妇，又匆忙出走。林彪一师人却掉头北进，三天之后，便在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并在北岸把所有船只毁掉，消失在彝族地区的深山密林里。从此有三个星期听不到红军的消息。

红军穿过彝族地区的深山密林，直奔万马奔腾的大渡河，蒋介石同时飞到四川成都，命令华西军阀“重演在大渡河一举消灭石达开的太平军的历史”。

朱将军奚落地提起蒋介石的命令，说道：

“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历史并未重演。”

第三十章

请想一想在遥远的西康省境内的深山密林中所上演的伟大历史剧吧！

中国红军因为一路上伤亡甚重，还有许多人留下打游击，因而在穿越彝族地区向北挺进的时候，剩下不过六七万人。朱德在一九二二年曾经走过这条路。恰好七十二年前，四万太平军也曾沿着这条路长途跋涉，翻过寸草不生、滴水皆无的火焰山。“董老”（董必武）安慰“小鬼”们（这些都是在部队长大的红军战士的孩子），说起孙悟空到西天取经路过火焰山的故事，因为这座山太热了，连孙猴子屁股上的毛都通通被烧掉——所以到现在猴子屁股上是不生毛的。

红军的小鬼们笑着说，“假如真有其事，那么你的长胡子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呢？”

董老又把话题一转说：“如果孙猴子能够爬过这

座不见人烟的大山，活得好好的，我们当然也不怕。”

唇干舌燥的红军终于在四周都是梯田和甘蔗地的疏落村子里找到水源，又在其他地方的潺潺河水中洗了脚。到了晚间，正象一名红军战士所说的，“沐浴在微晕的月光里”，跳到小河中洗个澡，然后在柔软的沙地上铺开军毯，“眺望着月色，谈古说今”。有时红军在河岸两边燃起篝火，咒骂他们的“死球”工程兵没能在彝族的深河中搭起桥梁。

为了同彝族人——他们的先辈当年曾与太平军作过战——建立友谊，参谋长刘伯承毫不犹豫地要与黑彝的首长歃血为盟。过去，彝族人见到红军，立刻高叫起“鸣——哟……鸣——哟！……”声；漫山遍野立刻就有半裸的彝族战士，手持梭枪，闻声而至，展开攻击。

一名通晓彝族语言的红军人员走在前面，安排与黑彝首领会面。在一个名叫海子边的池沼旁，首领和刘伯承会见并交谈起来。首领就在当场杀死一只鸡，把鸡血滴在两只碗里。他一边滴，一边说道：

“今天，刘司令员和小夜丹，在海子边结盟为兄弟。日后谁如有变心，就同鸡一样死去！”

刘伯承端起一碗鸡血，面对四周的彝族人 and 红军，高声说道：

“我刘伯承同小夜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为义兄弟。如有背弃，天诛地灭！”

刘伯承一饮而尽之后，这个彝族首领也高举血碗，高声宣誓：

“我小夜丹今天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生死与共，如不守

誓，同鸡一样死去！”

说毕仰头一饮而尽。

黑彝首领于是偕同他的战士护送红军穿过他们的地区，到了边界之后，他还派了二十名奴隶——白彝——引导红军北进，并让他们留在红军里学打仗，然后折回老家，教他自己的部落怎样同四川军阀刘文辉作战。红军果然毫无保留地教授给白彝！这些人在重回彝族地区前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他们后来如何，朱将军就不得而知了。

五月末，先头部队林彪一师人在安顺场开到大渡河——安顺场正是石达开和太平军覆灭的地方。

万马奔腾般的河水从终年积雪、高耸荒凉的西藏山区余脉咆哮东流。河水声如雷鸣，冲击在山岩上，不时升起虹雾。到了安顺场，河面加宽，渡口上有三条渡船来往摆渡，每条船每次可载八十人。当时安顺场只剩下了一条渡船，其它两条被扣在北岸，川军部队已在那里修筑工事，等待执行蒋介石的“象消灭太平军一样消灭红军”的命令。

传说就在这个渡口上，太平军的鬼魂常在黑夜哭泣，高叫复仇。随着林彪的先头部队而比主力部队先到达这里的朱将军，跟一些人谈起了儿童时代老织布匠给他讲述的石达开的革命军的故事。

故事正说到一半，一个战士走过来说：“我们买到一头野猪，把它杀了，我给你留了些猪肝之类的东西。打打牙祭吧！”

“好极啦！”朱将军眉飞色舞地叫起来。“我是个有名的大师傅！来，你切，我下锅。”

十几个人跟着他进了作为司令部的那间房子，站在旁边一

边闻炒菜的香味，一边听他讲太平军的故事。在饱餐之后，朱将军转过头跟刚才给他留菜的战士说，“你要是弄几块肠肚来，我能烧得让你流口水！”

吃完这顿饭，林彪一师人也准备好渡河了。渡船已经拉到上游老远的地方，坐满八十人，架起机关枪，就象七十几年前的太平军一样，直奔对岸。在机关枪的“喀喀”声和步枪的“嘣啪”声中，他们登上北岸。他们抢过两条渡船，派人撑回去，好再渡队伍过来。到了第二天，全师人渡过河去，北岸的敌军碉堡尽入红军手中。主力部队跟开上来了。不过，敌军轰炸机也同时出现，开始轰炸渡口和安顺场。仅有的另外可以渡河的地方是上游泸定的古代铁索桥。泸定铁索桥旁也有川军把守，工事很坚固，然而在主力部队过桥时，林彪的先头师可以从后面袭击敌军。

决定立刻下达了，两路纵队分别在两岸西进，彼此打着信号。夜晚，他们点起松枝赶路。一连行军十八小时以后，队伍才停住脚步睡了四小时，然后又爬起身来，沿着高低不平、上上下下的崎岖山径，继续赶路。

到泸定桥还有几小时的路程，林彪的师落在后面了。他们发出信号说，和敌军发生了遭遇战。主力部队依然勇猛推进，在五月三十日的黎明——上海五·卅惨案十周年纪念日，来到泸定桥。他们决定要在这历史性的日子里想办法通过泸定桥，以证明历史绝不会重演，除非是演出喜剧。

朱将军谈了这座有名的吊桥。它是用大约二十根大铁链^①

^① 泸定桥的铁链应为十三根，两边各二根作为扶手，下面共为九根。——译注

连结两岸石柱而修成的，每一根铁链足有“碗口那么粗”，铁链与铁链之间相距两英尺多。大渡河流到这里，河面变窄，只有三百米。满布敌人碉堡的泸定村立在河的北岸，南岸只有几座孤零零的房子。敌军早已准备了欢迎红军的办法，把桥上的木头桥板都抽掉和搬走，只留下靠北岸一百米的地方还没有抽。这样一来，这座两百米长的桥上只剩下铁链，在奔腾咆哮的河水上空五百英尺的地方摇荡。

林彪的一师人还没有开上来，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敌军拦住这师人的去路。绝不能再耽误任何时间了。必须铺上新桥板过桥。部队开始到附近森林中伐木，并且搜集木板、门板和任何可以充当桥板的材料。同时号召组织突击队，准备抢先过桥。

整个部队人人都愿意参加突击队，光荣任务交给了马大珠排长的一排人。^①然后又选了第二排随后出发。两排人把枪、刺刀和手榴弹在身上绑好，排长马大珠首先抓住了大铁链，两手交替向前移动，直向北岸进发。政委紧跟在后面，其他人也络绎上了桥。红军的机关枪组成一道掩护火网，工兵部队也拉着树干上桥，铺设桥板。

全体屏住呼吸，注视着突击队前进。马大珠头一个被射倒，掉到桥下激流里。另一个被射了下去，接着又是一个。其余的继续前进，可是就在他们抵达桥北的桥板时，敌人立即向

^① 关于安顺场和泸定桥两次战役，作者的记录恐怕有错误。根据杨得志所写的《大渡河旁勇士多》和杨成武所写的《飞夺泸定桥》两篇文章，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在泸定桥率领一班人夺桥的是班长廖大珠，而不是排长马大珠。——译注

桥板上倒煤油放火。看到火舌高卷，有些人犹疑了，然而政委没有等到火焰烧到桥边，一跳就跳到桥板上，招呼后面的人跟上来。他们趴在桥板上，把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扔出去，刺刀也出了鞘。

他们窜过火舌，把手榴弹扔到敌军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了，火焰燃着了他们的衣服。在他们后面，是同志们震天的呐喊声；而且，在呐喊声里，脚下仅有的桥板在“咔嚓咔嚓”的下落。整个桥上都是向前冲锋、踏着火焰前进的人。敌军退到他们的第二道防线，可是林彪一师人突然在他们身后出现，战斗结束了。

泸定桥的战斗持续了一小时。十七人阵亡，许多人被烧伤打伤，有几个烧得很厉害。有一名在强夺泸定桥时站在朱德和毛泽东身旁的参谋说，朱德始终不出一声，不动一动，好似一座石像。他知道红军的命运就要在此刻决定，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在此覆灭，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却要在此胜利。

黄昏时，敌机前来轰炸桥梁和村庄，朱将军下令离去。那天晚上，他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

朱将军对听众说，十七名英雄为了给大军开赴懋功铺平道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懋功，红军就要与第四方面军会师，继续北上抗日。

他说，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是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是上海学生和工人被屠杀的五·卅惨案十周年纪念日。而且，在七十二年前，石达开在五月间曾试图渡过大渡河。

简单回顾了七十二年来中国历史之后，朱将军谈到一个后来经常提及的话题：

“英雄主义是个旧观念，”他说。“过去，个人英雄凌驾在群众之上，轻视群众，甚至奴役群众。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我们前面的路比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要困难得多。我们必须翻越好几座世界上少有的大山，常年结冰的大雪山，我们必须时时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必须跨过奔腾的大河，自己修桥。在汉藏交界的广袤地区里，有很多好战的部族专杀汉人。几百年来汉族统治阶级企图灭绝这些部族，而且杀人不少。可是我们必须跟这些被压迫的部族交朋友，如同跟汉族工人农民合作一样，也跟他们合作。

“在前面的广阔地区里，还有敌人的无数山寨堡垒和奉令围攻我们的十万名敌军。国民党飞机从不袭击长驱直入的日军，但我们即使在大雪山里，它也要来轰炸。我们必须尽量夜间行军，躲避它们。我们的困难还有很多，我们的敌人也很多，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我们过不了的高山大川，也没有任何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

第三十一章

中央红军计划到懋功与从四川来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以便向中国北部作最后的进军。在地图上，从大渡河到懋功不到一百英里，可是直到七个星期之后，两支部队才在那里会合。

光是为了翻越大雪山，就准备了十天；翻越过去之后，又休整了一个星期。

出发之前，还有过几场战斗。藏军一团人从打箭炉一带开过来，增援川军。藏兵穿着羊皮袄，汉人军官也一身皮里军装。军官甚至连小老婆都随身带来了——满脸娇气的女人周身珠宝，裹在白羊皮袄里，也跟她们的主人一样，骑着健马。红军既然需要，没过多久就把这一团人——连那些小老婆在内——的皮衣都扒了下来。他们还缴获了马匹以及那些军官随身带着的现洋。

在准备翻越大雪山的最初几个山头时，朱将军发

出命令，指示每一个人都要尽量穿暖，携带十天的粮食和柴火。

命令中提到十万敌军正在泸定和甘肃之间的康藏地区集结的消息。对此，朱将军说：

这些部队战斗力极差，过去都在红军面前吃过败仗。他们不可能修筑新的工事，在凛冽的寒风中警卫，或者持久作战。我军则具有优势的战斗力，我们的部队和政治领导人积极勇敢，我们确信有击败他们的把握。

命令接着提到在大雪山中所要采用的战术。大雪山“路窄而且险峻，部队部署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几乎不能进行战斗。”部队行军每天不得超过六七小时，要准备制作担架，有某些地区还要使用白色伪装。过河的时候，要夺取敌军的船只，或者准备皮筏和木筏。必须避免从正面攻击敌人，要周密筹划夜袭，攻击一经开始就要“全面发动，连续不断，直到敌军的抵抗力完全瓦解为止”。

这项命令连同其后十八个月内朱将军的其他命令、报告、信件和文章，都写在各种各样的纸上，令人信服地记载了康藏交界地区落后、原始的生活。其中有一些写在大致裁成方块形的军用地图的背面，有一些写在中国人过年时使用的五颜六色的廉价薄纸上，有一些写在又厚又粗、上面还有藏文图样的藏民用纸上，或是写在从军用日记簿撕下的纸页上。另外还有一些写在几张大的粗纸上，原有的藏文已经用水或者化学药品洗得大致不见了。

朱将军有一篇文章大概就是在发布这项命令的前后所写的，题目叫做《如何争取敌军参加反日反蒋战线》，里面引用了一个川军俘虏所写的家信，很有意思：

我在川军的时候，长官告诉我们说，红军抓到俘虏，先割去舌头然后再处死。我们全连人都被俘了，可是连身都没有被搜过。一名共产党员跟我们谈话，问我们有多少有钱人是当兵出身的，我们说当兵就没有阔佬。他问我们，给军阀打仗，自己和全家可以拿到多少钱。我们说，家里的税反而越来越多，我们经常有几个月不发饷。他问我们为什么给军阀打仗。我们说，下了命令，谁敢不听。他说，我们帮了军阀地主的忙，军阀地主是蒋介石和日本鬼子的走狗，我们打的是跟我们一样的穷人。他要求我们参加红军，但又说，如果不愿意参加，红军可以发给路费，让我们回家，我们现在加入红军了。它跟川军可真是两样。长官和战士一块睡，一块吃，哪个长官也不能打战士。我们还上课、开会和唱歌。

因为朱德将军公事繁忙，没有时间跟我详谈这段时期的生活，他提了几个可以详述长征情况的人的名字，并且把他自己所写的重要材料交给我用。

一名跟我聊天的政治工作人员说，他以为最难爬的一座山要算库卓山，它并不象别的山峰那样高达千仞，可是山上森林密布，遮盖得连一丝光线都不透。部队在大雨倾盆中爬上这座山，满地泥泞，身子一直陷到臀部，要攀着树枝才能拔出来。

“翻过这座山，”他继续说，“夹金山就更厉害了，我们

许多同志都认为这是最难翻越的一座山。到这座山之前，我们已经爬了好几座大山，大家筋疲力尽。爬山之前，朱德将军检查了每一个部队，看看我们的鞋子，掂掂背包的份量，询问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指令医疗队走在最后，照顾那些身体不支而掉队的人。他鼓励我们作最大的努力。

“夹金山终年积雪。山谷间悬有巨大冰柱，到处白雪皑皑，一片寂静。我们身上的东西实在太多，每个人都要带十天的粮食和柴火。说起粮食，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多半是青稞，我们自己还存有一些荞麦和辣椒。我们把粮食装在干粮袋里，斜背在肩头。朱将军跟大家一样，也背着一份。他有一匹马，可是给伤病员骑了。

“如果我们能买到大米，就不会受那么大的罪，死亡那么惨重了。主食从大米换成青稞，就给部队带来了痢疾和种种胃病。吃了青稞，又照样拉出来——根本不能消化。另外一种折磨是虱子。只要在老百姓的茅草屋借住一夜，虱子就好象从地里钻出来一样，向我们展开全面进攻。人人有虱子，人人捉虱子。”

这么多人谈起翻越夹金山，要算董必武谈得最形象化。董必武是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五十多岁，很有学问。提起翻夹金山，他说道：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简直没有路，可是农民说，少数民族经常从山丛中下来抢劫，他们既然能翻山，我们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

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得人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用手势和拍打鼓动大家继续前进，表示山口就在眼前了。

“到了暮色苍茫时，我们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大山，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我们大家都筋疲力竭地躺下休息，朱将军却照往常一样，到四处巡查。他一路上和部队一同跋涉，疲劳不堪。但是他的例行巡查却是无论如何中断不了的。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牛肉干给我，他见人便鼓励说，我们已经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还有几天就可以到懋功了。

“为了避开敌人的轰炸机，我们在半夜就起来了，开始爬第二个山头。天下着大雨，后来又变成大雪，冷风象刀子一样吹打我们的身体，又有很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之中死去。

“提起这座山的最末一个山头，真令人胆寒。我们估计，从山脚到山顶共长八十里地。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他们想坐下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沿路，我们不停地弯下腰去，想拉他们站起来，可是发现已经咽了气。

“我们终于来到一处山谷，发现了几间部落人住的房屋，不由得都往那里聚拢，为重新发现人烟而欢呼起来。因为我们是汉人，部落里的人早就逃遁了，几百年来残酷压迫的结果，使得他们戒惧和仇恨每一个汉人。我们部队中有一些彝族人，可是他们也不懂得这一地区部落人民的语言。

“我把日子都过忘了，不过，大概在六月中或者六月底的

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一处满布部落村庄的山谷，到处是用牦牛皮撑起来的帐篷和茅草屋。大片的田地里，种植有大麦、小麦、小米和豌豆，还有成群的猪羊和牦牛。我们尽力和部落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从他们那里买到食物。我们付现款。

“那时候，伤病员太多了，我们主力部队决定休整一个星期，由彭德怀率领十一个团前进，以便在懋功、两河口、理番和茂县地区与我们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联络。第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这个地区好几个月，可是我们在到达该地区之前，还要经过不少高山大河。这些山倒不象已经爬过的大山那样险恶，但这整个地区到处都有强悍的藏族人，我们每前进一步，他们都要打。”

跟着彭德怀先头部队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员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我们在黑水河附近跟藏族人打了四天，终于来到一个名叫卫固的残破小村庄。村里人都跑光了，河上的绳索桥也被割断了。他们爬到卫固村后面的悬崖峭壁上，对着我们往山下抛大石头，彭德怀不得不派人去赶走他们。

“悬崖上、山坡上到处吹起了部落人号召作战的号角声：
‘鸣——鸣——鸣！’

“部队正在建造浮桥，只见对岸山上冲下来一列武装纵队，边跑边嚷，可是河水咆哮声太大，无法听见他们嚷的是什么。他们中有一个人用纸条裹着石子，隔河扔过来，上面写道：

“‘我们是红军第四方面军。上游四十里的银宁有一座绳索桥，可以过河。’

“在去银宁的路上，经过了好几个空无一人的村庄，藏族人仍然从悬崖上往下抛大石头。银宁的河面比卫固还要宽，吊桥也断了。我们又发现了在对岸行军的队伍，他们来到河边以后，由跟随队伍的一名藏族向导隔河扔过一封信来。那是徐向前写的信。

“我们全体撤回卫固，工兵部队搭起一座浮桥，我们渡过黑水河和同志们会师。大家拥抱，高唱，流泪。”

休整了一个星期，红军主力部队沿着彭德怀走过的路线前进。临出发之前，朱将军发布了这项命令：

环境虽很艰难，我们的军政教育工作仍然必须坚持，不能间断。必须遵守以下六项纪律：（一）服从命令；（二）动作敏捷；（三）严守时间；（四）爱护武器；（五）注意卫生；（六）对兄弟部队和部落人民要和气、尊重。

“对部落人民要和气、尊重”，真是一条难以遵守的纪律。行军途中不断发现尸体，都是彭德怀部队里因走累了或打累了而脱队，被部落人民杀害的战士。

我问朱将军当时他的看法如何，他答道：

“进攻的时候，我们尽力把部落战士撵走，而不杀害他们。我们对他们的家庭一碰都不碰，不拿任何东西，希望他们了解我们并不是敌人。彭德怀的部队在跟部落人民的关系上，后来获得极大的成功。他甚至在广大地区内组织起部落人民政府——和我们在江西的办法一模一样。”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和第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这支饱经艰辛、形容憔悴的南方部队散了队伍，直奔他们的同志而去，又是喊叫，又是哭泣，又是高唱。许多人高兴得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七月二十日^①，在倾盆大雨中，他们列队开进懋功地区的两河口，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到处贴满了宣传画和标语，村落间拉起了军用电话线，草原上搭起了讲台。

这次大会的经过情况以及随即举行的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是由好几个人讲给我听的。

朱德和毛泽东在滂沱大雨中走到村外，等候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他们已经和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及其他指战员详谈过，所得知的情况颇令他们不安。

一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把当时的局势说明如下：

“红军第四方面军共有五万人，都是从四川、河南、湖北来的彪形大汉。有的是贫农，有的当过农奴，什么样的罪都受过。他们在作战时发挥过英雄主义，而且也受过苦。张国焘在物质方面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吃得好、穿得暖，可是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一般性的教育或政治教育。张国焘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派去当政委的。他的任务很明确：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以免它变成任何有野心的军事领导人的工具。

“张国焘把红军第四方面军变成了他自己的工具。他仿效国民党的老一套办法，建立起一个有势力的军官集团，作为私人亲信。他按照国民党的办法组织军队，连军衔都照搬过来。他为自己及其亲信集团建立了特权，例如吃最好的伙食，穿最

① 应为六月十六日。——校注

好的衣服，还留下三十匹马给自己和卫兵用。

“毛泽东和朱德以及中央红军的少数将领当然都各有一匹马。毛泽东因为生病，是骑马的，只有一名卫兵。朱德也有一名卫兵。除非他要检查部队，朱德一向把马让给别人骑。我们经常向他抗议，因为他在整个长征中要指挥全军，可是他说，他天生来身体还结实，而别人的确需要他的马。

“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离开江西之前，我们曾与一百万敌军打了好几个月。我们的队伍离开战场马上就开始长征。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行军，穿越平原、高山、大河，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把大部分伤病员留给了农民；我们一路上还留下许多连队以发展游击战；所以，到达懋功的时候，只剩下了四万五千人。

“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象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张国焘的傲慢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的时候，他骑着马带领三十名骑兵卫队，活象演员在舞台上亮相。朱德和毛泽东奔上前去接他，他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朱将军在对集会部队的讲话中，盛赞张国焘的多年革命历史；而张国焘在讲话里向他的部队介绍朱德时，只说‘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

“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决定所有红军的政策和纲领，战略和战术。党已经决定长征到中国北部。会师之后，作为领导机关的政治局准备在两河口召集会议，以便制定继续北上的路线。

张国焘不顾这些事实，就在对部队的讲话中宣布了他自己的纲领，声明川康交界地区地域广阔，乃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地点。

“我们当初决定长征，并不是打算在康藏边界的高原上定居下来，同时却眼看着日本占一省又抢一省，眼看着国民党卖国贼继续投降。

“当然，在每一次大的革命高潮中，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并且会犯错误。但问题必须解决，错误必须改正。因此，政治局会议坦率地谈到了第四方面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可是张国焘不是一个虚怀若谷、愿意接受批评和承认错误的人。他甚至于傲慢地夸耀他的五万人的装备如何精良，而我们的部队损失如何重大，装备如何低劣。他是在暗示：只有他这个人才能领导红军。他反对执行北进政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在川康边区扎根，然后发展为革命根据地。

“会议辩论得很激烈，在散会之前，张国焘终于保证改正第四方面军里的军阀习气和做法。可是他以蒋介石在我们长征路上投入了十万兵力为理由，继续反对北上。他说，上上之策是沿着原路回到雅安附近的天全，占领藏人城镇打箭炉，在西康省建立政权。他的意见被否决，会议重新确定了北上政策。

“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我们最后妥协到把部队分为两路纵队，向北进发。第一纵队，或称东路纵队，由毛泽东率领，队伍是从南方开来的中

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二纵队，或称西路纵队，由朱德率领——刘伯承任朱德的参谋长——包括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和我们的第九和第五军团。

“我们立刻出发。我们东路纵队到达了离松潘七十里地的毛儿盖，在那里休整三个星期，一方面准备穿过大草地，一方面等候彭德怀的队伍开上来。彭德怀的队伍去为全军寻找粮食去了，还把部落人民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政府。

“西路纵队开到发源自昆仑山脉的一条湍急的大河前面，队伍停住脚步，搜索渡河的地方。张国焘宣布，这条河无法渡过，纵队别无二路，只好折回西康——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办法。他坚持朱德和刘伯承应该随他回去。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在华西名传遐迩，张国焘为了自己的算盘，打算利用他们两人。而且朱德还有一部全军仅有的无线电手摇发电机。

“朱将军和刘参谋长说，渡河的地方是可以找得到的，即或渡不过去，西路纵队也可以到毛儿盖与东路纵队合并，继续长征。当天晚上，张国焘带着第四方面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司令部，把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抓了起来。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

“第一项是由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

“朱将军答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的第二项命令是由朱德谴责党的北上展开抗日反蒋解放战争的决议。朱将军答道：

“‘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

“张国焘说，他要限定时间让朱德重新考虑，如果还拒绝

这两项命令的话就枪毙。朱将军答道‘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有许多因素使张国焘没有执行他的恫吓。首先，那里还有红军第九和第五军团，他们打算抢回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再跟东路纵队合并。张国焘警告他们绝不许抢！面对着这种很可能在中亚高原上引起一场血战的情况，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最后还是跟张国焘原路而回。

“西路纵队在张国焘率领下，回到西康省，一直在那里驻到一年以后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三万五千人开到该地为止。贺龙的队伍是沿着中央红军所经过的路线单独长征的，他们没有象我们那样翻大雪山，而是一路西进，绕过打箭炉，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

“贺龙和他的政委萧克^①了解了事件原委，并知道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尽量对张国焘容忍以后，贺龙便郑重劝说张国焘，应该让朱德复职，率领全部红军北上。那时，毛泽东的队伍已经到达西北，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根据地，直接阻拦住日本可能的进路。同时，全国的政治局势也比较对革命有利，而西康的粮食情况又太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答应下来。朱将军至此才重掌兵权，率领红军北上和毛泽东会合。张国焘则始终还掌握着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队伍还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

朱将军从未向我提到他这一年在西康实际上作了张国焘的

^① 贺龙原率领第二军团，政委是萧克。第二军团后与第六军团会师，组成第二方面军，由原任第六军团政治委员的任弼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译注

俘虏的事。我们谈到他这一段生活经历的时候，日本已经侵入长城脚下，朱德上了前线。我因此只有仰仗其他的人，以及他在那一时期所写的军事和政治文章。这些资料证明，朱将军在西康这一年中不仅专心致志地写作，而且尽一切可能帮助张国焘同四川军阀的部队进行斗争。

他在这一段时期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对军阀部队的性质作了分析，另一篇显然是在西康西部的甘孜写的，但未注明日期，文章讨论在大雪山中作战的战术问题。

朱德通过他的收音机还熟知天下大事。这从他对阿比西尼亚^①军队所采用的战术和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事所作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一份注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文件，是一篇很长的对川军的公开信。行文简洁有力，一开始就对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直到当时的独立斗争作了历史的分析。

这封信不仅分析到东京和南京缔结的臭名昭彰的塘沽协定，而且分析了一九三五年七月签订的何梅协定^②，南京政府在协定中同意全力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

这项文件一方面表现了朱德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精辟见解，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在那样令人沮丧的环境里，还以最大的热情来继续进行斗争。下面是文件的摘录：

阿比西尼亚人为了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已经两个月。阿比西尼亚虽然是个仅有一千万人口、三十万平方英里土地的国

① 今埃塞俄比亚。——校注

② 由何应钦和梅津签字。——译注

家，它的人民却仍然与在数量上和军力上比他们强过多少倍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

我们中国人拥有好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四亿人口，从黄帝到现在已有四千年历史。可是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拿起枪来抵抗日本鬼子，反而不断地向日本割让领土。

阿比西尼亚战争和日本入侵中国，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割和殖民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这些前哨战会逐渐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了。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将成为巨大的战场——它将成为帝国主义俎上的鱼肉。

我们大家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我们唯一的祖国。我们怎能奴隶成性，而根本不考虑挽救自己的国家以免毁灭呢？你们四川将领拥有几百万军队和精良武器。你们为什么不起而仿效小国阿比西尼亚，光荣地为独立而战斗呢？祖国英勇的人民为什么不站出来为祖国的生存而战斗呢？……卖国贼蒋介石情愿为帝国主义开路，摧毁或禁止一切抗日团体，借此向日本帝国主义表示忠诚。难道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中国人愿当亡国奴吗？

信中还提出一项建议，呼吁川军与红军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实现三项条件：（一）结束内战；（二）在川军的全部区域内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利；（三）保障人民有组织和武装自己成为抗日志愿军的权利。这封信最后写道：

如果你们接受这些条件，请派代表来和我们会谈。如果你

们继续接受卖国贼的命令，向我们进攻，并且继续执行蒋介石的迫害人民和围剿共产党的命令，你们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为帝国主义鸣锣开道。……抗日的责任现在落在中国民众的肩头上，如果你们愿意打日本，就不要惧怕民众，而是必须跟民众和衷共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们的目标是飞黄腾达，发财致富，如果中国被毁，你就是家财万贯，拥地十万亩，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你们拒绝我们的建议，继续卖国，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伥，其后果必然是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你们就不能逃避人民的惩罚。现在是你们决定选择哪一条道路的时候了。

四川将领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鸣锣开道”的做法是很明显的，不但从历史上，而且从朱德在红军和杨森的部队在西康的天湖和民雅交过两次锋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两次战斗中，川军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

这篇文章有好几页提到如何对待和教育俘虏。文章写道，在俘虏被解除武装之后，应该把他们分作两部分，军官是一部分，士兵又是一部分，各有驻营的地方。对待“士兵要和蔼，对于军官要监视。”经过仔细甄别以后，政治觉悟较高的士兵可以先予训练，然后再要求他们参加红军。对待士兵的办法如下：

我们必须先安慰士兵，问他们老家在哪里，未当兵之前做什么事情。问他们每一个人，给蒋介石打仗可以拿多少钱；受了伤，有什么待遇；阵亡了，他家里能拿多少钱；如果既没受

伤又没阵亡，他自己能拿到多少钱。回答总是一样的——“什么也拿不到”，可是我们必须一问再问。我们必须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问完之后，我们必须利用这些事实向士兵证明，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他有了阶级觉悟之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政策和行动跟国民党的比较一下；把国民党的原则和行动跟共产党的比较一下。哪个党、哪个军队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哪个是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的；谁教育和提高士兵，谁使士兵过得暗无天日；谁亲日，谁抗日。

我们应该从士兵面对的现实生活着手：自从他给地主和资本家干活以来，自从他当兵以来，受了多少迫害和凌辱，咒骂和殴打。我们不应该忘记，士兵在白军里生病受伤，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照顾，听凭他死亡。离开白军之后，他分文没有，无家可归，还要纳重税，就是能借到些钱，也要付出很高的利息。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都讨论清楚，把它们跟我们部队怎样对待士兵作一个清楚的比较。

有些俘虏一定要加入红军，有些还愿意回到原来的部队以便从内部领导起义，有些则要回家乡去从事某种革命活动。对那些愿意回家的，应该先教会游击战术和分地主土地的办法。对那些只愿意回家看望亲属的，也应该教他们怎样组织游击部队和分地。那些愿意打日本的，可以在红军内进行教育。就是那些职业化的老兵也要给予充分的教育以后再释放，因为他们在旧军队里很可以起宣传作用。

分地对于被俘士兵影响很大，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来自苏区，家里曾经分到过土地。他们大都是被军阀绅粮强征当兵的，也有些跟红军打过好几年的仗。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打，一再

对我们说，他们的军官经常告诉他们，被红军抓到就要开膛划肚，所以不得不打。另一个不得不打的原因是高级军官要下级军官对开小差事件负责，下级军官因此对属下每一个人都时刻监视着。

在处理俘虏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粉碎国民党传播出来的各种滥调。我们必须让俘虏认识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意义。

朱德将军被软禁在西康这一年的生活情况，从他的一名参谋所讲的一件事里可以想见得到：

“红军是由熟悉各种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他们剪牦牛毛和羊毛来纺织，制成毛军服，还做成皮衣和皮靴。地势太高，空气稀薄，水烧不到一百度就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煮饭的时间尽管很长，但煮成的饭仍不免是夹生的。……”

“在一次战斗之后，我和朱德带领一支小分队沿着山径前进。路上出现一群部落人民居住的黑帐篷；在汉人部队到达前，部落人民早已带着粮食逃走了。我们走进一个帐篷，发现我们打前站的十五名战士，他们围着一堆早已熄灭了的灰烬，盘着腿席地而坐。我们叫他们，但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低着头，象是一座座雕像。我们前去搀扶，他们早已冻毙。在另一个帐篷里，我们还发现六名战士围着一堆余烬坐在那里，每个人的背上都中了一枪。”

第三十二章

有一次，我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里听几个红军谈长征。其中一个说道：

“我要用同志的态度来问问你们，谁在长征时偷了我的针！我一直没有说这件事，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针，所以还是说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有一个答道：

“也许你为了显阔气，送给哪个村子的姑娘了！我看见过朱德缝缝补补，可是从未看见过你往褂子上钉一个钮扣。”

“朱德在西康的时候，空闲时间可多的是，”丢了针的那个人答道，“过了大草地，我连可以往上钉钮扣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才吃老鼠，把一个村子的老鼠都搜绝了。味道真难吃，可是我们还是吃光了，真有点对不起猫狗。”

另一个开了口：

“我记得过了大草地以后，穿过敌人封锁线，遇到汉族农民。他们以为我们疯了。我们抚摸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拥抱他们，我们又跳又唱又流泪。”

大草地！大草地！每个人都谈到大草地。由毛泽东率领的第一支红军部队在一九三五年九月穿过了大草地。一年之后，朱德将军率领的红军其余部队也通过了这一令人毛骨耸然的可怕地带。

大草地在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而且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是黑泥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是不是几百年来就是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寒风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着阴沉的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红军从大草地的东部边缘穿过，这里的沼泽较浅，而且时时有部落骑兵偶尔行走过的狭窄的土地。每一个人带着八天的粮食和柴火，走在前面的林彪第一方面军还带着竹批，为后续部队搭盖休息的处所。每个人携带的食物有小麦和茶叶。

一个红军在《长征史》中写到穿过大草地的情景：

毛儿盖附近的友好的部落人民——曾经受过汉族文化的影响，因此更为友好——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穿毛袜和羊皮衣，一定会冻死。我们尽力准备周到，可是无法给这么多人买足羊

皮衣、羊毛衣。

正要进入大草地的时候，我们听见后面响起枪声。一队部落骑兵赶上了我们的掉队散兵，抢了枪支。第一天我们行军十小时，然后就躺在又窄又冷的小路上睡了，把身体两旁的长草连到一起，算是帐篷。

第四天，走到一处深过膝盖的沼泽，不断下沉，马匹只能又拉又打，才拔得出脚步。乌云低压，除了野草的簌簌声外，这是一块死寂地带。

我问一个同志，他如果是作家的话，怎样来描写大草地。他说，他一定把它描写成沙漠，不过这里没有黄沙，而只有水草，在沙漠里可能口干渴死，这里却到处是水；太阳在沙漠里肆虐，这里却见不到阳光。他说，“我听说在沙漠里还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可是在这里连这份享受都没有。”我们终于一致认为，大草地是两脚老是浸湿的地方，是马掌足印立刻消失的地方，是人和马跌进大草堆的泥泞中即使侥幸被拉扯上来、也要在寒风中战栗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实在不能把这个一片荒凉的地带如实地描绘出来。

另一个名叫莫许的红军，留有日记，他这样写道：

今天，我发现一个同志在泥水中挣扎，身体缩成一团，浑身都是泥浆。他紧紧地攥住步枪，这支枪已经活象一根泥棍。我以为他是跌进泥坑里，打算爬出来，就扶他站起身来。我把他拉起来后，他勉强挪动了两步，全身重量就都压在我身上了，实在重得很，我几乎支不住他，更不用提行走了。我放了手，

要他自己走，他又跌倒下去，泥浆四溅，可是还用力抓住步枪，打算站起来。我又拉他起来，可是他身体太重，我则太虚弱，拉也拉不起来了。我看他就要断气，想起身边还有炒青稞，便喂给他，可是他连嚼都不能嚼，看来不是口粮可以解救得了的。我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干粮袋里，等他咽了气，便站起身来，继续前进，让他独自躺在那里。后来，我们到了休息地，我从干粮袋里拿出炒青稞来，可是我实在吃不下去。我一直惦记着那些垂死的同志们。我别无办法，只有眼看他跌倒在地而不能助一臂之力，我要不这样，也只有倒下去，跟部队失去联系，而终于死亡。话虽如此，我还是咽不下那些炒青稞。

岁月流逝，长征路途上和先头部队所搭的休息所里尸体也越来越多。筋疲力尽的人们曾经躺在休息所里想喘一口气，后来的人却发现他们已断了气。每一个人的身旁都有几小堆炒青稞——同志们把自己所需要的口粮都留下了。柴火已成了一堆堆灰烬。

有时大雨滂沱，哗啦啦地下着，连紧跟在后面的人的讲话声都听不到了。大雨过后，就是猛烈刺骨的大风。太阳偶尔出来一下，马上又被吞噬得不见，倾盆似的大雨又下起来。

大家走到休息所，都挤到里面，想取火暖暖，可是柴火湿了，点不起来。

第六天，他们隐约看到几个矮矮的小山头的暗影，四处还有炊烟袅袅，人人欣喜若狂。后来他们又在路上发现几块石头，便都捡在手里，想到它们所代表的美好的涵义，不禁欢声四起。第八天，他们再度看到炊烟，第九天下午，还看到了远处的树木和低矮房屋。他们象沙漠上的饥饿人群一样努力前进，

可是队伍从前面传来命令：

“向左进，准备今晚露营。”

他们默然接受下命令。后来，他们终于踏上了硬实的陆地，首先发现了象葡萄似的一串串草莓，摘下来就吃。几天来，每天只吃几口在热水里泡过的炒青稞，就是酸草莓，也是珍馐美味了。

此后的第二天黄昏，他们来到一个居民已逃避一空的部落，房子是用牦牛粪砌成的，一燃就着，只好组织巡逻队专门防火。有些房子很大，里面有三、四十间屋子。这时，部队的一切粮秣都吃完了，大家只有找到什么吃什么。有人把牛皮煮上二十四小时，吃下肚里，也有人煮大皮靴，喝皮靴汤。

蒋介石还调遣了著名的第十九路军一个师到边区地带，红军跟它交上手，一下子打垮它两团人，师长跑了，八百人投降。投降的士兵告诉红军说，他们原有的军官都调换了，新来的军官都是蓝衣社成员，他们宣传说，红军见到俘虏就割耳朵、挖眼睛、开膛划肚。有一个士兵攥起拳头，自己敲着脑袋叫道：

“信了这些鬼话，这脑袋有多傻！”

另一个俘虏笑着说：“要是连长说一次鬼话你就敲一次脑袋，非得把脑浆敲出来不可！”

“我从来不信那些鬼话，所以用不着敲脑袋，”另一个说道。“上面说我们北调是去打日本鬼子，一直到了这荒凉地方，我们才知道是要打自己人。我要参加红军。”

另一个士兵开口说：

“我要跟着红军离开这块荒凉地带，然后回家。”

“你永远到不了家！”他的同伴抗议了。“没等你走到半

路，你又被蒋介石的军队拉去当壮丁了。……你又没钱，能回得到家？”

“我一路上要饭回去，就算他们拉我强迫我再进蒋介石的军队，我绝不打仗！”

“到了那时候你就作不得主啦！你不打仗，你的班长就从后面开枪，毙了你！”

“说这些话也没有用！”那个遭受围攻的士兵叫道。“要是再派我打红军，我就再交枪投降。”

红军在饥馑中作战，终于冲破了敌军在甘肃边界的工事，涌入甘肃平原。这是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破军阀部队，夺取大米、制服和药品。这时，毛泽东的队伍只剩下二万人——称得起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跟胡宗南法西斯部队、马家军和东北军交过几次手以后，毛泽东的队伍终于到达陕西省北部，和刘志丹指挥下的一万名红军游击队会师。第四方面军在一九三四年留在西北的徐海东一团人，已经发展到一师人，在甘肃东部作战。

一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朱德率领其他红军部队沿着大致相同的长征路线，在甘肃南部的徽县，和林彪的第一方面军取得联系。

几乎是在同一天，一九三一年被日本从东北赶出来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从陕西西安打电报给蒋介石，建议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联合红军抗日。蒋介石大怒，拒绝了这项要求，命

令张学良停办他在西安新设的军官训练学校，坚称学校里满是共产党员。张学良回答说，学校收的是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而战的人。

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他对到会的西北军将领说，中国的主要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背信弃义的共匪”。胡宗南和王均同意此说，已经被红军消灭过手下几团人的张学良却另有看法。

就在这时候，日军西进深入绥远，图谋包围和切断华北五省。华北的矿山、铁路以及其他战略工业在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中是必不可缺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奋力战斗，可是群情激昂的全国人民也深切了解，他的部队不过只能支撑一个短时期。华北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奔向绥远抗战，而蒋介石不得不派遣的三师人却始终远离战线，更谈不到对日军发射一枪一弹了。

日本的攻势和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新围剿，看起来正象日本、国民党的钳形攻势，不但针对着红军，而且针对着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以及和东北军结成联盟的杨虎城指挥的陕西省绥靖军。蒋介石认为这些军队不愿打红军的主要原因是“军纪不强和领导无方”，因此决定在十二月十一日再在西安召集一次特别“剿共军事会议”。西安是张学良、也是杨虎城的司令部所在地。

为了准备剿共战役——在西安会议以后就开始的战役，蒋介石新派出三师人到甘肃，还调动了大批大米、军火、款项和被服备用。千百名武装的特务警察带着无线电发报机也暗中潜入西安，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反对张学良。

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事件，使得饱经忧患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人士深信国民党和日本确有一项压制全国抗日力量的阴谋。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更为加深了这种看法，日本和南京官员所发表的一些声明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例如，毛泽东的部队抵达西北不久，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建议成立东京—柏林—南京反共协定，“以防亚洲布尔什维克化”。其后不久，广田又在日本国会发表声明如下：

因此，在我们的这一部分地球上，镇压共产党活动，并将中国从赤色威胁下解救出来，不仅对于中国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有利于东亚和世界的安定。……日本政府深愿在各方面与中国合作，共同肃清共产党。

广田又说，中国目前仍有“与我们的政纲精神完全抵触”的学生运动，“日本深感遗憾”，不过，“相信中国当局不久即能改变此一局势”。

南京政府虽然没有在一九三六年的东京—柏林反共协定上签字，但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张群一再向日本保证，“中国绝不（哪怕是暂时的）放弃其反对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一九三五年年初，以中国主要亲日分子之一而著称的张群，正式向日本政府保证，他的政府感谢日本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情况的关注，“因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动乱势必对邻国产生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对“红色威胁”进行不懈的战斗，“我们相信可以早日将此一祸源全部铲除干净”。

蒋介石的新剿共战役，即或没有日本的直接合作，至少也

是在日本驻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军事和外交代表的监视下进行的。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的西安是全国唯一没有日本“观察员”的战略城市。在四川，人民经常袭击这类日本人。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队和秘密警察都严防发生同样行动。成千上万的中国爱国者，包括律师、银行家和新闻记者，因为要求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员”加以逮捕、监禁和杀害。

这就是朱德将军率领红军从康藏边境进入西北地区时的政治和军事情势。长征已告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曾经叙述过朱德将军的部队和林彪指挥的第一方面军会师的经过。

马海德是一九三六年夏天参加红军的，他曾经毕业于瑞士和贝鲁特、叙利亚的医科学校，在其后的重要历史年代里，始终在红军工作。

在他的信件和日记里，这个美国医生描述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怎样在甘肃中部和南部先占领六个县，以便迎接从康藏地区来的朱德将军的部队。在徽县县城和附近村镇，家家户户腾出空房来款待朱德的部队，第一方面军运来了粮食和四万套冬季军服——红军被服厂制造的，来迎接他们。

一个农民快步跑了四天，给第一方面军送来朱德将军的第一封信，然后带着回信步行而归。

据马海德的记叙，朱将军的先头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抵达徽县，但没有停留便继续前进，以便给后续部队留出地方。

第四方面军的一批部队和朱德、张国焘在八日到达。其余

的第四方面军部队在第二天到达，贺龙和萧克的第二方面军因为担任掩护，在十月十九日和二十日才到达。

马海德说，这批部队情况相当良好，装备精良。由于一路上不断作战，每一个人都带着额外的步枪、机关枪和军服。人数太多了，四万套新冬装都不够分配，只好再赶制。贺龙的衣衫褴褛的部队直到两个月后才穿上新军装。

马海德描述说，朱德将军“瘦得象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他接着说，朱德换了一身新军服和大衣，可是直到到达陕北保安——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司令部——才把胡须剃掉。

马海德在一封信里写道：

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象红军的父亲。他的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他的司令部好象蜂窝一样，通讯员和各级指挥员川流不息地你进我出，电话铃声始终不停，电报也收发不断。

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面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朱德刚走进设在徽县的司令部，第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就打电话过来。朱德非常激动。第二天黄昏——为了避免天天都来的敌机轰炸——红军在当地的会师大会开始了！

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

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

已经有一批西安—兰州公路上的长途汽车被缴获过来，输送伤病员。第四方面军的战士都是农民，他们从没见过汽车。尽管有病，他们也害怕坐汽车，宁肯步行到医院去。……

十月二十六日，沙河镇举行了全区红军的集会。林彪和其他领导人就西北局势，红军和日军之间的形势，日军继续进攻绥远的情况，作了全面报告。蒋介石有十个师在胡宗南和王均的指挥下在甘肃跟红军作战。

几个月以来，红军一直号召国民党这几师人与红军组成统一战线，对日本作战。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少帅张学良也继续命令东北军和红军作战，但是有很多部队反而参加了红军，红军现在就有了一个骑兵师，整师人都是原来的东北军骑兵。

早在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便曾下令红军，除了自卫之外，不得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应当加强统一战线的宣传。他还命令，不要再吸收东北军加入红军。十月二十七日，红军从敌军面前撤退，政治工作人员则到处张贴组织统一战线的宣传画。而胡宗南反倒增援几师人大施压力。马海德在他的日记里叙述了这以后的情况：

十月二十九日。有消息说，胡宗南的四个师正要包围我们。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部署和计划。……胡宗南的一名骑兵军官今天到我们司令部来说，他奉命于明天早晨十一点钟在某地向我们进攻。这名军官说，因为胡宗南一向坐飞机监视部队行动，他只好带部队作一次假攻击，不过他建议我们最好在早晨

六点钟穿过他的防区，以便有五个钟头的宽裕时间。这一事态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开始在白天迅速行军。敌机发现了我们，开始轰炸。它们炸毁了好几个小村子。

十月三十日。在红军军事学院第一次听朱德演讲。他讲得清楚明了，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要求学员们日夜不停地学习，以便迎接中国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所面对的伟大工作。贺龙也讲了话。他可真能鼓动！声音洪亮，讲解清楚，还带有许多表情，就是那些情绪低落、筋疲力竭的人听了也会斗志昂扬起来。

十一月一日。赴党西北局。……在那里看到十月三日的天津《大公报》，上面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徽县惨败。其实，在徽县，朱德的队伍未经一战便集结起来。毛泽东却在保安，离徽县有一千三百里远。

十一月三日。在山洞里躲空袭，遇到投奔红军的东北军两个团的几名军官，就在空袭之下，跟他们谈了三个钟头。他们和他们的部队都希望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后来又和他们的部队谈起来，士兵们显得忧愁和沮丧，因为红军派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宣传统一战线的原则。在山坡上听了朱德对这两团人讲话。朱德说明，让他们归队去说服同伴加入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紧急而必要的事。朱德讲话时毫不装腔作势，非常严肃，也很有说服力。他把思想整理得极有条理，象教师一样，慢条斯理地叙述出来，还经常重复地讲。那些满怀悲伤和期望的士兵终于围到他的四周。朱德真象慈父。他珍爱所有士兵。……

十一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的

指挥员连日与朱德和参谋人员开会。蒋介石的军队仍然全力向我们扑来，可是我们拒绝再退。大战之前，红军总要有一连串的会议，要向红军战士说明为什么要撤出那么一大片地区——那是为了保全愿意抗日的军队，争取敌军参加统一战线，王均在飞机失事中毙命。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朱德在四川时就认识这家伙。……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战斗结束。红军在夜间趁着轰炸机不能出动，进攻敌军。宁夏平原横扫过来一阵寒风，红军战士的手都冻僵了，既不能扳枪机，又无法拔掉手榴弹上的弹簧，索性展开白刃冲锋。许多人抓到了白军，把他们缴了械，有的人就把棒形手榴弹当棍子使用，专敲白军的脑袋。红军骑兵（原属东北军）追赶一团乱得鸡飞狗走的白军。周围几里地的道路上满是敌军尸体。我仅在一个山谷里就看到一百五十具白军尸体，其他地方还有几百具。好几百白军跌死在深谷和空井里，我们费了好几天工夫才用绳子把他们吊上来。

听俘虏说，他们是从湖南坐火车来的，下达的命令是开往绥远抗日。等到下车来打红军的时候，上级答应说可以发双饷——可是从来没有拿到。他们说，法西斯分子渗进了部队，散布所谓红军暴行的谣言，强迫大家打仗。俘虏们现在待遇既好，又受教育，每天跟着我们部队一起上课一起听戏。胡宗南也正在整顿他的部队。

十二月三日。我又回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保安。朱德和毛泽东以及参谋人员会合后，就举行了长时间会议。听到人们谈起张国焘，都说他“狡猾”。

就在这种情况下，史诗般的长征结束了，距离从江西宽田出发的时间，正好是两年一个月零十九天。重新合在一起的有战斗力的红军现在约有八万人，和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时的战斗力不相上下。来到西北的平原和山区以后，它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在延安——它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成为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张国焘终于被提交到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他虽然协助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却违反了它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在他的下属以及被他当作俘虏的朱德、刘伯承和其他人的指证下，他和他的亲信还为自己辩护。

在这次审查中，朱德将军丝毫没有提到他在张国焘手中所受到的待遇，只把自己的讲话限于指摘张国焘违反红军和党的原则和政策。张国焘满口好话，心怀鬼胎，为对待朱德的行为表示歉意，并且接受委员会的决定，加强学习，改正错误。

一九三八年夏天，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有一批到延安磋商军事问题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把张国焘偷带到汉口，他在那里加入了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的组织。^①

跟朱将军谈论这次事件的时候，我有一次提到，竟有成千上万中国人积极地帮助日本人征服中国，而甚至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也参加了特务组织共同打击中国进步力量了。

朱将军答道，中国现在是个半封建国家，而且一百年来，在列强压迫下还成了半殖民地。他说，在这一世纪里，中国政

^① 张国焘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随同国民党官员祭黄陵时离开解放区的。——译注

府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肮脏工具。北京、南京和上海始终是以高价向外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计划的温床。

他指出，中国的卖国贼总会比其他革命国家多一些，这是因为地方太大，人口太多了。

“美国在革命战争中，也曾经出现过大批卖国贼，”他提醒我说。“即或你在学校时没有人向你讲过，但在你们自己的解放战争中，的确有大批美国人积极为英国人服务。再想想把西班牙出卖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佛朗哥和他的部下吧！再想想十月革命时投降资本主义国家打本国人的白俄吧！看看印度，看看朝鲜，看看全世界，你就可以发现总是有人为了权力和金钱而出卖本国人民。

“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人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所采取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为我们军队招致了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人的生命，但绝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党和军队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胜利，这一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对于全世界人民，都将会产生影响。”

第十篇 历史重演

第三十三章

远望春光镇日阴，
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
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
驱逐倭儿共一樽。

——朱 德

蒋介石及其一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①到西安召开剿共会议，他自己下榻于城外临潼华清池，随员则住在城内西京招待所。用朱德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对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① 应为十二月四日。——校注

在发动另一次大规模剿共战役之前，蒋介石必须首先控制住东北军，而东北军下了决心，非日本人不打。为了改变这种“叛逆”的倾向，蒋介石认定应当先亲自解决这个远处西北的副总司令——少帅张学良。多年以来，张学良周围都是些青年人，他们给他灌输了许多有关民主以及必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领土的“危险思想”。

张学良及其部下准备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他们不愿意恢复内战，而是拟定了一项全中国军队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计划。他们的方案包括给予中国人民以民权，取消一切限制抗日运动的法律，释放政治犯，实现孙中山的遗嘱，成立由各党派和团体组成的政府。

蒋介石非但不召集大会提出和讨论这个方案，反而单独分别召见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说是只要推翻张学良和领导军队打共产党，他可以保证他们升官发财。

他只说动了一个人——这个将军立刻被一名青年东北军官刺杀了。其他的人则提醒蒋介石，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军人的老家，杀害了他们的全家，东北军因此只愿抗日，而不愿打自己的同胞。但蒋介石仍然顽固不化。

为此，在十二月十二日黎明时分，张学良的部队开始行动了。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党部以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寓所被围，其中所有的人都遭拘捕。蒋介石的随员居住的西京招待所也被冲进，东北军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装进大卡车里，开到张学良的司令部。

西安响起了炮声和枪声，一名青年东北军官率领部队赶到临潼，打死了蒋介石的侄子——全国人民所痛恨的法西斯分子

之一，还打死了他的一批卫兵。蒋介石穿着睡衣就跑了，然而还是被抓到手，带往西安去见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对蒋介石保证说，只是把他暂时扣留一下，以便让他听取和讨论西北各军队的抗日要求。

在西北的东北军一致行动，把蒋介石为打内战而储备好的军火、大米和被服站都接收过去。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开到离西安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从东到西，在陕西省布置了一条警卫线，朱德和毛泽东则在陕北的延安建立了司令部。

蒋介石“被劫持”——国民党和外国人把这次拘留称之为“被劫持”——三天之后，西安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委员会，包括红军在内的一切抗日的军队，都被邀派出代表。张学良那时在西安机场扣下二十五架准备在剿共战役中使用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并派出一架去接红军代表参加会议。红军总代表周恩来于是参加了这次强使蒋介石出席的会议。

“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从未公开过，后来用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那本书也没有说明实况。尽管事后否认，但蒋介石当时同意停止内战——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内战事实上已停止了，同时开始跟共产党谈判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得全世界的反动派都行动起来。在东北和华北的日本将领立刻在天津举行秘密军事会议，毫无疑问，是在研究是否已经到了全面占领中国的时机。墨索里尼的女儿——她的丈夫曾作过驻华公使——拍发了一封狂妄的电报给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美国、英国和法国外交官员纷纷给他们的政府发报。在中国的美国和国民党广播员居然说朱德将军已在西安，西安城头悬起了红旗，红军正在屠杀掳掠，并且在

北城奸淫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

蒋介石之获释，是由于他亲口答应了准备抗日、保卫中国。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张学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蒋介石，并且跟他一同飞回南京。在那里张学良却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处监禁，可是又立即获得“特赦”，释放出狱。蒋介石认为张学良敢于冒犯自己，其罪难赦，又将他拘捕，押在浙江自己的老家。从那一天起，张学良就成了蒋介石的私人囚犯。

在蒋介石获释的时候，历尽千辛万苦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终于开始了。可是张学良再度被扣的消息打击了东北军，蒋介石不久也采取了分化瓦解的办法，将它们分调各地，其中有几师人参加了共产党。一月中旬，极右的将领胡宗南接管西安，爱国者闻讯东奔西逃，有的投到红军，有的回到他们当初的活动地点——华北，继续战斗。

延安至此成了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工人、学生、教授、教员和文化领袖组成的人流，开始涌往陕北。为了避免采取敌视行动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不得不绕路前往。国民党那时还在说，“日本不过是皮肤病，而共产党乃是心脏病。”

朱将军、毛泽东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在延安几乎接连不断地开会。一九三七年二月，正是周恩来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前往南京的时候，朱德和毛泽东代表红军和共产党，给当时正在南京开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拍发了一封长电，要求组织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实行民主改革，他们可以作重要让步。电报说，如果统一战线能够成立，如果军事委员会能够对全国军队一视同仁，红军愿意改换番号，接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为了把全国各阶层都吸收在抗日行列中，他们提出停止

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西北苏区改组成特区，由共产党管理，但受中央政府指导。他们宣布了的特区完全执行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的愿望。

作为这些让步的交换条件，共产党和红军要求国民党早日恢复公民权利，把这种值得人们为之斗争甚至于战死的权利给予群众。他们还应该释放一切政治犯，给予人民以组织并武装自己进行抗日斗争的权利。^①

然而，过了好几个月之后，统一战线才真正开始建立。国民党把共产党的这些建议当作投降的表示，打算利用它摧毁红军，因此，坚持红军的七个师必须有四个师解散，另外三个师组成一个军，军官由国民党任命。共产党反对解散任何部队，建议在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进行兄弟般的交换军官工作——这个建议一经提出，国民党大感棘手，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再提了。

^① 此电系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出，原文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二四七页。）——译注

跟我谈起国民党所要的手段，朱将军指出：

“如果接受国民党的建议，我们的军队就等于垮了，而抗日工作也就完全解体，蒋介石及其一帮人并没有真想抗日，可是蒋介石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抗日的話，他就要被我们的军队、其他抗日军队和中国人民赶出历史舞台。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三师人或四师人的津贴和军火，然而我们绝不能解散另外四个师，因为对日战争眼看就要开始，全国人力物力应该全体动员起来争取胜利。国民党拒绝拨给任何口径的新枪炮，也拒绝拨付被服和药品；我们顶多能拿到三个师的旧军火和军饷。

“可是，战争开始以后，我们的部队全部上了前线。我们要象过去一样，在老百姓中间扎根，并且动员、训练、武装和教育他们。我们要生存下去进行战斗。”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国民党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西北视察红军，最后来到延安；我在胡宗南接管西安时，到了延安。

国民党军事代表团在延安逗留了一个星期，我看到朱将军以主人身分，招待那些跟他打过十年仗的将军和校官。他一反我所熟知的率直纯朴的军人作风，也搬出来旧的一套社交礼仪，不过，并没有任何虚假和奉承。在他那从容的态度里，贯串着威严、庄重和自信。在第一次欢迎国民党军官的早餐会上——我也在场——他用这样一番发乎内心的话表示欢迎：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机，从此，牺牲了千百万中国儿女的十年内战结束了。如果民族统一战线能在几年前建立起来，中国的人力和物力就可以获得保全，我们的领土也不会丢失，我们今天就能够以对等的立场来和日本打交道。

“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纪元，红军和共产党愿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和维持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有些人到现在还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作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能够在战争进行之中动员、训练和武装自己的人民。红军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并不怕中国人民。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只要给他们讲解清楚抗战的原因和目的并改善他们的生活就行了。”

我向朱将军问起红军部队对于统一战线看法如何，他极为坦率地说道：

“我们的部队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并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的思想就是红军的思想。既然是农民和工人，他们这一辈子深恨地主和军阀。他们过去是很会干活的；可是现在大家都想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再叫他们去干活，就难办了。为了重新训练他们，我们召集了千百名干部到延安，在抗大（红军军事学校）上特别训练课程，学习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战术。学习完毕，他们就要回到部队，别人再来受训。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成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

“到目前为止，红军的纪律是：‘我们是工农子弟，工农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现在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国家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对部队讲清楚，如果中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那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就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全国人民都将变成奴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在最后的目标上，不要被来自右边的阴谋和敌视以及来自左边的幼稚病所左右。”

成千上万的青年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为了安置他们，新学校陆续出现。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在西安附近红军前线的一所专门学校都建立起来。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领导人都抽空到新学校去讲课，不过，朱将军的大部分授课时间依然是在抗大。

延安这座小城装不下这么多的人，为了解决房荒，大家都在河谷的山崖上挖窑洞。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的学生，现在也拿起锄头和铁锹，同红军在一起劳动，把整个地区变换成一个窑洞城市。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延安人口已经超过五万。

在反动派控制得十分严密的地区，缺口终于打开了。四月，一群上海印刷工人带着印刷机，乘着红军汽车从西安来到延安，过去印刷极差的《新中华报》立刻面貌一新。四月二十日，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①正式问世。

新出版的《解放日报》的第一篇社论是论西班牙内战。那是朱德写的，这篇文章就象他的其他文章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在叙述了西班牙为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以后，他写道：

大约有十万名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分子现在在西班牙作战。……西班牙不仅是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战，而且是在为防止北欧沦入德、意手中而战。……西班牙人有国际民主力量的援助——美、德、法、英、意、波、苏和其他国家的志愿军。……许多人相信中国也会出现象西班牙一样的内战，可是因为

^① 应为《解放》周刊，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延安创刊。——校注

我们有了抗日统一战线，这种内战是不会出现的了，如果有人想挑起中国的内战，那就只能是帮助日本。

边区原是老苏区，这是中国国内唯一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地方。西班牙共和政府寄来的宣传画不久就贴在了陕北村镇的墙上。

第三十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附近向第二十九路军开火，标志着征服中国计划的开端，那时，统一战线仍然没有巩固，蒋介石还没有打定抗战的主意。尽管如此，边区政府立刻进入了战争状态，二十四小时之内，正在抗大学习的指挥员们纷纷南下归队，另有几百人离开各自的单位，前往延安。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十天之后，蒋介石终于发表抗战宣言，并声称义无反顾。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河北省，涌入西北。八月十三日，他们的军队开始了新攻势，不久攻陷上海，十二月占领南京。

蒋介石军队直到上海之役才真正作战，而且直到南京遭受威胁，国民党才同意积极与红军合作。八月九日，朱德将军和周恩来偕同红军和共产党的一批代表飞往南京，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

九月六日，红军三个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这三师人——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连一枝新枪都没领到，而发下来的药品只有三磅碘片、两磅阿斯匹林片。不过，三师人的军饷和弹药是发下来了。

这三个师共有四万五千兵力，立刻奔向山西前线。他们还穿戴着老红军的制服和帽子。连一条军毯都没发给他们。蒋介石的一名尉官后来讥讽地对我说：

“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八路军开赴前线一个月后，我也到位于山西省东北五台山的朱德将军总司令部，那已经是日军的后方了。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林彪的一一五师展开战斗，在长城关口平型关获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次大捷。

与此同时，共产党驻南京代表不断催促蒋介石准许他们召集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赣闽两省的老红军游击队。可是，一直到南京被日军攻陷，二十万平民和战俘惨遭杀戮之后，国民党的军政部长才命令这些游击队沿长江下游一带集中，重新组织为新四军。

这些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农民，从老苏区的大山下下来的时候，地主和民团只要有便打埋伏，放冷枪。他们的司令员项英和陈毅，忍住内心的极大痛苦，下令不得还枪，纵队在夜间穿过危险地区。

新四军约有一万一千人，一九三八年四月集结在皖南一带，叶挺任军长，项英副之。陈毅是师长之一，他这一师人立刻插入南京地区。全军所接受的作战区域只有五十英里宽，一

百五十英里长，而且就在长江江边。国民党军政部真是会打算盘。新四军奉令不得擅离该区，就是在跟日军作运动战的时候，也不得离开。在他们背后的南京地区，还有由上海恐怖分子、南京歹徒组成的一军人，这批人过去的工作就是专门围剿苏区村庄的。他们的头目名叫戴笠——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全军装备精良，供应充足，其任务就是包围新四军，迫使新四军直接和日军接战。

消息灵通的中外人士都已经毫不怀疑，国民党希望由日本人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的工作：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到达五台山朱德将军的总司令部时，日本正分两路向山西省会太原进击：一路从北部山区下来，一路从东部沿正太铁路西进。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部队拦住了北线敌军；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以及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则在东线作战。八路军的另外两个师作为机动部队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贺龙的一二〇师远远地伸入山西省北部，林彪的一一五师的几个团则在晋东北和冀东一带作战，他们已经占领了几座县城，甚至攻击过平汉铁路。

跟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一样，山西省主席、老军阀阎锡山不许组织和武装人民，只是在沦陷区里，才准这样做。八路军一向是在沦陷区内活动的，因此能够按照当年内战时在华南一带证明极为有效的作法，进行组织、训练和武装人民的工作。农民、工人、商人、妇女、青年和儿童组织都成立了。村镇里上了年纪的人组成自卫队。体力壮健的年轻人组织成抗日游击队，作为八路军的辅助部队，进行战斗。这些游击队用缴获的

步枪装备起来，成了八路军补充伤员的预备部队。

朱德总司令的位于五台山的总司令部安置在一所白色的大房子里，这所房子原是地主的住宅，当两名中国新闻记者和我进去时，他正坐在一张小凳上，由理发师给他理发。他挥手大声招呼了几句，后来便领我们走进一间大房间，里面挂满从房顶直垂到地面的军用地图。在指点清楚日军和中国军队的阵地后，他便解释起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

“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我们的游击战给敌人增添了很多困难，这就便于我们的正规部队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

他把将来的计划也加以说明：

“我们的计划是要在全华北和西北山区建立许多敌后根据地——就象在五台山这个根据地一样，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我们的正规军可以休息、补充和整训，游击队和群众也可以在根据地受训，小型兵工厂、学校、医院、合作社和区政府都可以集中于此。从这些根据地，我们可以攻击敌人的部队、碉堡、战略据点、军火库、交通线、铁路。毁坏了这些目标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转移，攻击其他地方。我们要巩固和利用这些根据地，从而扩大我们的作战范围，好把我们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化为战略性进攻。蒋介石同意了这项计划，五台山区根据地的建立也是他同意的。”

我们正说着话，彭德怀将军进来了。他平常很严肃，现在

谈起捷报不断从敌后广大地区传来时，显得兴致很高。朱将军眯起眼睛仔细听，把那顶带有褪色红星的破旧军帽，直推到新剃光的后脑勺上。

“你应该调查调查我们动员和训练群众的办法，”彭将军挥着愉快的手势大声说道。“群众对于我们真是如鱼得水啊。这是民族革命战争。要想胜利，一定得依靠部队的勇敢、自信和战斗力量，得依靠指挥员和战士的亲如手足般的关系，还得依靠我们和其他中国军队的紧密团结。我们在部队和人民中，政治工作做得很深入细致。群众跟我们团结在一起，男人、妇女、孩子，毫无例外。”

彭将军攥拢双手放在桌上，继续说道：

“当然，你会发现许多令人鼓舞的标语和宣传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在逐渐开展。我们的目的是激发人民的深切的民族意识，并且把敌人的情况和计划告诉我们的部队、人民，用来教育他们，启发他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识到，不付出代价是得不到胜利的。战争不过刚开始！”

朱将军依然眯着眼睛，一边盯着一处，一边答道：

“这话对，可是国民党军队也的确应该改变改变！国民党军官仍然打骂他们的士兵——他们不讲丝毫道理，就是要人服从。这是封建办法！应该用友谊、互敬、信任和互助来代替这种办法。大家同甘共苦。军官和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应该大体一样，这样才能让人家全心全意地参加抗战。”

“能办得到吗？”我大感怀疑，而永远是乐观的朱德答道：

“得费些时候。我们的部队应该作出样子来。战争一直打下去，国民党军队如果还不改革，便只有一败涂地。为什么日本军队里有那么多伪军作战呢？为什么日军吹嘘什么用中国人征服中国呢？就是因为国民党从来不曾清除全国的封建情况，不肯取消军队里的封建办法。我们必须说服国民党，必须争取伪军反正。”

朱德和彭德怀跟我们谈起了林彪一师人在平型关消灭日军一个旅团的战役以及其他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日军除非受了伤，是绝不投降的。他们说，甚至受伤的都装死，等八路军的担架兵弯腰去抬人，便跳起来把担架兵杀死。贺龙的部队打垮敌人的运输队，日本兵死命攀住卡车，不用刀斩就不放手。在搜寻日军尸体的时候，贺龙的部队发现了许多由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反法西斯联盟签署的反战传单。

朱将军提到这些传单，不由得兴奋起来。

“也许我们杀了自己的同志了！”他高叫道。“可是我们哪有其他办法呢！我们的部队应该多学几句日文，好对日本兵喊话：不杀俘虏。敌人军官一向告诉他们的士兵说，共产党折磨和杀害俘虏。”

朱将军把一张已经译成中文的传单放在我们眼前。里面有一段写道：

可怜那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死亡的二十万名弟兄！为谁而死？为何而死？为了军国主义者——为了自己国内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军国主义者！难道我们再去上当吗？……亲爱的阵中同志们！……要求军国主义者偿还我们弟兄的生命。我们应该

站起来，把枪口朝向真正的敌人——军国主义者和财阀。只有打倒他们，我们才能在远东获得真正的和平。

早在从阵亡日军的口袋内发现这些传单以前，八路军政治部就对日军展开宣传工作了。现在，由通晓日语的人负责的“敌军工作部”下令迅速扩展工作，在部队中教授日语——这项工作的确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内全面展开了。

谈到日本兵，朱将军用愤慨的语调大声说道：

“日本人情愿被打死而不愿被俘，他们那种拚死作战的精神不应该单纯说成是勇敢。里面还蕴藏着犯罪和胆怯的情绪。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强奸了那么多妇女，他们深怕给我们逮住。他们公然吹嘘自己的‘杀光战’。他们以为，只要落在我们手中，我们会用他们折磨和杀害落在他们手中的中国士兵的办法，来折磨和杀害他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对日本俘虏的工作多加注意。”

这次谈话的第二天黄昏，朱将军奉命立刻南进，前往正太铁路支线，日军已经突破该地，正向太原进军。

那天晚上，朱德的总司令部彻夜灯火，拂晓时分，我们踏过晋东干燥而荒凉的山冈，向南挺进。贺龙的一个师留在晋北，八路军的一个行政天才——聂荣臻将军率领一一五师的两个营留在五台山，实力雄厚的晋察冀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部队随朱德总司令部南进，跨过正太铁路。这时，日军第二十师团以飞机开路，正从东面长驱直入。

十一月的头三天，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加上刚刚重创了日军的一二九师，边行军边打击敌人。在这次战役里，第一次活

捉了两名日军，一名是无线电报务员，一名是步兵上尉。四百多匹驮马的补给，包括粮食、药品、军火和冬季大衣被截住了，在东北被强拉去看守马匹的三十名农民也俘掳过来了。

但是这一仗未能阻止住太原在十一月十三日陷落。后来，朱将军把一二九师留在有铁路的地区，阻止日军巩固势力，总司令部和一一五师则向晋南挺进，一路上冷雨如冰，大雪难行，部队只好留在村镇里召集群众大会。到处留下群众工作者，以便将山西全省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

在一个小镇，两名俘虏被押到台上讲话，台下骚动起来，许多人喊叫道：“杀死鬼子！”。八路军的人正想恢复秩序，台下又大叫：“朱德！朱德！”朱将军一步就跨上讲台，担任主席的镇长迎上前去，说道：

“我们听说朱德的名字都有好多年了。他现在亲自来到这里，用不着我介绍了！”

朱将军首先谈到人民在抗战中的作用，然后要求大家了解，日本士兵原来都是工人和农民，是被日本军阀和财阀征调入伍派到中国来的。他说，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日本人民，而且大批日本反法西斯人士因为反战而被关到狱中，或者被杀害了。八路军打算俘掳、教育和训练日本士兵，让他们与自己的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作战，帮助中国赢得抗战胜利。

这是附近地区的人民头一次听到的观点。俘虏中的日本报务员走到台前说道：

“我是一个士兵，但我也是一个工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打这场战争，可是日本人民并不要。我是被强行征调入伍，派到贵国来的，可是一直到我被俘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国人民

如此善良。将来我要和中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

朱将军后来跟我谈起那个日本上尉被俘时的蛮横态度。林彪有一次下乡，到禁锢他的茅草屋里去看他，可他大模大样地坐着不动，还吩咐林彪给他准备鸡、鸡蛋和米饭！

林彪用冷峻而平缓的语调答道：“不要误解我们对你的友好态度。这并不意味着怕你。我们自己吃高粱，让你吃米饭。听说有位农民来照顾你，你打了他。我们并不打算因此而杀你，可是你如果再敢打中国人，我们就要当众用鞭子抽你！”

朱将军说这件事的时候，双唇紧闭，两眼直视着。

“我们一向带着他走，”他说。“今天，我把我的马让他骑，还给了他一包缴获的日本香烟。他有点不知所措，可是都收下了。他会明白的！”

朱将军还给了我一份发给八路军所有部队的命令，是他和彭德怀刚刚发布的。命令说：

日本士兵乃是日本劳苦大众的子弟。在日本军阀和财阀的欺骗和强制之下，才被追跟我们作战。因此：

（一）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件。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

（二）对伤病日俘应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

（三）日俘凡欲回归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四）日俘如有愿留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意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五）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六) 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

朱将军对命令中的第三点解释道：

“如果我们准许日本俘虏回他们的部队，我们就会粉碎他们长官所说的我们折磨和杀害俘虏的谎话。我们把这项命令给两名日俘看。他们说，日本有一条军规，凡是在战场中被俘掳的日本人永远不能返回本国，被俘掳以后再回到自己部队的，一定枪毙。

“尽管如此，任何日本俘虏凡是愿回自己原来部队的，照样让他回去。如果他的长官枪毙他，更会在他们部队里引起不安。将来一定会有日本士兵不经战斗就投降我们，或是开小差投奔我们。”

过了几天，我听说朱将军在村子里买到一些薄饼干，送给那个日本上尉。上尉鞠躬致谢，若有所思地吃起饼干，开口说道：

“应该有个国际运动来改变目前的解决纷争的办法，我们这里不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一个美国人，相处得都很好！”

“你现在正跟着这种运动前进——所以你才能活着，”朱将军答道。“在你们军队里，也有一些人是这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在战场上从他们口袋里找到了反战传单。”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传单！”上尉叫道。

“你是个军官！日本兵帮助我们打败日本军阀的日子总会来到的。”

“想打败日本军队可没有那么简单！”上尉冷冷地说道。

“可是一定能打败！”朱将军反驳他。

一边在半溶的雪地里行军，一边在群众大会上、共产党各支部小型会议上讲话，朱将军终于率领部队来到晋南洪洞地区，部队有的休息和学习，有的转进到太原以西，因为日军又在那里建立了阵地。朱将军总司令部四周光秃的麦田里，不久就黑压压挤满了人群，从早到晚都有又高又壮的农民志愿军在练兵。

有天晚上，坐在朱德将军的总司令部里，啜着美国咖啡，我们天南地北地闲扯起来。我曾经到临潼卫立煌将军的司令部访问过一次，回来才发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来到了总司令部。贝特兰已经上了前线，卡尔逊现在则端着一只搪瓷杯，坐在这里啜着咖啡，听我们谈天。我正说到在临潼跟国民党将领谈话的时候，刚好遇到空袭。

“我们穿过一片操场，钻到洞里，飞机正好兜圈子转回头来，”我说。

“谁最先进洞的呢？”朱将军的参谋很客气地问道。“最后出来的又是谁呢？是卫立煌吧？”

“我应该说，卫立煌将军的部属可比你们讲究！”我说道。“他们穿的是上等毛料制服，高筒皮靴亮得象镜子，斜背带，军章。他们还有皮帽子，皮领子大衣。”

“他们也许比我们讲究，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朱将军笑着说。“日本人注意的是我们！他们最近在太原和其他地方贴出布告说，凡是提供有关我们的情报或我们发布的任何文件的人，都有赏。他们说，到中国来就为的是要清剿八路军！”

“你看不看洪洞县外国传教士送给你的那本新约全书呢？”我问他。因为的确有一个老传教士送给他一本中文的新约全书，朱将军也回送了一本《法西斯是什么？》

“我什么都看！”朱将军沉思着。“谁能想到我会跟传教士交换书籍呢？听说他的圣经班还派出些传教的，想劝部队信教。”

“是真的！”我答道。“他们甚至劝我信教，我不信，他们还生了气。”

“让我们看谁劝得动谁吧！”朱将军说得简单明了。

谁劝得动谁的看法是正确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周以德医生^①——后来是有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当时在山西汾阳行医传教——给他在汉口行医传教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那位朋友把信件转到我手里。周以德写道：

许多人认为阎锡山跟日本人有秘密交易。事实上，阎军的副司令六天前到我这里来医治性病，亲自告诉我说，这地方不会再打了，中国的力量太小、太弱，必须来个“政治解决”才好。我知道山西的军政负责人都是这样想的。……长官认为需要政治和平，可是士兵却不这么想。……我知道八路军是不会跟日本人作任何交易的。他们在农村，尤其是在山区，进行组织工作，准备生产自己的军装等等东西，以便自给自足，能拖几年就拖几年，一直把敌人拖垮。我们教会学校足有一半学生参加了八路军，还有我们几位传教士和教员也参加了。他们丢下三十元、七十元一个月的职业，去做十块钱一个月的工

^① 周以德是美国国会内“援蒋游说团”的最主要成员之一。——译注

作，反而热情极高，全心全力地去做。我时常纳闷，为什么我们教会得不到中国人这份热情呢？据我看，这不就是教会所需要的信念和诚意吗？我的看法虽然如此，却丝毫不能够发动同事们拿出这份精神来。我觉得，我们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不曾严格地要求教徒作出牺牲。他们的工作是太舒服太容易了——我们从未要求他们做什么，就象八路军所要求的那样。……

阎锡山把八路军请进山西，是因为希望八路军替他拦住日军。他还觉得，八路军跟他一样，对南京关系极冷淡，等到日本被打败了，展开善后工作，便可以由他给多给少，来满足八路军的愿望。可是现在一看，日本人已经成了他的主子，他必须尽量利用这机会。八路军现在反而成了他的最头痛的事。这里许多人相信，他最近去汉口是为日本人作说客，日本人答应以优厚条件给予中央政府，只要政府能切断同八路军的联系，让出日本在华北占领的土地，让出上海海关等。……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日本人占了太谷，大抢大劫，对于孔祥熙的房屋却连碰都不碰，孔家大门贴上了“经济提携”封条，日本兵都不敢动手。……

在这封信里，周以德医生有一点是说错了。他的教徒离开教会以后，并没有做到“十块钱一个月”的工作。他们离开他以后，做的乃是一个月五角钱，或者不到五角钱、甚至连一分钱都没有的工作！朱德的薪水那时一个月三块钱，可是他还没拿到，因为中国政府发下来的军饷要平均分配到八路军的七个师里。八路军军官的薪饷和国民党军官一样多，士兵也是一样。可是所有的钱都集中在一起，以便为大家准备粮食被服。谁要

有一角钱装在口袋里，他简直就是富翁了。

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对眼前这些事情越来越觉得惊奇，对于朱德将军也颇有几分敬畏。多年以来，他听说朱德是个“土匪”，可是亲见其人，而且研究了军队的各项措施和教育制度以后，他对我感叹地说：

“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

“朱德不是基督徒！”我抗议。

“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徒！”卡尔逊答道。“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卡尔逊的话引起了许多次讨论，可是讨论始终没有完结，因为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日军展开占领全山西、肃清八路军的攻势。卡尔逊随着八路军到五台山，我动身赴汉口为八路军和华北游击队征集药品、被服和现款，朱将军则率领两团人和一队新兵，挺进到太行山，协助国民党军队阻止前进中的日本军队。

第三十五章

日军通过一九三八年年初几个月的激烈攻势，占领了山西省的主要城市，国民党军队有的被赶过黄河，有的被赶进省境的袋形阵地。敌军六路纵队沿着不同路线前进，同时向八路军根据地五台山进迫。他们在五台山停住了脚步，然后逐渐向山西西北部推进。贺龙的一二〇师则在晋绥边界的大山里又建立起另外一个游击队根据地。

在这次战役中，林彪的一一五师的一部分兵力偕同当地游击队及从延安来的正规军，在山西西部和日军展开了激战，以便阻止敌人到达黄河，进入边区。林彪在这一战役中身负重伤。

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将军说服了许多表示反对的同志，亲自率领两团人和新兵的队伍在太行山区和日军作战。在几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差一点在战场牺牲。

日军从早到晚一直用遮天蔽日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作为前导，最后终于突破防线，占领了晋南所有的大城镇，并且开始警卫全省的主要公路和铁路。他们占据大城镇，而八路军和农民游击队则占据农村，并且致力于破坏铁路，爆破桥梁和在公路上伏击敌人的卡车。

到了一九三八年年中，在这次战役中被日军攻占的十一个县都由朱将军的部队重新收复。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区又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全区的行政负责人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大学教授^①。

一名曾到过朱将军总司令部的澳大利亚护士回到汉口——长江边上的临时首都，带来了可怕的描述。她说，朱将军的总司令部设在晋东一个大山谷里的小镇上，她穿过几百个被日军炸光烧光的村子才走到那里。她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新坟堆，上面只覆盖着一层薄土，还看到了数不清的未曾埋葬的尸体。幸存的人在村子的废墟中走来走去，照顾着濒死的家人和邻居。

八路军分出粮食给老百姓吃，可是他们自己的粮食已经不多。朱将军总司令部的野战医院，挤满了军民伤病员。

朱德将军让这个护士随意挑选工作的地方。他把医院所能匀出来的药品都交给了她，并且派出一名警卫员帮助她。她到各个村子去工作，直到脚气病窜到身上，才返回汉口去救自己的命。

^① 指杨秀峰，全国解放后，曾任高等教育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
——译注

这样的困难时期使朱德将军颇有所感，有时他就在笔记本里写下几首绝句。后来他把这些诗寄给我看，其中一首写道：

佇马太行侧，
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
夜夜杀倭贼。

一九三八年夏天，朱将军穿越日本防线西行，渡过两岸峭壁插云、河水奔腾的黄河，骑马返回延安，报告八路军一年来的抗日经过。这报告是那年秋天在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朱是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的。

报告说，八路军在抗日战争第一年里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牺牲的占三分之一。伤亡人员中，有七千人是共产党员。当时，八路军部队的活动范围遍及整个华北，西自山西山区，东至黄海，南起黄河，北到内蒙、热河，并且还在热河建立了另一个山区根据地，与东北义勇军配合作战。他们甚至攻打过山东省会济南以及供应北平的煤矿和电厂。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距北京市六英里）学生和少数教授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影响。有些毕业生还在读书期间就参加了游击队。在战争结束前，有七百名燕京毕业生加入了八路军。

朱将军在这项报告里说明，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的活动牵制了日军，使他们无法渡过黄河，南下进攻国民党军。日军还不得不停止推进，分散部队，以便保护交通线和运输队，防备袭击，以及修复公路、铁道和桥梁等。他们也不得不采取国

国民党在十年内战时的办法，通过修筑碉堡和大屠杀来“绥靖”全区。

朱将军象战争初起时在南京会议上提议过的那样，重新提到了全国性的战略，以及要根据“中国的长处和敌人的弱点”来制定战术。他说，中国要是“死守在工事里等敌人来爆破”，就无法防御自己。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应该利用有利的地点和时间，绝不应该跟兵力相同、并且拥有优良装备的敌军硬拚。

八路军伤亡虽多，敌军的损失也已达到三万四千人。敌军被俘的——大多数是伪军——则有二千零九十四人，另有被强征入伍的一千三百六十六名原东北籍士兵，带着全副日本装备，投降了八路军。

考虑到八路军开赴战场时的低劣装备，就可知道缴获的战利品是多么惊人了。这些战利品包括六千三百八十七枝步枪，一百七十一挺轻机关枪，八十四挺重机关枪，七十二门野战炮，二十五门迫击炮，一百九十辆汽车，八百四十七辆卡车，四台发报机，六个扩音器，十九具电话和九副望远镜。另外还有五箱毒气——日本人认为跟八路军作战，不论用什么手段都是合法的。

八路军还在晋北机场炸毁了二十四架敌机，此外还炸毁了五辆坦克、五辆装甲车、九百零一辆汽车和卡车。到一九三七年年底，那时我正跟随朱将军的总司令部在前方，有好几千名八路军还穿上了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

八路军力量增大，影响遍及华北，国民党反动派为此大感恐慌。八路军在解放区实行改革的新闻传到汉口以后，“共产主义威胁”的老调又甚嚣尘上。在华北和西北解放区里，凡是

年满十八岁的人，不论男女，都有选举权，由他们选举自己村镇的行政机构来代替原有的国民党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不是在日本人来到以前逃跑掉，便是投降了日本，主持起当地的伪政府。由于汉奸大部分是地主，农民就在解放区里没收和分配了他们的土地。也有一些地主已经逃跑而未当汉奸，农民就代耕他的地，而不予没收，不过绝不再向他们交付地租了。

在这种情势下，朱将军说：

中央政府应该不遗余力地改善人民生活，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大力支持，便于动员人力。政府还应该鼓励、帮助爱国团体和爱国活动，组织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战争。

战争头一年里，政府释放了政治犯，在统治区内对人民开放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可是自此以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大批追随者支持下，又敲起了所谓“共匪”的警钟，要求政府接受日本的和平条款。国民党内部的CC系反动集团也反对并阻挠组织人民和武装人民的工作。汪精卫警告说，如果继续打下去，中国就要亡给共产党了。

蒋介石深知，如果投降日本，自己就要被打入冷宫，因此拒绝了敌人的一切和平建议。他和汪精卫一样，对于他的红色盟友甚有戒心。例如，他在一九三八年夏天，特别派遣了一支部队，由指定的国民党军官率领，来到华北接收八路军解放的地区。同时，黄河沿岸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袭击解放区。位于绥远西部、亦即延安边区北境的其他国民党军队也和日军停火，结

成同盟，以便联合攻击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日军正向汉口进迫，朱将军飞到汉口参加军事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对上述行动提出警告，并且要求在全国实行民主改革。他着重提到，只有这种改革才能改善人民生活，使他们懂得世界上的确存在着值得他们为之战斗甚至牺牲的东西。为了证明他的看法，他报告了八路军的成就。八路军已经把华北变成抵抗敌人侵略的堡垒。由选举而产生的村镇人民代表会议实行充分的民主。共产党还规定，在这个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朱将军的提案当然不会获得通过，不过，他还是向政府保证，八路军及其在长江下游沿岸作战的兄弟部队——新四军一定维持统一战线，尽一切力量和国民党军队发展密切的兄弟般的关系。

在日军于十月二十五日占领汉口后两个月，行政院长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神秘地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支那。从印度支那，他们一下子就奔到上海，投进日本人的怀里。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府，正式宣称其目的就是要“肃清共产主义”。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八日延安报纸登载了朱将军的文章，说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增长以及内战和对日投降的双重危机：

自从一九三八年秋天汉口陷落以后，我们看到国民党内有影响的集团正在分裂民族统一战线，企图恢复内战，借此为投降开路。我们获得的材料证明，晋东南、冀南、鲁西地区的三部分国民党军已经成立了所谓“三省联防”协定，专打八路

军。其中一支军队系由鹿钟麟率领，蒋介石派他接收我们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国土。这支军队进入解放区后，解散了当地的行政机构，又把一九三七年日军来时望风而逃的旧官僚一一扶到台上。它还包围、缴械和解散了当地人民武装，而代之以“保安队”，用来镇压人民抗日和民主活动。我们所推行的改革，诸如减租、取消高利贷，也被宣布为非法，旧税新税源源加在人民头上。农民又被强征入伍，只有那些能向鹿将军付出三千大洋的人才能幸免。

这些行动是和重庆政府统治区内进一步压制人民的行动齐头并进的。凡是不在国民党直接控制下的出版物和团体都遭到查禁，集中营建立起来了，就连新成立的工业合作社也因所有权属于社内全体职工，而被认为含有颠覆性质。有一个国民党政客告诉我说，共产党在华北有合作社网，所以凡是合作社，必是共产党机构。这种机构在战时也许有用，但到战后，就会发生危险，因为工人过于独立，就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工厂了。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共产党人还竭力平息这些事件，以免内战重起。但在三月底的一个深夜里，国民党军队扑到新四军在湖南省的运输站，把站上人员全部活埋了。^①

毛泽东和朱德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们立刻致电重庆，并将电报原文向报界公布，揭露全部暴行。他们要求立即严惩有

^①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地方的通讯处，枪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众，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活埋，是为平江惨案。——译注

关人员，正式道歉，保证类似的暴行不再发生。

八月，朱将军再度致电蒋介石——这次是密电，它指出，靠近冀鲁豫边界解放区的国民党第六军军长石友三和日军积极配合，共同攻击八路军。尽管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有多年亲日历史，蒋介石仍然立即拒绝了朱德的指摘。

朱将军再度控诉。蒋介石也不答复。八月二十四日，朱德和彭德怀给蒋介石拍发了一封附有证据的长电，内中引述了石友三对部下的命令。该命令写道：

据蒋委员长令，为了国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全军必须剿灭阻碍抗战的共匪。……目前阶段，应首先肃清共匪，第二阶段则为对日作战。

(一) 第六军如与日军冲突，应立即后撤，并派代表向日军解释。日机来时，在房顶摊开白布，命令所属不得射击。

命令接着说明和日军的联络办法：白天用旗语，晚上用信号弹。行军时，第六军和日军应至少相距十里。在日军谅解下，第六军在夜晚八点钟后即不再行动。

命令最后说道：

第六军如遭遇共匪，除必要的警戒外，其他行动，应通知日军。必要时，应协助日军与共匪作战。

蒋介石借口该电全属虚构，否认其事；但石友三的叛国行动过于彰明昭著，过了几个月，蒋介石不得不予以逮捕，交付

审判后枪决。枪决之后，一个国民党政客当着我的面说：

“石友三这家伙并不坏！他说过，一个人只有当过汉奸之后，才懂得爱国主义是美德。”

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内战危机更加明显时，朱德将军离开前线回到延安，以便跟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他在三年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蒋介石第一次对八路军展开赤裸裸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事件。”

与这一“事件”同时发生的还有两件事。第一，驻扎晋南的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公然参加了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战。第二，在绥远的国民党军和日军同时对延安边区的北境展开进攻，胡宗南也遥相呼应，开始进攻延安边区的西南部。胡宗南还出动了飞机大炮，一毁就是几百个村庄，并且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占领了边区好几个地方。

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朱德将军第一次从正在战斗的前线抽调部队，以保卫八路军的后方和延安边区。

国民党的进攻过于露骨，外国报刊都作了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报道说，朱德将军“有措词强烈的电报致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军队停止进攻”，并引述朱将军的控诉，“共产党在对日军作战中，后方遭到攻击。”

朱德将军在一九四〇年的全年军事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文章里写道，一九四〇年，危机四伏，似乎内战就要大规模爆发。这个时期，正是重庆在许多有利于日本的事件的影响下，开始分崩离析的时期。这些事件是：（一）云南通向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永远关闭，英国人也暂时封锁了滇缅公路——重庆从此不能从海路获得军事物资；（二）欧战开始；（三）以汪精卫

为首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宣布以剿共为目标。

重庆非但不象华北那样，实行勇往直前的民主改革，以期唤起人民的潜力和热忱，反而更加反动腐败。有几个将领索性带领军队投到日本方面去了。

国民党不仅严禁报道它的军队的背信弃义，反而放出烟幕，谴责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打日军。早在一九四〇年一月，蒋介石手下将领之一——陈诚就公开指摘共军“到处骚扰，煽动民众，扰乱社会秩序”。

朱德和八路军的十五名高级将领揭穿陈诚的谎言。他们正式要求蒋介石派陈诚到华北一行，视察八路军的作战情况，视察住满了伤兵的医院和人民武装力量，同时，他也应该亲自调查一下国民党军队，他们不但和日本人搞交易，而且还随同日军攻打八路军。蒋介石不理这项要求。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摘在继续着。

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

朱将军在信中对我说，参加这次惊人攻势的八路军一百个团，都是挑选出来的志愿队，因为人人都要求击败日本在华北采用的围剿战略。八路军的每一个部队都参加了战斗，但只有那些身强体壮的志愿队才能挑选到百团里。

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占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

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农村里横七竖八地满处都是电话机、电线杆和电话线。华北的大部分铁路被扒断，枕木被扛走，铁轨则运到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小兵工厂。敌人的卡车、摩托车被击毁，山东沿岸港口的船只发生爆炸，济南和烟台的敌人仓库和办公楼也被炸毁。几千名获得解放的铁路工人和矿工参加了八路军。

到十二月底攻势停止时，总共击毁日军二千九百三十三座碉堡，毙伤日军二万零六百四十五人，其中有军官十八人，俘掳日军二百一十八人。此外，毙伤伪军五万一千人，俘掳伪军一万八千四百零七人，其中有一半原是国民党军。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立刻分发使用了。

日本对这一战役的看法——以及国民党对这一战役的反应，完全可以从东京一家反动报纸《国民新闻》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反映出来：

重庆对于中国共产党势力的不断增长确实感到担忧。……在长江下游不断活动的新四军也对和平造成了威胁。……津浦铁路的运输屡遭破坏。八路军的已经渗入整个华北，成为维持和平的毒瘤。……蒋介石集团现在应该有所抉择。……如果重庆不能镇压共产党，那末日本不得不考虑共产党势力增长的后果。

也许是重庆按照日本的指令办事，也许是它和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结论，总而言之，重庆最高当局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令新四军撤出已经作战达两年之久的战区，限它在指定的长江

渡口北上，并按照指定路线开往华北。重庆早就扣押了新四军的军饷，新四军不但粮食不足，就连冬衣也还没有着落。

叶挺将军向重庆最高当局进行交涉。他相信，迫使新四军撤出长江一带是为了便于和日军进行投降谈判，新四军如果按照指定路线过江，一定会被日伪军消灭。叶挺将军说，他的部队——那时已有四万人——大都是当地志愿参军的农民，他们的家庭就在附近，工人和知识分子也都来自上海、南京等沦陷城市。这些人熟知地形，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因此作战异常出色。

他的交涉被拒绝了，撤退命令再度下达。新四军于是接受了命令，但要求发足欠饷，自己选择渡江地点和北上路线，还要求弹药和冬服，以便抵御北方的严寒。

重庆发下二十万元欠饷和弹药，然而没有军服。到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前为止，整个新四军部队除了九千人之外，已经在自选的渡口渡过了长江。剩下的九千人，包括有司令部、军政训练班、两个住满伤员的后方医院、司令部的警卫队和一个师的部分人。

一月七日，这些人在向长江进发的途中，被五万名从其他战区抽调来的国民党军包围住。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副军长项英力战而死。叶挺将军受伤被俘。医院里的伤病员俱遭杀戮。战士们陆续倒了下去，女政治工作人员和女护士拿起她们的枪，一直战斗到子弹耗尽，然后在树林中自缢。……

一千人突围，渡过长江归队。约有四千人被俘，大部分是伤员，被驱入集中营。由于疾病和虐待，又有一大批死在集中营里。美国参战以后，美国战时情报处在华东的人员曾在国民

党一个集中营里看到过几百名侥幸未死的人。还有一个战时情报处的人遇到过两名从集中营跑出来的俘虏，其中一人是叶挺将军的弟弟，两腿已被严刑打瘸了。

蒋介石原想封锁皖南大屠杀的消息，后来又宣布说：由于新四军违抗军令，已对它采取了“纪律措施”，新四军番号从此取消。封建思想最深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汤恩伯奉令“肃清叛乱”。

在这次大屠杀之后，南京傀儡政府立刻对它的部队广播指令：

“新四军已被歼灭，各部队应肃清残匪。”

新四军改由陈毅将军领导，在国民党军、日军和伪军的夹击下，看来似乎就要被消灭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国民党军队不管有多腐败，但一旦奉令不打日本人，而要打自己的同胞，内部实在感到混乱，士气低落。

皖南事变的真相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而公诸于世，重庆最高当局还辩称新四军阴谋策划占领京沪杭三角地区，并且要把势力范围从沿海地区一直扩展到山东。

这个不可思议的声明正是欲盖弥彰。京沪杭三角地区是长江下游的日军基地，如果新四军真个“阴谋”占领这一地区，岂不就是要打垮力量强大的日军和南京傀儡政府。而且，整个中国的沿海地区也都在日军手里。

毛泽东和朱德再度出面。他们尽可能地防止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但仍然揭露了事变的全部真相，要求重庆释放叶挺将军和其他新四军人员，并予以复职，严惩事变有关人员，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公开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明白无误地指控说，中国政府里的法西斯分子正在和日军阴谋策划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把华北拱手让给日本，以便求得和平解决，并把中国拉入轴心阵营。为了防止内战和投降日本，他们要求扩大重庆政府的基础，由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

重庆的回答是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军饷、粮食和军事物资的供应，并且命令胡宗南加紧封锁延安边区。国民党这方面是拚命要饿死八路军，日本那方面则继续对八路军进行扫荡。

新四军的悲剧发生后两个月，蒋介石的两名将领——都曾参加过消灭新四军“残匪”的战役——率领五万国民党人马投降了日军。蒋介石对他们既不通缉，又不解职，更不派兵追剿。

从此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依靠自己和群众的集体生产来维持。共产党恢复了内战时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且建立了延安政府，由它指挥全部解放区。朱将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并下令重整部队，在长江下游一带继续对日军和伪军作战，国民党如果进攻，新四军也要自卫。

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两支军队，以及华北和华中的人民，为了吃饱穿暖，展开了一项艰巨的事业；数年以后，凡是看到这项事业成就的人，无不大感惊奇。经过几个月的艰难困苦，新四军仿照华北的办法，建立了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并且在它的全部辖区内，实现了普遍的公民权和自由选举，还发展了民政机关，建立起了小型工厂、兵工厂、医院和教育宣传机构。

重庆从全面内战向后退了一步。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始终保持着武装停战状态。共产党代表仍和以前

一样，留在重庆，但被隔离起来，《新华日报》必须经过最严格的检查才准出版。

共产党重申，他们将尽力保持统一战线，但如果受到攻击，就一定实行自卫，他们一如既往，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基本政策。他们要求国民党也这样做。

朱将军在给我的信里写道：

军饷和军事物资的供应虽然中断了，但我军现在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着抗日战争。我们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军队和党政机关一概参加。每一个人都要垦荒、养猪、织布，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军队和华北人民要自给自足。第一年很困苦，可是后来就好转了。经过第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加强了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发展出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同志已经以此为题写成专书。我们和人民是休戚与共的，但只要生产运动能够顺利展开，军队就可以完全自足，不必再依赖群众了。

历史重演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第十一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三十六章

北华收复赖群雄，
勇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依旧战旗红。

——朱 德

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这两年，解放区的人民和部队，在鲜血和苦难之中，饱经锻炼。

情况极其明显，就连那些头脑迟钝的人都能看得清楚：一方面是国民党断绝了对共产党的一切供应，并把他们围在一道坚固的封锁线里，另一方面则是日军打算在战场上把他们清剿干净。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共产党要准备应付后方的偷袭和前方的战斗。自从国民党采用封锁的办法以后，毛泽东立即正式宣布展开“生产自救运动”。这运动

逐渐改变了华北的面貌，坚持了抗战。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说：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的经验说明，通过互助，个人的劳动效率提高了四倍。……生产互助一旦形成制度，不但产量大增，各种创造也都出现了，随着政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会有所改进。流氓得到改造，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我们的农村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备将来反攻之用。……要组织农民生产，也要组织部队和政府机关一起生产。①

生产运动展开的时候，在遍及数千英里的解放区里，各种群众组织——包括武装力量——都举行了计划会议。千百万人民在互助组、变工队，在工业、消费和运输合作社，在小型工厂或其他机构里工作，没有谁例外。

日军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发动攻势。这一仗一连打了十八个月，直到一九四二年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伤亡八万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其中有三万零七百八十九人牺牲。老百姓和民兵的伤亡更多得无法计算。

特别是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延安报纸不时报道朱德将军在各地的活动——写作，讲演，在总司令部里的烛光下工作到深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九一七——九一八页。

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就象他所出身的农民一样，下地干活。

延安在那些年代里出版的报纸、小册子和书籍中经常登载他的文章，单是有关他的演讲和访问记的报道就可汇集成册。不论在合作社、妇女、工会、青年和指战员会议上，或者在讨论农村建设的农民会议上，在劳动模范会议上，在追悼会上，在坐满日本战俘的教室里，在工业和军事成就的展览会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讲演时那种坚韧顽强的形象。

制定民族革命斗争战略和战术的共产党会议刚刚结束，他又来到边区妇联生产大会。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天，他在妇联大会上讲了怎样煮面条和如何看管孩子：

这个地区产盐，所以我们在冬天可以大量储存蔬菜。在四川，我们经常腌菜，是这样腌法……

现在再谈谈大豆，大豆应该作为这个地区的主要作物。豆子的吃法有好多种——可以做菜，可以做豆腐、酱油，或是风干了到冬天吃。也可以做成酱豆腐到冬天吃。东北人，家家至少有一缸子酱豆腐，一缸子酱油。是这样做法……

跟妇女们谈了庄稼，话题又转到养猪、羊、牛、兔子和蜜蜂等等。“牲口的全身——骨头、肉、蹄子、皮——都是有用的，养蜂酿蜜也应该作为边区的主要生产之一，”讲完这个，又谈到照顾孩子：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妇女坐在窑洞口，因为刚死了孩子而痛

哭不已。孩子是怎么死的呢？有一个原因就是，陕北的人太不注意卫生。长时期来，我们的人民在这方面很少进步。卫生情况不好，猪一死就是一片，孩子们如果也是这样死法，损失就不可估计了。所以，我们的生产宣传必须结合着改进村子和家庭的卫生。一定要经常强调清洁。我们的合作社现在生产又好又便宜的肥皂。……婴儿必须每天洗一次澡，孩子要养成清洁习惯。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战士都力求保持清洁，每天晚上洗脚。如果他们能这样做，后方人民就一定能做得更好。

从看管孩子，他又谈到手工业合作社。他说，手工业合作社一定要大力发展，“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起桥梁作用，活跃经济。”合作社不能只当作赚钱机构，也不能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他提醒她们，延安边区政府很重视合作社和家庭工业，有的免税，有的减税，不论男女，凡是在生产上达到高标准的，都给予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

有几个妇女生产领导人告诉我说，她们有二百元钱资金，可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我以为你们可以用这笔钱购买两架二十锭的纺纱机。只要两个星期的训练，一名妇女就可以用这种机器纺出十四斤纱。在这十四斤纱里，你可以挑出五斤最好的，把它精纺，拿到我们织布厂就可以卖三十元钱。次纱可以织成线毯。……这里的亚麻产得很多，可以和毛线混在一起，织成又结实又暖和的布。

开完了这一类会议，他有时骑着那匹从日军那里俘获来的大马，直奔到南泥湾。八路军有一个旅在王震将军的指挥下保

卫着延安，不许日军渡河，也不容在南面进行封锁的国民党军队进犯。

这支部队的生产运动——名为“南泥湾运动”——是朱将军的骄傲和喜悦。军力强大的这一旅人刚开到的时候，南泥湾还是一片荒凉，既没有房子，又没有窑洞，只偶尔能碰到一处坍塌的村子和庙宇。

朱将军对部队说，国民党封锁边区，就是要边区军民挨饿，以便让日军在战场上消灭他们。不论是军队还是老百姓，谁也不打算饿死，或者被消灭，而且，军队离开老百姓也是无法生存的。

王震将军在南泥湾的一旅人，四下搜寻，结果在一座已被废弃的古庙里找到一口二千斤重的大钟。他们就用它制造出第一批耕犁和铁锹，第一批可以在山边开挖窑洞的锄头和铲子，第一批可以做家具、打水井的工具。部队开始把荒地变成稻田和菜园。从远处的村子里，他们买来几头牛、马、羊、猪，逐渐繁殖增多。他们经常举行生产会议，还成立了纺织合作社，但部队的学习一如往常，甚而还组织了文工团。成千上万的难民从战区涌进边区，部队就帮助他们在这个地方安家立业，给他们打水井，制造纺车，协助他们成立合作社、小学、成人的扫盲夜校和变工队。

一九四一年七月初，正当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出动三十万日军进攻解放区，施行他的“三光”战略——杀光、烧光、抢光。

冈村宁次一九四一年的“三光”攻势有一个主要目标：“清剿华北，准备大东亚战争。”日军首先包围全区，然后逐渐

收缩，展开屠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山西东南部的一个小县份里，日军把留在家没走的老百姓，不问老少一下子杀死了一万三千人。八路军有一次夺回一个小镇，部队在街头发现了几百具赤裸裸的、老少妇女都有的尸体，他们把这惨景照了下来。

在“三光”攻势以前和攻势期间，日军单是在河北省中部，就沿着公路挖了二千四百英里长的壕沟，筑了四百英里长的防护墙。沿着日军控制的华北和西北铁路线，他们修建了高墙和防护沟。还修建了连锁的碉堡群，下面都有储藏粮食和军火的地下室。

华北平原的老百姓也在利用地下。他们先是挖掘地下防空壕，然后加以扩充，成为许多地道，村村相通。在敌人进攻时，某一村的居民可以到另一个村去躲避；敌人开进一个四顾无人的村子，却突然发现八路军从脚底下出现，使他们陷入重围。

老百姓学会了制造各种地雷的方法。他们在所有的路上埋下地雷，保家卫村。在地雷战里，有许多小孩当了“人民英雄”，他们走出村子去闲荡，故意遇到敌军，然后天真烂漫地回答敌人说：

“不，我可不能带你到我们村，那不行，那边就是进村的路，……”指的正是部队和民兵四下埋伏，而且布满了地雷的山路。

朱将军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的年度报告里提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经常只有五发到十发子弹就开上去作战，华北人民和部队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正是国民党封锁的恶果。

朱德后来报告说，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日本人以为已经打垮了华北的人民武装，可以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我们发动了反攻，日军因此无法将部队调到南太平洋去打击盟军。”

这次反攻是和生产运动的高潮同时来到的。人民武装收复了一县又一县，人民群众陆续回来，重整家园，延安方面把粮食和牲口运到这些刚刚收复的地区。

在一九四三年的报告里，朱德将军已经无法估计在反攻中缴获的军火、粮食和药品的数字，因为，这些物资立刻就用在战场上。不过，缴获的步枪共九万五千枝；轻重机关枪二千多挺；手枪四千零二十七枝；反坦克炮二十九门；大炮七十三门；速射炮二百二十五门；还有两门高射炮。其他的战利品包括二百七十二台无线电发报机，并附发电机；九百三十九台战地电话；一百一十二架照像机，附胶片；七千二百零一个防毒面具；另外还有自行车、留声机、降落伞、日本国旗和几千匹马。新四军的战利品清单中有：“五百九十二桶美国汽油”。

朱将军的报告里最有意义的一段谈到，日本军队和前五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说，到一九四二年年中，日军投降和逃跑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这些战俘从来没有上过手铐，也不送进集中营。他们穿上中国制服，坐在教室里，和抗日军队学习差不多同样的课程，不过着重于研究日本的封建性社会结构，日本工人阶级历史，科学的社会主义原理。有很多“延安日本工农训练班”的毕业生，后来在前线和八路军一起，充任特别政治宣传员。到一九四四年年底，他们有三十人死于战场。

朱将军在一九四三年的报告里还相当详细地提到日本军队内部反法西斯团体的地下活动，其中有一个团体名叫“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到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八路军的好几个部队建立了联系，随时通知关于日军的计划和动向。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地下工作老战士冈野进（野坂铁）^①前往延安，负责对日本战俘的教育，并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作顾问性质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于其他国际问题所持的态度也在朱将军一九四三年的报告和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中反映出来。有些国民党右翼分子多年来就高唱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中国”的社会理论；共产党则与他们相反，乃是法西斯主义的敌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属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阶段里，资产阶级面对着日益高涨的人民力量，摧毁了一切议会制度，公开建立独裁政权。德国和意大利在反共烟幕下，已经实行了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也在鼓吹法西斯主义。

根据这些事实和过去的历史因素，朱将军和其他共产党人谁也不相信西方国家所宣称的为民主目标而战的表面价值。西方国家曾在一九四〇年以前把战略物资卖给日本。尽管如此，朱将军多年来一直相信，不论愿意与否，西方国家迟早也要和法西斯主义作战。

他还相信，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中，西方国家的人民一定会迫使他们的政府，把过去所宣传的民主至少兑现一部分，

^① 即野坂参三。——译注

而轴心集团的失败也将成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法西斯分子的致命伤。

朱将军和其他共产党人丝毫不隐瞒这种看法。国民党则一年到头叫喊“赤化”或“共匪”，说共产党不过是利用战争来扩大影响，其目标是在战后建立政权。

共产党的确要扩大其力量 and 影响。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国民党打算利用战争来打击所有的敌对者，以便在全国范围之内建立独裁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采用了共产党从不采用的办法：整军整军的国民党部队投降日军；朱将军相信，这是得到重庆最高当局同意的。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已有十二名国民党将领率部投向日军。一九四二年又有十五名。朱将军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部队倒戈的原意就是要开进华北，和日本人一起进攻解放区。

朱将军的参谋长叶剑英有一次分析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倒戈是因为重庆政府贪污腐败，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且因为日本屡获胜利，造成国民党军队士气涣散。他说，国民党士兵没有任何政治教育，反而一再被灌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土匪，中国的敌人首先就是他们，其次才是日军”的宣传。国民党士兵大字不识，盲目无知，肚子半饱，备受凌辱，只知道服从和放枪。

“珍珠港事变”后的两年之中，日军攻打盟军，所向披靡；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恐怕也会因此而士气低落。但是，共产党早就料到会发生太平洋战争；而且预见到，由于在地理上接近亚洲战场，由于西方国家多年来的援助加强了它的战争机器，日本在战争初期必定会占上风。所

以，中国共产党并不因为轴心国家的胜利而意志消沉。

“珍珠港事变”前两星期在延安举行的东方民族会议上，朱德将军所宣读的长篇论文，可以反映出他对各种国际问题的看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蒙古的几百名代表，虽然是个规模不大、不甚引人注目的会议，却对历史的进程颇有影响。朱将军在致词中首先提到，具有十亿人民或世界半数人口的东方民族，百多年来一直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征服者而展开斗争。

由此，他进而分析中国从太平天国以来的革命斗争，并且简单地回顾了印度、缅甸、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历史。他也提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接着，他总结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项因素：

“既然不能够征服中国，”朱将军说，“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南进，进攻其他亚洲国家。”

为了证明日本随时可能发动南进攻势，他不但提出了在战斗中缴获的日本文件，而且说道：

日本已经重新组织军事力量，通过战时紧急措施，建立了强大的空军，加强了国内统治，把整个经济纳入战争体制。日本现在天天都有大规模空军演习。东条英机最近重新执政，说明日本业已全面军事化。以上措施在对华战争中并无必要，显然是为了对英、美、苏开战而采取的措施。

他还指出，日本召回了几千名海外日侨——从荷属东印度召回二千七百人，从美国召回三船人，还从香港召回一部分

人。

根据他收集到的情报，他说，日军的战略计划是把亚洲划分成四个区。第一区包括日本、朝鲜和台湾。第二区包括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菲律宾、泰国、婆罗洲、马来亚、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石油、橡胶、锡、米、奎宁和其他原料物资产量丰富，为日本战争工业所需要——合成第三区。拥有棉花、羊毛、铁矿砂和其他资源的印度和澳大利亚是为第四区，这一区还包括位于中亚的西藏、青海和新疆。

他接着说，日军的战略计划还包括利用当地卖国贼、间谍和佛教徒；购买和利用广播电台、电影、报章杂志，以及收买各国的编辑、广播员、作家和教员。日本在亚洲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宣传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华共存共荣”和“从英美帝国主义枷锁中解放中国”等口号。

他说，由于日军屠杀千百万中国人民，焚烧房屋，掠夺中国自然资源，只有那些汉奸才相信日本的宣传。他又说：

我们不要轻信日本的反英反美宣传，也不要轻信日本人操纵的东亚国家独立运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白人帝国主义并无分别。……我们希望英美对于东方民族采取开明的政策，这样，日本就无法破坏东西方人民的团结。

过了两个星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消息传来还不到一个钟头，朱将军立刻指令几个月来与冈村宁次的“三光”攻势拚死周旋的部队发动反攻，阻止日军抽调兵力到南太平洋。

该项命令还指示华北的所有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要保护从沦陷区逃出来的盟国公民。

已经有一批盟国避难者逃离北京来到西山，他们由八路军游击队护送穿过华北，有的被送到晋察冀边区的秦家集山区根据地，有的被送到延安。其中有两名法国人，一名美国万国宝通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一名荷兰商人，三名英国教育家。

这几名英国人里面，有一名是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斑威廉，他和他的夫人在解放区住了两年，大部分是在秦家集，教授大学物理，并且出席过在华北举行的第一届自然科学会议。另一名是林迈可，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留在延安教书，一直到抗战结束。他和延安无线电学校一起创建了广播电台，在其后数年内，中国和西方世界通过这座电台，才听到了华北的新闻。

法国的避难者之一是乌曼中尉，后来参加了在欧洲的自由法军，他是这样描述八路军的：

八路军好象我们法国革命初期的军队一样，贫穷匮乏，孤立无援，却完成了双重任务：击退侵略者，以自由思想教育人民。

避难者来到延安，都有大会欢迎，由朱德将军和其他领导人致词。在七月七日抗日战争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朱将军说：

趁着这个机会，我代表八路军新四军五十七万战士，谨向我全国军民，向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致以民族解放的敬礼。我们对于为了民族独立、人类正义和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而牺牲的中国、苏联、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优秀儿女，

表示衷心的悼念。

日军席卷南太平洋的消息在开战后几个月中不断传来，朱德将军在对其指挥下的部队和游击队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始终号召，“要加紧攻击和牵制侵华敌军，以加强和盟军的配合”，并且要摧毁日军在华北和华东的每一个据点。他还号召国民党采用同样政策，并且实行民主改革，他说，如果改革能够实现，就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人力、物力，保证盟国胜利。

他所写的最富感情的文章之一，是对东北人民的宣言，这篇宣言通过东北地下组织，刚好在一九四二年“九一八”那天在东北出现。宣言开头说：

东北义勇军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已经浴血抗战十一年了。条件异常艰苦，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奋战不息。

宣言接着号召东北人民在被日军强征入伍的中国人中间组织逃跑和兵变，找各种借口逃避征兵，并且组织当地游击队配合义勇军和八路军。工矿里的工人应该“不停地扩大宣传和破坏，实行怠工，制造事故，缩减生产，以便打击日军。”

农民应当反对敌人统制粮食和配给制度；要组织、供应和保护当地游击队；不要让自己被抽去当壮丁。

宣言最后说：

我们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插入热河和察哈尔两省，进入冀东，穿越长城渗入东北与义勇军取得联系。全体人民，全体中国军队应当配合我军行动。

报仇雪耻之日已经不远了。你们十一年来所受的苦难，我们无时不念念在心；你们的血泪与耻辱，我们无一刻忘记。团结起来，发动起来，准备迎接反攻的胜利！

一九四二年将近结束，朱将军和他的同志们不断利用一切机会来鼓励人民，使他们坚强起来，因为全世界人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十一月十三日，在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他牺牲在八路军的工作岗位上——逝世三周年追悼会上，朱将军感情激动地提到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多年来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

十二月三十日，他还在柯棣华医生的追悼会上讲了话，柯棣华是一个志愿来华的印度医生，也是第一年在八路军工作时逝世的。在回顾了印度多年来为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之后，朱将军说：

柯棣华知道，印度人民的解放是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息息相关的。他因此把中国的抗战当成自己的事业。他是把生命献给中国的第二名外国朋友。

在那些岁月里，倒也并不完全是伤感和忧愁，朱将军就有一首诗描绘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①。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① 五老指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及朱将军本人。——译注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白浪满青山^①，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① 桦树叶面碧绿，背呈白色，被风吹动，形如白浪。——译注

第三十七章

珍珠港事变后不过两个月，英国占领了一百一十八年的新加坡就陷落了。三月，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势力完全崩溃，到了一九四二年初夏，盟军在缅甸的部队全面溃退。

在与英国进行了长期谈判后，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的中国军队才获准进入缅甸，因为缅甸是英国在一八五五年夺过去的，他们害怕中国军队重占缅甸，常驻不走。

到一九四二年年末，荷兰女皇威廉敏娜答应印度尼西亚人民，他们在战后可以参加荷印联邦，可以自己掌管“内政”，但必须在联邦内承担“互助”的义务。

一九四三年一月初，英国和美国政府也采取了抵制日本宣传的措施。它们废除了对中国的平等条约，和中国另立新约，并且建议，待战争结束后，再签订有

关通商和其他事务的条约。

这些事件的发展都成了朱将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用以教育部队和人民的材料。二月四日和五日，朱将军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评论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旧条约，另一篇评论新条约。他说，这些新条约“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一纸条约是不够的，只有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而民族经济也获得发展以后，才能真正取得与大国平等的地位。”

可是中国政府丝毫没有实行民主的迹象，更不想努力发展工业，也不去制止可耻的囤积居奇和大发战争财的歪风。国民党根据“中国已经尽了作战努力，现在该看英美了”的原则，尽量避战。国民党的军人、政客非但不着手发展民族经济，反而投机倒把，甚至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广东闹饥荒饿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把大米卖给日本。

在同一时期，河南也出现了饿殍满道的灾难，一下子夺去了三百万条生命。驻防河南的汤恩伯军队和汤恩伯本人对于灾荒不闻不问，反而借着税收或军粮名义，连农民的谷种都抢走，这些粮食大部分又用高价抛售出来，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一名到河南进行救济工作的美国红十字会代表迫不得已，付出了比在美国市场还要高的价钱从汤恩伯手里购买小麦。成千上万的饥民想迁徙到解放区，也被汤恩伯军队的机关枪手赶了回来。河南农民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我们遇上了四种灾——黄、旱、蝗、汤。”^①

^① 民谣原话为：“河南四荒，水（黄河）、旱、蝗、汤（恩伯）”。
——校注

重庆《大公报》因为把河南的灾情和重庆的奢侈、贪污情况比较了一番，也被停刊三日。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介石的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开始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内心的感想。他直称重庆为“粪坑”，蒋介石为“贪婪、固执、可憎的小响尾蛇”，蒋把租借法案下的物资囤积起来，不打日本，而准备打内战。

日子一多，约瑟夫·史迪威成了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反动分子背上的芒刺。“尖酸刻薄的乔”^①对于反动而腐败的蒋介石政权毫无用处。对于中国人民和士兵，史迪威是既同情而又尊敬的；但是在根据他的部分日记而出版的《史迪威日记》一书中，他每逢写到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官时，他的用语是极尖刻的。

史迪威有一项目标，就是要中国继续抗战，改革军队，以使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并且阻止内战，免得国家分裂。为了达到这项目标，史迪威将军一再促请蒋介石撤回他在延安边区四周部署的二十万军队，调他们去打日军。这些建议使得蒋介石大为生气。事实上，中国这批吃得最好、装备最好的军队，许多年来从未打过大仗。

国民党的政客、军人、银行家和地主显然是在利用战争来增加他们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但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始终与日伪军作战，还击退了国民党对边区不断发动的攻势。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前——这战役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初结束的——国民党内有影响的集团似乎一直认为轴心国家必将获胜，因而他们在战争中是站错了队。但是，朱德和其他延安

^① 指史迪威，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注

领导人，从没有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盟军必胜有过任何怀疑。不仅如此，朱德将军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坚信中国军队可以在盟军的胜利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纳粹侵略苏联之前，我们中国已经抗日四年之久。中国比苏联人口多一倍……可是中国还没打过胜仗。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原因是政府不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动员全国去抗击日本。……

纳粹德国不了解革命战争可以把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展起来的特点。这就说明了苏联红军为什么能够击败装备精良的德国纳粹军队。它也说明了斯大林格勒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三十三万名轴心国的军队被围于此，九万一千名被俘，其余都被歼灭。中国必须从各方面学习苏联红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苏联红军拥有一个强大的后方生产基地。红军大捷的另一个原因是盟国的团结，以及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物资援助。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轴心国家把胜利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以高唱“共产主义”威胁来破坏盟国的关系上。自从发动战争以来，日本采用的就是这种政策，而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官员也随声附和。

在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纪念日，以及一个星期以后的抗战六周年纪念日，朱将军利用这两个日子发表演讲和文章，以提高华北人民和军队的士气。

他在七月一日问道，中国为什么产生了一个能够持续发展

并且能够动员将近一亿人民继续抗战的共产党？他解释说，这是由于“工人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和这两项运动的结合。”他说，这种结合就产生了“一个由先进理论指导、有足够的魄力和远见去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政党”。

他把这个意见作了进一步的申述，指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遗产”——刻苦耐劳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它并且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的过程中，我们的党结合历史遗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灵活地运用了马列主义。

针对国民党的反民主宣传，他指出：

我们的经验证明，如饥似渴地热望民主，我们从未听到过人民曾经因民主自由过多而加以拒绝的奇闻。……我们相信，只要全国都实行民主政治，那末抗战的力量将会惊人地无限地发展起来。……诚然，由于中国人民在旧社会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大多数中国人民还是文盲，因此我们最重视教育工作。当前这一极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七月七日，朱将军回顾了抗日战争六年来的情况，他的统计数字说明，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伤亡三十八万人，毙伤敌军的数字也不相上下。他说，损失固然是大的，但“党、军队和人民却改变了华北的面貌，对于全国所有进步人士的思想起了很大影响。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抗日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

的，它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公民权，以及公民的人身、财产和政治自由权利。”

这些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支纯朴而优秀的军队，一个纯朴而更有效率的政府。……因为我们宁死而不投降。”

“我们的力量和权力都来自人民，”他继续说道，“我们的一切办法也都是人民创造的。由于依靠人民，我们就击败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我们早就失败了。”

他说，自从汉口陷落以后，国民党的政绩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对民主力量实行白色恐怖，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贪污腐败，与敌人秘密谈判，以及准备内战吗。

那年秋天，盟国的代表直接干预重庆政府的事务，以便防止国民党和日本一旦媾和必然会发生内战，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朱将军的话并不是仅仅为了宣传。

第三十八章

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在新的一年开始时，对中国局势作了简要的叙述：

复兴中华和保卫东亚的唯一障碍就是共匪尚未完全肃清。这些土匪都是煽动性的青年，借口抗战，毁灭村庄，进行无法无天的活动，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妨碍了新中华的进步和大东亚新秩序的建立。他们是目前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唯一障碍，我们应该在精神和实际行动上进行战斗。

日本报纸登载过许多同类性质的报道，这篇报道则是在盟国反攻亚洲前夕发表的。那时，华北解放区和外界断绝了全部联系已达三年之久。史迪威将军看到盟军反攻的准备已如箭在弦，便要求蒋介石准予

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解放区去搜集有关敌人的军事情报。他的意见最初被拒绝，过了一个月才获批准。

同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也要求准许到华北去采访，以便报道当地抗日斗争的事实。他们最初也被拒绝了。

到了五月，蒋介石准许一批外国记者和几名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记者访问西北，条件为逗留时间限三个月。据说，他曾这样说，记者们只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司令部，是无法看到在赤色宣传幕后的真实情况的。在去西北的途中，他们还应该访问在西安的胡宗南军队，参观西安的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并且穿过还在军阀阎锡山军队手中的晋东南地区。

西安集中营早就为这批中外记者作了布置，经过挑选的犯人站出来代表其他人讲话。有一个人说，他过去是共产党，自动投到集中营来，关在里面接受改造！记者们到达延安边区以前，一路之上，经常有人把一些自称来自饥饿恐怖的共区的难民的人，介绍给他们。

五月底，记者们跨过黄河，进入共产党地区。有三四名八路军的年轻战士前来迎接，领他们到王震将军的司令部。王震这一旅人在三年前调到前线来，保卫南泥湾，以免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攻击。

外国记者经过这次采访而撰写的三本书——哈里森·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都以近乎惊佩的字句来描述南泥湾。三万四千英亩渺无人烟的荒地，如今成了粮丰菜熟的良田；山坡上新挖出来的窑洞星罗棋布；几千名从山西战区来的农民难民住进这里的新村子；合

作社、小工厂和学校如雨后春笋，羊群漫山遍野吃草。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些记者第一次看到丰衣足食的中国军队和农民。他们第一次遇到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和战士，而且和他们交谈起来。

六月六日，一行出发前往延安，王震从司令部里跑步出来，召集部队集合，为他们送行：

“盟军登陆诺曼第！第二战场开辟了！打倒法西斯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延安和朱德将军谈过话的外国记者都这样说：他说话不多，思考问题时具有军人的准确性。他向记者们坦率地说明了有关帮助盟国反攻的计划。

他说，延安欢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观察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所有地下的抗日情报网都可以协助他们工作。他指出，情报网是遍及沦陷区各大城镇的。

朱将军还表示了一个后来从未实现的希望：他的部队愿意接受盟国的“某些小型军事物资”，诸如步枪、轻机枪、步兵炮、炸药和弹药。有了这些物资，再加上不时对于特定战役予以空中支援，他的军队就可以收复重要战略城镇，使敌人的所有重要交通线陷于瘫痪。他又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或是独立作战，或是作为附属于登上中国大陆的盟国军队的一个作战单位，对于盟军都可以有极大贡献。当时，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曾提出设置在华盟军司令部以统一中国军队和防止内战的建议。朱德说，他并不反对这个建议。在登陆欧洲和最终攻占德国的战役中，英国曾经接受一个美国的总司令，因此，朱德认为设立盟军最高司令部必将间接地为中国的统一和团结打下

基础，因为“中国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而我们的部队是坚决维护盟国之间无条件的团结的”。他还补充说，他愿意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置于当时已被提名为盟军最高司令的史迪威将军的领导之下。

然而，朱将军的意见未获任何结果。那年秋天，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建立了总部，但那种想把全部中国军队置于一名盟军总司令之下的酝酿，使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要把他变成“奴隶”。十月，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史迪威被调回国，美国国防部并且命令他不得发表公开声明，因为中国问题具有“爆炸性”。

史迪威被召回以后，魏德迈接替遗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集团获得了畅通无阻的绿灯信号。根据《纽约时报》记者阿金森的说法，美国从此支持一个腐败和垂死的政权。从那时起，中国内战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朱德将军在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后不久，用毫不含混的语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国民党的力量太弱了。海外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因而提出了“中国是否能够抗战到底”的问题。……中国有一句老话，“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好，我们在华北就有三百万个臭皮匠——我们的军队和民兵。我们还在人民中选举代表，组织村、县和区政府。把他们也算在里面，看看他们抵得上多少诸葛亮。……国民党封锁我们，因此我们自力更生。人民只要能够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即使没有外界的供应，也可以团结一致抵抗日本。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名字同慈禧太后、袁世凯、段祺瑞和其他“人物”并列。如果蒋介石还不了解自己因为什么失败，他的名字不久倒可以接在这张名单的后面。清朝的高压和花言巧语并没有将人民镇压下去，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没有办到。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办得到。我们是在警告现在的独裁者。

朱将军还说明，解放区的衣食都可以自给自足了。制造手榴弹和地雷已经成了家庭职业，可是各边区根据地的小兵工厂还不能为军队供应充足的军火。敌后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有些地方的村镇曾遭敌军部队蹂躏达十几次之多，解放区边界有些地方则曾遭国民党军队蹂躏达六、七十次之多。尽管如此，直到一九四二年，解放区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在整个封锁时期，朱德继续说，国民党军队对日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政策，每逢敌军进攻便向后溃退，并且根据“中国已经尽了作战努力”的理论，等待盟国去胜利地结束战争。当日军在盟军的反攻下，被迫打开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且打击美军在华南的机场的时候，面黄肌瘦、全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敌人在六个月内就完成了任务。可是在同一时期内，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反攻，把日军赶出了八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解放了几千万中国人民。

朱将军又补充说，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的时候，八路军的实有人数是八万名；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已经发展到六十万名正规军和二百万名民兵；在这段时期内，正规部队伤亡大约近四十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阵亡。

第三十九章

随着决定性的一九四五年的到来，毛泽东宣布，华北军民有四项主要工作要做：

（一）加强解放区的抗日工作。

（二）组织沦陷区的人民。

（三）帮助国民党区的人民组织游击队，协同其他部队抗日。

（四）发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全国性运动，积极与盟军合作，继续作战。

朱将军支持毛泽东的声明，指出，只要重庆实行民主措施，中国就能在战争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盟军胜利的或早或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在战场上的努力和盟军的海空攻势。

但是，自从史迪威将军被调回国以后，尤其是罗斯福在四月逝世以后，朱将军和毛泽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于美国的意向颇表怀疑。尽管朱德和毛泽东在继

续作战，继续要求盟国全力支持，但他们的军队却一丝一毫也拿不到飞越喜马拉雅山以及经过新开辟的中缅公路而源源运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胡宗南的二十万反共军队继续封锁延安边区，再也不准许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了。

日军节节败退；日本本土开始大闹饥荒，它在中国的军队转而成为人类蝗虫，四出抢劫粮食，以填饱肚皮。他们对解放区的进攻特别凶猛，可是盟军捷报频传，共产党军队也打得越来越为勇猛。

山东省向朱德的总司令部提出报告说，又有二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大约二万个村庄，共九百万人口已经归属该省解放区。此外还收复了山东沿海长达五百英里的海岸线，八路军的“海上游击队”正沿着海岸展开行动。这份报告中的一段话是很典型的：

山东解放区。民选的村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增加了工资。军队、人民和解放区政府的生产运动克服了粮食和物资的困难。大片荒地得到开垦；挖井一千三百零三十一口；疏浚河床二百九十英里；开挖新灌溉渠二十一英里；二十八万三千名农民组成六万二千个互助组；发放大批贷款给农民和军属；三个行政区出现了一千零十二名劳动英雄。……敌人虽然经常扫荡，生产和文化建设从未停止。解放区现有八千一百三十四所小学，学生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名，十七所中学，学生四千名；另有为不识字的成人设立的无数夜校。黑板报、文工团和秧歌队村村都有。部队组织大批人力帮助耕种和收获。去年，十七个军医站为二万二千名老百姓治病。发生传染病的村

子设立了临时军医院。军队为人民制造纺车和农具。一百个公私营工厂生产铁丝、肥皂、丝绸、酒精、药品、香烟和硫磺。价格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地处内蒙边界的晋绥解放区也送来一份报告，报道了“人民义勇军英雄”会议情况，并且提到，当地有一个专门分发战利品的“合作社”，业务兴隆。

南京情报网的一个情报员送来了一份讽刺性的情报，内称：伪苏州县长马益献本周被日军逮捕，他被控妨碍军事行动。马益献遭毒打后，被装入麻袋押往南京，气愤而死。……伪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宋毓材某夜招待日本军官，客人当场强奸其妻。……伪劳工厅厅长余孔彰被控贪污工资，日方迫令切腹赎罪，但余逆并非武士道，仓皇他遁，自称做汉奸亦非容易。

另一份从上海来的情报说，美军登陆菲律宾后，在沪日军开始逮捕和禁锢“日本不坚定分子”。华北各前线也送来了日军自杀成风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年底和一九四五年年初，朱将军是延安边区建设展览会上一名自豪的参观者和演讲人。会上展出了各种收获物的样品，还有照片、宣传画、木刻、图表和地图。

展览会的经济部分悬有图表。显示边区自被封锁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新开垦农田达一百万亩，边区现有存粮为七十三万担。三十万亩棉田所产的棉花，已织成棉布一万四千五百匹。防御牛瘟的有效血清已能够生产。二十万人加入了变工队或其他互助组，粮食税已经减到只及附近国民党区的二十分之

一。

工农产品部分展出了各种纸张、棉花、羊毛和生丝，还有毛巾、肥皂、染料、火柴以及改良式纺车和织布机。

此外，还有一个边区生产的军事物资的展览会，展出了无烟火药、烈性炸药、手榴弹、掷弹筒、步枪、子弹和地雷。有一幅地图描绘了国民党在边区四周的封锁网，共有三层封锁线和成千上万的封锁哨。朱将军在展览会上讲话时说，国民党如果把封锁边区的这么多力量拿去打日本，拿去建设，并且帮助人民，日本军队早就被赶到海里去了。

展览会吸引了数十万人到延安参观，同时还举行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盛大会议。毛泽东在欢迎词中对代表们说：

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①

朱德对听众说：

当我们看到在没有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们就想起了中国的有钱人存在美国银行里的三亿（美）元私人存款。我们解放区没有一个人在战争中发私财，没有一个人在银行里有存款。我们工作，我们作战，是为了解放中国，解放我们的人民。可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却对人民和士兵进行掠夺，并且盗卖盟国租借法案物资，把赃款都存到美国银行里去。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九一五页。

第十二篇 “伟大的道路”

第四十章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能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任何缓和。

中国的局势对于他们来说，一向是了若指掌的，接踵而至的“事变”和危险信号使他们更加确信，不经过战斗，国民党永远不会放弃一党专政。然而他们希望，解放区内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加强的国民党区内的这一运动能够阻止内战。他们还期望盟国所宣布的民主目标可以使国民党对中国人民的控制有所放松，并且相信，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可以把国民党的理论基础彻底扫光。

魏德迈和赫尔利大使——他支持蒋介石的一切行动——的政策代替了史迪威的政策，中国各民主力量为此而产生了极大的忧虑。由于罗斯福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这种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却使国

民党深感不安。

当罗斯福运用其影响，迫使国民党在出席一九四五年春天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内延揽其他党派的代表时，另一线希望之光冲破了黑暗。尽管如此，蒋介石还坚持只有他才能指定各代表人选。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就是他指定的，民主同盟里的两个小党也被允许各派一名代表参加。

旧金山会议开幕前，罗斯福于四月十二日逝世的消息在原已出现的希望上投下了阴影。毛泽东和朱德致电杜鲁门总统和罗斯福家属表示吊唁，整个解放区都下了半旗。延安的报纸提到罗斯福时说，“全体中国人民，悼念这位伟大的反法西斯政治家、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好朋友的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道：

罗斯福清楚认识到：美国本身的利益是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分不开的，而这两件大事情，又是同苏联的合作分不开的。……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他在顿巴敦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在外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我们希望继承他的政治家按照他的既定方针，领导美国人民完成他的消灭法西斯主义、建立民主的和平的世界的遗志。

罗斯福的逝世使全世界反动分子的希望复活了，他们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也许可以转变成反共战争。例如，东京《朝日新闻》在四月十二日再度叫嚣中国应当反共，说中国的“共匪”

占领了从浙江省一直到东北的全部中国海岸线，他们的农民自卫队也“妨害皇军和南京的军队维持和平和秩序”。

这些共匪和农村强盗（日本这家报纸怒冲冲地说）不让大米、棉花、木柴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从内地外运，以致和平区的经济大为混乱。我们的驻屯军和南京的和平军、保安队组织了联合特种部队，日夜对共匪展开惩罚性攻击，以便实现和平、生产、净化思想三大政策。

在罗斯福逝世前的几个月里，朱德将军一再表示相信中国的内战是可以避免的。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在延安和外国记者谈话时曾经说道：

我们并不想要内战，我们永远不会发动内战。可是我们和国内其他民主力量始终准备保卫多年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成果，同妄想摧毁它们的任何反动派作战。国民党如果想打我们，就必须对全体中国人民作战。这样的战争将是目前战争的继续——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击败轴心国家之后可能并没有结束。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朱将军警告说，“战场上的胜利绝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而且“日军正试图通过挑动中国内战和在盟国间播撒不和种子的办法来避免失败”——而这种努力得到了“国民党的大力支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朱将军在中国共产党于延安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出了这项警告。他说，他的总司令

部拥有数以千计的文件和证据，证明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已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同敌人相勾结，并在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指挥下攻击人民军队。他指摘说，国民党最高当局和这些伪军还有无线电联络，伪军奉令，一旦战争结束，就要撕下日军军章，换上国民党军章，继续和解放区作战。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际局势千变万化的背景下举行的。会议期间陆续听到许多震动世界的新闻：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还有另外十七名法西斯分子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希特勒和他的许多部下在柏林的火焰中结束了他们遗臭万年的事业；邓尼茨海军上将最后还打算分裂盟国，一边向西方国家洽降，一边继续抵抗苏联红军，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到了五月一日会议结束的时候，苏军已在柏林市中心作战，在意大利的德军正向盟军投降。又过了一个星期，在法国的德军投降，纳粹军队的陆、海、空军代表在柏林签署了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书。

就在这样极端复杂的国际情势下，毛泽东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个文件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一开始就号召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的封建主义，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毛泽东说，这三条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

他接着提出了成立一个代表各党派、团体的中国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计划，他要求给中国人民以普选权和一切公民权，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和文化事业，并且保护、发展和教育人民军队。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骄傲自大，他说，沾染

了其中任何一项，就会脱离群众。他和过去一样，要求共产党员倾听群众的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根据群众的认识水平，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因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为防止工作不前，他力促展开严格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还指出，在农村地区进行游击战时行之有效的战术、方法和政策，到了对日战争结束，大城市解放以后，就不完全适用了。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野坂参三）也在大会上致词，他回顾了十四年来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经过。他说，损失虽然重大，但“我们是为日本民族的利益和幸福而战斗的”。冈野最后表示，希望“盟国声明愿予协助、并为它而战斗的”新的日本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并且指出，新政府“应该是共和制”。

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的朱德将军回顾了抗战八年的情况。他在分析抗战时期的各阶段时指出，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特别是在第一阶段——曾在许多战线奋勇作战。但是政府始终坚持推行“反人民的政治路线”，因此在军事上不能够利用日军战线太长的战略弱点，“反使敌人利用了国民党的错误，囊括了全国大部战略地区。”

在将近八年的战斗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渗入敌后，发动反攻，吸引住大部日军，建立了许多解放区，并在敌后开辟了战场，援救了国民党军队，胜利的捷报激起了全国的昂扬斗志。人民的军队根据毛泽东所制定的持久战战略作战，进行了十分

壮烈的流血斗争。

他挑出一九四〇年秋天以后的两年，称为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百团大战”，以及要把华北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日军接连展开野蛮攻势，“串通国民党军队，集中进攻解放区，因此而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局势。”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大约有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由六、七十名将级军官率领，投降了日军。”

他接着说，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军队前线从来没有过重要战事。可是解放区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

“按道理讲，”他又说，“国民党也许在这些年里加强了抗日军队的力量，准备反攻。然而事实上，它继续和日军私下谈判，希望妥协，并且发动了三次反共攻势。”

朱将军提出全国应该做到的几项军事改革。他根据孙中山的理想，倡议建立联合最高司令部，以代替国民党的最高司令部；解除所有失败主义者和亲日分子的职务；废止妨碍抗日和人民利益的反人民措施和贪污现象。各方面军队之间的摩擦应该停止。各方面军队都应享有平等待遇，盟军的军事物资应该平均分配给前线部队。他要求建立民主的国家军队制度，加强军事训练，根本改革国民党的征兵制，并改进官兵的待遇和薪饷。他指出，只有这样，中国军队才能发挥其战斗力量，中国才能发挥其崇高作用，迅速而胜利地结束战争。

就在那年六月，华南日军逐渐向沿海撤退，一路劫杀不止。他们每撤出一地，前惊后怕的国民党军队才敢开上去接收，而重庆宣传家们则恬不知耻地把它称为“大捷”。但是，

解放区里的日军却稳扎不动，直到人民军队展开猛攻，才向后撤。

西北地区黄河河曲的日军向东撤退的时候，胡宗南一枪不发，反而派出九师精锐部队去进攻延安边区。

激烈的战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朱德将军和彭德怀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其部队退回原驻地。由于舆论抨击甚烈，战事终于逐渐停止。八月初，朱将军的参谋长公布了八路军在战斗中缴获的美国租借法案武器的清单，并且详细列出商标和武器号码。

参谋长指摘说，“中国的封建法西斯分子利用了美国这个民主兵工厂，从而拖延并且阻碍了对日战争的胜利”，他因此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里的民主人士”呼吁停止这项反动政策。延安和重庆的共产党报纸也评论这事，指出美国反动分子正在破坏罗斯福总统促进中国民主与团结的政策。

正当国民党进攻延安边区之际，波茨坦宣言公布了。它要求日本军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宣称要在日本建立民主制度。笼罩着中国的阴云又稍微散开了些。

第四十一章

在一九四五年形势急转直下的八月的头一天——那时，日本在太平洋的各个基地在美国海军的猛烈轰击下先后失守，朱将军再度警告，日军正试图通过挑动中国内战和在盟国间播撒不和种子的办法来避免失败，而这种办法获得了国民党的大力支持。

“我们必须和盟国统一行动，在敌人未放下武器以前，决不停止攻势，”他写道。“对日军网开一面，就违反了全体盟国的共同利益。”

突然之间，战争的整个进程改观了。八月六日，并不是军事目标的广岛被美国飞机投了原子弹，转眼间化成废墟，过了两天，另外一枚原子弹又摧毁了长崎。

重庆的新闻界，只有一家报纸——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认清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这家报纸在八月七日抗议轰炸广岛时说：“战争的目标是打击日本

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毁灭人类。”

八月九日，苏联根据六个月前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对日宣战，红军南下，开始猛攻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以来在东北经营的军事基地。

除了国民党官方报纸以外，重庆所有报纸不顾官方检查，一致欢呼“法西斯匪徒离间盟国的阴谋”破产，日本五十万关东军命运已定。可是，国民党官方报纸上却出现了这样一句挑拨是非的话：“从此，我们不难看到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冲突。”

基督将军冯玉祥两年后在美国指出，蒋介石曾在他和一批国民党军官面前大夸海口，自称“既然能够迫使美国打日本，也就能够迫使它打苏联。”他还宣称，中日战争将从此转为内战，再由内战转为苏美战争。作为美国胜利——他认为势所必然——的副产品，他和他的政权依然可以高踞于中国之上。

但是，重庆《新华日报》表示了另一种看法：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苏联在过去八年中给予我们的物资援助和精神鼓励。……在我们争取民族解放、自由和民主的运动的的全部进程中，条件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放松，团结全国民主力量反对内战，加强民族团结，努力作战，肃清全部法西斯主义。最后胜利是属于人民大众，属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

共产党人着手准备善后工作。报纸指出，中国人民有权提出日本战犯名单，对他们进行审判——蒋介石反而立刻宣布放弃

这种权利。共产党报纸依然全力推进这项工作，宣布了大批日本在中国的战犯名单，并且详细列举他们的暴行。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冈村宁次，令人毛骨悚然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制订者。冈村宁次当时在南京，已经是驻华日军总司令了。

朱将军在延安写道：

决不容许伪军改徽易帜，决不能考虑赦免他们。应当按照法国爱国者处理勾结纳粹的法国卖国分子的办法来处理他们。我们要求所有日伪军都向当地的抗日部队投降……象欧洲纳粹军队向当地盟军部队投降一样。……谁要是拒绝投降，就用武力消灭它。

朱德将军的办公桌上来了一封紧急密电：重庆一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宣布，日军将在适当的时候投降。

“如果再推迟两个月，”这名官员说，“我们就不得不对日军展开反攻，消耗掉我们的租借法案物资。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物资打共匪了。”

另一封密电提出警告说，蒋介石召见了三名在一九三一年逃离东北的将领秘密开会，要把他们连同国民党官员都派到东北去，准备接收。

就在决定命运的八月十日那天，朱将军陆续接到更多极为严重的报告：蒋介石命令华北、华东和华中的日伪军，如没有“他的特别命令”，不得采取缴械、整编或并入其他部队的行动。他还命令他们“坚守阵地”，并且“维持和平和秩序”。

整个华北并无一名国民党军，只有日伪军，而大部分伪军

原是国民党军队。经过四年安排的巨大卖国阴谋现在达到了高潮：国民党最高司令部命令曾在解放区屠杀人民，以致血流成河的日伪军队，如遇共军攻击，必须抵抗。

各解放区给朱将军的报告还提到国民党预先安排的另一步棋：伪军又恢复了国民党军番号和军徽，降下了日本旗，升起了国民党旗。

八月十日午夜十二时正，朱将军发布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七号命令中的第一号命令，指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解放区任何抗日部队，向驻扎在附近城镇和交通线上的敌伪军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器投降。日伪军驻扎地区应予接收，并实行军事管制。凡有违抗，均以汉奸论罪。

八月十一日八时正，朱将军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开始就说，“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下面是四点命令：在朱将军指挥下的东北军三个军，八路军一个军，应分别撤离目前在内蒙、河北和山东的阵地，以及东北、内蒙边界的根据地，向东北进发，进攻日军。

上述三个东北军中，有一个军是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就成了蒋介石私人囚犯的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率领的。

过了一小时，朱德将军又发布第三号命令，指令贺龙将军在绥远的部队和聂荣臻将军在内蒙的部队向北进军，与参战后向南进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配合作战。

第四号命令于一个半小时后发布，指令贺龙将军指挥山西省内一切抗日部队，解除敌伪军的全部武装，“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

第五号命令在三十分钟后发布，指令铁路沿线及附近重要交通据点的一切抗日部队向敌伪军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

第六号命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时发布，指令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和他的副司令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第七号命令的发布时间是“八月十一日十八时”，指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在接管敌军所占领的城市或据点后实施紧急军管制度；划出安置战俘区域；逮捕和登记战犯及汉奸；控制一切军事机关或公共团体，包括兵工厂、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和要塞，严禁自由出入；控制船只、火车、军用汽车、码头、邮政、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机关，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控制所有军用和商用机场及其仓库；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一切反动分子，将敌探和汉奸交付军法处理；当地抗日武装组织应归地区卫戍司令指挥。

这最后一号命令还指令一切抗日部队，宣布凡有私藏敌伪分子、分散武器等等行为者，决予严惩。“严禁奸商囤积操纵”，抗日部队应管制粮食、煤炭和水电。

这些命令推动了几百万人行动起来，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朝鲜独立联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分别致电它们的分支机构，号召朝鲜和日本的士兵及居民向抗日的中国人民军队投降。

八月十二日，有消息传到延安说，美国的运输机和运输舰正在集结，准备运送八万名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的战斗岗位，其中第一批就是由美国军官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新军。

就在那一天，蒋介石正式命令朱德的部队停止前进，等待

解除敌人武装的命令；他并且指出，只有盟国才能决定敌人投降的条件。

第二天，朱德和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答复蒋介石，声明“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我们不得不……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他们进而提醒蒋介石，他不久前刚命令在华南的日军就地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他们问道，蒋介石为什么要命令可恨的敌伪军保存武器，维持法律与秩序，而不得向不是他所指定的任何人缴械投降？

朱德和彭德怀还告诉蒋介石，盟军在欧洲就是限令德国纳粹军队向当地盟军投降的。纳粹没有任何权利来选择应该在何地向何人投降。电报最后说：“我们有充分的权利来亲自消灭使我们遭受重大苦难的敌伪军队。”

在解放区的敌伪军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他们非但不投降，反而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以轰炸机和坦克为前导，他们攻击共产党的军队，掀起了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后来随同国民党先头部队飞到南京的美国记者报道说，他们曾看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北上进攻新四军。

在山西省，日军护送老牌军阀省长阎锡山乘坐装甲火车回到省会太原。日本司令官由此成了他的顾问，将二万名日军交由他指挥。这些日本军队，再加上阎锡山自己的军队，立刻对八路军发动反攻。三年半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占领了太原，并且俘虏了好几千名日军——还有他们的司令官。阎锡山则逃到广州，当了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

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接受了盟国的投降条件，这是有条件的投降，而不是无条件的投降。日本天皇还可以保留他的

“特权”，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各地的强烈抗议。

同一天，中国的局势突然起了变化：重庆政府在美国的鼓动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项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特别包括了严防日本再度侵略，尤其是侵犯东北的条款。在声明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条约规定：中苏共同管理中长铁路；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三十年，期满后，由苏联出资兴建的设备无偿地交付中国。大连辟为自由港，由中国负责市政，但港口行政由中苏共同管理。条约为期三十年，期满后，两条铁路的全部资财，象旅顺口的设备一样，无偿地移交中国。缔约双方保证在实现和平之后进行密切的和友好的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干涉内政。

条约签字那天，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向毛泽东发出了三封邀请电报中的第一封，请他到重庆共商国事。

毛泽东答称，俟蒋介石答复了朱将军前此提出的解除敌伪军武装问题，再考虑这件事。

对此，蒋介石花了两天时间才作答复。在此期间，朱将军给当时在南京的令人痛恨的日军统帅冈村宁次拍了一个电报。他命令冈村指令在解放区的全体日军，就地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至于华南，电报说，除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外，也应该向华南抗日纵队投降。

朱将军还命令：沦陷区的一切设备和物资都应该妥为保存，所有在华北和华东港口的日本飞机、舰只应停留原地，黄海沿岸的全部战舰应向指定港口集中。命令警告冈村说，他和他手下的全体日本军官应对执行这项命令负绝对的责任。

国民党立刻指摘中国共产党是“叛党”，是“第一号公

敌”。国民党一家日报转载了《纽约时报》的社评，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企图篡夺中国政府权力的阴谋集团”。

延安报纸对《纽约时报》和那家国民党官方报纸回答说：

我们曾经一再声明，我们反对一小撮人的腐败和专制的统治，并且和全国民主力量一道，要求废除这种专政，成立代表各党派，各阶层的联合政府。

年高德劭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提出了举行各党派会议，以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他说，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内战。

朱德将军向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发表了正式声明，要求“注意目前中国战场的事实”，从而进入了国际外交舞台。

他对这些国家说，解放区是在一九三七年被国民党放弃、而为日军占领的。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收复了上述地区的近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亿人民。

在扼要说明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和人民的战果以后，朱将军声明，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and 人民“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非但不予以协助，反而“以九十四万军队来包围和进攻我们。”

他对各盟国说，解放区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建议举行各党派会议，以建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全国抗日，确保胜利和战后和

平。但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了。

在说明“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要求”以后，他警告道，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决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如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条款，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朱将军进一步指出，解放区及其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敌伪军的投降，并在接受投降之后负责实施盟军的规定；有权出席处理日本问题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声明最后说：

为了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立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租借法案援助。国民党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内战（这种危险是严重存在的），我们要求你们（美国政府）不要援助国民党政府。

可是各有关政府对于这项声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到了八月二十三日，朱将军接到第一批报告，说美国军用运输机开始运送国民党军队，不仅运送到南京和上海，而且运送到华北和华东的战斗岗位——如北京、天津和青岛；蒋介石还要求美国军队在天津和青岛登陆，协助他的部队“收复解放区”。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采取措施，保证向南京推进的国民党军队的安全，并要冈村负责收复“匪军”地区。

对于冈村宁次来说，其后四年虽然不是尽惬人意，倒也舒适安乐，因为他在进攻共产党的内战中成了蒋介石的顾问。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迫近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宣布他和一大批日本战犯无罪，遣送他们回到东京。

第四十二章

朱将军虽然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军人，他的想象力却足够使他认识到，他是站立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斗争的中心。

放在朱将军办公桌上的每一件材料，国际舞台上的每一事态发展，几乎都证实了他的“阶级是超越所有国家和种族的疆界而遥相呼应的”信念。

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华北日军的布告，公然声明，他们“接到重庆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命令，进攻中国共匪。”有一份来自山东省的材料甚至说到有许多日军“将要编入中国国军”。

在各种材料里，还有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该报大声疾呼，指出日本投降不过是“暂时停战，”重庆并没有“对日本战犯、伪军和汉奸采取行动”，而是“甚至利用他们在内战中进攻解放区的中国人。”

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曾在八月二十四日向盟国发表声明，警告说，日本天皇裕仁最近的“诏书”，用“隐讳的辞句否认日本战败，否认对中日战争的责任，甚至包含复仇的暗示。”

提到日本新阁，冈野说：

有谁能相信这帮战犯和反民主的军国主义者能实现要求严惩战犯、完全解除日本武装、建立民主政府的波茨坦宣言呢？他们决不能实现！相反地，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利用皇室作烟幕，反动力量将要在烟幕后面和盟国携手，以求保全自己。

这是冈野在中国的最后声明。声明发表之后，他立即偕同二百名在延安转变过来的日本俘虏穿过华北，召集解放区根据地里的其他日本同道，启程回日，希望日本人民能接受他们的思想。

八月中旬，“大人物”回到延安，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曾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首次飞抵延安。他下了飞机，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前来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握手时，十足地表现了自高自大的神气。

赫尔利那次去延安是为了促使毛泽东就国事问题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五点协议：

（一）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实行合作以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成立联合政府和统一的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应采纳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民主。

（四）抗日军队服从统一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并由其补

给。

(五) 承认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赫尔利大声赞许地说，这五点太合理了，他自己都愿意签字——据传说，他的确装模作样地签了字。

“这家伙是个小丑，”毛泽东后来对朱德说。从此，在重庆被称为“大人物”的赫尔利，在延安就成了“小丑”。

尽管赫尔利自称是“共产党的好友”和友好的调停人，共产党领导人却从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美国决定支持国民党。他们准备来一次摊牌。可是美苏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就中国问题进行的谈判使他们耽搁下来。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当然不会和苏联对世界局势发展的分析唱反调。苏联和重庆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在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保证，苏联并不想把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战场。苏联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协议。

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赫尔利迫切要求毛泽东到重庆会谈。为了保证毛泽东此行安全，赫尔利与张治中将军在八月二十八日飞到延安，陪同毛主席和王若飞将军一同飞往重庆。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编入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并不是乡下佬，他回答说，他的军队可以交给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军队也应该照此办理，以便组织统一的民主的国家军队。

毛泽东的建议和他的《论联合政府》一书所提的方案是一致的。中国民主同盟那时正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作了阐述。

九月三日那天，毛泽东向蒋介石要求新闻自由，要求释放

在战时因从事民主活动而被捕的新闻工作者，并严惩通敌的新闻工作者，永不录用他们。毛泽东通知蒋介石——好象蒋介石还不知道似的——有许多汉奸记者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毛泽东的这些要求获得了非官方报纸的支持。

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报章杂志的总编辑和所有人响应了这些要求，他们在报上公开声明，今后拒绝送检。根据这一决定，他们提出警告说，法西斯主义虽然在战争中被打败了，但“在中国，它的阴魂却在许多伪装下凝集不散，进行着各式各样的阴谋和危险活动。”他们要求严惩日本战犯和中国的军政汉奸，解除全部敌伪军队的武装，停止思想管制，取消秘密警察，由民主的联合政府替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棘手的谈判一直拖到十月初。谈判中，当国民党的处境越来越被动时，秘密警察暗杀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①而他们原以为被刺杀的乃是毛泽东两名助手之一的周恩来。^②可是，就连这次暗杀也没能阻挠协定在十月十日签字，蒋介石在该协定中同意召开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议成立联合政府。

在谈判进行期间，朱德将军仍在延安埋头工作。在九月五日庆祝盟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他指出，只有民主的中国才能团结全国，解放区应在实施民主和生产建设方面作为全国的模范。

他说，如果没有一支这样能打仗的、而且是边打仗边生产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要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在和

① 被打死的人不是《新华日报》总编辑，而是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婿。——译注

② 这次事件不是国民党特务有计划地暗杀，而是出于误会。——校注。

平和重建工作中获得胜利，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许多汉奸不但还未惩办，反而做了大官。

重庆的非官方报纸刊登了朱将军的谈话，询问政府：“这些汉奸是谁？日军还在进攻八路军，屠杀我国人民，这是根据谁的命令？”

政府置这些问题于不顾，外国记者又去询问军政部长，他答道：“我没有看到这些消息——我忙得很！”朱德将军为此又在九月十七日的文章中提出答复。

他说，日军在山东济南的宪兵穿上了国民党军服，改名为“中国宪兵”，它的日本司令官也换了中国姓名。

在山西的日本军队还控制着全省铁路、车辆、邮局、发电厂和工厂，而太原的日军司令官最近刚发出一项正式布告，内称：

根据阎锡山将军指挥的晋绥军队的请求，在山西的日本派遣军同意以一部分兵力协助晋绥军队扫荡中国共产党。凡欲自太原前往北京的居民，希稍待。

朱将军还指控说，在太原的敌伪军都挂上了国民党军的番号行动起来，新老汉奸、中日官员“已亲如一家”。

他提出了这些人的姓名：

皇协军司令李献良被任命为国民党青岛市长。中央社报道，这个恶名昭彰的汉奸的部队已经接收青岛。

九月四日，由林昭指挥的一千名日军和数千名伪军向华南抗日纵队进攻，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冀东日军协同伪满军队发

动联合攻势，在遵化地区劫掠屠杀。……

还有，战时在北京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的汪时璟最近飞到重庆，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结束后，国民党派飞机送他回去。他奉国民党的特别命令，象过去一样继续活动。

许多汉奸出头露面，丝毫未受惩罚，曾经屠杀过中国人的伪军官兵，反而在国民党政府里成了达官显贵。

过了几天，朱将军又在报纸上撰写文章，这次是抗议麦克阿瑟刚刚在东京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名单上只有三十八个名字——珍珠港事变时的内阁阁员，负责在菲律宾、缅甸和荷属东印度进行屠杀的高级军官。那些应该对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负责的日本人却一个都没有。

朱将军还抨击麦克阿瑟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声明，因为声明中说，日本可以保留它的一些重工业和它在远东贸易上的领导地位。朱德警告说，盟国正在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麦克阿瑟是在为忙于给第三次世界大战埋下火药的日本法西斯分子铺设温床。

许多新的事件发生了，这就表明重庆之邀请共产党人前往，除去公开声明的理由之外，还有着另外的原因。九月三十日，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地点不在日军大量集结的华南，反以解除华北日军武装为名，在华北登岸。

十月五日，双十协定签字的前五天，朱德将军再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出现，他向重庆美国军事当局强烈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抗议是针对美军在华北港口烟台的行动而提出的。八路军在八月二日从日军手中解放了烟台，十月一日，烟台港外的美国舰艇派了几名军官上岸，要求八路军准予视察在烟台的美国财产，并以娱乐为名，要求准许陆战队登上港口外的一个小岛。

两项要求都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同意了，第二天，这一批军官又来了，要求准予视察中国沿海工事。八路军也同意了，并且派人协助视察。

但是，到了十月四日早晨五点钟，从一艘驱逐舰上登岸的美国军官竟命令八路军部队撤除烟台沿海全部防御工事，所有部队和烟台市政府也必须撤走，并将该市和平地移交给美军！

在给美国军事当局的抗议中，朱将军特别警告，美军如不获得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同意即登陆烟台，则其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当然，正如美军司令不会允许美国港口向外国海军投降一样，他是绝不会允许美军登陆的。

美国人在烟台事件上低了头，但并非处处如此。十月十八日，美军包围并捣毁了八路军驻津办事处，逮捕了办事处工作人员，而且带往美军司令部。

朱将军又就此事和另外两件事提出了抗议。一件事是美机十架侵入解放区的安次，扫射群众大会，许多人遭到伤亡。另一件事也是美国飞机十架，在解放区的固安上空盘旋，而且投下信件，命令八路军在两天之内撤走，否则就将遭到攻击。

在要求对这三项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进行道歉，并赔偿八路军在天津的财产，抚恤安次伤亡者的家属后，朱将军通知魏德迈：

我郑重要求你采取妥善步骤，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与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们解放区的行动的同类事件。

据美国记者报道，两天之后，魏德迈不顾朱将军的抗议，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将美国准备装备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的数字，以及准备拨付租借法案物资的计划通知了国民党将领。

同时，据中国报纸报道，美国飞机正在给封锁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里的国民党军队运送军火。

国民党政府对于美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许多暴行，丝毫不敢提出抗议，而中国各阶层人民心中的愤恨则与日俱增。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昆明学生举行大会，抗议内战和美国占据中国领土；特务在会场内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数人，伤了几十人。仇恨是更加高涨了。学生示威游行的浪潮遍及全国。在重庆的一次抗议集会上，中国民主同盟的两名领导人——李公朴和罗隆基教授讲了话。罗说，“今天，活着要比死困难得多。我们听说过地狱的恐怖，但没听说地狱里有思想统制，有秘密警察。今天活人的世界比地狱更黑暗。”

一九四五年年底，青岛一名教授因为拒绝回答市长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的盘问，竟被枪决，而这个市长原来曾做过皇协军司令。群众的怒火更加高涨了。

在延安抗议屠杀昆明学生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将军对听众说，“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国民党一共杀害了四十万到五十万进步青年”，特务“还在日以继夜地杀害人民”。

“国民党自以为比旧北洋军阀开明，”他轻蔑地说，“让

人民去判断吧！应该让人民看清楚，如果国民党按照它的愿望把全国‘统一’起来，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它是个比北洋政权还要恶毒、专制、残忍、狡猾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没过多久，全国响起了“打倒美国！……解除日军武装！……解除伪军武装！……停止内战！……美军立即撤退！”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并不是反对美国人民，而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或者“美国反动派”。过去，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反对过日本军国主义，而不反对日本人民。象他们拥有日本朋友一样，他们也知道自已拥有许多美国朋友。卡尔逊准将在一九四七年逝世的时候，他们悼念他，把他当成中国的爱国者一样。作为卡尔逊的朋友，朱德将军曾经给卡尔逊夫人发了唁电。

同样，一九四六年十月史迪威将军逝世时，也在解放区引起了深切的哀悼。朱将军致电史迪威夫人说，“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的对华政策所进行的斗争。”

延安广播称：

如果今年一月史迪威将军提出的停止援助蒋介石的建议能够实现，如果美国大使采取了象史迪威将军所采取的毫不自私的态度，中国局势和中美关系决不会处于象今天这样的逆境。

卡尔逊准将在临死之前至少有一个莫大的安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联名签署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为中国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第四十三章

十月和十一月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华北变成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搏斗的战场。美军和日军共同防护铁路，以供向共产党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和伪军使用。美国飞机和租借法案物资源源涌入上海和美军占领的华北城市，也是为了供给国民党军使用。

在八月二十三日完全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控制着东北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和东北义勇军则在农村活动，避免与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苏联发生任何接触。

蒋介石鉴于东北有人民军队，正式要求莫斯科把撤军期限推迟到国民党军能够前往接收的时候。莫斯科同意了这项要求，确定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为最后撤军日期。

然而，到了十二月中旬，蒋介石的代表正式要求红军再延期三个月撤军，莫斯科又同意了。

国民党两次正式要求红军延缓撤军，而它的宣传人员却在美国同僚的唆使下展开了猛烈的反苏运动，指责红军拒绝撤出东北。一九四六年三月，红军按照预定日程开始撤军，国民党宣传人员又说它是故意撤军，以便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人！

在这以前的几个月里，由美国飞机运送的国民党军和伪军不断向八路军和东北义勇军发动进攻，企图深入东北境内。到苏军撤退完毕的时候，国民党只占领了东北南部的几座大城市，共产党军队则紧随苏联人之后进入东北北部，甚至占领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直到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全力围攻过来，才撤出该地。

美国指责苏联拆走了东北的机器设备。当然，这些指责部分地是有事实根据的。但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却始终未作出认真的解释。我相信事实是这样的：

苏联无疑是拆走了东北的工厂和一切军事设施，因为日本在过去十四年里建设起来的这些工厂和军事设施，是它把东北作为反苏基地的依靠。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把东北当作在亚洲的反共堡垒。在十九世纪后期，作为“亚洲角逐场”的东北曾是美国金融家追逐的目标；而在俄国革命时，东北则是一个反苏活动的基地。

看来毫无疑问的是，那些支持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要蒋介石把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堡垒接收过来，使它成为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基地。苏联拆走了全部设施，这就使这个潜在的反苏基地的基础削弱了。

朱将军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希望中国成为第三次世

界大战的战场，朱将军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将为鱼肉，帝国主义将为刀俎。”他们对苏联和红军不存任何依赖思想，因为苏联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不过苏联的同情无疑是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至于苏联是否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的局势——或正在发展中的局势。这时，有两名美国记者飞抵延安。

他们没能见到十月间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但朱将军却和记者们作了坦率的谈话。

在延安的共产党总部正在搬家。战争结束时，八路军把日军赶出工业城市张家口，这地方在延安东北，步行前往大约四十天路程。一路之上都设有食宿站，接待从延安前往张家口和其他地区的几万名男女人员。在战时曾经训练过成千上万名军政人员的著名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分成七队，分赴各解放区。在延安的大学生都离校了，有的参加行政工作，有的则前往张家口新设的联合大学就读。为近代中国培养出许多卓越艺术、音乐和文学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搬到张家口，战时曾经培养了一千名经过三年训练的医务工作者的白求恩医学院也搬到了张家口，并且带去了延安窑洞医院中的大部分病人。

上千名党和军队的干部也走了，但毛泽东、朱德及其属下的高级干部还留在延安工作，看一看蒋介石是否遵照他所同意的双十协定召开党派会议。

美国记者向朱德将军提出的第一批问题是关于东北，以及美国和国民党所指责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接受苏联援助的问题。

朱将军指出，无论是延安还是东北的共产党人，都不曾和

苏联有任何接触。而且他确信，苏联无意把援助中国共产党置于优先于国民党的地位。

他以极大的轻蔑谈起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他说，在日本占领东北后的这么多年月里，国民党当局始终想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它只要能收复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所失去的领土，就心满意足了。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反对国民党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派出文职人员前往东北执行任务。随后，他又说：

我们必须指出，在过去十四年间，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东北人民共同抗日，我们八路军和东北人民在战时曾经建立了冀热辽解放区。因此，我们有责任关注东北重建民主的工作，以免人民原已享有的民主权利再遭摧毁。……

纠纷的真正原因是国民党无视东北人民的愿望，想把一党专政强加给他们。国民党官员拒绝和人民合作，否认他们的民主权利。国民党依赖并且偕同美军进入东北。某些反动分子甚至打算利用东北作反苏基地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这就引起了东北人民的担心和反感。事实上，美军在华北是全无必要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踏进东北的权利。……如果国民党不取消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它和东北人民之间的纠纷就永远不能消除。……

东北人民主张组织地方自治政府，并且建立地方的民主联合政权，从而成为重建民主工作的模范区域。这是解决东北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一办法的实现，并不危害统一的中国的主权。

国民党应该在东北实现它的诺言，还政于民，实行民主。这样可以消除东北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对于巩固全国统一也有极大好处。

朱将军又说，在过去十四年中，东北有十万名地下工作者——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在斗争中牺牲。该地区现有三十万名共产党指挥的军队，由林彪将军率领。

这就是中国时局发生急剧变化时朱将军的观点。杜鲁门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明，美国注意到“中国国民政府乃是一党政府”这一事实，认为只有中国人民自己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团结。在建议颁发停止内战的命令之后，杜鲁门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的基础能够扩大，包括其他党派在内，则他相信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可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美国愿意贷款给这扩大了基础的政府。

这一政策指定由马歇尔负责执行。

重庆《新华日报》号召说：“起来吧，人民大众！”《大公报》则发表了上海大专院校致马歇尔的呼吁书：

- (一) 协助建立民主的中国政府。
- (二) 协助发展中国的工业、农业、商业、医疗和文化事业。
- (三) 尊重中国人民的利益，实现故罗斯福总统的政策。
- (四) 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的真正感情以便加强中美友谊。
- (五) 公正地调处内战。

(六) 在最短期间内撤出驻华美军，并不再以租借法案的军火供给中国军队。

毛泽东和朱德都公开欢迎杜鲁门的声明，并表示希望马歇尔能“弥补赫尔利将军和魏德迈将军所造成的损失”。

尽管如此，美军仍继续留驻中国领土，美国租借法案物资依然源源而来。其后，魏德迈公然对记者宣布，伪军已经成功地和蒋介石的军队“合并”了。

好象这些警告还不够似的，毛泽东和朱德又看到好几份新发出的国民党秘密文件——“国家复兴计划”——围剿共军的计划。把美国的行动和这项新计划联系起来考虑，他们不能不严重怀疑杜鲁门的声明和派遣马歇尔使华的目的。这是不是一项缓兵之计，用以分化和瓦解他们呢？

尽管有这种怀疑——这种怀疑直到几个月后才说出来——共产党还是立刻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终于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郑重地签署了历史性的、准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重庆协议，并立刻设立了委员会起草新的民主宪法；经过普选之后，这宪法应该交付新成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大会讨论和批准。

重庆协议的要点之一——国民党曾竭力反对，但是无效——是新政府的行政部门应向国民大会负责，而不向总统负责。这项条款之所以制定，是为了防止政府变成独裁者的工具——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屡次出现的情况。

重庆协议签订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立刻在另一项协议上签了字，并由马歇尔联署。这项协议同意双方军队停战，并裁减和整编双方军队，以便在联合司令部之下建立国家军队。

共产党言行一致，确信协议可以实现，朱将军的总司令部立即着手整师整师地复员军队——根据协议，共产党军队应当缩编到十八个师，国民党军队应缩编为九十个师。在三个月内，有五十万人复员回乡。

第四十四章

一月，朱将军和外国记者约翰·罗德瑞谈话，这位记者把他描绘为还带着“旧世界的礼貌”的“热心倾听者”：记者向他敬烟时，他拱拱手、点点头，才接过去。罗德瑞说，朱将军不再和部队打篮球了，不过经常散步，有时骑马上山打猎。朱将军坐在离延安五英里的一个冷风飕飕的窑洞里——延安在战时已被日本轰炸机炸毁，他是一个“没有薪饷、衣履简朴、军阶却相当于美国五星上将的革命者。”

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事。这些天，为统一而举行的谈判正在重庆进行，他既要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又要指挥在他统率下的一百三十万军队，从早直忙到晚。清晨六点钟，他吃了早饭，便埋首于前

线送来的报告。午饭稍稍吃一些，再忙一下午，多半是走五英里地进城去，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开会。早饭前，晚饭后，他一向手不释卷，阅读书报，还要看翻译出来的外国电讯和广播稿。……

他说，他已经为统一、自由和民主而战斗了一生，准备在这些理想实现以后立即放下武器。“我希望，”他说，“在一九四六年就能实现。”

朱将军非常热心地谈起重庆谈判。“日本战败，苏联无问题，内战危机显然已经过去”，他认为接着必须走的一步应该是根据全国所能负担的水平裁减军队。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应该再进一步削减。中国应该尽可能自立，他认为并不需要美国军事代表团。而蒋介石曾经要求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魏德迈也在筹划此事。

进一步说，用于军事目的的外国贷款，要偿还是困难的，但用于建设工业的贷款则可以用新工厂的产品去偿付，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相应地有所提高。

当问到是否需要一支庞大的训练良好的中国军队去保卫远东和平时，朱将军回答说，新中国的民主政府就是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原因。重要的是，必须铲除把军队当作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工具的思想”。朱将军用恳切的语调说：

我已经致力于在华北开辟一个新天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免于遭受逮捕和恐怖统治，实行民主自治。我总算亲眼看到生

活在动乱和压迫下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已经在解放区建立起来了。对此我很高兴。我没有白活。

在二月四日于延安举行的庆祝国共合作的重庆会谈结束的大会上，朱将军表示了这一信念：中国如果能够保持三十年和平，就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和世界上任何一国相匹敌。他在祝贺蒋介石同意成立民主政府的同时指出：为了表明诚意，蒋介石应该撤除对延安边区的包围——蒋介石对这一挑战置之不理。

马歇尔在三月四日到达延安，朱德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马歇尔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停战，起草了军队整编的计划，从而迈出了走向和平民主的第一步。人民军队一定忠实执行停战小组和军调部的指示。

马歇尔在三月初回华盛顿，要求拨付五亿美元的援款，据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透露，这笔援款只付给新的民主政府。

可是，在国民党反革命的火药库里，有着马歇尔的人生哲学中难以梦想的阴谋诡计。就在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废除政协协议。国民党不但推翻了行政部门应该向国民大会负责的原则——这原则剥夺了蒋介石的独裁权力，还要求有权指定参加联合政府的本党代表，而且有权指定其他各党派的代表。

国民党所筹划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到了它向共产党提出农林部长的职位的时候，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多年以来，农林部长这一职位始终是退休军阀的收容所。国民党向民主同

盟一名成员提供的职位是教育部长，这位民盟人士答道：“对于我来说，还是以保全性命为第一。”

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职位，要求全部实现政协协议。然而国民党不但废除了协议的各项决定，而且开始实施肃清共产党的秘密计划。

计划分做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中，用收买的办法来取消、或用恐怖的手段来镇压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区域内领导的民主运动，“中国问题”不是作为中国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问题，而是作为国共两党争权的问题，向美国提出。毫无疑问，美国一定会支持这一观点。

第二阶段——围剿共军的战争自七月中旬开始。

第二阶段预料可和第三阶段结合起来：美苏发生大战，国民党确信美国可获胜利，共产党对中国和世界资产阶级的威胁可以最后和一劳永逸地消除。

据说，蒋介石曾说过，“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再用三个月的时间消灭共产党。”

朱德将军在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的讲话，表明他对这一阴谋的细节，已经了如指掌。他指出，政协协议已被蒋介石完全撕毁了。

“斗争尚未胜利，可是我们相信，全体中国人民最终会击败这个阴谋的。”

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到七月，秘密计划的第一阶段付诸实行了。战事遍布整个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区域展开了特务的恐怖行动。反对派的报章杂志，特别是民主同盟所办的，被一群便衣特务捣毁。印刷厂和报社工作人员被痛殴，许多编辑被绑架

或杀害。在西安，特务捣毁了一家民主日报的印刷厂，痛打工作人员，并开枪打死编辑。律师王延为此案在法庭进行控诉，也被抓起来处死，而后，国民党宣称他是个大烟鬼！

停战小组到上海以北的南通调查国民党和新四军的战事，特务传令全市人民不得离家，不得提供任何证据。然而，群众还是出来欢迎停战小组，还有二十名教师、作家和新闻记者作证。第二天，这二十人全部失踪。过了几天，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四具遍体鳞伤、眼睛突出的赤裸尸体；另外十六人则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在广州，特务捣毁了所有进步书店和进步文化机构，勒令它们关门，还砸烂了两家揭发政府官员贪污联合国救济总署物资的报社。这两家报社看到有一船救济米运到当地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司令部，后来又听说，另一条运米的船丢失了几百包大米，于是派记者去采访，联总一名中国官员答道：

“大米被一阵大风吹到海里去了！”

眼看政协协议被撕毁，十一名参加政协会议的共产党领导人于四月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人机俱毁。驾驶员和机组人员都是美国人，但国民党特务对于这类事件是逃不脱破坏的责任的。死难人士中包括新四军前军长叶挺——被禁锢了五年，刚刚释放出来——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

中国的民主力量在战斗。杜鲁门总统、美国国会和马歇尔将军接到大批来自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团体、甚至包括保守的商人和工业家的抗议信。他们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出其军队，在中国的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停止拨付援华军事物资和贷款。

七月，宋庆龄向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要求

撤销对国民党的全部援助，以防再度发生内战浩劫。她警告说，如果发生内战，其结果将是混乱，饥馑，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她还警告说，国民党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宋庆龄的呼吁，和其他千万人的呼吁一样，全如石沉大海。

到了七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只剩下一处民主据点——西南的昆明。中国民主同盟在那里还保持着唯一的机关报：李公朴主编的《民主周刊》。编辑部成员之一是闻一多教授，一位全国知名的诗人，曾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达十年之久。

七月十一日，特务在昆明街头开枪打死李公朴。第二天，闻一多在他的亡友灵旁，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峻的悼词。他对几千名在哀痛中参加追悼会的人说，“今天我跨出家门，就不准备再回去了。”他公开向特务挑战，要他们站出来，并且说道：

“无耻！无耻！你们毁灭了活人，侮辱了死人！”

没过几个钟头，闻一多教授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也在昆明街头被枪击而死。

在昆明的十六名民主教授和他们的家属投奔到美国领事馆，飞往香港和上海。中国其他各地的十三名著名教授冒着生命危险，就昆明暗杀事件，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们特别指出，暴徒所用的武器乃是美国造的无声手枪。

外国报刊对昆明暗杀事件的揭露，以及许多国家文化界领导人向蒋介石提出的停止暗杀的抗议，使公然的谋杀得以暂时停止，但秘密绑架和暗害始终未停。

在昆明暗杀事件的同一周内，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周恩来给马歇尔送去一份蒋介石给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命令，该命令指示其军队发动全面内战，并确定七月二十二日为进攻人民军队的

日期。果然，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制轰炸机、坦克和炮队的掩护下，开始进攻解放区。

六个月以后，马歇尔将军回到美国，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国共两党，说双方都应对中国内战负责。不过，他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国民党内有影响的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它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大规模援助上。”

朱将军后来发表声明说，马歇尔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美国政府政策的失败。

十月，正当一批美国记者飞到延安的时候，蒋介石动员了四分之三的兵力——二百五十三个师里的一百九十三师——投入内战。朱将军对记者们说，停战协定被撕毁的基本原因是国民党决心继续一党专政，以及美国对蒋介石的鼓励和援助。他说，国民党要建立象希特勒、佛朗哥和日本天皇那样的独裁政权，而共产党和人民是决心打倒这种政权的。

谈到国民党所宣传的“美苏战争不可避免”论，朱将军指出，的确“有一小撮美国反动派在制造这一战争，中国反动派还希望早点开战呢。”

我不认为他们的野心能够实现（他又说）。即或发生了这种战争，我们的态度要由交战双方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来决定。

……

美国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可以采取，一种是把中国当做美苏友谊的桥梁，另一种是攻击苏联，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场。前一种政策是华莱士所主张的，后一种则是美国反动分子所主张的。我们一定不许这种战争出现！为了避免战争所引起

的灾难，我们一定要寻求和平。

面对着这样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人民军队能支持多久呢？朱将军冷静地笑着说：

那就完全要看通过中国反动派给我们运送武器和军火的美国反动派了。

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十分清楚，这次战争是中美反动派发动的，如果我们打败了，人民就会失去所有已经得到的东西，千百万人民就要遭到屠杀。所以全国人民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样，支持我们。……蒋介石的许多部下也不想打内战，可是不得不执行他的命令，否则就得脱离他。这种盲从的时期是不会太久的。在过去两个半月里，我们已经消灭了国民党二十五个师，可是国民党就连我们一个团都没能够吃掉。

有人问他，如果苏联提供援助，他的军队是否接受？朱将军答道：

我们今天所希望的是美国人民的伟大援助。我们要求美国人民向他们的政府呼吁，改变目前不光彩的政策。我愿意诚恳地说，我们对于一切同情中国独立、和平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深表谢意，我们坚决反对干涉我们内政、挑动内战的一切反动分子。

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的可恨（他痛切指出）。

美国政府是个反动政府！这些反动分子给予蒋介石的援助已经超过三十亿美元。这些钱除了被官僚军阀饱了私囊之外，都是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已经在美国大炮之下丧生，而在一年前，他们还为杜鲁门的政策声明和派遣马歇尔来华而欢欣鼓舞。马歇尔谈和平，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却在准备战争！

一九四六年年终快到了，华北和东北洒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可是一个人在前线倒了下去，立刻有更多的人冲上去替代他。人民解放军放弃了大城市，撤到农村，以便拖垮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越来越差，以至有整师的人向共产党投诚。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身经百战，视死如归，因此很快就用最好的美式武器装备起来，不久就到了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入正规战的时刻。

朱德将军，一个四川贫农的儿子，现在到了他的六十寿辰。十一月三十日，正是战斗方酣之际，华北人民和军队同声庆贺，他们向朱将军发了充满爱戴和激情的贺电。林彪的司令部从遥远的东北战场电称：

“我们用新的捷报来庆贺你的六十寿诞。国民党一团人刚刚投降。”

在上海出版的《群众》杂志编辑部的贺信，刚好在朱将军生日那天寄到。信里写道：

敬爱的朱总司令：

您把人民从敌人的铁蹄下救了出来，您领导着人民从几千

年的奴役底下翻了身，过丰衣足食的生活，您帮着人民保卫住自己的田园。您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您真是中国人民的再生父母，今日欣逢您六秩大庆的佳节，我们谨奉上一片虔诚的心意。

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从清晨到傍晚，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到朱将军在延安的总司令部。有四个农民，三男一女，赶了二十英里路，给他送来寿桃、两瓶酒和一挑寿面。驻延安的部队给他做了草鞋、布鞋，在总司令部前唱起革命歌曲，扭起秧歌。

但是，朱将军最感珍贵的礼物可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贺信中回顾了他在推翻清朝、推翻袁世凯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回顾了他在大革命中的作用，回顾了他和毛泽东共同创建红军、领导红军长征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成就。贺信说：

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是被压迫的中国农民的子弟。……

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了美国帝国主义，又来抢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得的果实了。……你依然和毛泽东同志站在最前线，保卫着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朱将军在六十岁生日那天发表了一篇文章^①，以纪念他的母亲——一个流浪艺术家的女儿，一个地位低下得连名字都没有的妇女，一个直到八十岁临终前还在劳动的农妇。

^① 朱德同志纪念母亲的文章《母亲的回忆》，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的《解放日报》上，是为悼念朱太夫人的逝世而作的。——校注

六十岁生日后两个星期，朱将军再度踏上了中国的江河大地。由胡宗南指挥的蒋介石的封锁部队正在向延安推进。由于敌人的进迫，这座小城已经撤退一空。

面对着那些带着忧戚神色来为他送行的农民，朱将军说：

“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

朱将军转过头来对走在他身边的毛泽东（他那年已五十三岁）说：

“我已经活了六十岁了！从此以后，每一年都是多赚的！”

他就这样在人类解放的伟大道路上迈开了大步，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向胜利。三年之后，他们打垮了蒋介石，使全世界的反动派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

附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亲爱的艾·史沫特莱女士：

你一九四五年十月由董必武同志转来的信，已于去年年底收到。周扬同志将去美国，所以我借此机会给你去信。

首先，对你和所有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寄予的关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须表示深切的感谢。自今年一月以来，中国在一个短时期内赢得了普遍的和平并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的美国朋友的贡献。美国的民主活动极大地加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使他们坚决相信这一友谊的无限发展。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虽然遭到了中国反动派（在美国反动派的怂恿和合作下）的破坏，然而我和所有同志都坚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反动派的阴谋，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终将为中国人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所击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从各方面巩固力

^① 这封信是根据史沫特莱保存的英文文体翻译过来的。——译注

量，以便摧毁反动集团的阴谋，而反动集团的困难和危机却在日益增加。中国的和平和民主化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你重返中国的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看到中国某些地方的暂时的黑暗而感到失望。请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同样，我也相信美国人民。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正注视着美国的民主党派的团结和发展。美国的反动势力确实比中国的反动势力强大，它们企图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它们既不能为美国也不能为其他国家带来任何光明的前景。因此，它们阻止中国 and 所有国家人民的反抗是徒劳的。这是它们的致命点。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我们在延安均好。周恩来同志及其夫人、董必武同志和章汉夫同志仍在南京。哈塔·詹姆斯博士现在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请向美国朋友伊·卡尔逊上尉、埃德加·斯诺先生、冈·斯坦先生、哈·福尔曼先生及伊·爱泼斯坦先生转达我的最美好的问候。请转达我对史迪威将军的最良好的祝愿，中国人民都会记住史迪威将军所作的正义努力。我对你的朋友阿内斯女士表示非常感谢。丁玲准备出国参加巴黎国际妇女会议，因此不能应邀去美国。但是，丁玲和邓颖超同志都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因

此丁玲失掉了访问美国的机会。周扬同志这次虽然不是直接从延安动身出国旅行，但因为他对延安和我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他将同你当面详谈。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于纽约州，
萨腊托加—斯普临斯镇，耶德庄

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

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看来，表示伤心毫无用处，然而我必须这样做。我不得不向您倾吐我的沮丧的心情。

您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您嘱我相信中国人民，您还指出您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您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我一共印了一百五十张贺年片——现附上一张。我以这种方式庆祝了圣诞节和元旦。

弗兰克·泰勒先生给我带来了您送来的底稿和剪报，还带来了您、乔治·哈特姆(马海德)、黄华和其他人给我的信。这些来信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正在同一位中国女友共同翻译您送来的材料。我还同这位女友一起搞长征的历史，我们也许可能把这两卷长征历史的主要章节都译出来在美国发表。我刚从

纽约旅行归来，在纽约，我作了关于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的讲演，翻译了文件，查阅了文中提到您的新材料，所有这些工作，全为了写书。我已将您最近的一封来信的抄件分发给你们的所有朋友——伊·爱泼斯坦、冈瑟·斯坦、哈里森·福尔曼和其他人。我在纽约见到了所有这些人并代你们转达了友好的问候。他们都为得到你们的问候而高兴。

我希望您能将那位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您生平的最后部分，也就是从一九二九年到现在的那部分带给我。作家和记者杰克·贝尔登已经去中国，他将设法见到您。如果他见到您，请尽可能将有关您生平的全部底稿带来，或请交给去上海的人转给我。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国工作，但是目前在美国进行这一工作是很艰苦的。一月份，我将去美国许多城市讲演，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我将中断好几个星期写书的工作。我希望一月份以后停止一切讲演，以便集中全力写书。我指的是写关于您的生平和时代这本书。我已经选定书名：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这是一本不容易写的书，因为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贯穿着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平。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这也必须写进去。也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的埃德加·斯诺已经阅读了我的一部分底稿，提了很多修改建议，这些必须写入这本书。我必须为这本书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期书中所涉及的每一历史日期都准确无误。

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和安娜莉·雅各比（贾安娜）的

新作《中国的风雷》刚刚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你们解放区（某些方面）而言，这本书写得并不正确，但在描述国民党方面却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已经送给董必武一本，送给上海一本，朋友们则给你送去了几本。我还将给上海的朋友们送去一本精装本，要求他们把它带给您。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已经销售了近六十万册，这在美国是极其罕见的。我写的最后一本书在美国只售出二万五千册，在英国售出也差不多同样数字。到目前为止，我的这本书已译成两种外文。

我们刚刚收到周恩来和董必武发来的一份有关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电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就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华盛顿会议所作出的拒绝中国共产党建议的决定向该会议提出了抗议。埃德加·斯诺已去纽约从事多方面的工作，他也在为这件事尽自己的力量。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F·詹森博士现在纽约，将于后天去中国，因此我必须以快件把这封信寄给他，托他将信带交给您。埃德加·斯诺正带他到各大报馆去，争取把他报道的事实发表出来，远东民主政策促进委员会已将他的报道印发出去。但是该委员会是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我们所有人都支持该委员会，我已将全部讲演收入赠送给它。但愿我们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对各地的重要人物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由于不宜在信中说明的各种理由，我名义上不属于该委员会。不同它发生关系更有利于我进行工作。

感谢您给我送来您最近的照片。和您合照的那几个美国人实在可憎——他们有些人脸上流露出狡猾和残忍。

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白恩）已经到达纽约。我已见到他。他是一个浅薄的人。他说我应该去参加今春在印度举行的

泛亚会议，但是我将不参加，因为这意味着停止写书，而这本书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倘若您认为明智，孙夫人和其他人应该去参加这个会议，而我则不能去。何况我能否取得美国护照离开美国，也是没有把握的。届时埃德加·斯诺将前往印度并能出席泛亚会议——他会比我更能起作用的。

在纽约逗留期间，我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并同两名美国外交官员作了恳谈。其中一名告诉我：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诸如否决权、裁减军备和西班牙等问题，完全遵照美国人的指示投票。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抗议并在不重要的小问题上独立地投了票。我还了解到：蒋介石和美国之间已经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根据协议，青岛将无限期地继续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基地，我还了解到：美国的对华关系完全取决于陆军部和海军部，而国务院甚至不知道这一政策的内容。美国正在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一场严重的风暴也正在美国酝酿。一年之内，这场风暴有可能爆发。美国除了卢斯、范登堡等人外，还有实力很大的反动派，其中最危险的是大银行和大企业在海军部和陆军部安插的占有最高地位的代理人。

请向所有负责的和一般的同志致以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请向毛泽东、马大夫和黄华等致以亲切的问候。恕我此刻不能一一写信，因为这封信必须以快件送到纽约城。

您的诚挚的，

艾·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①

亲爱的朱将军：

我有几件事情要告诉您，它们会引起您的关注。所有这些事情将使您对美国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首先是我个人的事情，其实，它们根本不是什么个人的事情，而是政治性的问题。

如您所知，今年二月初，我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也就是说，我是一名“尚待审讯、判决的人”；其实，是多年来我在美国全国许多地方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讲演，并在第二次大战中到一些陆军训练营去作了这样的讲演。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著作，并且参加过关于中国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广播。尽管如此，麦克阿瑟的牒报部门却利用过去日本秘密警察的档案，控告我在多年以前便是一名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活动的间谍。它还根据我所写的关

^① 原信无日期，根据内容判断，写信时间应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二日。——译注

于中国的著作，控告我现在仍然是一名苏联间谍。在提出这一控告的几星期后，美国陆军部宣布对我的控告是一个“faux pas”，这是个法文术语，意思是“社交性质的过失”——有点象在美国做了当众剔牙这类的事情。我的律师直接向陆军部申请，要求他们正式宣布对我的控告已经撤销，并宣布该部撤销麦克阿瑟的法律豁免权，以便我能以刑事诽谤罪控告他。该部答称：在研究所有的文件以前他们不能撤销对我的控告，并拒绝撤销麦克阿瑟或该部任何官员的豁免权。此后，这件事就被束之高阁了。

对我的控告使我损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并在司法和其他费用上花了一千五百美元。虽然这一控告被称为“faux pas”，可是它紧紧束缚着我，以致此后我不再能够得到一次讲演的邀请或出售一篇文章。虽然我必须靠讲演的收入维持生活，我当然还是能为激进的集会免费讲演的，我也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我在激进组织上讲演也会危害那些组织，因为我在公众中仍然被认为是一名有特嫌的人。因此，我拒绝在许多激进组织上讲话，只在一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激进组织中露面。我也拒绝对共产党听众发表演说，因为共产党人即使不被指摘接待特嫌分子，也已经够多的难题需要对付了。

我住在纽约城外朋友们的家里已经一年多了。该地区的反动的美国退伍军人团散播谣言，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向那些在附近的哈得逊河上来回行驶的苏联船只发信号，这件事，您听起来可能觉得愚蠢，但是象这类谣言，今天在美国却是严重的事。接着，我所寄居的朋友们遭到他们的亲戚的抵制，因此我最后不得不搬到纽约城里去。在纽约，我设法寻找我住得起的

房间，但是有多少次，当人们知道了我的姓名时，我就被打发走了。他们说，他们不愿意因为联邦调查局特务前来询问我的情况而自找麻烦。最终我搬到一家小旅馆，房租很高，但是不会因为我受到指控而要我搬家。

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您的传记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常常是完全不可能的。等到我终于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写作并不成功。我是今年一月写完这本书的，但是出版商和三位审稿人（他们是我的朋友）读了原稿以后都建议重写某些部分，以使它们达到其余部分的标准。我同意在某些方面改写。

大约三个月前，我决定离开美国去英国或意大利，在那里我可以摆脱对我的政治压力，而且在那里，生活开销可以非常少，远比我在美国的花费少。再说，我从出版商那里拿到的钱，也不足以供我在美国长住。因此，我申请去英国的护照，在那里我可以和一位香港旧友同住一所公寓。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了，我的护照还没有被批准。我到处托人帮忙，也找了律师，然而无济于事。我的律师同华盛顿护照局通了三次电话，最后一次才被告知，不发给我护照是因为陆军部曾指控我是间谍。因此，上星期我的律师去华盛顿，同护照局的一个负责的女官员进行了谈话。他告诉她，对我的控告所根据的是日本秘密警察指控我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的间谍活动的档案，而美国政府利用那种指控来反对我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这个女官员答称，即使东京案情不予考虑，她仍然确信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我的律师说我不是共产党，并要她拿出证据来。她回答说，她已读过我写的关于八路军的书，这些书使她相信我是一个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怎能用那样的方式写书呢？她说，这是扣

发我的护照的又一个理由。她说她正对我进行一些外调，等她得到回音以后再给我一个答复。她还说，发不发护照，她将在大约两星期内答复。

这件事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

至于说因为我是共产党，所以扣发我的护照，这个理由是荒唐的，因为很多美共领导人已经得到护照出国旅行。去年，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兹·福斯特获得护照去东欧旅行并在写作一本关于东欧的书。美国的作家及其他共产党人拿到了护照去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或者去欧洲旅行、甚至居住下去。就在上星期，有一位美国共产党的女中央委员从巴黎旅行归来。而且她拿到的是长期性的护照。他们全然不顾这些，竟借口我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不给我护照！因此，我的朋友们和我都认为，我之所以拿不到护照，是因为我做的工作和我对中国所持的立场；还因为美国政府怀疑我打算到中国去，而他们不想看到那样的事情。他们不肯发给我去欧洲的护照，就是因为我可能从那里前往中国。但是他们却发护照给想去任何地方的知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我的命运因而捉摸不定，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将会发生什么。

有一个参议员试图帮我弄到护照，但未成功。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人士也作了努力，但同样失败了。现在我要求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代表我前往陆军部要求：要么撤销对我的指控，使我能够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取得护照；要么使我能得到一个临时护照，以便我离开美国到我所选择的某国去设法取得国籍，以保护我免遭迫害并在那里谋生。下星期将向陆军部提出我的请求。

如果我最终被拒发护照，我有一两个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我可能把我的案情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当然，它是不会理睬的。或者，我可能正式放弃我的美国国籍，试图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获得国籍。

除了这两个方案，我不知怎样办才好。就我的情况而论，法律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美国政府拿不出反对我的法律根据。假如它有法律根据，它会在这以前早就拿出来了。我之所以落到这个境地，纯粹是因为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讲演和广播；也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支持、现在仍然支持新中国。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

我个人的事就说这么多。

关于社会状况，您一定已经相当了解。您一定知道美国的左派运动已经被逼进死胡同，几乎完全同广大人民群众隔绝。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报刊、广播及其他公共舆论机构都在毒化美国人民的思想。任何进步的、甚至自由主义或中立的活动都被叫做共产党活动。即使美国人民不相信这类事，他们也不敢对此说一句话。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是有很高的效率的，它同一个半封建社会不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漏洞可以使人民躲避。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完全受反动派领导，它们的一些领导人是天主教徒。目前在进行的大罢工有两个：五十万钢铁工人举行了罢工，另外五十万钢铁工人可能很快也要罢工；还有将近五十万矿工也举行了罢工。但是工人们罢工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为了不足以养老的退休金。我国的劳工运动没有为任何政治利益举行过一次罢工。在中国内战的全部岁月里，我国的工人甚至一次都没有走出来拒绝往船上装运武器给腐朽的

蒋介石政权。我国的工人甚至没有举行过一次罢工来反对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生产武器。他们为金钱而继续劳动下去。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将左派从绝大部分的工会领导中驱逐出去。

左派运动现在几乎完全为着生存而进行法律斗争。左派筹集到的全部款项都是用于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单单是十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受审讯这一件事，就使共产党每月花费二万五千美元，而他们的律师却是索取巨额报酬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律师们靠这些案件过着优裕的生活。有审讯黑人的案件、驱逐出境的案件、审查忠诚的案件等等，不一而足。有一些是审讯被指控为间谍的人的案件。好几百个组织、好几千个人，仅仅由于是自由主义分子，就被贴上了“颠覆分子”的标签。

我可能错了，也许在很多方面我错了，然而在我看来，左派的宗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厉害了，以致狭隘到成了小集团，凡是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怀疑。我认为这种政策是错误的。有很多方面，我不想在这封信里讨论。

但是，我想给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一星期前，远东民主政策促进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来访问我，谈到一个妇女代表团将参加十二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妇女代表大会。她说美国妇女大会将派出八名来自纽约的妇女，至少也要争取做到这一点。美国妇女大会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它的主要领导人很多是共产党人。因此我说，我认为去北京的代表团应当比八名来自纽约的妇女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纽约并不等于美国。我同意这位朋友的意见，至少应当有一位黑人妇女和一位犹太妇女代表劳工界。我建议有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农女，还建议有约瑟夫·吴·史迪威夫人和伊万斯·弗·卡尔逊夫人从我国西岸前

往中国。这位朋友既反对史迪威夫人也反对卡尔逊夫人去北京，因为她们不是左派。她还说，史迪威夫人是“陆军”，而且二十年后仍然是陆军。我告诉她这无关紧要，因为史迪威夫人也同史迪威将军一样是新中国的朋友。要是她在北京露面，对中美两国都可能产生非常好的政治影响。我据理力争，说伊万斯·弗·卡尔逊夫人曾经当过俄勒冈州进步党的众议员候选人，仅以几票之差而落选。卡尔逊夫人是一名专职教师，她和史迪威夫人都是母亲，她们能深刻地领会中国妇女的问题。我遭到反对，据我看，是因为她们都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她们应该去，并且在上星期重新提出我的建议。我认为中国妇联可以邀请这两位夫人去北京参加妇女代表大会。她们去北京对新中国在美国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史迪威夫人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州卡迈尔五十号信箱；卡尔逊夫人的地址是俄勒冈州布莱特伍德四十八号信箱。

我提出这些建议供您本人和其他人考虑。要是您不支持，那么您总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我一定遵守您的决定。我纯粹是作为一个例子提出这件事，以说明我所认为的我们的某些左派组织的宗派主义。

还有一事必须向您汇报：

大约两个月前，我去费城同公谊会教徒服务委员会商量（“公谊”教徒就是贵格派教徒）。如您所知，该委员会会有很多人在中国工作，诸如您的军队中的公谊会教徒救护队和其他地方的医生、护士等等。由于该委员会已经制定了苏美友好的纲领，我要求他们扩大这一纲领的范围，并公开呼吁同新中国

建立友谊和承认新中国。他们同意考虑这一建议，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然而，在同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交谈中，我了解到，大约在三个月以前，美国海、陆、空三军的中央情报组织的代表曾去该委员会，要求利用它在世界各地的救济网从事谍报活动。该委员会说，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违反他们的人类皆兄弟的一切原则，而且这样做会完全毁掉他们的工作。他们回答：他们的工作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与此同时，该委员会告诉我，他们曾经在为它的四名代表返回中国领取护照时遇到过困难。他们最后领到了护照，但是护照局不允许一名女医生和一名化验室女技术员去中国。因此该委员会安排一名英国女医生兼化验技术员和一名英国管理员替代她们两人。当时护照局拒绝给前往国民党控制区以外的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颁发护照。

因此，该委员会问我是否了解，在他们抵达香港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华北和华中的其他地方工作。他们表示愿意到香港从新中国的代表那里取得到上海去的证件，然后从上海前往他们各自的岗位。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也许要等到新的中国政府成立之时。现在新的中国政府已经成立。他们告诉我，上海地方当局认为无权发给他们通行证，他们希望新政府能给予他们合法身份，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下去。

我仅仅是向您转达他们的请求，以便您慎重考虑。公谊会教徒服务委员会是由几百个极其英勇和进步的公谊会教徒组成的，领导人是参加进步运动的克拉伦斯·皮克特。皮克特先生给我写信，说该组织正在竭尽全力，争取它的促进苏美了解的纲领得到采纳。它将取得多大成功，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件事：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同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谈过。司徒告诉我的朋友，说他有证据证明北京有苏联顾问；他相信满洲是苏联控制下的特别地区。司徒说，传教士同中国共产党人相处得非常好，但是他并不期望这种友谊能够再维持两年以上。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军队，受过高度的纪律训练和教育。他说，燕京大学同共产党人有特殊关系，有六百三十九名毕业生参加了共产党。他说，华北的美国教授除因年老和家庭有困难者外均未离开。过去在燕京任教的卢修斯·波特教授年老退休，现住西海岸，他一天到晚称赞中国共产党人。司徒博士说，他觉得应当警告波特，在研究了美国的政治气氛以前保持缄默。但是波特没有接受这一警告。

还有一件事：我的律师奥·约翰·罗格在美国为很多民权案件辩护过，以前曾担任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副部长。他为抗议杜鲁门总统的政策而辞职，在这以后就投入了争取民权的斗争。罗格希望在贵国派遣代表到达美国后，他也许能在那些需要法律专门知识的问题上，对你们有所帮助。他说，也许你们喜欢共产党人律师，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们可能不得不既为你们自己作战，也为美国共产党作战。

我问罗格先生的负责业务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新中国政府万一向它征求法律上的意见时要索取多少报酬。她说，事务所将听凭贵国决定，可以按贵国认为最合适的或力所能及的方式付酬。她还说，他们很乐于代表贵国处理这类事务，因而几乎可以不要报酬。

我仅仅是将此事转达给您考虑。您必须自己决定这些事情。

罗格先生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进步人士，进步党的领导人之一，美国劳工党的州主席，劳工党是进步党的纽约支部。罗格先生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罗格是华莱士的主要合作者之一。

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你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在第二卷里，我想从这一年开始往下写，并且希望到中国去写。我的出版商渴望着这一本书。

杰克·贝尔登关于中国的新书《中国震撼了世界》，本月份即将出版，我将立即给您送去一两本，航空寄到香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将在本月出一本新书《中国人征服了中国》。埃德加·斯诺夫人也给我看了她的新书的清样。我没有全部看，我不喜欢她的文风和她的一些提法。她好象很自负，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她正在美国各地作关于中国的讲演。她能得到讲演的邀请，而我却得不到。

我也许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我等待着今后某一大逮捕。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当他们开始的时候，我知道

我将在被捕的头一批当中。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我希望您和毛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向您、毛、周、康克清和其他人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您的诚挚的，

艾·史沫特莱

通讯处：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百老汇四〇一号，奥·约翰·罗格律师转

司徒雷登博士还告诉我的朋友，说他曾向国务院建议辞去驻蒋介石政权大使之职；还建议不要任命新大使，从而为承认新的中国政府铺平道路。他已辞职，但这个消息尚未发表。此间特别是陆军强烈反对承认新中国，陆军的行为使国务院极为烦恼。国会中也有强大的反动势力。——又及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

〔日〕石垣绫子

《伟大的道路》是史沫特莱的绝笔，是她在近六十年的生命中，在最后最艰苦的环境里费时数载才写成的。在这几年中，她不但得忍受如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所描述的饥寒冻馁的痛苦，而且还得忍受比她青年时代更加复杂、更加剧烈的政治迫害。她的一生除了有十二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足迹遍历中国大陆河山以外，在其余的岁月里，她一直经历着各种痛苦和艰辛，尤其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更是饱尝忧患。但是当她开始执笔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她便将她所有的全部精力都灌注在这本书里了。

我和史沫特莱之成为亲密的朋友，开始于她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战事即将结束，史沫特莱从纽约来到萨腊托加—斯普临斯镇附近的耶德庄，这里经常是艺术家们聚居的地方，它距离纽约不过是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行程。耶德庄以前曾是著名富翁特列斯克的宅第，周围有广袤达六百英亩的广坪。森林、小湖、起伏的原野和一些房舍分

布其间。富翁特列斯克临终时，遗嘱将耶德庄专供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使用，成为他们从事创作的中心。史沫特莱住的一所房子位于广坪中部不远的地方。我恰巧在这年也到这里度夏，彼此毗邻，便选了个时机拜访这位独居的芳邻了。

这是一幢两层房屋。在她搬来之前，这幢房屋就象被废弃的炮台一样，到处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史沫特莱来后，清理了杂草乱石，把这里拾掇得象个花园一般，每当她写作疲倦时，常见她在花园里席地而坐，小憩片刻。这里的秋空蔚蓝无际，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披着红叶的树丛夹杂着红、黄、紫色的盛开花朵，构成了群花争妍的景色。我每次看到史沫特莱在花园里俯身弄花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走到她的身边，坐在她的身旁，听她畅谈朱德的故事和对中国的回忆。

这样看来，她的周围环境似乎是愉快的，但是她的实际生活却是潦倒不堪。她一直没有一个安定的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她才从旅居十二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回美后，她一直是辗转流徙似的从这个朋友的家转到另一朋友的家，过着流浪生活，好不容易她才得以暂把流浪生活结束下来，搬到耶德庄的一幢被人弃置的房子，她准备从此定居于此，开始用自己的手镌刻生活的里程碑。为了实现她多年来写作《伟大的道路》的宏愿，她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她感到需要把一部繁复的中国史牢记在心头。

史沫特莱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①一个贫农的家庭，在许多兄弟姊妹中她排行最大，出生年月大约是一八九〇年的最初几

^①史沫特莱的出生地是密苏里州。——校注

个月，因为没有正确的户籍可查，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出生的日期。这位含有少量印第安血统的作家，她的出生犹如在贫困与愚昧的世界中的一粒种籽从寒冷的旷野中以它可惊的生命力发芽茁壮，它排除了周围的杂草，在苦难的时代中锻炼成长。关于史沫特莱的生平，在她的自叙《大地的女儿》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述。她一生所遭受的苦难是说不完的，她那急剧的表情变化和深刻的皱纹，正可以使人看出，乃是作为一个被虐待被压迫者的悲伤和愤怒情绪凝集而成的。

在童年时，她便随家移居到科罗拉多州一处矿区附近的小镇上居住。家贫失学的她从小就得在贫苦的环境里探求生路。稍长之后，她一面替人家洗碟子或在香烟工厂工作，一面求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来到了纽约，开始在《纽约呼声报》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文笔生涯。这时候她因赞助印度的独立运动而被捕下狱，过了六个月的铁窗生活。在那时，她已深知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和在外国支配下的亚洲人的苦难是共通的，因此，她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当然，她也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当她对我自然地说出：“如果我们亚洲人在一起……”如何如何时，她已把她自己当作一个亚洲人，把亚洲人的解放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了。这种使人感到和亚洲人心连心的纯朴的情操，时时都从她的言语文字中流露出来。

由印度的独立运动而开始了解亚洲人民痛苦的史沫特莱，不久就离开了美国而到丹麦去了，此后她又到达了德国。一九二九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员的身份到了中国，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艰苦的解放斗争中，史沫特莱一来到中国就将她的笔和中国革命连结在一起，她自己也活跃在中国革命的各

个战线。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的特派员，她和中国人民革命军队同进退，共甘苦，深入中国腹地数千英里。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中，她和中国人民军队一同吃饭，一同行军，一样睡木板，他们的感情——愤怒、悲痛和胜利的喜悦早就连结在一起了。

在中国的这段时期里，她和朱德经常接触，并且了解了他的经历和生活。回美后，直到她搬进耶德庄，她才获得一个较安定的住处来从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虽然她在中国时经常接触朱德，从他的谈话中获得了许多直接的写作素材，但是为了写得更为翔实，她又写信到中国希望得到正确的朱德自传资料。那时是在战争期间，远隔重洋的中美间交通来往非常困难。这封信发出后，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一个盖着中国邮戳的小包裹，这是朱德从延安寄给侨居美国的中国人转给她的，包裹里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还有一块丝织的披肩和朱德亲笔写的一篇自传，果然，朱德不负她的所望把他的自传寄来了，披肩和别针则是作为赠礼送给她的，披肩是延安的工人手织的。记得有一次，史沫特莱正打开这披肩细心赏鉴着，忽然又象是若有所思地原封不动折叠起来了。就在这年冬天，我在纽约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集会上碰到了史沫特莱，我认得出她手上拿着的那块披肩。她当着数十个与会者展开了它，宣布为了筹募救济中国战灾基金而将它义卖，后来不知是谁以一千美元的代价购得了。

史沫特莱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十二年，早已把中国人民的苦难看作是自己的了。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是盟国，她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更是同情和爱护。她常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而

被邀请讲演，但每次她都把所有收入统统寄到中国以救济战灾孤儿，因此，她永远没有积蓄，并且时时和贫穷搏斗。

她将中国寄来的别针装饰在房间里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中插着一些楠树枝。她告诉我这些楠树枝的来历，原来朱德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幼时就是在楠树丛中度过一段光阴的。为了体验这种环境气氛，她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了这些楠树枝，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她写作态度的细微和周到了。

阅读史沫特莱的作品，使人感到它文笔的流畅有如一气呵成，然而殊不知她对用字用语的推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在她写完《伟大的道路》中朱德的幼年部分后，曾将初稿拿来给我看，要我提意见。她已有几十年的写作经验，但她总是这么虚心地向人求教，连对我这样的人也不例外。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喝过午茶之后，她邀我到她的房间里把她经过多次修改然后用打字机誊清的《伟大的道路》草稿递给我，我看过后，深深被她的作品中的气魄和描写才能所感动。我也了解到史沫特莱就是这样从来不以为自己的文章高于一切的谦虚的人。

她的表情是时时变化的，有时当她内心深处痛苦时，她的面部皱纹紧蹙加深而显得愁闷不乐，但在心情开朗时，她总是笑容满面露出一一种纯真优美的样子，她那随着感情而剧烈变化的容貌是较为复杂的，但在这一天下午我们的相聚，我发觉她的蓝色的眼瞳非常的美。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我再度来到耶德庄。她还在继续写《伟大的道路》。这时，印度即将宣告独立，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写信来聘请史沫特莱作为印度政府的顾问到印

度去，早在她为支持印度的独立活动而被捕入狱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说过等印度独立后欢迎她去印度。现在果然邀请她去印度去了，她激动地紧捏着那封信，手不住的在颤抖，她的内心是多么的波动。

但是，她决定不去印度了，她决定在《伟大的道路》完成前暂时不去。住在耶德庄的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也表示支持她的主意，而我却表示不同意。我觉得书可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写，印度之行却不可缓，何况到印度后仍可继续写作。但是史沫特莱却认为她为了研究《伟大的道路》的时代背景已将全部精力耗尽了，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越是深入研究越是感到深邃广博，所以她决定不去印度。

从一九四七年起，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转变。凡是同情新中国反对蒋介石的人，暗中都遭到了迫害，史沫特莱的文章和讲演受到很大的阻挠，甚至她在耶德庄的住处也有联邦调查局侦探的踪迹，在这种压迫下，她离开了耶德庄到新泽西州的奈耶克村朋友家里居住。

她并不因遭遇到这样的打击而气馁，但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在生活上几乎失去全部收入而不得不仰仗朋友。尽管如此，为了完成《伟大的道路》，她仍然继续全力从事写作。然而更不愉快的事转眼又来，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国当局突然以“苏联间谍”的名义来诬蔑她，使她成为轰动一时的报纸头条新闻人物；美国当局诬指她为“左尔格”事件^①间谍组织中的一员，对这种无中生有的诬蔑，她立刻勇敢地站起来，同美国政

^① 左尔格是德国人，任职德国驻日大使馆，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他和另一个日本人尾崎秀实被指为苏联间谍而被判处死刑。——译注

府斗争，直到她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最后，美国陆军当局宣布撤销它们指控她为“苏联间谍”的诬蔑，但是，美国陆军当局的撤销声明故意在报纸上用极小的地位刊载，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加在她头上的“间谍”诬蔑一时还洗刷不清。随着美国的反共政策而起的是疯狂的麦卡锡主义活动。美国的一些进步的亚洲问题专家先后被麦卡锡主义所吞噬，而史沫特莱便成了美国反共大纛下的第一件祭品，连她的朋友也遭到迫害。她所寄居的这位朋友家庭中，首先是母亲和儿子的职业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虽然他们已在社会上独立并且各自成了家，但在那种日益激化的反共高潮里，由于他们和史沫特莱的关系，处境是非常危险的。美国的这种恶毒的反共迫害不是身受者也许不能领略它的滋味。史沫特莱恰好处在这股“反共旋风”的中心，处境之苦可以想见。她从朋友家中搬出来后便到了纽约，她打算租一间房屋安身，但是房东们一听到她的姓名马上就回绝了。她无法可想只得出高昂的代价住到旅馆里。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胃溃疡毛病时时发作，深以为苦。

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受到了一些阻碍。这时，曾出版过她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的一家美国第一流的权威出版社就和她商量，要她在《伟大的道路》的结尾加上诬蔑新中国的文字，史沫特莱立刻拒绝了出版社的要求。美国的言论自由在这里又出了一次丑。记得她和我谈起这件事时，使我也深切地感到美国是在剧烈地变着，而她说话时那种忍辱负重和沉痛的表情，我至今犹能痛切地回忆到。

史沫特莱居住的旅馆离我的住处不远，大约步行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里，她每天埋头

创作，只是在黄昏时分才偶见她出来略事散步。就在这一年的夏初，印度总理尼赫鲁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来访问。史沫特莱早在一九二七年时就和尼赫鲁是文字之交，但她从未去过印度，当然也从未和尼赫鲁见过面。这次听说尼赫鲁来到美国，她便写了一封信给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转交尼赫鲁，信中表示希望能和他见面。在此以前，她曾因《伟大的道路》尚未完成而回绝过印度方面邀请她访问印度，后来，尼赫鲁曾回信对此表示遗憾，并且说，俟她将《伟大的道路》写完，一定再度请她到印度去。

然而，这次却没有得到尼赫鲁的回信，一连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音。这使她百思不解，不知道是否尼赫鲁不愿会见她。不久，尼赫鲁结束了对华盛顿的访问来到了纽约，在一次新闻界海外特派员俱乐部的宴会上，史沫特莱的一位友人，也是尼赫鲁相识的记者，坦率地向尼赫鲁问起史沫特莱的信件问题，当时这位首相大感诧异，原来他压根儿就没有接到史沫特莱的信。尼赫鲁并且表示他很想会见史沫特莱谈谈关于她所知道的中国的事情，他托付那位记者请史沫特莱当晚就打电话给他。

她挂电话过去了，接电话的一个男人自称是随总理从印度来的随从秘书，但说的却是道地美国口音的英语。史沫特莱在答复了对方询问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后，还说明是应总理口头约会特地打电话来的，那秘书竟然答说：“这可不行，尼赫鲁总理非常忙，他不可能接见你。”当史沫特莱再问他：“你究竟是谁？”时，对方没有回答，索性“嗒”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尼赫鲁总理的随从来到了旅馆，并且约请史沫特莱在本星期四上午见面。她接受了这个约会，但为了稳妥起见，她又打电话到尼赫鲁的住所。这次接电话的依然是上次美国男人的口音，他说了“总理绝对不能接见你”之后又把电话挂断了。

在星期四的前一天晚上，史沫特莱、我和其他五个朋友一起在她的密友密尔德雷·科依夫人（史沫特莱的好友之一，史曾遗嘱在她逝世后将她的全部著作权益委托她处理）家里偶然相聚在一起，从史沫特莱的谈话，我们知道是谁在阻挠着她和尼赫鲁的会见。据说，作为美国国宾的尼赫鲁在美国的一切活动，不论何时总有一个不愿使人看清面貌的男人紧跟在身边。他专管接听电话，调查来访客人名单，以及调查信件等工作。那天我们一同回家，途中穿过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拂面轻风带着绿叶的清香，十分爽快，天空闪烁着初夏的繁星，我们只是信步走着，不自觉地陷入沉思中，偶尔只是在林荫的阴暗中互相望一下对方略带白色的脸孔。在我的脑海里，种种思潮起伏不停，我还在想，尼赫鲁总理在纽约逗留时日很短促，他一定会向史沫特莱问起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吧！史沫特莱在明天的会见中会不会再碰到障碍呢？她是否能见到总理呢？最后，我和史沫特莱分别时约好她明天把会见的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的中午，史沫特莱果然打电话来了，大概是她刚会见过尼赫鲁吧，我拿起电话筒，听到有一种吱吱的怪声，我吃了一惊，自忖莫不是有人偷听电话吧。后来我见到她说起这件事，她说使用旅馆电话，确会被人偷听，但她这次是借公用电话打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事实上，即使在尼赫鲁总理

的周围，表面上虽是一片欢迎的气氛，但是他们也同样受到这种暗中窥伺的待遇。

在这次会见中，史沫特莱就她所知关于中国的情形详尽地告诉了尼赫鲁。她说，尼赫鲁象一个哲学家似的态度，两眼注视着史沫特莱，细心地听她所说的一切。最后，史沫特莱告诉总理，说希望他能亲自到中国去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尼赫鲁答复说，“我目前很忙，恐怕不能到中国去，若是我不能去，我一定会派专人到中国去研究中国问题的。”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她携着未完成的《伟大的道路》手稿到英国去了。她的原计划是一俟写完这本书便再到中国去访问。但是在美国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的史沫特莱，她的自由也同时被束缚了。美国政府一直迟迟不发下她的出国护照，经过几许折冲好不容易护照发下了，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也着实为她非常高兴。

一九四九年秋末的一天，她来到我的住处向我告别，说她第二天就要乘船离开纽约了。她嘱咐我明天不要送她上船，因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会跟踪她，若是被特务们看见就麻烦了，她特别叮嘱说，“你不是美国人，对这些要特别注意。”她的用心实在细致，连很小的地方她都考虑到了。

史沫特莱在伦敦定居以前，住在一个在中国认识的朋友家里。当时英国正闹粮荒，她从美国带来了一些准许进口的食品罐头，当作礼物送给她的朋友。她们八年不见，这次相逢感到莫大的愉快。当时，史沫特莱在从英国寄给友人的第一封信里，字里行间充满了她那朴实纯真的愉快心情，她详细地说到携带鸡蛋到英国来如何的困难，她如何同船员成为朋友，同伦

敦老友重逢如何快乐。这年的圣诞节来临前，她还写信到美国，并且附去支票，请美国的朋友替她买些糖果，寄到英国，好让她在参加友人之女举办的圣诞舞会时，赠送礼品。对史沫特莱来说，她的心情在这一个短时间内是比较愉快的。

这时，史沫特莱才能比较安定地全力从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了。但不幸的是，这时病魔开始向她侵袭，就在这年过后的第二年四月间，我突然收到她一封用钢笔在拍纸簿上匆匆写就的短信。信中说：“……健康不良，已卧床三个星期，因有内出血症状，定是胃溃疡无疑。医生说要动手术，但费用极昂，而且要割去五分之一的胃，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很担忧这样既不能工作，又不能行动，仅赖牛奶度日的生活。……”事实上，她的病是由于多年来受尽黑暗势力的迫害、自由被剥夺以致身心极度憔悴积郁而成的。

作手术后不久，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①，史沫特莱不幸逝世。她进医院后，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写下了她的遗嘱，她除了在“手术志愿书”上签字外，还用书面说明《伟大的道路》的大部分手稿在她的箱子里，一部分在她写字台上，还有一部分在带到医院的黑色皮包里。史沫特莱直到她临死的一天，还不忘整理《伟大的道路》原稿。在她的遗嘱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她在遗嘱中要求在她的葬礼中奏出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并且要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中国。

^① 应为五月六日。——校注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和史沫特莱那天晚上在纽约的相会，竟成为生离死别的一次见面。记得那晚我送她到旅馆门口，目送她的背影缓步走下台阶，我还对她说：“好好干吧！下次我们也许在中国见面哩！”我知道她视中国为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会见她是很可能的。

史沫特莱终于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之中了，如果我现在去中国的话，我不能不想到，史沫特莱将会用她那爽朗的笑容来欢迎我，她将会用优美的歌曲对我唱出“我们亚洲人……”

我在想，如果有机会让我把这部《伟大的道路》的首版日译本献在她墓前的话，她在冥冥之中一定也会感到快乐吧！

（原载《伟大的道路》日译本。鲁丁译）